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二）

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

主 编

宋永毅

编 委

石之瑜 丁抒 周原

沈志佳 郭建 周泽浩 王友琴

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编委会 编纂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出版

2002

编制说明

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编委会 编纂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制作及出版

主编：宋永毅

2002

编委分工

宋永毅（美国狄金森大学，主编；第一、三部分编辑并合作编辑第六、七部分）

石之瑜（台湾国立台湾大学，项目负责人，合作编辑第七部分）

丁 抒（美国诺曼学院，第四部分编辑）

周 原（美国芝加哥大学，第二部分编辑）

沈志佳（美国匹兹堡大学，第五部分编辑）

郭 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英文目录翻译）

周泽浩（美国宾州约克大学，英文目录翻译）

王友琴（美国芝加哥大学，合作编辑第六部分）

本项目获下列学术机构和研究基金会的大力资助

特此鸣谢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 Development Committee, Dickinson College, Carlisle, PA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Faculty Research Grant,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CO
Faculty Development Fund, Normandale Community College, Bloomington, MN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Committee, York College of Pennsylvania, PA

总导言

宋永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不仅在中国当代史上，而且在整个世界史上也写下了极为重要，又极为复杂的一章。已故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这样评价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诚如费正清所言，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与复杂性而言，它毫无疑问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China Watc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58)。

文革首先是一场历史悲剧。毛泽东和中共因为党内斗争而发动的所谓“革命”，使数以百万计无辜的中国人失去了他们的宝贵生命，又使数以亿计的普通百姓及其家庭创巨伤重。此外，文革使知识贬值，文明扫地；还使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惨遭破坏。从这个角度，中国作家巴金早在1986年就发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的呼吁（《十年一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166 页）。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官方二十年来对这一呼吁一直噤若寒蝉，有意任其湮灭。在最应当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中国大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却成了巴金可能终生都无法实现的梦。

文革又出乎意料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整个政治和经济面貌。当毛泽东和中共把他们原来就错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在文革中推向灾难性的顶峰后，稍有良知的人不难认识到那套“主义”的疯狂和荒谬了。这也就是连文革后的中共领导人都终于被迫走向改革开放的社会动因之一。至于文革所激发的对所谓“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普遍怀疑和对大陆文革后民主运动的重要推动，又更是有目共睹的史实。从这一角度，文革在半个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更值得深入持久的认真研究。

文革结束已经有近三十年了。作为一个历史学的研究课题，海内外的文革研究呈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景观。一方面是“说不尽的文革”，即文革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持久的研究热点。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到1996年三十年内，全世界各种语言的研究文革的著作，就达七千本（篇）（参见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Bibliographical Series, Harvard University，1998）。另一方面却是“被禁忌的文革”，即在中国大陆它还是一个犯禁的独立研究课题。然而，大陆的学者和作家们仍以回忆录、报告文学等等形式书写文革。但是，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学者还是国际汉学界的文革研究都还存在不少困难。其中很重要的是原始的历史资料和系统性的整理工作的双重缺乏。文革中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出版物可谓浩如烟海，但文革后中国图书馆中的许多这类收藏都无法自由查阅。另一方面，收藏在民间和海内外学者手中的不少可贵资源又因为缺少一个资料信息的共享工程，无法发挥它们的最大作用。由此，海内外文革研究中由史料问题引发的史实的错讹、真相的曲解和研究的空白仍普遍地存在，阻碍着这一重大研究课题的进展。

从总结历史教训，揭示历史真相，推动文革研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目的出发，北美地区来自中国大陆的七位学者和一位台湾学者于1998年组成《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编辑部，开始了这一筚路蓝缕的浩大的史料编纂工程。很快，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台湾、香港和大陆学者的大力支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还成了合作单位。三年多来，编者们走遍了世界各地的亚洲图书馆，征集了众多的私人收藏，抢救了无数第一手的文字资料，在数以百万计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中进行专业性的编辑校勘，汇集成了这一光碟中的上万篇文献。

汇编在这一光碟中的史料，限于第一手的文字资料。虽然也有一些文革后与文革密切相关的文献，但回忆录、访问记等等的二手材料均不在收录之列。就数量而言，已经有近三千万字之巨，共分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和公报”、“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中央首长关于文化革命的讲话和指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等七大部分。为了方便中外学者查阅，文库还采用了中英文两种目录。

如此巨大的史料容量，如果采用传统的印刷出版，可能有数百本之多，连存放都很不方便。而现代计算机技术却使它们能浓缩在一盘体积极小的光碟之中，而且还能够运用“作者”、“标题”、“时间”和“关键词”等等途径检索。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这个文库光碟正借助于现代科技，在史料汇编方面完成了一个研究性和资料性并重的“文革博物馆”。

2001年12月

于美国狄金森大学

序言

余英时

宋永毅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费了整整四年的功夫，历经种种艰辛，编成了这一部《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这部文库收集了一万篇以上的原始文件，总字数接近三千万，真不愧为一项“浩大的史料编纂工程”。《文库》以类相从，分成七个单元，所收的都是第一手资料，为将来研究文革的学人提供了最方便、最重要的原始资料汇编。参加这项计划的八位学者，包括宋永毅先生在内，都是卓然有成的专才。他们各自在专业的岗位上，利用公余的时间，遍访世界各地的亚洲图书馆，搜寻一切有关的文件。这一困苦的过程，只有“集腋成裘”的成语才能勉强形容其万一。英国著名史学家屈维林 (G.M. Trevelyan) 有过一句名言：“去收集法国大革命的事实吧！ 你一定要下至地狱，上至天堂，去把它们找回来。”（Collect the fa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You must go down to Hell and up to Heaven to fetch them.）无巧不成书，现在《文库》的八位编者竟在无意之间把这句名言实践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这一任务上。宋永毅先生还真的下过一次地狱。我清楚地记得，几年前他为了收集资料，失去了几个月的自由，成为当时举世瞩目的国际事件。没有史料便根本不可能有史学，所以作为史学园地中的一个耕耘者，我必须在这里向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致以最大的敬意。

我细读了《文库》的全部目录之后，好像重温了几十年前的一场噩梦。第五部分的报刊社论是我最熟悉的；这些文字当年是顺着发表的次序，一篇一篇读过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现在又整个地从记忆中陡然复苏了。我不过是文革的一个海外旁观者，情绪尚如此激荡，《文库》编者是曾经身历其境的人，他们在长期编纂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精神痛苦，更可想而知。这样看来，《文库》所收的一切文件决不能和一般所谓历史档案等量齐观，因为其中仍然跃动着强烈的生命。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每一个文件的后面都隐藏着数不尽的血和泪。我们不难想象，当年每一个文件发布的前后，有多少活生生的个人遭受到精神的屈辱和身体的摧残，更有多少本来很幸福的家庭顷刻之间变成“家破人亡”。研究《文库》中的文件，若不能接触到背后那些无数淹没在血河泪海中的生命，便不免空入宝山了。

宋永毅先生在<总导言>中指出了关于文革研究的一个奇特现象：即一方面是海外有“说不尽的文革”，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却是“被禁忌的文革”。1978年以后，中共官方事实上已完全否定了文革，我们只要一读《文库》第一部分有关中共文件最后十一年（1978－1988）的目录便已昭然若揭。但是在同一时期，我们又看到了许多关于文革研究的“禁忌”的规定。最明显的是197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提醒全党维护毛主席形象的通知”，198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共为什么如此自相矛盾，一方面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维护文革呢？答案并不难找：1978年后，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班子都是被文革打倒的人，他们如果不否定文革，在党内便没有合法性了。但是文革的根源如果步步追究下去，到达其逻辑的终点，则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却又将成为问题了。“投鼠忌器”，这是中共不得不为文革研究设下许多限制

的根本原因。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之所以得不到官方的任何回响，是丝毫不必奇怪的。

“被禁忌的文革”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怎样认识和研究文革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什么启示呢？我们决不能把文革孤立起来，看作是中共“革命”进程中一个偶然的“意外”或“偏差”。中共官方今天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便是有意误导我们的思路。文革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动，而且是革命暴力的最高阶段。但这既不是“意外”也不是“偏差”，而是革命暴力落在一个绝对独裁者掌握之中的必然结局。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曾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有系统地进行消灭所谓“敌人”的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正如俄国史名家派普思(Richard Pipes) 所指出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师法列宁、斯大林，而且也参考了希特勒的经验。（见,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A.A. Kropf, 1993, p. 281.）列宁在建立政权后的第二年，即1918年9月，正式采用了“红色恐怖”（Red Terror）的统治方法。毛泽东一切照抄，也在1950年藉口“土改”和“镇反”，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红色恐怖”从此便笼罩着中国的大地，文革不过是最后一个高潮而已。《文库》第六部分收有红卫兵的一篇文献，题目是“鬼见愁——红色恐怖万岁”，恰好证实了文革是“红色恐怖”的必然发展。

我们衷心地欢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问世，为革命暴力蹂躏中国，保存了最宝贵的记录。但是研究文革首先必须具备历史的眼光（historical perspective）：它的近源是1949年的巨劫奇变，远源则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文库》的价值才会充分地显现出来。

2001年12月20日
于普林斯顿

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

周原 编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策划者和发动者，也是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最高领导者和决策者。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研究它的发生、发展以及它扑朔迷离的演变，不可不研究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及其演变。虽然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思想和意图，常常会在众多的历史文献中得到反映和体现，诸如中共中央的文件、通知和规定，其他文革领导人的讲话，中央级报刊的社论和“理论文章”等等，但最为直接地记录其思想发展及衍化者，莫过于毛泽东本人留下的有关言论和文字。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毛泽东一生政治生涯中十分重要的阶段。作为中共的精神领袖，他在国家和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独尊地位达到了顶峰。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讲话、指示，也留下了相当多的文字如文稿、信件、批语等等。这些言论和文字有些已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不同程度的流传，但也有相当的部分至今仍存于官方的档案馆，秘不示人。那些秘而不宣的文献自然非本汇编所能搜集。收在这里的毛泽东的言论和文字则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选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文稿》）；二是部分通过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印发和传达的毛泽东的讲话、指示；三是在文革前期出版印行的（主要是由各群众组织和后来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所编印的）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及指示；四是在文革中流传的一些毛泽东讲话的记录传抄稿。另外，有几篇毛泽东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前巡视南方时的讲话是来源于汪东兴回忆录（《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中的记载。对于这些以各种形式得以流传的毛泽东的言论和文字，编者做了尽可能广泛的搜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选编。但囿于能力，漏收漏选者必是在所难免。这只能有待于今后的补收和修订了。

从时间跨度上，汇编所选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始于1960年，终于1976年（毛卒于该年）。文革是1966年开始的，选收部分1966年以前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稿是考虑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想法非一日所成，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文革前几年应是这一发展过程的最重要阶段。至于断在1960年，则是基于以六十年代为开端简单明确的考虑。在选收标准上，1966年以前的文献只选最为相关者（如毛泽东论及国内国际形势、阶级斗争、四清、教育革命和知识分子等问题的谈话、批示），而1966年以后的文献，除两类情况外，基本都予收录。这两种例外的情况一是无实际内容者，如“照办”、“同意”及退转、酌定一类的批语。二是一些外交方面的电报、信件等，例如《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5日）。

在编选过程中有关选取版本，确定编选内容的一些具体做法，在此也一并说明。一般说来，汇编只收讲话、文稿本身，不收后人（多为编者）添加的题解、注释等内容（原件本身已有的简注除外）。当一篇讲话或文稿有多种版本时，特别是对那些在文革初期由群众组织或革命委员会编印，以各种版本广泛流传的文献，编者都经过认真比照，确定底本，再经参互勘订而成定本。原则上，凡有《文稿》版的或有以中央文件印发过的版本

的，即以文件版或《文稿》为准，遇到少许文字或内容被后人明显删改过的情况，则根据其它版本予以补订，以求原貌。对两种版本内容上差距较大的个别情况，则采取两种并录的方式处理。

总体上说，汇编收集到的《文稿》所未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文革以前和文革初期，即1960至1969年间。文献的主要来源是文革初期由各种群众组织或后来的革命委员会编印发行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讲话文稿（通常以《毛泽东思想万岁》为题）和有关学习材料。这些出版物当然不具备官方出版物的权威性，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在当时广泛大量地印行，发给群众学习引用的毛泽东的讲话与文字，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被官方指斥为伪造。有一些讲话中的段落、节录甚或全文在当时或以后还被官方公开发表，证实了它们的可靠性。事实上，公开正式发表的版本也不尽全是原貌的真实反映。在汇编的编校过程中，就能发现一些正式发表的版本有不少地方是做过润色、修改甚至删除处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始记录稿和当时非官方印发的版本在考订文献原貌方面，还有着特殊的功用。而本汇编所收录的那些至今尚未（也许永远不会）被官方正式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献则是尽可能全面地研究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思想及其发展演变的一部分难得而宝贵的资料。

1960 年

印发《纳赛尔与社会党全面破裂》材料的批语

毛泽东

1960.01.14

印发各同志。看，阶级斗争是何等尖锐！资本主义世界都是如此，不可能有例外。社会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也还是存在的。

对七省市和十四个重点企业一季度工业生产安排情况的批语

毛泽东

1960.01.23

各同志阅，直退毛。准备谈一下此问题。
看来，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

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0.03.02、04

华东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在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一段批语

毛泽东

1960.03.15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件，《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件，《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件，都好，使人看了高兴。现在发给你们研究、参考、仿行。其中放在括号内的一些指示性的断语，是中央加上去的。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充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工厂、矿山、街道、机关、学校、团体、军队的公共食堂，一律照此办理。

中央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0.03.22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〇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关于反华问题

毛泽东

1960.03.23

附件请同志们一看，这是我国在巴基斯坦开设展览会的一件材料。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假定说一百个人中有十个人反对我们，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中，不过只有二亿七千万人反对我们。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况如同一九四九年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在我们六亿五千万人中真正反共的，最多不过百分之十，即是说，不过六千五百万人而已。而五亿八千五百万人则都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暂时怀疑的。巴基斯坦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在新德里展览的各国农业馆，在所谓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民群众达三百五十万人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馆。我劝同志们，对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所以他们反华，对于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对于他们说来，是坏事，不是好事，是他们的不祥之兆。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一九四六年全面大进攻，只有三年半，他就被人民打垮了。这件事是人人明白的。现在的外国人反华，不过空口骂我们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我们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希特勒、东条英机的结局。请同志们想一想，假如上述占百分之十左右的坏人或半坏人，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说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我们岂不成了背叛马列主义，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者吗？还有一层，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这个题目也不能永远借来反华，因为他们亏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相信他们的话，每天反下去，他们越站不住脚。美国和我们的仇结得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其原因也是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题可借，再来掀动反华。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的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

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我们有苏联的先例可资借鉴。在过去几十年中，凡是反苏的都没有好结果。反得最凶的是武装进攻苏联，这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的猖狂进攻，其失败也最惨。因此，我劝同志们利用巴基斯坦这件材料，想一想我们的任务，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想通这个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着世界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性地反对我们。所谓长期，至少要打算十年，甚至会有整整二十世纪的后四十年。如果给我们四十年时间的话，那时候世界情形将起大变化，那百分之十的坏人或半坏人的多数或大多数很有可能被他们自己的人民所推翻，而我国则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一吨钢，平均每人有二千斤至三千斤粮食和饲料，多数人民有大学的文化程度，那时人们的政治觉悟水平和理论水平将提到比现在高得多，整个社会很有可能在那时候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中央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

毛泽东

1960.03.23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委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帐，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毛泽东

1960.03.30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中央在1960年3月下旬根据由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这个文件，谅必你们已经看见了。在这个文件中曾经提到，现在就要利用六级和四级干部大会公开指出三反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关于三反，中央将在四月上旬有一个规定范围和如何处理各类犯错误分子的指示，发给你们。但你们不要等候这个文件，而应利用当前正在开或准备开的六级和四级大会立即号召整风，并作典型调查，使自己心中有数。中央现在所要着重地告诉你们的，是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历城县委在今年三月十四日报告山东省委说，他们那里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给你们看看。其中说到会议多和文件表报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县委及县委各部门，自今年一月一日到三月十日，七十天中，召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有184次，电话会议56次，印发文件1074件，表报599份。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定出办法，克服五多五少。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法推到全省施行。同志们，这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个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不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请你们各自调查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知道底细了。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理。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的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后来没有再过问（主要指五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本文及附文，应登党刊。

十年总结

毛泽东

1960.06.18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cha，左“山”右“查”］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cha，左“山”右“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限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一六五〇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一三〇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〇年六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上一定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

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〇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帐。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

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

1960.11.15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1961 年

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一）

毛泽东

1961.01.13

这次工作会议，据我看比过去几次都要好，大家头脑比过去清醒了些，冷热结合得好了一些。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些。这次比过去有了进步，对问题有了分析，对情况比较摸底了。当然，有许多情况还是不摸底，中央和省市都有这样的情况。譬如对一、二、三类的县、社、队比较摸底：一类是好的，执行政策，不刮共产风；二类也比较好；三类是落后的，不好的，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全国县、社、队有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一般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一个具体地方，坏的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但是，究竟情况怎样，也不是完全清楚，也不完全很准确，只能说大体上是这样。不要以为一、二类社、队都是好的，其中同样也有坏人，三类队中也有好人。××同志批了河南灵宝县的一个报告，指出了一、二类社里也有问题。真正把群众发动以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群众是摸底的，公社是摸底的，就是我们不大摸底。总的看，好的和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还是好的多。群众知道好坏，就是领导不摸底。我们要有决心。这些地方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要派大批干部去，深入发动群众，扎根串连，找出贫农和下中农的积极分子，采取两头压的方法，否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灵宝县一、二类社尚且有很多问题，也还有坏人，何况三类社？现在我们虽然还不完全摸底，但已向这个方向进了一步。今后好好地进行调查研究，就可以更摸底。譬如粮食产量究竟有多少？现在比较摸底了。口粮搞低标准，瓜菜代，粮食过秤入库，比较摸底了。但也有地方不摸底，河北省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不摸底。口粮标准有的不按省里规定吃，吃多了。

至于城市工业问题，比较接近实际。今年钢只定××××万吨，煤、木材、矿石、运输还得搞那么多。煤的指标要增加，不但冬季烧煤不够，而且发电用煤也不够。今年着重搞质量、规格、品种。钢的产量已居世界第六位，数量不算少。目前是质量不够，所以今年不着重发展吨数。

省委书记、常委，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究竟摸不摸底？他们不摸底就成问题了。应该说现在比过去进一步，也在动了。要用试点方法去了解情况，调查问题。调查不需要很多，全国有通海口一个就行了，但现在也只有这么一个报告。三类社队的问题，有信阳地区的整顿经验的报告，那么整顿三类社、队的问题就够了。还有河北保定的一个材料很有说服力，这个报告说什么时候刮共产风，如何纠正，如何整顿组织，如何改进领导，以及怎样实现大生产。现在河南出了好事，出了信阳文件、纪登奎的报告。希望大家回去后，把别的事放开，带一两个助手，调查一两个社、队。在城市也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城市人民公社。

省委第一书记只有那么一个人，怎么能又搞农村又搞城市呢？因此要有个助手，分头去调查，使自己心里有底。心中没底是不能行动的。过去打仗，心中有底，靠什么？解放

战争时期，中央直接指挥的经验少，但有两个办法：一靠陕北打胡宗南的经验，到四七年四、五月间，就靠各地区前方的报告，这是阳的；还靠阴的，即各方面的情报，所以情况很清楚。现在这些情报没有了，死官僚又封锁了消息，中央就得不到更多的消息。

我们下去搞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不是用别人的眼睛），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用嘴去讲，要开座谈会。看粮食是否增了产？够不够吃？要察颜观色，看看是否面有菜色？骨瘦如柴？这是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保定的办法是请老农、干部开座谈会，与总支书、支书谈，群众也发言议论，这些意见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

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作调查研究也并不那么困难，人不要那样多，时间也不要那么长。在农村有一两个社、队，在城市有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学校，一两个商店，合起有七、八个，十来个，也就行了。也不必都自己亲自去搞。自己搞一两个，其它就组织班子去搞，亲自加以领导。保定的报告是农村工作部搞的，是个大功劳。通海口是省委派人下去搞的。灵宝县的报告是纪登奎同志下去搞的。信阳的报告是改造后的地委下去搞的。

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所有省委书记，常委，各部门负责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党委书记、委员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不作，情况就不清楚。公社有多少部门，第一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一个公社有三十多个队，公社党委只要摸透好、中、坏三个队就行。

做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资产阶级是讲调查研究的。美国发言人总是说胡志明的军队进入老挝。但究竟进去什么兵、什么官、什么兵种，他们不说。资产阶级比我们老实，不知道就不讲。我们有时没有底。呱哩呱啦一套。但是资产阶级也有冒失鬼，资本主义国家有个杂志说，从五一年到六〇年，就把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消灭掉。

这次会议，情况逐渐明朗，决心逐步大。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同志讲刮共产风要破产还债，听起来这句话不好听，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区、社各级通通破掉就好了。破掉以后再来真正的白手起家，过去是黑手起家。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削者，这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现在这种黑手起家是掠夺来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剥夺劳动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方法比我们还高明，他们是逐步使劳动者破产欠债。我们是一下子平调，用这种办法建立社有经济、国营经济。我们的国营经济赚钱太多，到农村中去收购，常常压级压价，剥夺农民，交换非常不等价。这就使工人阶级脱离它的同盟者——农民。这个道理，同志们也懂得，说也好讲，但实行起来决心不大，不那么容易。是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还得看看。这也是不平衡，各省也会是参差不齐的。可能有的省决心大，彻底一些，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有些省决心不大，作得差些。一省之内，几十个县也会是不平衡的，因为领导人的情况不同。一类县、社、队有百分之三十，共产风刮了一下，停得早，五九年三月郑州会议后就停下来了。他们懂得不能剥夺农民，不能黑手起家，决心大，退赔得彻底，以后就不再刮了。有些改变得不彻底，一次再一次刮共产风。去年春季，中央情况不明，以为

共产风不很严重，所以搞得不彻底。其实去年春季就应该开这样的会，纠正共产风，可是没有开。我们对情况不够明，问题不集中，决心不大，方法也不大那样对头。不是象现在信阳、通海口、保定、灵宝的方法。所以这件事是个大事情，这是一场大斗争。要在实践与斗争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农忙过后还要再搞。一、二类社、队的问题也还不少，还要抓紧搞，下决心搞彻底。总而言之，过去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头，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利。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说不算账，不退赔，这点不对，后来改过来了。上海会议十八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报告。五九年三、四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得不够彻底。现在省委、地委同志认识比较深刻了。

工业开始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要缩短工业战线——重工业战线，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要延长农业战线，轻工业要发展。重工业除煤炭、矿山、木材、运输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设。过去搞了的有些还要搞，但有些也不搞，癞了头就让它癞头去吧。

长远计划现在搞不出来，我们要再搞十年，从六〇年到六九年。这是个革命。中国的封建主义搞了那么多年，民主革命也搞了那么多年，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陈伯达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是否也有个周期率，若干年发展较快，有几年较低。如同行军一样，有大休息，中休息，小休息，要劳逸结合，两个战役间要休整。这次工作会议也有劳有逸，决议文件也不多，开会也不是一直开。过去决议文件多了不灵，少了也可能不灵，譬如郑州会议就只搞了那么一个决议嘛。还是看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头。

现在看一个材料说：西德钢产量去年是三千四百万吨，英国二千四百万吨，西德六〇年比五九年增加百分之十五，法国是一千七百万吨，日本是二千二百万吨。但他们的生产率是长期积累的，搞了那么多年，才那么多。我们才几年，就一千八百多万吨。今、明、后年，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让帝国主义说我们大跃进垮台了，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要提高质量，增加规格、品种，加强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我们劳动生产率很低。五七年我们职工有二千四百多万人，现在有五千多万人，还要下放。不然，五六个人围着一台机器，一个人作，几个人看，这不行。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陈伯达同志有个材料：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养活三十个人，英国二十六个人，苏联六个半人，我们只有三个半人。有人说我们也可以养四个人，那就看你怎样养了，如果一天只吃几两米，那不行。

国际形势我看也是好的。原来我们讲要硬着头皮顶住，准备顶它十年。从前年西藏闹事到现在，不过二十多个月，现在反华的空气大为稀薄了，但空气还是有，有时还有寒流。莫斯科会议以后，空气还好一些。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实事求是是汉朝的班固在汉书上说的，一直流传到现在。我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最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就不注意去摸情况

了，摸不了底了。今年要摸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连队，一个城市人民公社，不搞典型就不好工作。这次会议以后，我就下去搞调查研究工作。总而言之，现在摸到这个方向，大家都要进行。不要只讲人家坏话，有的地方工作有错误，人家改了，就要欢迎人家。

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二）

毛泽东

1961.01.18

这次会议，因为经过二十天的工作会议的准备，开得比较顺利。今天想讲一讲工作会议上讲过的调查研究问题，别的问题也讲一下。

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几次路线错误，在解放后又出过高岗路线。右的不搞调查研究，“左”的也不搞调查研究。那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和策略方针，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长时期没有得到解决。自从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十四年间，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大革命遭到了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到了损失，长征损失也很大。在遵义会议后到了延安，我们党经过了整风，七大时又通过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王明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八年我们积蓄了力量，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比较注意搞调查研究，情况比较清楚。对革命那一套我们比较熟悉，那时情况也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几亿人口，情况比较复杂了。过去我们有过几次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立三路线的错误，王明路线的错误等等，有了几个比较，几个反复，容易教育全党。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给他挂上这笔账，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出了乱子的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系，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实际上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直接同盟军。因为死官僚不顾人民死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整社是把干部排队，分分类：

第一类，地、富、反、坏夺了领导权的。

第二类，有些干部蜕化变质。

一、二类问题是敌我矛盾的问题，要按敌我矛盾去处理，整社时将这一类干部整掉。是反革命分子，还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法律处理。

第三类，死官僚。是不顾党的政策和群众死活的。这类矛盾虽仍属人民内部矛盾，按内部矛盾处理，但必须严肃处理。撤消领导岗位，进行教育改造。凡愿改正错误的，要叫他在实际工作中改正。

还有一类是心中无数，政策无底，糊里糊涂，工作不好。是第四类。

头脑一般的还清楚，政策水平一般，有些问题不那么清楚，工作也不很好，是第五类。

头脑清楚，政策界限清楚，必中有数，工作做得较好，共产风传达后即不刮了。是第六类。

根据以上六类，就全国说，大体上一、二类百分之三，第三类百分之六到七，一、二、三类大体占百分之十，四、五、六类百分之九十或多些，因此从全国说，百分之九十以上干部是好的、比较好的。农村县、社、队占百分之三十好的，百分之五十比较好，坏的仅百分之二十。死官僚在主观上不一定帮助反革命，但实际上帮助了敌人，一部分与他们（一、二类）是直接同盟者或间接的同盟者。凡三类社、队都与反革命、坏人有关。死官僚不顾人民死活，不管主观上如何，实际上是反革命的同盟军。也有一部分是不知道三级所有、共产风刮不得的糊涂人，五类分子就利用死官僚和糊涂人做尽了坏事。

一九五九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二百四十亿斤粮食，硬说有四百五十亿斤，估得高，报得高。出现了四高，就是高指示、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直到去年北戴河工作会议，才把情况摸清楚。现在事情又走到了反面，是搞低标准、瓜菜代，经过调查研究，从不实际走到比较合乎实际。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我讲了五年，庐山会议也讲了，但去年没有实行。看来今年可能实行，我只能说可能实行，因为现在还没有兑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反映了这一点，注意了农、轻、重，就可能变成现实。

对地主的复辟，我们也缺少调查研究，我们进城了，对城市反革命分子比较注意，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让他们分散的大鸣大放，出了几万个小匈牙利。这样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进行了反右斗争，整出了四十多万个右派。搞得比较好，底摸清了，决心就转大了。农村那年也整了一下，没有料到地主阶级复辟问题。当然，抽象的讲是料到的。过去我们总是提出国内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是地主的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

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山会议是要纠正“左”的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当然，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不可抹煞。还有大办文化、大办教育、大办卫生等等，不考虑能不能作。共产风问题，反革命复辟问题，死官镣问题，糊涂人问题，干部问题。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就没有搞清楚，有的摸了，我们也没有讲清楚，或讲清楚了也不灵。郑州会议讲反共产风，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后冬天又刮起共产风。庐山会议前，“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等人，与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国内右派相呼应，打乱了我们“纠”左步骤。去年一年国际情况比较清楚，对国内问题也应该聚精会神调查研究。

工人阶级要团结农民大多数，首先是贫农、下中农和较好的中农，依靠他们对付地主反革命。三类社、队要成立贫农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并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应该纯洁党的组织。经过整风，整顿组织，使党纯洁起来，使绝大多数党员都代表贫农、下中农的利益，同时也不损害富裕中农的利益，坚持不剥夺农民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刮共产风是非常错误的，是剥夺农民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须坚决退赔，经验证明，只要退赔，群众就满意了，情况就改善了。

这次工业计划比较切合实际，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延长了农业、轻工业战线。与农业有关的基本建设还要搞，有的重工业，象煤、木材、矿石、铁路还要搞。上下一本账，不搞两本账，不要层层加码。总之，要实事求是，使一切从实际出发。粮食要过秤入库，不搞四高，搞低标准，瓜菜代，坚决赔退，整顿五风，不准不赔，不准不退。

城市也要整风，正在搞试点，还要一、二个月才能搞出来，也要搞十二条。

今年计划看来比去年高不了多少。有人建议钢仍然搞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到一千九百万吨，也增加不了多少。这个提法有道理。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指标，早已超额完成，还剩两年，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在质量上好好跃进一下，数量上不准备多搞。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会说大跃进垮台了，他们要讲就让他们讲，他们讲坏话也好，讲我们好反而不好，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搞企业管理制度、技术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成龙配套。要搞调整、充实、提高，就是要在这方面努力。英国、日本的钢暂时还比我们的多，再有七年，我们总会赶上他们，并且还会超过他们。能否超过西德，还要看一看。讲打仗、斗地主，我们有一套经验，搞建设还比较缺乏经验，我与斯诺谈话就谈到这一点。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我们只希望不要象民主革命花了二十八年才成功。其实二十八年也不算很长，许多国家的党同我们同年产生，现在也还没有成功。搞建设是不是可以二十年取得经验，我们搞了十一年，看再有九年行不行。曾想缩短很多，看来不行。凡是没有被认识的东西，你就没办法改造它。

工业还是要鼓干劲，不然几次会议一开，劲就没有，泄了二三个月的气，然后再开一次鼓干劲的会，反右倾。大家回去以后，要实实在在的干，不要老算账，搞计划要好好调查研究，搞清情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坚持总路线。有人说现在不用多快了。这不对，搞粮食就要多快嘛！搞工业讲质量，成龙配套等等，也是要搞多快嘛！

团结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核心。庐山会议时有少数人闹不团结，我们希望和他们团结，不管他们的错误有多大，只要他们能改。他们讲你们也有错误。不错，错误人人皆有，但错误大小轻重不同，性质不同，数量质量不同。不要一犯错误就抬不起头来。有的同志工作职位降低了，降低了也好。一年来有进步，不管真假，总是值得欢迎。地方工作的同志有的也犯了错误，欢迎他们改正。

河南、甘肃、山东三省问题比较严重，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现在情况明了就好了。有些地方政权也夺回来了，面貌已经开始一新。甘肃也开始好转，其它各省也总要烂掉若干县、社、队，大体是百分之二十左右，严重的超过百分之二十，好的不到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的一、二类社、队中，也可能查出三类队来。社、队烂掉百分之二十，不光是因为粮食问题。林彪同志讲，军队有一万个单位，烂掉了四百个，占百分之四，这并不是因为粮食问题。这种情况在城市、工厂、学校一定会有。对一二类干部？要按政策清洗出去，死官僚要改造，变成活官僚，长久活不起来的也要清洗。这些人是少数，合起来也不过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其中也有糊涂人。我们也糊涂过，不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南方根据地丧失，白区力量丧失，要长征，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新问题。我们缺少经验，要开训练班，把县、社、队干部轮训一遍，使他们懂得政策。如果一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讲清政策，不训练干部怎么行？每个县都要有一个县委书记真正能懂政策，弄清政策，那就好了。现在中央下放了八千多个干部帮助农村整风整社。大多数农村干部是好的，可靠的，如果大多数是国民党，我们还能在这里安心开会吗？所有一切可团结的人要团结。就是对反革命分子也不能都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才杀。有的要关起来，管起来。杀人要谨慎，切不可重复过去所犯过的错误，如过去搞根据地时杀人多了一些。延安时规定一条，干部一个不杀。现在还关了一个潘汉年，绝对不杀，杀了就要比，这个杀了，那个杀不杀？总是不开杀戒。但是不是说社会上一个不杀，有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民愤很大的人，不能不杀几个。至于中央委员犯了错误，就不牵涉杀不杀的问题，还是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要与各兄弟党团结，与苏联的党团结，要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工人党团结，我们要采取团结的方针。

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专门进行调查研究。

在北京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1.06.12

人民公社问题，在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开了两次郑州会议。第一次会议解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这两次会议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会议开得很仓促，参加会议的同志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开始懂得了一些，还是懂得不多。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上海会议上，通过了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纪要。后来，我给小队以上的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讯”，对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提了意见。在这一段时间内，普遍地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使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逐步地得到纠正。不过，由于各级干部还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按劳分配，什么是等价交换，他们对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许多意见和规定，还没有认识清楚，他们的思想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反右以后，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假象。有些地方有些同志以为从此再不要根据两次郑州会议的精神，继续克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了。一九六〇年春，我看出“共产风”又来了，批转了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小时的会，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华北、西北各省同志开了会。这些会，都因为时间短，谈的问题很多，没有把反“一平二调”、反“共产风”的问题作为中心突出来，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几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是“共产风”又来了吗？一九六〇年北戴河会议，用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谈国际问题，只是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谈了一下粮食问题，没有接触到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同年十月，中央发了关于人民公社十二条的指示，从此开始认真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但是仍然坚持供给制、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作法。而且，在执行中，只对三类县、社、队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整顿，对于一、二类县、社、队的“五风”基本上没有触动，放过去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九中全会以后，经过农村调查，在广州开会，强调提出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着必须解决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这次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然而还不彻底，继续保留了三七开（即供给部分三成，按劳部分七成的分配办法）、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尾巴。经过会后的试点和调查，到这次会议，大家的思想彻底解放了，上面所说几个问题的尾巴最后解决了，大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比过去清楚得多了。由此可见，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任何人不能例外。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经过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挫折，经过了万里长征，经过了三年整风，到一九四五年的七次代表大会，共用了二十四年的时间，才形成了思想上真正的统一，并且在政治上、军事、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实现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具体政策，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过去谁也没有干过，必须在实践中才能逐步学会。我们已经搞了十一年，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积累了很多经验。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

一整套具体政策。现在要好好地总结经验，逐步地把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制定出来。我们已经有可能这样做，并且已经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

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一次是在广州，一次是在杨村，了解了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要搞具体政策，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行的。

形成一整套的具体政策，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还需要十多年。这是一种设想。如果大家都觉悟了，也可能缩短一些。

现在重要问题是要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我们要利用人民公社六十条等文件，作为教材，用延安整风的方法，去教育干部。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思想通了，就要去教育地、县的干部。他们的思想通了，再由他们去教育社、队的干部，使他们真正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教育干部的事情，今年一定要做出一点成绩来。并且一定要长期地做下去。搞民主革命，我们长期地教育干部，搞社会主义，也必须如此。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毛泽东

1961.07.30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〇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〇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61.11.00

对付反革命分子、贪污分子，单是用行政的办法、法律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公安、检察、法院的工作同党的工作、同群众的工作配合起来比较好些。比如讲，铺张浪费、贪污分子，一般的说，单是依靠行政力量是不行的，他们就是怕群众，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要隔几年整一次。即使不是一年整一次，也要几年整一次。比如一个机关，有的几十人，几百人，隔几年贪污就要发生几起。

我们国家现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阶级斗争。过去我们十年没有抓这个问题。从去年起我们准备用几年的时间把阶级斗争的问题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抓一下。不然就很不好搞。有旧的资产阶级残余分子存在，又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做投机生意的、贪污分子等等。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如果现在不整，再过十几年，中国就会出现修正主义。当然他们的人数是少数，大概是百分之几的样子。

我们不主要依靠抓人、杀人，主要靠批评教育。但不是说一个也不杀，一个也不抓。对罪大恶极、人民群众非要把他抓起来的，就非抓起来不可。有严重破坏行为，如杀人、放火、破坏工厂、破坏桥梁等少数分子也要捉起来。不是严重的破坏分子，就是那些普通的破坏分子，他们破坏社会主义，比如放谣言等等。不是严重的破坏分子都不抓。依靠群众监督他们，在劳动中改造。看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我们的经验供你们参考。各国情况不同，你们应该根据你们的情况去做。相信你们会做得很好的。

司法工作不是容易做的工作。司法、公安部门都是专政的工具。

第一条我们相信群众；第二条就是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劳动力，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杀掉，他们的家庭和生产队就丧失了劳动力；第三条，对他们的子女不好做工作，他们的子女要恨我们。所以用教育的办法，就可以避免这些了。对于那些不是严重破坏的分子，我们相信依靠群众可以把他们教育改造好的。他们是劳动力，可以参加生产。这样又可以做好他们的子女和家属的工作，使他们的子女不恨我们。

但是，并不是每个地方的工作都做得好的。有那么一些同志性急，喜欢用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动不动就把人捉起来，或者要求把他们杀掉。把矛盾上交的方法并不是一个好方法。上面不好处理，还不如放在群众中间一面劳动，一面进行教育。至于有少数分子，你们不是看了北京市监狱吗？那就是抓起来的。但抓起来也是为了进行教育改造。

对。我们第一是相信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般地说是可以把人改造过来的。只有个别人改造不过来，那也不要紧，刑期满了放出去，有破坏活动再捉回来。有的放出去一次，他们还要破坏。放二次，他们再破坏。放三次，还是要破坏。是有这样的人的，那我们只好把他长期养下来。把他长期放在监狱工厂里工作，把他们的家属也接来，这就是按置就业。

1962 年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2.01.30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

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情况，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

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家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

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

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 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〇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

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〇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〇 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了。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

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都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

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份，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〇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

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 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

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2.08.06

先开工作会议，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从明天起开始讨论。

少奇同志建议成立核心小组，还有许多小组，解决六个大组不能畅所欲言的问题。核心小组，有党委、书记处，再加大区第一书记、中央各口负责同志，共二十三人。毛、刘、周、朱、邓、彭、富春、先念、震林、伯达、定一、富治、谷牧、瑞卿、陈毅、尚昆，加上各大区第一书记。

（一）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象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这个问题是否谈一下。我同几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话，了解到，有的人听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右派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孙中山就不讲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二）形势问题，也要谈一下。国际问题，要找几个人准备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广大人民各阶层、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

国内形势，谈一谈。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工业上半年不那样好，有主客观原因。下半年怎样？还要看一看。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那种对？如果都不对，是不是应有第三种看法？即不是一片黑暗，基本光明，有黑暗，问题不小，确实很大。回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小，前途光明”。两年调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做得不那么好。以农业为基础，谈了三年，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实际上没有实行。中央的东西，有些没有下去，有些成了废品。所谓没有实行，就是没有认真做，个别做了，或者是做得很不好。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现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三）矛盾问题。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究竟哪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说，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已经包产到

户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文件？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闹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也是要搞单干的。

再有，生产与分配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积累过多，消费少了。

再有，集中与分散的矛盾。七千人大会以后，我看没有解决，还要继续做工作。民主与集中的矛盾，要用民主的办法达到集中的目的。要让人家讲话，不民主，集中不起来。还要做工作。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是敌对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积累过多。民主与集中还要做工作。阶级存在不存在？国内形势如何？矛盾，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有个肃反问题。还有反革命存在，要看到，看不到不好，看得太严重也不合乎事实。

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2.08.09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台了，我们还有几年。

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各地方、各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李××揭露邓子恢的五个报告中的问题）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统一”，不讨论就走，这种办法不好。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五个人：邓子恢、王稼祥、康生、吴冷西、胡绳。

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券并不比我们少。

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二、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〇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

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康生插话：现在的价格，低出高进，不利于集体经济。）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十六户，我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调的传达，受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〇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象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象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

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每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党员的成份，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十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以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误，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要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二千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克思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陶铸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则。

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说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

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

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要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

三年解放战争，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改革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饶漱石，长期没发现。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

一九五七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〇年大跃进。六〇年开始搞十二条，六一年搞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

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力压弱劳力。

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争夺，地富要争夺，我们要争夺。

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付酬，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那个能办到？

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项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做得好，象军事、外交。有些部门象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么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到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

西七、八年，陕北十三年。不一定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关于领导机关应加强请示报告工作的批语

毛泽东

1962.08.10

此件值得一阅。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而国外使馆消息，却如此认真而迅速。请同志们想一想，是否可以把这个十几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

对邓子恢关于农村工作政策意见的批评

毛泽东

1962.08.12

此件是一九六一年夏季庐山会议时印发文件之一，现在重印发给各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部在那时还是正确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二部分的十条措施，其中包括如何正确对待单干问题），对形势的看法（第一部分的十条分析）也很正确。过了一年（其实只有十个月，即一九六一年八月到一九六二年五月底为止），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我们欢迎子恢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核心小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他说，他在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单干主张是不正确的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他没有联系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他那时，在城市，则主张依靠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则是不够的，所以我在那会议上给他指出了这一点。

在中央组织部七月份综合报告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62.08.12

印发各同志。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现在部长安子文同志在经过批评之后，觉悟了，这就好了。希望毛病不要重犯。

对邓子恢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报告的反映的批语

毛泽东

1962.08.29

看来，单干论在我们的军事干部中还有一点市场，但是不占多数，占绝对多数的同志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

1962.09.00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2.09.24（上午）

现在十点钟，开会。

这次中央全会解决几个重大问题。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业问题。这是两个重要问题。还有工业问题、计划问题，这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三个是党内团结问题。有几位同志讲话：农业问题由陈伯达同志说明；商业问题由李先念同志说明；工业、计划问题，由李富春、薄一波同志说明。另外，还有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干部上下左右交流问题。

会议不是今天开始的，这个会开了两个多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到北京差不多也是一个月。实际问题，在八、九两月，各个小组（在座的人都参加了），经过小组，实际上是大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不需要很多时间了，大约三天到五天就够了。二十七号不够，就开到二十八号，至迟二十八号要结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阶级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阶级问题没有解决。国内不要讲了。国际形势，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那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没有解决阶级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反帝任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亚、非、拉三大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的叛徒春日庄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过了几次复辟，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为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表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开始好转。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就开始

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了。然后十一月、十二月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第三次郑州会议，然后四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一九六〇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赫鲁晓夫来我国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鲁晓夫支持尼赫鲁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鲁晓夫来，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坛上攻击我们。然后一九六〇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一九六〇年一年，与赫鲁晓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意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〇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变成“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很行呵，他可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问题。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都是好的。开国初期，包括我在内，还有少奇同志，曾经有这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会受到摧残。后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地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印尼亚洲新运会。几万人示威，打烂印度领事馆，印度孤立。西伊里安，荷兰交出来了。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装斗争，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出现了武装斗争胜利的阿尔及利亚。出现了老挝这个胜利的斗争。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埃及独立。阿联偏右，出现了伊拉克，两个都是中间偏右的，但它反帝。阿尔及利亚，不到一千万人口，法国八十万军队，打了七、八年之久，结果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所以国际形势很好，陈毅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有几个文件，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等，有几个同志讲话。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的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变。无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要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的经被黑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要好好想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得好，改好了，就好了嘛！李××同志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同志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很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允许我犯错误，允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绝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广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可不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门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现在已经组成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再来搞清楚，把问题说清，要说服人。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专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爆破案、杀人放火的人。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上层建筑。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得不好，就会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

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键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请小平同志宣布有哪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人不参加。（邓小平插话：常委决定五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习、张、黄、贾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大了，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稿中加的一段话

毛泽东

1962.09.26

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

1962.09.29

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

1963 年

在听取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汇报时做的指示

毛泽东

1963.02.00

看来我们的军队还是要抓政治工作，抓四个第一，抓三大民主，加强薄弱环节，搞好党的建设。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

1963.05.00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外国有一种说法：他们国内没有阶级了，他们的党是全民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对象了，他们的国家是全民的国家了。我们国内也有类似的说法。资产阶级每天在斗争无产阶级，就是不承认有阶级存在，就是不承认有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的。不光是外国的修正主义者和国内的资产阶级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我们有许多干部、党员，对于敌情的严重性，也是认识不足的，甚至熟视无睹的。

以上这些看法对不对？完全不对。已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不甘心于死亡的，他们总是企图复辟的。同时，资产阶级分子会新生，反革命分子也会新生。而在这些阶级敌人的后面，还站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因此，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存在着阶级，在党内不反映资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富裕农民思想，那才是怪事！阶级斗争所以会反映到党内来，还有一个重要根源：从党内成分看，我们党内主要成分是工人、贫雇农、下中农，主要成分是好的。但是，党内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其中有的是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识分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富农的子女。这些人，有的马列主义化了，有的化了一点，没有全部马列主义化，有的完全没有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另外，这几年还钻进一些坏人，他们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钻进来，这个问题要注意，但是比较好处理。主要问题是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的子女，对这些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因此，对党员、干部要进行教育，再教育。这是一个重要任务。

二、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革命尚未成功”，这是孙中山的话。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正在进行，有些地方民主革命尚未成功。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就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就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还有一些地方，地主还根本没有打倒，那些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中农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上面。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有些地方比较认真地执行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做得很好，不仅制止了“单干风”，而且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把各种矛盾揭开了，把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了。可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有些地方，虽然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但是没有抓住要点，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今后，还需要抓住要点，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步骤，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是什么？

要点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干部洗手洗澡，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这样一套。凡是社会主义教育一般化，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的地方，就不能抓住主要问题。

方法是什么？

方法就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所谓团结对敌，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错误的人，只要彻底坦白悔改，就算在百分之九十五以内。手脚不干净的要批评，但洗了澡，还是要继续做工作。伤人不要过多，但少数人是要伤的。要奖励一批好人，处理少数坏人。组织处理一定要经过批准手续。有的地方采取讲社史、村史、家史的办法，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这个办法很值得推行。贫农受剥削受压迫的家史可以讲，贫农富裕起来的家史也可以讲，地主富农的家史也可以作为反面教材讲给贫、下中农听，讲他们是怎样剥削压迫人的。

步骤是什么？

就是：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分地区地进行。一个县之内，也要分期分批进行。要注意到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允许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开始训练县级干部，再训练公社和大队的干部，然后训练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试点很重要，各地都要搞试点，经过试点把情况弄清楚。有的同志，开始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不大相信，后来他去试点以后，就相信了。相信了就抓起来了。

有人对社会主义教育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伤人”不能过多，但少数人是要“伤”的。解决人民内部问题也要有点“紧张”。精神轻松愉快，这是就其结果说的。不是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没有一点紧张。只有搞了社会主义教育、“五反”、“四清”、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才能做到心情舒畅。贫、下中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手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农、下中农心情也不舒畅。因此，要心情舒畅，就要搞我们这一套。搞了我们这一套，才能出现真正的心情舒畅的局面。

当然不要急躁，不要蛮干，过去社会主义教育搞得不深的地方，要从搞得不深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要跳起来一哄而起，不打无把握之仗，要准备好了再打。没有试点，情况不明，或者兵没有练好，干部和贫、下中农没有训练好，就不要急急忙忙地、大规模地开展运动。对干部要着重说服教育，口头说不服的，就要用事实材料去说服。要派强有力的干

部去领导运动，不会打仗的人，不要他当指挥官。没有蚂蚁的地方不要硬找蚂蚁，例如有些一类社、队，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完全采取现在这一套办法来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一类社、队，也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总之，这次运动是一次大考验。干部好不好，行不行，都要在这次运动中受到考验。只要我们分期、分批、分地区去搞，经过试点，认真对待，再加上保护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大毛病是可以避免的。

三、关于四清问题

在农村中，不搞“五反”，只搞“四清”。“四清”就是清理账目，清理工分，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其中又主要是清理账目、清理工分两项。首先应当发动群众把一九六二年以来的账目、仓库、财物、工分，同时把国家投资、银行贷款和商业部门赊销所添置的资产，全面彻底地清查一次。

这是一项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主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来说，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农村中的“四清”运动，同城市中正在进行的“五反”运动一样，都是打击和粉碎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一九五二年搞“三反”、“五反”是在城市。在农村，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全民整风，但不是用现在这个方法搞的。合作化以来，农村中的现金、工分、财物、仓库就没有清理过，没有向社员全面公布账目。“四清”能搞出很多贪污盗窃、牛鬼蛇神，公安机关搞不出来的，“四清”能搞出来。

进行“四清”，方法要对。要采取扎根串连，依靠贫、下中农，这一套办法，放手发动群众，有些干部不听领导的话，他们却不能不听群众的话。把群众发动起来，事情就好办了。要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打击极少数严重贪污盗窃分子。有些人坦白了，退赔了，就可以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要使多数人洗温水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四清”中一切问题的处理，都要发动群众充分讨论。赃款、赃物，不退不行，但要退得合情合理。不退群众不允许，太挖苦了，有些干部过不去，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们的。对贪污盗窃分子，一般不采用群众大会斗争的方法，可以一方面采用背靠背的方式（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在较小范围的群众会上，让群众揭发和批评），一方面组织专门小组清理账目，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根据确凿的证据，核实定案。要严防敷敷衍衍“走过场”，也要防止逼、供、信，严禁打人骂人和任何变相的体罚。已经搞过的要复查。凡是搞得不认真不彻底的，必须重搞。一些必要的制度还没有建立的，必须建立起来。

今后，除了按照“六十条”的规定，定期公布各项账目之外，每年还要大清一次到两次，使“四清”成为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首先是基本核算单位的一项经常制度，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

四、关于组织贫、下中农革命的阶级队伍

不论在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的问题。因为那时还有唯物论和唯心论，还有先进和落后。没有阶级差别了，总还有左、中、右。

在农村中依靠谁？

不是依靠全民，而是要依靠贫、下中农。贫农、下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左右。他们是农村中的多数，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我们要同地、富、反、坏做斗争，就要团结大多数，首先是依靠贫农、下中农。要多数，还是要少数？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牛鬼蛇神专政？真的马列主义者就是依靠多数，修正主义者名曰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一些农村干部有一种说法，说：“地主听话，中农好办，贫农糊涂。”其实地主是要你听他的话，县、社干部都不注意听贫农的话，那么贫农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依靠贫农、下中农，树立贫、下中农在农村的优势，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我们在农村中都要依靠贫、下中农。

要依靠贫、下中农，就必须建立贫、下中农的阶级组织。组织起来，就有了中心了。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就可以更好地团结中农。有些地方，贫农一经组织起来，中农就打听消息，表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不是大家都积极起来了。

建立贫、下中农阶级组织，要在斗争中发动群众去建立，不要形式主义地建立。搞形式有什么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南斯拉夫还不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

开始组织，不一定数量很多。比如一个生产队有二十户，先组织两三户，以后四、五户，有十一、二户组织起来了，就很起作用。就象滚雪球一样，逐步搞起来，不要一哄而起，一步一步搞，扎扎实实搞。

有些地方提出贫、下中农委员会的主任由党支部副书记兼任。这不好，要由群众选，可以选支部书记兼任，也可以不选支部书记兼任，不能硬性规定，保谁当选。

在农村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在争夺农民中的富裕阶层。这个阶层本身就是产生资产阶级的东西，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对这个阶层，要作具体分析。例如，要看生活上升，还要看政治表现，只要不是剥削者，思想上又赞成社会主义，积极劳动，还是要把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五、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党。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掌握在劳动积极的先进分子手里。农村中的党支部书记，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必须力争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县、社以上干部也要认真参加集体劳动。干部不劳动了，就会慢慢变质，甚至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就有基础了。浙江省有一位大队支部书记应四官说：“不参加劳动，工作就象浮萍一样浮在水面，摸不到地。”参加劳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减少贪污、多占问题，可以了解农、林、牧、副、渔这一套。

支部书记参加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要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

现在有些群众对干部作官很有意见。群众说：“大队干部了不起，一吃二用三送礼。”大队干部就这样大？现在给他一个“四清”，一个劳动。你不干，就当老百姓。这是一个很大的斗争，没有一大批积极分子起来是搞不好的。

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是个好榜样。昔阳县的干部既然能够长期坚持，其他县的干部也应当是能够办到的。我们争取在三年之内，分期分批，使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劳动。比如，一百个支部，第一年先有三分之一参加劳动，第二年又有三分之一，就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这样声势就大了，其他的人就要参加进去了。

有些劳动模范现在不参加劳动了。不参加劳动，还作什么模范？不能参加劳动，理由无非是怕耽误工作，会议太多。公社以上的领导机关要减少会议。一个县，每一年只召开一两次三级干部会议，就够了。必须开的会，要事先作好充分准备，有些会还可以到下边去开，就近开。

六、关于用马列主义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

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这是个很坏的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河北省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调查就是这种方法。保定地委开始并不是去搞“四清”，是去搞分配问题的。群众不同意，提出搞“四清”。保定地委听了群众的意见，改变了计划，搞了“四清”。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是生产斗争，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科学实验。不对这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哪有马列主义？浙江省青田县搞试验田，带点科学实验性质。他们试验到水田里去了。那里农民开头不赞成冬水田，经过试验，冬水田第二年收成好，贫农看到以后就接受了。所以要调查，要试验。社会主义教育为什么有人不相信？就是没有试点，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比如走路，象平常那样走，什么也看不见，弯下腰来细看，就可以看到地上的蚂蚁很多，就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则，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见，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现象也看不见。例如阶级斗争和干部不参加劳动是大量存在的现象，有些人却看不见。

当然，这些事情也是要逐步认识的，要从现象到本质。比如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产生修正主义，有许多同志就看不清。干部不参加劳动，了解和反映的情况就不会真实。比如打仗，不亲自参加战斗，还不是纸上谈兵，怎么能懂得打仗呢？单是进军事学校也不行。

为了造成调查研究的风气，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认识论的教育。唯物论、唯心论、形而上学、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物质可以变为精神，精神可以变为物质。这些道理应当让干部懂得，群众懂得。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的尖锐武器。

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有些同志是不知道的。对于精神可以变为物质，有些同志就更糊涂了。但是，不识字的农民是懂得推理的。比如，农民认为地主是人，是剥削压

迫他们的人。人、地主，是两个概念。农民把这两个概念联结起来，进行判断推理，得出结论说：地主是剥削人的人。农民的这种认识，是从生活中来的，不一定要识字才懂得，所以要破除迷信（当然不要破除了科学），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那么困难。哲学是可以学到的。雷锋那样年青的同志就懂得一点哲学。

总之，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而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的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七、关于划阶级问题的指示

划阶级有必要。坏人虽是少数，但他们占据了要害部门，当了权，这不得了。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也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地富子弟也要团结。有些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也要改造。只要愿意改造，就应当要他们，都要嘛！如果只论出身，那么马恩列斯都不行。例如马克思也是先学唯心论，后来才学唯物论，才搞出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是他在哲学方面的两个先生。

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清查出来。象白银厂一样，把那些坏人查出来，并非查所有人，并非主要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一些人主要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信任。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有的只是剥削阶级出身，那就要看表现好坏。

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把已经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研究提高为理论，加以宣传，把工人阶级从分散的变成为有组织的，从自发的阶级变成自觉的阶级。工人每天在剥削压迫之下生活工作，为了吃饭，那么忙，自己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不是工人，但他能看出发展的趋向，经过分析研究，把资产阶级哲学变成无产阶级哲学，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变成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样来教育工人。其实，工人也读不了那么些书，读不了那么大部头的著作，先进的可能读的多一些。阶级斗争的现象存在了几千年，资产阶级也说是有阶级斗争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能把它理论化，系统化了。要斗倒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继承了资本主义的。我自己也是先学地主阶级的，六年

读孔夫子的，七年读资产阶级的，共计十三年，那时二十几岁，对马克思根本不知道。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知道马克思，读马克思的书。

八、关于依靠贫下中农的问题

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剥削者不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按七亿人口计算，百分之五就三千五百万人，剥削六亿六千五百万人口，要算这个基本账，到底站在哪一方面。不管赫鲁晓夫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总之，他是修正主义，他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我们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这一边。

我赞成省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各级有工会，就是没有农会，共产党又不代表它。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年团，省应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

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也要有一部分中农的积极分子参加，使他们想到有他们的份。湖南就是这样开的。

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有的地委书记也忘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作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贫下中农有权，能管中农，也能管地主、富农。

修正主义跟我们不同，我们依靠工人、农民中的大多数。就算工人中有百分之八到十五的坏人，坏人还是少数，而且要加以分析。农村中贫、下中农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可以带动中农，改造地富中的好的，再加上地富子女，使少数人孤立起来，其中有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

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中加写的两段文字

毛泽东

1963.05.00

一

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或指示的以外，还有若干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有些则是在过去指示中提出来了，但是不明确，不系统，尚未引起人们注意，需要重新加以明确的系统的说明。这些问题共有十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经过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的实践，才能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特别是在近三年中，即一九六〇 年中央发布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起，直到今天，才能写出现在这个决定。可见认识客观事务，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应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是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

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附在这个决定后面的有下列一些材料：湖南、河北省委报告两件，东北局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件，河南省委报告一件，湖南省委报告两件，河南、湖北、湖南三省省委、区委、社委报告四件，重发山西昔阳县材料一件，河北省材料两件，浙江省材料七件，共计二十件。材料虽多，但是好看。最好先看材料，后看本决定，因为这些材料极为重要，写得很好，本决定基本上是根据这些材料作出来的。没有这些材料，就不可能作出这样一个有系统的决定。

二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3.05.00

（据五月七日、八日、十一日谈话、插话归纳为四大问题）

一、 形势问题：

生产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严重的，尖锐的。（列举农村阶级斗争情况之后）为什么农村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有三个原因，一个是阶级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一个是认识原因。

阶级原因。主要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阶级的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

历史原因。一方面是有的地区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有的地区社会主义革命未完成。封建地主没有打倒的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工作历史方面的原因。土改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搞阶级斗争。“三反”、“五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都搞了一下，但不是这样的做法。苏联在一九三二年以后，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又搞了二次肃反，此后十六年当中不搞阶级斗争，他们的集体化依靠谁？不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可靠的社会基础。

华北局机关五反搞得好。说是“清水衙门”，但是一清就清出好多专案来。

认识原因。阶级斗争是客观的存在，没有认识到，怎样领导阶级斗争？

二、 认识问题：

十中全会后，跑了十一省，只有刘××、王××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人都不讲。二月会议后，情况有了变化。河南五个月没有抓阶级斗争，二月会议后，抓得很好。有变化，但并不是都通了。有个地委书记，二月会议以后就不通，下去试点以后才通。

我看了湖南第二个材料，现在才懂得一点，即搞规划、生产经营中间，也有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问了许多人，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都回答不出来。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不识字的农民也懂得这一点。比如说，你问农民，他知道张三是地主，是压迫我们的，有了“张三”、“地主”这两个概念，就可以推理：地主是剥削人的人。农民的认识是从生活中来的，不识字也可以懂哲学。成吉思汗就不识字。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就是一言，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一言可以兴邦吗？赫鲁晓夫也是一言，就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革命。这不是一言可以丧邦吗？

哲学要在实际工作中讲，要在开会中讲。要告诉你身边的同志，哲学并不难。军事学也不难。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从军事学校中出来的。翻了军事书，看了欧洲战史，和中国情况对不上。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要破除迷信。当然，不要破除了科学，如“人有

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的半年的入伍生。派出来当连长，根本不能打仗，听排长的。排长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军事是从实践中学的。所以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看得那么神秘，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把哲学看得那么难。哲学是可以学到的。我看过雷锋一部分日记，此人就懂得一点哲学。

大学生学习五年就学好哲学？我不相信。许多哲学家都不是大学学习的。中国的哲学家中，王充、范缜、傅玄、柳宗元、王船山、李贽、戴东原、魏源，都不是专门搞哲学的。黑格尔也不是专门搞哲学的，他的学问很广。康德是一个天文学家，他的天体论到现在还有价值。马、恩、列、斯也都不是专门搞哲学的。

山沟里出哲学。零陵那样好的报告，不出在湘潭，不出在常德，而出在零陵。在困难中，在斗争中才能够出哲学。逆境出哲学，顺境能够出哲学吗？三国的黄盖兄，零陵人。程颐、程灏的老师周廉溪，是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和他是一个系统的，也是零陵人，是零陵专区的道县人。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派。唐代的大书法家怀素，也是这里的。柳宗元从三十岁到四十岁，整整十年都住在零陵，当时叫做永州。他的山水文章，和韩愈辩论的文章，都是在那里写的。所以要破除迷信。不过要注意，不要象前几年那样，把不应该破的也破了。

事物有现象有本质，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的统一。本质是看不到的，要透过现象去抓到本质。比如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会产生修正主义。又比如平常我们走路看不到蚂蚁，大踏步就更看不到了，要蹲下来，才能看到蚂蚁，就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则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到，就是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也看不见。比如阶级斗争和干部不参加劳动是大量存在的，有些人却看不见。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有的人是主观主义地大胆地假设，主观主义地小心地求证。河北各地委下去调查研究，只有保定地委是科学的，其他都是主观主义的。保定地委开始并不是去搞“四清”，是去搞分配的，群众不同意，提出搞“四清”。保定地委听了群众的意见，改变了计划，搞了“四清”。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

讲哲学不要超过一小时，讲半小时以内，讲多了就糊涂了。

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哲学，《莫斯科宣言》写上了，在国内反倒没有人讲。

三、 要点：

运动的要点是什么？是十个问题，其中一部分是认识问题，是要高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解决的。还有一些问题是普遍工作要解决的，普遍工作中的要点有以下五点：

（一）阶级、阶级斗争。用什么方法进行阶级斗争？一定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问题。最先写四大家族的是曹雪芹。《红楼梦》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他们是奴隶主。三十二人。写奴隶，如鸳鸯、晴雯、小红等，都是很好的，受害的是这些人。林黛玉不是属于四大家族的。

（二）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法有两大条：

第一条是把中央的精神和干部、群众见面，讲解清楚，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工作、具体事实，让群众揭盖子。

第二条，要让老一辈重新回忆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激发阶级感情，让青年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

（三）依靠贫下中农。依靠谁的问题，一万年也有。到将来总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先进和落后、左中右的矛盾。在今天依靠谁？总得有一个阶级。依靠全民？说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人。有人说，地富听话，中农调皮，贫农糊涂。地富怎么不听话？又送东西，又送女人，可是他是要你听他的话。

什么叫心情舒畅？贫农、下中农受到压抑，不能抬头，心情怎么能舒畅？贫农、下中农不舒畅，干部怎么能够舒畅？

资产阶级说他们后继无人，怎么说后继无人？黑格尔的后继人是马克思，资产阶级的后继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三自一包”，想卷土重来，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打击他，打掉他的基础，不让他拉后继人。

（四）四清。

什么叫贪污？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只要坦白了，退了赃，就不算贪污。

赃要退，也要合情合理，退到手脚干净，又要退到让干部能够生活。这样做究竟退多少？是不是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

惩办要控制在百分之一。

今年不要开杀戒，明年再说。罪大恶极的也先放慢一些。现行反革命按规定办理。群众要求非杀不可的，是有道理的，你领导可以等一等嘛！

（五）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上面。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脱离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昔阳干部劳动很好。昔阳在山上，很穷。很穷就革命。

要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先进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手里。（有人说，有些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

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还算什么模范？取消好了。有的因为会多，接待访问太忙，这个问题要解决，你们可以到田间去访问嘛！

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

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吗？你们是做大官的，也有做小官的。小官权也很大。过去一个团长，给不少办公费。现在我们基层干部，一个参加劳动，一个“四清”，不愿意干就回家当老百姓去。

干部参加劳动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就少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什么时候都有，一万年都有，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就没有对立统一了。

贪污揭发得越多，我越高兴。你们抓过虱子没有？身上本来很多，抓得越多越高兴。

四、 方法：

要采取积极态度。

（一） 要注意训练和教育干部。

（二）不要着急。今年搞不完，明年。明年搞不完，后年。土改不是搞了三、四年吗？有的人不信，不要去责备他。你一围攻，他一着急，就乱来。要慢慢地说服。着什么急？我们革命胜利比苏联还不是晚三十多年？

（三）要试点。要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防止敷敷衍衍地走过场，一定要搞试点。

（四）要区别不同情况。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不要一起搞。（讲了西汉陈平的故事，略。）（对李井泉）你四川那么大一个省，一下子能搞得了哇？

（五）精简。要精简一些干部下去劳动锻炼，搞阶级斗争锻炼。我身边原有二、三十人，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人。我对江渭清说，江苏四千多万人口，省直机关工作人员五千，可以精简一千五百人或二千人。这是一个老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六）要抓住重点。“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香山记》是讲归庄王的女儿（观世音菩萨）的故事，七个字一句，开头两句就是这个。天和地可以隔开，天和地都不唱，单唱《香山记》，就抓阶级斗争。

在中央会议上关于四清运动的讲话

毛泽东

1963.05.00

先看二十个材料引起大家讨论，先看三天，各中央局、省开会也如此，不要传达中央文件，有一个框框。不要性急，横竖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搞三年，这样一个大的运动需要时间，不要性急。

这次革命运动是土改以来第一次最大的斗争。这样全面，这样广，这样深远，是几年来没有的。三反、五反搞城市。一九五七年反右是思想战线上，反高饶是党内的，全面的党内、党外这样的阶级斗争是十几年来没有的。这次是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这样理解有好处。这是土改以来第一次大斗争。开始要训练县以上的干部队伍，再训练大队以上干部，还要训练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

没有蚂蚁的地区不要硬去找蚂蚁。譬如一类社、队过去进行了阶级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一定去找地富活动，没有一例外也不好。

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差不多都有，大的小的。河南材料说到一个支部很好，另一个材料说的一个公社干部经过洗手洗澡真是一尘不染的只有两个人，不能说这个支部不好，还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现在看来我们干部真正一尘不染的是有，但不能说太多。铺张浪费，多吃多占，一点没沾上的少，大多数的沾了，洗手洗澡交待就好了嘛！这次四清、五反大家都出点汗，洗温水澡，轻松愉快，才能轻装上阵，一致对敌。为什么轻松愉快，一致对敌？我们身上不干净没有力量，搞干净就能团结一致对敌。有的干部多吃多占，有的和地富女儿勾搭，不洗就不能对敌。有些人对敌斗争有劲，对人民内部矛盾就不大积极，有顾虑。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多吃多占，上了当的，只要自己说出来，又退了赃，不算贪污分子。将来机关、工厂、企业也可以这样办，当场宣布不算贪污分子，可不公布姓名。东北局有几个贪污一百元、二百元，自己讲了，开大会宣布不算贪污。至于贪污大的案处理了，大的不过上万元，如自动交待了又退了，处理可以减轻。既要有严肃性，又要有政策性。四清五反一定要有，不反不行。一定要交待清楚，不退赃物赃款不行，这是严肃性。但处理要区别对待，要退的合情合理，多吃多占的退的时候，不要退得太挖苦了，使干部生活过不下去也不好。有的已吃了用了，教育他向群众检讨一下退出若干，参加劳动，这样群众不会叫一次退出，分期分批退，不致使生活不好过。还可以采取自报公议。这个政策很复杂。看起来自觉好。

这次运动中间要换一批，取劳动好的人，看来是少数。处分的，也是少数。（议论：干部受处分的可能不到百分之一）不要太多了，要多做教育工作。加强运动的领导，需要靠各地区县社队广大干部，上面去的人不要包办代替，要把广大干部发动起来，要依靠广大干部去搞，用这种自我教育的方法，发动广大干部的方法，来得力量大。

注意总结经验，回去中央局开十天会。搞一个月工作，到七月中央局再开一次会，总结一下经验，摸一下情况，到七月底八月初中央开会。除这个外还要搞工业。

要有强的领导才能发动运动，分期分批，一批批搞不算落后。这次运动要大大提高各地的自觉性，中央局、省、市、县的人下去一起来运动。

四清历来不清，阶级斗争粗糙。这次运动，要提高自觉性，要衷心诚恳地帮助社队把工作搞好。帮助干部洗温水澡，帮助把四清搞好。除了个别不行的，烂了的，蜕化变质的帮不上去，或太坏了，要派工作队代替他们搞，除此要诚心诚意地帮他们搞。

你们对干部怎么样，我不清楚。现在看起来对干部要说服教育，特别是用实际证据来说服教育。照理说有，要拿出实际证据来说，也要有阶级斗争实际证据，昔阳县是实际证据，浙江参加劳动，四个好文件是实际证据。检查一下，我们是否照理说得多，证据说得比较少。

你们是否有机会去一个区搞过十多天？（众说：没有），你们下去是否干部很紧张？混熟了就不紧张了，多尊重人家，不要指手划脚，“三不”。对干部我们要团结他们，要洗手洗澡，要抓一下。

这次运动会出现杀人灭迹。

发动群众搞四清是厉害的事情。河北经验，有些公安机关搞不清，发动群众四清搞出来了。有人讲阶级斗争靠公安部门，人民内部靠监委，当然要靠，但除此还要充分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这个运动抓起纲领就好办了，分期分批搞，搞第二第三批不算不名誉，还是名誉。

（众议：有地方走过场，雨过地皮湿）走了过场再搞嘛，就是不要伤人，不是敌人当敌人。

（众议：乱子一点不出不行。主席同意我们的看法。十九日大厦跳楼死人，黑龙江有个地富杀死三十八人，去年枪毙了反革命十三人。）上海死一人，在厕所吊死，留字“过路君子”，说好为他申冤，根本没斗他就死了。

要坚持说服教育，分期分批试点，划清界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有强的领导人。只要有几条搞好，就可少出乱子。

不打无准备之仗，材料没准备好，兵没练好，不要去搞。这一仗是全国性的革命运动。要象解放战争时的仗来打，辽沈战役、锦州、淮海、过长江战役，不要打百团大战，不要象皖南事变那样打法。

第二是解放战争几个战役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这次打仗打好了是全国革命的胜利，对世界革命贡献更大了。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教育工作的指示

毛泽东

1963.05.00

学生健康不好的原因是伙食不好，卫生不好，功课重，课外负担过重，太忙。要增进学生健康，要增进营养，要克服忙的现象。要一面增加收入，一面减少消耗。因此要多增加助学金，改善伙食，另一面要克服忙乱现象。

接见阿尔巴尼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工会代表团和档案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

毛泽东

1963.05.04

毛：你们到中国有多久了？是一起来的吗？

各代表团长答：新闻代表团四月二十一日到中国，劳动青年代表团和工会代表团都是四月二十六日，档案代表团，四月三日。

毛：你们的党是很好的党。你们的国家是很好的国家。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也很好。我们两党、两国，修正主义都攻击我们。对修正主义的攻击要分析，第一是坏，攻击我们当然不好，第二也好，修正主义骂我们，这对我们有好处，修正主义不骂我们就不好了。修正主义不援助我们，经济上不援助我们，撤走专家。这也要分析，第一是不好，撤走专家，不帮助了，当然不好，但也是好事，让我们自己干，自力更生，要不怕困难。

你们到过××吗？有机会最好到那个国家去看看，不一定就是你们去。那个国家很好，反对修正主义很坚决，建设工作也做得很好，比我们好。他们建立了重工业，他们自力更生。我们的农业还没有过关，他们过关了，他们的农业比我们好。我们的朋友不少，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要孤立我们，但孤立不了。我们是多数，他们没有多少人，多数人民并不赞成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各个修正主义领导国家的人民，并不见得很欢迎修正主义。这方面的情况你们知道一些，人民是好的，包括修正主义领导国家的人民，干部中也不都是坏的，不是一块铁板，并不都是修正主义者，是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坏。

你们在中国还有多久？

各代表团长回答：工会代表团还有一个月，新闻代表团和青年联盟代表团还有二十天，档案代表团六月七日走。

毛：你们可以到处走走。前几年我们的情况不好，最近一、二年比较好一些，现在政治，经济情况都比较更好些了，但还有困难，困难不少。社会上和党内还有一些问题。困难可以克服，正在克服中，问题在解决。

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会生长资本主义因素。有些共产党员挂了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多数，但有一部分是如此，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铺张浪费，浪费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如能适当解决，就可以搞几十亿美元。美国人不会借款给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借给我们，有个办法，就是向官僚主义借款（外宾笑了）。

马马基（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美国借款给他们——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

毛：你们有一个“好”邻居（指南斯拉夫），他们锻炼了你们，他们反对你们，南斯拉夫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你们。

马马基：但是我们的朋友很多，我们的人民很坚强，因为和中国人民在一起。

毛：即使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你们也不会灭亡。

卢鲍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团长）：但我们感到幸运，中国给了我们国际主义的援助，鼓舞了我们。

毛：但是援助很少。有些科学技术关键问题我们自己也没有解决，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技术，所以不能完全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过意不去。再过五年到十年，我们会好一些。

马马基：修正主义企图破坏我们的五年计划，而你们是帮助我们。

毛：你们原定的五年计划有没有修改？

吉贝罗（工会代表团团长）：有的，一般说项目有些增加，大型项目有增加。

马马基：五年计划有些改动，但总的说增加的比减少的多。去年冬季的气候对农业的影响很大，雨下得多了，涝了。

毛：春季生产怎样了？

马马基：直到三月还在下雨。

毛：你们雨下多了，我们有些地方少了。

马马基：如果有可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雨送一些给你们。

（全场笑）

卢鲍尼亚：沈阳很久没有下雨，我们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一到就下雨了。

毛：很好。你们可以到郊外看看，这里（指上海）春季生产还可以，有麦、油菜、蚕豆和豌豆。

卢鲍尼亚：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看到一路上庄稼长得很好，尤其是从山东到上海这一段，很深刻的印象是农民没 有荒废一寸土地。

毛：这是因为我们土地不够，平均每人只有五分之一公顷，长江以南每人只有十五分之一公顷。我们是寸土必争，否则没有饭吃。这里一年要种两次，冬季种麦、夏季种稻，南方有的地方不种麦，种两季稻子，早稻和晚稻。东北只有一季麦子，只有一百二十天无霜期。这些地方（指上海附近）比较好。上海是北纬三十一度，你们在北纬多少度？

卢鲍尼亚：我们和北京一样，纪诺卡斯特城（霍查同志的故乡）和北京在一个北纬度。

毛：北京是北纬四十度，请你们问侯霍查同志和谢胡，卡博、巴卢库、阿里亚和凯莱齐等同志。这些同志我都认识。

卢鲍尼亚：一定转达您的问候，我们出国时，同志们也一再要我们向毛主席致最衷心的问候，祝您身体健康。

毛：谢谢。

卢鲍尼亚：您身体健康，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毛：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骂我们，我们要和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一起反对他们，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难道还孤立吗？印度还是反动派统治，但印度人民对我们很好。

卢鲍尼亚：我们有些同志过去来过中国，这次再来，看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感到无限鼓舞。我一九五七年来过中国，这次再来，完全不认识了，十大工程是世界上绝妙的杰作，只有像中国人民这样有才能的人建造出来。也看到上海的工业展览会，使我们十

分惊奇，生产出很精密的仪器，还有重工业，这使我们十分鼓舞，欢欣愉快。我们在以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你们党以自己的英雄气概鼓舞了我们。我们劳动党和霍查同志也一再指示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我们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和中国青年的会面，也使我们受到了革命的鼓舞。

毛：不是一国支持一国，而是互相支持。不是一国帮助一国，而是互相帮助。有了你们站起来反对修正主义，全世界人民都高兴，不仅中国人民。

卢鲍尼亚：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毛：都是国际主义义务，你们是国际主义义务，我们也是国际主义义务，国际主义应当如此，应当坚持马列主义，应当互相支持。

你们今天还有什么活动吗？

阿外宾：主席的接见就是最重要的节目。

毛：今天谈得不多，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卢鲍尼亚：主席接见我们，不仅是给我们，而且是给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民、劳动党和青年的荣誉，是我们一生中难忘的大事。

毛：我要谢谢你们来看我。

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

毛泽东

1963.05.09

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个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中央曾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且作了具体安排；其他地方，则反映尚少。建议各地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有自己的好范例，应当选出一些（不要太多）让干部学习。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困难呢？并不很困难。只要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经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可靠的材料，明了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政策和方法又都是正确的，又有政治上强有力的几个同志作为核心领导，那末，就一个公社的范围来说，有几个星期就够了，就一个县来说，有几个月也就够了，就一个省来说，分批分期，搞好搞透，大约需要一年、二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因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中央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

毛泽东

1963.05.10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现将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份，河南省委报告一份，发给你们研究和参考。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第一步，只用了二十几天时间，就训练了十五万多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一百五十万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是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头两个步骤时，并经过试点。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

毛泽东

1963.09.00

戏剧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

关于文艺要推陈出新

毛泽东

1963.09.27

文艺部门、戏曲、电影方面也要抓一下推陈出新的问题，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家丁、丫环。内容变了，形式也要变，如水袖等等。推陈出新，出什么？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旧形式要出新内容。按这个样子，二十年后就没有人看了。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

对戏剧界的批评

毛泽东

1963.11.00

《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要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

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前十条》、《后十条》的通知

毛泽东

1963.11.16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在今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这个重要文件之后，十月间，我们又同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省委、若干地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分别开会商量，然后，我们又同华东局领导人，华东各省委的领导人再商量了一次。大家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为最有利。因此，在九月文件上作了修改，加进了点、面结合的一段，此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由于这一改变，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也要在一些问题上加以改变。五月二十日的通知规定，中央“决定（草案）”，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县、社和大队，暂时不要下达。现在改为：

（一）五月二十日的“决定（草案）”，九月的“规定（草案）”这两个文件，要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二本，由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负责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要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文件由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印发。“决定（草案）”原有的七个附件，这次不再重印，各地可以选择一些在本地区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好的典型材料印发。在党内外宣读“决定（草案）”和“规定（草案）”的时候，对这些典型材料，可以只读有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四清”方面的一、两件。

（二）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一切党支部都要发给二本，由市委、区委指定负责干部用口头向一切人宣读，使他们懂得党的政策。

（三）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

（四）民主党派成员，由统战部召集大会小会宣读，并发给他们阅读。

（五）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

（六）效果如何，随时总结经验。纠正缺点，发扬成绩。

（七）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这样一来，一切党内外干部，一切战士，一切人民，都会大进一步；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人，也会受到教育，得到改造。

（八）本通知要向党内各级党委直至支部宣读。

（九）本通知不要向党外宣读。

关于文艺工作的两段批语

毛泽东

1963.12.12

彭真、刘仁同志：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关于提倡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通知

毛泽东

1963.12.13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军委，中央各人民团体党委，各部委会党委、党组：

现将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锋两同志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写的一个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写的一个指示，发给你们研究。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地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处所及其人员，工作做得较好，上面却不知道，因而也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部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另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湖南省委过去在一个时期内，不作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地下达许多指示，往下灌的东西多，由下面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少，因而脱离群众，产

生很大困难。从一九六一年起，他们开始改变了，以至情况大好起来。但是他们认为还是远不如广东和上海，所以他们派遣大批省、地、县三级干部，还有省和市的干部，组成两个考察团，分别到广东上海去学习。这一点，请你们注意研究，是否也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如有不同意见，请你们提出。

关于在基层配备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批语

毛泽东

1963.12.14

少奇、小平、彭真同志：

这个文件请你们看一看。它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在生产队里设一个政治委员，或者叫政治指导员，或者叫宣传员，让一个不脱离生产的小知识分子（高小毕业生有的是，初中生也可找到），把思想政治工作，在几亿农村人口中抓起来。在城市工业、商业、居民方面也仿军队办法从上到下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指导员。此事情书记处议一下，然后常委再议。

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

毛泽东

1963.12.16

林彪、贺龙、荣臻、瑞卿、肖华同志：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需适合各个不同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四个部这样做了。看来这第四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关于加强宗教研究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

1963.12.30

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

1964 年

《前十条》、《六十条》为什么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毛泽东

1964.00.00

因为它解决了人民内部的矛盾，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把力量组织起来。人是生产力诸要素的首要因素。人，劳动手段（包括畜力、农具、肥料等），劳动对象，这是生产力的三大要素嘛。实行了《六十条》、《前十条》，还是原来的那些人、畜、农具、土地等等，但是结果却大不相同了（当讲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及“贫下中农心正，地富心服”时）那也不一定。贫下中农心正，以后有可能正，也有可能不正。地富心服，也不一定都服。

（当讲到“小站有个假劳模，不劳动，一年得一万五千多工分、二千元”时）

那是剥削阶级了，撤职，一定要撤。账要算清楚，一定要退赔。

还有小霸王之类，也要整。

贪赃枉法，有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事情就是这样复杂，没有才怪哩！有个对立面才好。

（当讲到“曲阜陈家庄陈玉梅被打下去，亩产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去年再上来，亩产从三百斤翻到六百斤”时）

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会起变化的。把好的一打下去，比如说莫洛托夫打下去，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莫洛托夫上来，又从三百斤翻到六百斤。陈玉梅这些人，小学没上过，大学也没上过，可是能把事情办好。

修正主义上台，也是资产阶级上台，就是这么惨。像陈家庄那样，砍树铲葡萄，把房子里的桌椅都搬掉了。好人上台，又都变了。赫鲁晓夫也要把苏联变成这样砍树铲葡萄，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给我们也不要。我们要依靠陈家庄陈玉梅、大寨陈永贵。

不要只看到阴暗面，凡事总是一分为二的。百分之十的模范，带动大多数，整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坏人。

有些支部，被不好的老党员霸着。他们有一条项县委的办法，你知道有多少中央委员，姓甚名谁，答不上来，他就说你问题解决不了。上面的根本不下去，不了解情况。

与王海容的几次谈话
毛泽东
1964—1965

谈话之一

王：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发现了反动标语，还有用英语写的。就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毛：他写的是什么反动标语。

王：我就知道一条，蒋万岁。

毛：英语怎么讲？

王：Long live Chiang。

毛：还写了什么？

王：别的我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章会娴（章上剑之女）告诉我的。

毛：好吗！让他多写一些贴在外面，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人不杀人？

王：不知道杀人不杀人。如果查出来，我看要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毛：啊，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又作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有多少人？

王：大概有三千人，其中包括教职员工。

毛：你们三千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蒋介石分子。

王：出一个就不得了，还要出七、八个，那还了得！

毛：我看你这个人哪，看到一张反动标语就紧张了。

王：为什么要七、八个呢？

毛：多几个就可以树立对立面，可以作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

王：我们学校贯彻了阶级路线，这次招生，百分之七十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其他都是干部子弟和烈属子弟等。

毛：你们这个班有多少工农子弟？

王：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干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他们表现很好，我向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毛：他们和你的关系好不好？他们喜不喜欢和你接近？

王：我认为，我们关系还不错，我跟他们合得来，他们也跟我合得来。

毛：这样就好。

王：我们班有个革干子弟，表现可不好了。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里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有时也不参加，星期天也不按时返校。有时星期天晚上，我们班或级里开会，他也不到，大家对他都有意见。

毛：你们教员允许你们上课打瞌睡，看小说吗？

王：不允许。

毛：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告诉这个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十二点再回去。谁让你们星期日晚上开会嘛！

王：原来我在师范学院时，星期天晚上一般不能用来开会的。星期天晚上的时间一般都归同学自己利用。有一次我们开支委会，几个干部商量好，准备在一个星期天晚上过组织生活，结果很多团员反对。有的团员还去和政治辅导员提出来：星期天晚上是我们自己利用的时间，晚上我们回不来。后来政治辅导员接受了团员的意见，要我们改期开会。

毛：这个政治辅导员做得对。

王：我们这里尽占星期日的晚上开会，不是班会就是支委会，要不就是级里开会，要不就是党课小组学习。这学期从开学到我出来为止，我计算一下只有一个星期天晚上没开会。

毛：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

王：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的，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毛：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

王：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毛：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王：人家会说我：主席的亲戚还不听主席的话，带头破坏学校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

毛：你这个人哪，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呢？你说正因为我是主席的亲戚，我才听他的话。正因为我听了他的话，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说的那个学生，将来可能比你有所作为。他就敢不服从你们学校的制度。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些形而上学。

谈话之二

王：现在都不准看古典作品。 我们班上那个干部子弟他尽看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练习英语，他却看《红楼梦》，我们同学对他看《红楼梦》都有意见。

毛：你读过《红楼梦》没有？

王：读过。

毛：你喜欢《红楼梦》中哪个人物？

王：谁也不喜欢。

毛：《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很好，要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

建社会？读《红楼梦》要了解四句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贾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王家）。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薛家）。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史家）。”这四句话是读《红楼梦》的一个提纲。

杜甫的一个《北征》你读过没有？

王：没读过。

毛：在《唐诗别裁》上。（毛把书拿出来，把《北征》翻出来要王阅读）。

王：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先打点预防针才不会受影响。

毛：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要打什么预防针喽？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钻进去，深入角色，然后再爬出来。这首诗熟读就行了，不一定要背下来。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或佛经？

王：不读，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毛：要做翻译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你读过《聊斋》吗？

王：没有。

毛：《聊斋》可以读，写得好。《聊斋》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

“知识分子”英文怎么讲？

王：不知道

毛：我看你这个人，学习半天英文，自己又是知识分子，还不会讲“知识分子”这个词。

王：让我翻一下《汉英词典》。

毛：你翻翻看，有没有这个词。

王：糟糕，你这本《汉英字典》上没这个词，只有“知识”这个词，没有“知识分子”。

毛：等我看一看。（王把字典给毛）只有“知识”没有“知识分子”。这本《汉英字典》没有用，很多词都没有。回去后要你们学校编一部质量好的《汉英词典》，把新的政治词汇都编进去，最好举例说明每个词的用法。

王：我们学校怎么能编字典呢？又没时间又没人，怎么编呢？

毛：你们学校这么多教员和学生，还怕编不出一本字典来？这个字典应该由你们来编。

王：好，回去后我把这个意见向学校领导反映一下，我想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谈话之三（接见外宾以后）

王：外宾跟你讲英语，你能不能听懂？

毛：我听不懂，他们讲得太快。

王：那你接见时讲不讲英语呢？

毛：我不讲。

王：你又不讲又不听，那你学英语作什么？

毛：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文和汉文做比较，如果有机会还准备学点日文。

谈话之四（毛让王海容读文天祥诗《过零丁洋》）

毛：假如敌人把你捉去了，你怎么办？

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毛：对了。你回去读一、二十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点唯物主义的东西。看来你这个人，理论水平不高。在学习上不要搞什么五分，也不要搞什么二分，搞个三分、四分就行了。

王：为什么不搞五分呢？

毛：搞五分累死人。不要学那么多东西，学多了要害死人。譬如说汉高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写得好，很有气魄。写诗的汉高祖就没读过什么书，但是能写出这样好的诗来。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许多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辈，而完全靠自己。

在听取汇报时的一些插话

毛泽东

1964.01.00

（当谈到工业企业管理，要建立“托拉斯”问题时）

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方法，不好，要改。比如说，企业里用了那么多的人，干什么！人是要吃饭的，要消耗的，不像孙猴子吃铁砂，拉铁屎。用那么多的人，就是不按经济法规办事。

生产出来的物资，必须按合同收购。商业部门说是因为计划变了，不收购；是谁变的计划？国家变的，就由国家收购。总之，不能积压在工厂里头。

（当谈到企业管理不好的原因时）

解放军一道命令，可以通到底，行得通。说解放军所以搞得好，是由于共产党领导。那经济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呀，为什么搞得四分五裂？抢钱（利润分成）、抢物资（物资分成）、发生冲突（闹关系），多年不得解决？商业为什么不能按经济渠道经营管理，为什么只能按行政设置机构？打破省、专、县界嘛！就是要按经济渠道办事。企业跟军队一样，一通到底嘛！党委管思想、管政治、管仲裁（冲突）、管人、实行监察嘛！

（当谈到专业化和协作、制造主机和辅机的关系时）

主机和辅机的矛盾，是对立物的统一。资本家办一个工厂，管工厂的资本家总是少数，做工的工人总是多数。少数和多数的矛盾，也是对立物的统一。

（当讲到树立标兵，领导上不要埋没英雄时）

我说高官厚禄、固步自封有的是。比如有的部的报告就说他们也有多少模范、典型、标兵，但多年没有发现，这不是被固步自封的官僚主义所压住了？！现在被压住的、没有发现的还很多。要改变这种情况，抓活人活事。

（当讲到报纸应该怎样宣传时）

文汇报、光明日报办得比较好，有些议论，也有科学研究、哲学、历史研究等方面的文章。人民日报单纯些。（它担负人家不担负的任务。）报导国际消息，一礼拜几次也就可以了。要写点新鲜事物，活人活事。加上一版，专门报导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写“活”哲学，不要写“死”哲学。现在写文章，引语太多，看了就心烦，少引一些可以。我写文章很少引马、恩、列、斯。要写活的哲学。许多老粗懂得哲学，最近解放军发现一个炊事员写的文章说，他从前烧饭每顿二斤四两煤炭，后来经过调查研究，掌握了煤炭的客观规律，每顿只用六两煤炭。

（当讲到石油部的经验时）

过去封建皇帝时代，还可以据理力争。我们解放军有一条，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在伙夫手里就听伙夫的，在班长手里就服从班长的。真理不是谁的官大、官小来决定。

（在与日本客人谈到对日本垄断资本反美的态度时）

日本垄断资本现在有变化，八番钢铁托拉斯，富士钢铁托拉斯，东海渔业托拉斯，反美反得很紧张。过去只纺织业来反，现在垄断资本家也反了。这一件事，对日本共产党来

讲，是个新问题。过去讲得太死了，切记不要讲死。我讲了法国的经验，戴高乐掌握了民族独立的旗帜，掌握了反美的旗帜，而法共则去欢迎艾森豪威尔，为肯尼迪流泪，所以戴高乐上台，倒不了。苏加诺也是大资本家，但他掌握了反美和民族独立的旗帜，所以他能维持。而印尼共产党就把这些接过来。希特勒上台后，宣布废除凡尔赛和约、收复失地，抓民族独立的旗帜，德国共产党台尔曼未表态，失败了。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是两个拳头作战，一手反美，一手反共。你们要给他放松一头。日本垄断资本家提出反美，要美国撤走基地，要反控制，你们应该把这些接过来。日本目前的形势是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就是要跟垄断资本家在反美问题上搞统一战线。我们也跟四大家族（中国垄断资本家）搞过统一战线。这样做，可能麻痹了工人。但我们也要想想工人的心理，资本家反对美国控制，工人有事做，工人是同意的。我们跟蒋介石的经验也是。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同蒋介石是采取两手，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也是为了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反共高潮只三次，一打，他退回去了，我们还是联合。不联合，哪能发展这样快，这样大，从二万五千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如果日本不投降，这一政策还要继续下去。我们在这中间发展，我们要趁这个空子发展嘛！

（当讲到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时）

为什么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是带普遍性的，许多人脑子里有这个问题。解答这一问题，还是要用阶级、阶级分析。这是从斯大林时候就包下来的。联共党史写了，宪法也写了，只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全民一致，不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外的不一致。不提还有资本主义分子，还有未改造的知识分子。此外，也不提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高薪阶层，工人贵族。问题不在于赫鲁晓夫一个人，而在于这个基础，基本问题，即有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基地。所以，只说反赫鲁晓夫不行，打倒一个，还有第二、第三、第四个。不只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欧洲十几个国家都出了修正主义，代表什么？代表工人贵族。我说工人阶级的广大贫苦阶层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少数工人贵族出修正主义。

（当讲到不用武力来解决领土争端问题时）

台湾海峡，两重性。这是国内问题，谁人都不得干涉。我们也是两手，和平解放或者武力解放。不管哪一手都是内政问题，谁也不能干涉。我们用武力解放，并未说死。

（当讲到苏联现在请南斯拉夫以观察员身份列席经互会时）

经互会要去，南斯拉夫参加，我也去。现在形势变了，赫鲁晓夫的指挥棒不灵了。南斯拉夫你参加，我也参加。将来要把经互会转到抵抗苏联的控制。大西洋公约国家反对美国控制，以法国为代表嘛！东欧国家也反对苏联控制，并且正在发展。现在指挥棒不灵了。要看到这一形势。

（当讲到工人中间的模范人物时）

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但是，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汉朝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静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即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即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是真齐王，何必假的。”而项羽则有二次错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那时他有四十万军队，刘邦只有十

万人。鸿沟协定他认真了，建都徐州（那时叫彭城）。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好几个好的，如李世民。我们中间上过大学的也很少，过去上了大学的就想做官了，还革什么命。现在有许多新的好的典型，要提倡。

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的一段话

毛泽东

1964.01.00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与毛远新的谈话（一）

毛泽东

1964.02.00

（当毛远新向毛汇报在寒假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感到以前虽然读了农村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和决定（草案）两个文件，但到农村后感到自己对两个文件的理解远不如农民深的时候，毛笑着说：）

你亲身有感觉了，很好。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国民党的部长。但当我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到农民知道的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就不如他们，应该向农民学习。你还不是中央委员嘛！怎么能比农民知道多呢？回去告诉你们的政委，就说是我说的，今后你们每年都应该到农村一次，这很有好处。

（毛七十寿辰时，毛远新写信检查自己，着重进行了自我批评，毛提到这封信时说：）

现在你能够认识到自己有缺点，并且能够进行思想斗争了，这很好。你主要的缺点还是不懂得辩证法，不会辩证地分析自己和分析别人，不懂得一分为二；以前把自己看得了不起，现在又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这都是不对的。辩证法是个很好的东西，虽然你知道的东西不多，但是只要你会运用这个方法分析，是能分析出来的。比如我吧，我知道的也不多，但我会分析问题，不明白的问题一分析就明白了。要好好学会用辩证法，这个作用很大。

（当毛远新谈到学院有几个学生因犯错误而被开除和受处分时，毛说：）

你们学院的性质我不太了解，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是你以为应该怎样对待这些人呢？当犯错误的人知道自己犯错误了的时候，你对他主要是鼓励，要指出他的优点，事实上他的优点还是很多的。同时又得给他洗澡，要洗温水澡，热了受不了，冷了也受不了，温度适合。对于犯错误的人，只靠开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开除倒是很简单，但是你把对立面又搞没有了。你不是到农村去了吗？对待那些地富反坏分子，主要是放在群众中监督改造，而不是送交法院。送交法院只是把矛盾上交，但是这不解决问题。溥仪、杜聿明、康泽那样复杂的都改造过来了，青年人有些是党员，有些是团员，还改造不过来？

（毛远新提到对干部子弟的看法时，毛说：）

这些人也是可以分成左、中、右三派的。看来你好像是属于左派。我看到一个文件（指学院关于干部子女情况的报告），表扬了你，但这不是好事。像你这样的人挨骂是少了，应该是多挨些骂。什么事情都是逼出来的，我写《实践论》、《矛盾论》，就是被逼出来的。你好像算是先进分子，什么叫先进你知道吗？先进就是要作落后人的工作。不然，那叫什么先进？

（毛的女儿要下乡，问毛，别人要是知道我是你的女儿怎么办？毛说：）

你就说我念了十几年书，什么也不懂，越念越蠢。

关于《人民日报》要注重思想理论工作的批语

毛泽东

1964.02.03

少奇、小平同志：

《人民日报》历来不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自然科学文章更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为盼！

接见新西兰共产党书记威尔科克斯夫妇的谈话（摘录）

毛泽东

1964.02.09

什么都是可以分开的。譬如说，过去认为原子不能再分，后来科学发达了，知道原子可以再分成原子核和电子，还利用电子发电。后来又进了一步，知道原子核还能再分，而且那里面复杂得很，可以分成好多部分。电子能不能再分呢？理论上是可以分的，虽然实际上我们对电子世界还懂得很少，科学家还没有把它分开，但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已经说过，电子是可以再分的，我不懂这门科学，但是我相信这个道理。

科学是无限的。无限大的世界和无限小的世界都有无限的工作可做。

任何社会无论今天和将来，都一分为二，总是由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在现在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已经十四年了吗？但是还是阶级斗争在推动我们的社会前进。过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以后，建成了社会主义，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那时是什么推动社会前进呢？那时是先进集团同落后集团的斗争。一万年以后还是有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不可能设想铁板一块，都正确，没有一点错误。没有错误，哪里有正确？

社会是复杂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根据对立统一的规律，一百万年或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一分为二的，还是有正确和错误。社会结构也是分成几百个阶段或几千个阶段前进的。我就不信在一百万年以后，所有的人就都是那么文明、高尚、道德、都是圣人，没有肯定，没有否定。

而且一个阶段代替另一个阶段也是要通过斗争的。

在中国，还是有保持原状的人，还有人反对我们，还有人表面上不反对我们，但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人表面上服从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心里不满意。将来也还会有这样的人。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是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一个社会总是一分为二，有正面，有反面。如果我们这一代什么都改造完了，那么下一代干什么？如果说再过一万年社会改造得十全十美，每个人都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的人，那么一万年之后的人干什么呢？一万年之后，还是会有量变、质变。还是会有飞跃，还是会有社会革命。我就不相信在进入共产主义后，社会经济将永远是同样的一种经济，人永远是同样的人。现在当然还没有人谈这个问题，但是我就不相信会是那样。

实际上，社会总是复杂的，一个统一体总是可以分的，至少可以一分为二。

现在，美帝国主义代替了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在泰国、老挝、南越，它代替了法国。在南朝鲜和台湾，它代替了日本。它到处都要伸手，我们就要反对。有人骂我们用肤色来划分人。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同蒋介石团结起来？为什么你们不支持美国的统治者？为什么×××同志不喜欢英帝国主义？各国都是用阶级来划分的。

任何社会，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不仅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一分为二，而且无产阶级也一分为二。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有修正主义者好，没有就不好。这不是人为

的，是自然的。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势必一分为二。从来是一分为二的，从马克思的时候起，就是如此。

就是你们和我们，也是一分为二的。你刚才不是讲，你们过去以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只应该有团结而不应该有斗争吗？这种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你们思想中错误的一方面。但是你们思想中正确的那个方面占主要地位。因为你们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你们党的脱产干部很少，你们的大多数干部都是靠自己劳动吃饭的，这样就减少了官僚主义。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这里的官僚主义可不少咧！应该让威尔科克斯同志看看我们关于城市五反的文件，看看官僚主义危害多大。五反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这个文件应该翻译成外文，给你们带回去。让你们的中央委员都能看到。

中国的社会是一分为二的，谁也不能说中国是不能分的，不能说只有光明的一面，而没有黑暗的一面。不能说只有正确的一面，而没有错误的一面。不能说只有马列主义的一面，而没有修正主义的一面。不能说只有廉洁的一面，而没有贪污盗窃的一面。否则就不符合事实。

对外国同志介绍情况时，只说好的，不讲坏的，这是不正确的，不是真正马列主义的态度。

列宁、斯大林的时候是肯定阶段，现在是否定阶段。但是事物的发展会走向否定的否定。修正主义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势必如此。广大的苏联人民、党员和干部是反对修正主义的，但需要时间，或者十年、八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

我是从修正主义对我们的好处和帮助谈起，联想到我们历史上错误的政策和机会主义路线对我们的好处，以及党外的敌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我们的封锁，断绝经济关系和大举进攻对我们的好处。这个道理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有人总是认为敌人的压迫、杀人、被打入地下、党的组织缩小等等，是坏事。认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猖狂进攻，是坏事。日本过去进攻中国，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有些日本资产阶级的代表，现在见到我们就道歉，说：对不起得很，我们过去侵略了你们。我说：不，没有你们的侵略和占领大半个中国，我们不能胜利。你们的侵略激起全中国人民都起来反对你们。就是因为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所以中国人民都起来了。

所以，日本侵略中国，有两重性：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是，杀中国人，破坏村庄，抢劫物资。好的一面是，激起了中国人民，强迫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否则我们的一百二十万军队建立不起来，一亿人口的解放区建立不起来。也不能解决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吃饭、穿衣、住房子的问题。枪炮问题也不能解决。我们的枪炮是他们送来的，后来是美国人送来的。我们军火的主要来源是美国，其次是蒋介石的兵工厂，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很少。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的军火工业才开始发展，有了十万工人，开始制枪，小型的炮、步枪和机关枪，制造子弹和炮弹。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小米加步枪，没有飞机、坦克、大炮，没有外援。但是我们打败了有飞机、坦克、大炮和有大量美援的敌人。

春节谈话

毛泽东

1964.02.13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旧历正月初一）下午三点，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郭沫若、蒋南翔等，以及党外人士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许德珩等十六人。）

（一开始，毛问章、许、陈、黄。）你们说，我们会不会垮台？苏美合作会不会出兵？会不会占领北京？我们是有准备的，顶多退到延安。那时我们只有一百五十万人，还顶住了。他们原子弹多，会不会把我们打死？（章说：不会）（毛对黄炎培说）是不是上了贼船？你们都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怎么办？（章说：我们不下来了。）

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很好。帝国主义的日子不好过，修正主义的日子也不好过。走狗不那么走，美国就要搞掉它。例如南越的吴庭艳。伊拉克有个卡赛姆，也是美国搞掉的。搞掉了吴庭艳，蒋介石很伤心。一月十日台湾开紧急会议，决定与法断交，形式上是蒋与法断交，实际上是法国与蒋断交。

我最近对外国人员讲话，要印给他们看。许德珩，你是一党之魁，不看还行？

人就是要挨骂。人挨骂有好处。修正主义公开骂我们，我们就可以公开反击，公开了就好办。一九四〇年我们在重庆有个办事处，蒋介石暗中搞了个“限制异党办法”，在他们内部发行，比修正主义高明。后来一九四一年搞皖南事变，他们消灭了叶挺九千人，又搞三次反共高潮，教育了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使我们做了准备。抗战胜利后，我到重庆谈判。正在谈判期间，打了上党战役，把阎锡山的几千人消灭了。后来又打了邯郸战役，高树勋起义了，几千人没有跑多少。（康生说：高树勋还是共产党员。）可见人是会变化的。

我来介绍一下章士钊的历史吧。我们相识可能是一九一八年在北大时。（章说：还早一点。）那时我是个小职员，八块大洋一月，不管衣食住行。章士钊当过黄兴的参谋长。袁世凯想提他当北大校长，就是陆平那个角色，他知道袁要做皇帝，不干，跑到日本。在日本出了个甲寅杂志，又叫老虎杂志，因为寅属虎。在日本出的比后来在国内出的好。回国后，与戴传贤唱对台戏，出了个杂志，封面划了个狗，屁股后面划了两条扛扛，表明“狗屁不通”。后来又当了教育总长，又参加了马厂誓师。（章：我没参加。）黄任老，你是个立宪派的人？（黄炎培：我是革命派，不是立宪派，参加同盟会的。）陈叔老你是研究系。许德珩，你这个水产部，很有前途，海岸线很长。（×××说：可以捕，可以捞，还可以加工养殖，大有可为。）无论是立宪派、革命派、研究系，现在你们都跟我们一起了，在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康生说：溥仪皇帝来拜年了。）啊，皇帝还给你拜年！（康生说：到政协拜年，我也在。）宣统皇帝应好好团结，听说皇帝只拿一百多元，是否太少了？要长些薪金。光绪、宣统，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那时是他们治下的公民。（章：他的叔叔载涛，听说生活很困难。）载涛这个人是过去的陆军总长、军机大臣，留学过德国。可由你把稿费多给他一些，使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食无鱼”。

我现在不看《古文辞类纂》了，看《昭明文选》。《海赋》写得很好，庄子《秋水篇》很可以看一看。（对章说）你是桐城遗种，我是选学余孽。

国际形势，当走狗不好当，尼赫鲁太不行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输定了。现在还有神气，还张牙舞爪，但是他们脱离群众，苏联修正主义日子不好过，到处碰壁。在罗马尼亚碰了壁。波兰不大听话。古巴是听一半，不听一半。听一半是因为古巴没有石油，不能造武器，无可奈何。美帝国主义日子也不好过。日本是要反美的，不仅日本共产党反美，日本人民反美，日本大资产阶级也要反美。不久前北×制铁所拒绝美国调查。中法建交是戴高乐主动的，戴高乐还不是大资产阶级吗？他也反美。（问章：）你知道沈崇事件吗？（章说：是沈从文吗？）不是，是北大一个女学生，被美军强奸，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美浪潮。现在美帝到处做坏事，到处遭到反对。

人是要挨骂的，他们愈是骂我们，我们愈好。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蒋介石愈是公开骂我们，我们愈好。最近蒋介石不大公开骂了。帝国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说我们讲空话，骂我们宗派主义、假革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登我们的讲话？那就是说明我们有些东西。最近，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四点：（一）停止公开论战；（二）再派专家来；（三）边界谈判；（四）扩大贸易。来专家，你们敢不敢要呢？（大家说：不敢领教，来了以后再走，反而增加困难。）停止争论吗？他们骂了我们两千多篇，我们才写了七篇。边界谈判可以谈，在北京，二月二十五号就开始。生意也可以做一点，但不能太多，因为他们的机器一贵二笨。（他们一套化肥设备，一千八百吨重，要占三千多亩地，用三千多个工人。意大利的只有一百八十吨重，占三百亩地，用三百个工人就可以。）（××：质量还差。）是呀！质量差，还要留一手。一笨，二贵，三重，四留一手。我们和他们作生意吃亏，不如同法国资产阶级好办，还有点商业道德。

过去几年缺点主要是两条，一条瞎指挥，一条高征购。现在都改了，可是又走到反面。瞎指挥改了，成了不指挥，下面没有劲了。还是要将他们鼓动起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石油部大庆。最近石油部大庆油田出了××万吨原油，建立了××万吨炼油厂，只花×年时间，×亿多元，投资少，时间短，效果大。每一个部都应学石油部，学解放军，搞一套好经验。大家不是要学解放军吗？要派人去学。解放军对敌人是战斗队，对人民是工作队，解放军内部官兵关系好，比地方好。大庆文件要发给在座的。（问蒋南翔，大学是否要学解放军？）（蒋南翔：要学，已派人去学。××说：学校成立政治部，看来是肯定的。）大学生也要学解放军。

今年要把工作搞得比去年好些，错误要少些。要发扬好的，树标兵，多表扬，同时也批评错误，以表扬为主，批评为辅。在我们的事业中，有很多好人，有很多好典型需要表扬。现在高征购，瞎指挥没有了，看老天爷如何？去年北方大水，湖南大旱，（××：还有广东、广西也旱。）本来年成好，下了暴雨，几十亿的粮食就没有了。（××：不是几十亿，而是一百二、三十亿没有了。）可是去年还是增产了××亿斤粮食。（××：河北是十二成年景，几天工夫就搞完了。××：六天。）五天半就搞完了。

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都要学解放军，对犯过的错误都要改掉。今天开座谈会，谈了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是根本的。国内不好，国外就不好谈了。现在有几个国家要和我们建交，一个是突尼斯，一个是布拉柴维尔刚果。卢蒙巴的刚果搞起了游击战，他们无枪无炮，用的是张飞的丈八长矛，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邓小平：还有黄忠的箭。）无非是

关张赵马黄的武器，没有新式武器。我们过去也是没有的。（康生：最近他们还用箭射到一架直升飞机，射中了油箱，飞机起火。箭有毒，射死一个美国的参谋。）

中国一开始也没有自己的部队，只有叶挺一个团，南昌起义才搞了两个师，打到广东，搞得光光的。朱德、陈毅、林彪带残部上了井冈山。我那时教小学，教过一年级、二年级、三、四年级，怎样打丈，那时也不知道。

今年工作要比去年搞得好点，要想法把成绩搞得更好点。不但是中央的希望，也是你们的希望。今年也可能是较好的收成，如果老天爷帮忙。现在工业有了进步，教育也要改一改。

今天想谈谈教育问题。除中央的几位同志以外，还邀请几位党外人士参加，还有科学院长、教育部长、北大、清华的同志和新华社的同志参加。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请邓小平讲一讲。

（邓：现在教育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负担太重，学制太长。现在七岁上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一般五年，好的大学六年，要十七、八年，到二十四、五岁毕业。加上大学毕业后一年劳动实习，一年见习，正式走到工作岗位就已经二十六、七岁，显得年纪太大了。比苏联要迟二、三年或三、四年。苏联中、小学十年，大学四、五年，二十三、四岁进入工作岗位。年龄大了，这对文科的学生问题还不是很大，但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学生，对他们的发展有不利的影响。根据国外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原子能等新兴科学方面的发展情况来看，开始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平均是二十四、五岁左右。这个年岁正好是脑子最好使的时候。而在我国的大学生，这时却没有走上工作岗位，这对他们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学制特别长，应该缩短学制。）

可以缩短。

（邓：现在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学制问题研究小组，准备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由林×负责。林×提议：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十五、六岁毕业就可以就业，也可以中学毕学后再受一、二年职业教育，十七、八岁就业，可以到农村，也可以到工厂。如果升学，可以入大学预科，预科可以文理分科，办得更有特色，便于同大学的课程衔接。大学一般搞四年，一部分的工科五年、医科六年。这样学制可以缩短，二十三、四岁就可以到工作岗位。采取这样的制度来完成国民教育，一般是十五、六岁就可以毕业了。不过有个问题，是当兵，中学毕业生还不到当兵年龄，但可以到军队当预备兵。）

这不要紧。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事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当兵，搞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事生活；十七岁（指男的）也可以当兵。

（邓：这样文科学校问题不大，理工科问题大一些，课本要搞得好。）

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中小学生近视眼成倍增加，这样不行。

（×××：课程多而繁重，老师作业留得多，紧张得不得了，没有课外活动和阅读的时间。）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孔子教学生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了颜回、曾参、荀子、孟子四大贤人。颜回二十四岁死了。

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不能跑跑跳跳、打球、游泳、看点电影，又不看课外读物，那是不行的。学生不能培养成书呆子。

（邓：现在学生应付考试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功课得五分也没有用。）

历来的状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状元，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柳宗元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都不是状元、进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清朝的拔贡。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一个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士，比较蹩脚。刘邦是个草包，也没有什么文化。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邓：现在课程繁重，考试方法有问题，学生不能独立思考。）

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一些偏题、古怪题，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看这种考试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学生公布，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看书去做。譬如，对《红楼梦》的研究，出二十道题，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解答。有的学生答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见解，这样的试卷可以给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全部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是平平淡淡，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这样的试卷就可以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我看可以允许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自己不懂，问懂了就有收获。交头接耳、冒名顶替，过去不公开，现在让它公开。这无非是你会我不会，你写了我再抄一遍，也可以，抄会了也是一次学习。总之，考试的方法要改变，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具体如何作法，可以试点。

还有，先生讲课有的［Luo， 左“口”右“罗”］［Luo， 左“口”右“罗”］嗦嗦，要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又臭又长，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不如打瞌睡，可以休息脑筋，养养精神，对身体有好处。

（邓：学制缩短以后，可以抽出一些时间让学生参加劳动、当兵。还有一条，应该允许优秀的学生跳班，有的优秀学生跳班以后还是最优秀的，现在总是压在那里。）

现在我们搞得太死了，课程太多，考得太死，我们不赞成。现在这种作法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付学生，害死人，要改变。

（陆定一：现在教育厅长正在开会，有两个问题要研究：第一是学生负担太重，课程多，教材内容多，作业多，门门都有课外作业。第二是现在的教育方法有三套，学了苏联凯洛夫的一套，英美杜威的一套，孔夫子的一套。）

孔夫子可不是这样。他只有六门课：礼、乐、射、御、书、数。

（主席问章士钊：书是书法，还是历史？）

（章：是书法吧。）

是历史吧。如书经。

（陆：现在中小学以升学为唯一目标，毕业后不肯劳动，问题很大，要解决一下。要实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第二是两条腿走路。河北省去年发大水，很多房屋塌了，办简易学校，结果中小学入学人数反而增加了。）

这是大水冲垮了教条主义。

（陆：其他地方学生人数都下降很多，主要是要求正规化，取消复式教学，搞单式教学，贫下中农子女失学的很多。河北省有了好的经验。另外，广东新会县调查了十几所农业中学、普通中学，普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国家一年花一百二十元，农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一年只花六元八角。农业中学毕业生就业没有问题，普通中学毕业生考不上大学，就麻烦得很。看来中小学都要两条腿走路，同时要注意提高质量，这样才能普及教育。从前都只是照抄苏联的一套，五八年冲了一下，劳动多了一些，又忽视了学习，改就是了。文艺也是如此，当时大胆改革，做得比较粗糙，但现在的水平就提高了。没有五八年的革新，也就没有今天的水平。）

要把演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市去，统统赶下乡去。要分期分批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在机关。你不下去，就不给开饭。住在城里怎么能写得出东西来！

（陆：还有教师队伍问题，估计中小学百分之二点七的教师是坏分子。现在最坏的学生上师范，好学生进理、工。）

这不要紧，只有百分之二点七。这些人可以改造，可以转业。

（陆：现在进师范的学生质量不高。今后可以考虑高等学校的文科、师范，不要直接招高中毕业学生，而招高中毕业后参加过劳动一、二年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到农村去也有好处。哈尔滨工大有个经验，把教师下放一、二年，原来不好的，回来都不错，成了骨干。）

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李时珍长期自己下乡采药，祖冲之是自修的，没有进过什么大学、中学。孔夫子又进过什么大学？他的职业是人死后去吹吹打打，当吹鼓手。这一点是章太炎指出的。他还做过会计，看过牛羊。但是，他却学会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会弹琴、骑马、射箭、驾车子。“书”大概讲的是历史。后来到鲁国做官，官也不大。鲁国只有一百多万人口，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县。孔夫子自己说，他小时贫穷，受鄙视，经常挨骂，自得仲由以后，才“恶声不入于耳”。大概是子路做了孔子的保镖，谁骂就要揍谁，别人不敢再随便骂他了。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这几方面都要改。

（陆：小学改五年比较有把握。）

可以改。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传记文学家，他是卖报童出身。瓦特是一个工人，没有读过多少书，发明了蒸气机。要让学生自学，学会思考，比读死书好，要多给时间。

（林×：将来二十三、四岁走上工作岗位是可以的，小学入学年龄可以提早一年，允许六岁入学。就是房子有问题。小学改为五年，可以解决一些房子。中学四年，大学预科可以是两年，也可以是一年。）

（××：入大学前拿一段时间到工厂、农村。）

还有军队。

（林×：文科可以，但理科有困难，劳动二年就忘了。）

（康生：苏联中学毕业后劳动二年，但理工科所学课程不衔接。）

（林×：学制要结合我国国家大和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来考虑，要允许多种形式。将来大学可以考虑三种学制，六年主要是医科；五年制理工科；四年制文科、师范，多数大学四年就行了。将来学制要多种多样多轨制。城市中学也有两种，一种升大学，一种是中学毕业，上二年职业学校然后工作。）

对了，学制要多样化。

（林×：课程问题主要是不集中，门类要少些，内容要少而精，考试也要少一些。）

现在一是课多，二是书多，压得太重。

（林×：现在课程的循环多，如果集中一些，课程的门类就可以减少一些。）

不要门门课程都考试，上过就完。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就不要考，真正理解这些课程要到以后工作中去慢慢体会。知道什么是逻辑、什么是语法就行了。

（彭真：现在是灌输，死念硬背。）

（陆定一：现在教育思想有二派，一派主张讲深、讲透。一派主张讲总略，学懂、学会，学少一点。现在很多学校想一下子讲透。）

课程讲得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终究是要灭亡的。我看用这种办法教学生，不论是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苏联的也好，都要灭亡，走向自己的反面。无论土教条、洋教条一概不行，都不要。五经、十三经注解那么多，还不是都灭亡了，行不通。佛经那么多，谁能读得完！唐玄奘翻译的解释金刚经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不到一千字，比较好读。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那么长，就很难读完了。

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列主义的书要读，但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行了。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

孔夫子的教学也有问题。孔子没有参加过工、农业劳动，因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

洋教条、土教条都要反对，要创自己的路。

关于学校课程的设置、讲授和考试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

1964.03.10

刘、邓、彭阅后，请尚昆办。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在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毛泽东

1964.03.17

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

毛泽东

1964.03.22

我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需要几年才能完成（至少要三年到四年）。地方要学习解放军的经验，解放军也要学习地方的经验。中央的三个社会主义教育文件（五反指示，决定草案，规定草案），除五反指示限于城市及县以上机关以外，其余两个（即所谓双十条）应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发问，答问，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直到确实解决问题。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这种队伍，要使一切能讲（即能看懂文件）会讲（即政治水平较高，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同志都得到机会去讲。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已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现将两个文件发给你们。一个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的报告，一个是孔夫子故乡山东曲阜县委一九六四年二月十日的报告。请你们研究这两个文件，从其中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在听取汇报时的插话

毛泽东

1964.03.24

看到你的信，你们想找我谈一谈。最近因为搞反修斗争，等等，好久没有找你们谈了。

你们看，我们跟赫鲁晓夫斗争，能否取得胜利？我们跟敌人斗争了一辈子，敢跟帝国主义斗争，也打败了帝国主义，我们就不能打胜赫鲁晓夫？！

我们现在主要是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至于反动派，如尼赫鲁，那不算什么！

（当谈到有人在一九六〇年上海会议上提出粮食产量的高指标问题时）

真理，一切真理，开始的时候，总是在少数人手里，总是要受到多数人的压力。四百年以前，波兰人哥白尼，他是个伟大的天文学家，发现了地球是动的。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以科学的日心地动学说，推翻了在天文学上统治了一千余年的地心天动学说。当时宗教界群起而攻之，都反对他，说他是异端，他是一直受压迫的。他的《天旋论》，一直到他临死前（一五四三年）才出版，他高兴了。当时意大利的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年），是一个卓越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赞成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意见。从一六〇九年起，他自制望远镜观察天空，看星球是否是动的。但是，也受到当时宗教界的迫害，受到罗马反动法庭判罪。另一个人是被火烧了。烧死一个人算什么！真理还不是在他手里头？！烧死一个人，地球还是动的。发明安眠药的是德国人，是个药店子的药剂师。他们几个人在药店试验。开始他们的目的，是想减少妇女生育的痛苦。他们经过了多少次的试验，有一次八个人都中了毒，几乎死了，但终于发明了安眠药。可是，德国人不准他们制造和推销。法国人买了他们的发明的专利权，把这个药剂师请到法国，开欢迎会，这才推广了。也很奇怪，在那一个地方不灵，在别的地方就灵起来了。这种事情也很多，比如说，佛教是印度发明的，可是在印度并不那样吃得开，到了中国和其他地方就灵了。又比如，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欧洲和苏联就不灵，到中国就又灵了。达尔文，他本人也是信仰宗教的，他的《物种由来》出来之后，受到宗教界的迫害，都反对他。

（当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

最近我们讨论了一次，批了两个文件，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委员，都到群众中宣读，用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我批了，凡不是年老有病的（比如徐老、吴老），凡不是不认识字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就是说不是右派，比如彭德怀不要去了），都去读。军队中的将军们都下去读了，说行嘛！其他的人为什么不行？

实际上，向群众宣读文件，就是向群众学习。你要到那一个地方宣读，你就要首先进行调查研究。在向群众宣读的时候，群众又会提出很多问题来，你要解答，这也要进行调查研究。

“四清”，“五反”，这都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我们的头脑中并不产生什么。“四清”就是保定地委提出的。河北省有八个地委，只有保定地委提出。保定地委开始也是不

懂得搞“四清”，后来群众提出，非搞“四清”不行，他们接受了。干部参加劳动，是山西昔阳县教给我们的，以后又有浙江省的几个材料。

（当谈到全国现在正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

“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苏区斗争是很激烈的，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不得不进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两论”是几十年前写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发展了，内容更丰富了，应该重写。

（当谈到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三年大发展中间的经验教训时）

大有好处。不经过这么一次是不行的，是学不会建设的。搞全国规模的建设，我们没有经验。革命时期，我们有些根据地搞经济建设的经验。那时，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三个：一要吃，二要穿，三要盐。因此，就必须发展生产。这就是我们当时搞经济建设的由来。

土地改革纲领（一九三三年文件），我在这前后费了十年功夫。不费十年功夫，是搞不出来的。在大革命时，我办了两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一次，武汉一次，也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但还没有解决。还是以后在兴国和其他地方进行了八个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才解决了问题。这是群众教给我的，说应该这么样办。

我们学会革命，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到一九四五年七大，用了二十五年的功夫。延安整风的时候，我们知道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知道了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我们总结了这些经验。所以，我们到抗日战争结束时，能够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民兵还不在内。七大开得很好，统一了思想。团结了全党。当然，也还有些问题，比如高岗、彭德怀，但我们还信任他们。彭德怀以后当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一九四六年跟国民党是小打，一九四七年七月就开始反攻，每月消灭它八个旅，可灵咧！到一九四八年，逐步打下了石家庄、济南，以后就是三大战役。

学会打仗，是用了十五年的功夫。我开始不会打仗，也没有想过要打仗。大革命失败了，我们当时有五万党员，分成几部分，一部分被杀了，一部分投降了，一部分不敢干、逃跑了，只剩下了一、两千人。七大统计时，还有八百人。这几年，除了老死的，只有六百人了。井冈山的人也只有三十个了。在那个时候，逼上梁山，非拿起枪学打仗不行。也没有进过什么军事学校，住过军事学校的是少数。学会打仗，主要是蒋介石这个“老师”教给我们的。他把苏区打垮，叫我们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两万多人。而这两万多人，还并不都是长征来的，是经过陕甘边境庆阳、关中的云阳和东征发展来的。当时我说，这两万多人是比三十万人强了，而不是弱了。走了两万五千里，腿“讲话”了，发言了。这样我们的脑子就要想一想，遵义会议就开成了，才改过来。学会打仗，什么都是逼出来的。

（当谈到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打歼灭战时）

不能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打个歼灭战，没有这么个几年功夫不够。至少四年，去年一年，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不能急。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也大概需要一些年，才能全学到手。也不能急。有的省今年就要把社会主义教育搞完，太快

了。你没那么多好干部嘛？工业基本建设也是这样，也不能太急，太急了不行。你逼得厉害，他就要弄虚作假。

（当谈到什么叫做拥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践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伟大的成绩，它既振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万吨石油，而且不只是××万吨石油，还有××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说服人嘛！

（当谈到某些同志革命意志衰退，需要提拔青年干部时）

有些人到底是有病，还是革命意志衰退？还是一礼拜跳六次舞？！还是爱美人、不爱江山？！说是病得不得了，不能工作，就病得那样厉害？！……像某些同志，到底是爱美人，还是爱江山？我看叫他搞××不一定能搞好，要给他配个“宰相”。

多年提倡下去调查研究，就是不下去。搞了多少年工业，并不知道什么叫工业。不懂机器，不懂设备，怎么行？！

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是二十七岁，孙权也是二十七岁。孙策干事时只有十七、十八岁。周瑜死时才不过三十六岁，那时也不过三十岁左右。曹操五十三岁。事实上，年青人打败了年老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谈到大寨生产队的陈永贵时）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全国人代会开会时，我的一个同学×××，现任湖南省副省长，他要跟我谈一谈。他说，现在了解到了，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的，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一个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认识字，是个放牛的。我们军队内，也是老粗多，知识分子少。许世友念过几天书！×××没有念过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念过高小，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当然，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林彪、徐向前、×××、×××、……，我们算是中等知识分子。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当谈到现在风气不错，大家都愿意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愿意向别人学习时）

凡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我是个小学教员，小时候也信过神仙，跟我母亲朝过山，在十月革命以前并不知道有马克思，知道有马克思是以后的事情。

哪里有没有错误的人呢？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喜欢形而上学。什么叫做形而上学？就是片面性，就是只准说好的，不准说坏的，只爱听好的，不爱听坏的。前年，一九六一年，××部门就是听不得批评。像×××同志，这是个好同志，但就是不愿意让人家看他们的坏的，只愿意让人家看好的，生怕触着痛处。

马克思也是一分为二的。马克思的哲学，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学来的，经济学是从英国李嘉图等学来的，又从法国学了空想社会主义。这都是资产阶级的。从这里一分为

二，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请问，马克思他小时候，是否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我们这个党也是一分为二的。

在反一次“围剿”之前，有人说，搞军队非打人不可，不打人怎么能带动军队？！那时，军阀主义可厉害咧！士兵说：“爱兵爱兵，连长骑马”。这句话不对，连长应该骑马。

彭历来是闹分裂的。在中央苏区时，立三路线来了，他们可“左”咧！要打大城市，打九江、武汉、长沙。我说不行，他们说非打不行。当时有个吉安地委书记李文林，也给中央写了信，说分土地、土地革命发展和巩固并重是农民意识，说先打吉安后打九江要断送革命。这是说非打九江不可，“左”得很！十年内战，党内斗争可厉害了。

五中全会选张闻天为政治局委员，那时张并不是中央委员。现在查，张是否党员，何时入党，何人介绍，都查不出来。但是，那时却选他为政治局委员，反而不让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参加会议。

长征到遵义会议，情况有些改变。王明路线，应该有个分别，遵义会议前和会议后不同。

跟四方面军会合，我们讲老实话，告诉张国焘，说我们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有三万人了。讲老实话嘛！那时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张国焘就向我们要领导权，我们不给。张国焘他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以后，就到了陕北。抗战中间也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有王明路线，还有彭德怀的百团大战之类的东西。七大前，开了斗争彭德怀的会议。他在庐山会议不是说，你们骂了我四十天，我也骂你们二十天。延安斗争会，你们参加了嘛！他就是不分散（指百团大战），要搞集中。实际上，那时一个排分散出去，就可以发展成一个团、一个师。

解放以后，还不是一分为二？高饶反党集团，一九五三年是一个大暴露。财经会议时，他们说，××、××等是一个宗派。我谈了，中国革命就是许多山头闹成的，没有山头，那有革命？我们那时又没有共同纲领。

彭与高岗是在陕北结合到一起的。没有想到，邓华也跟他们搞到一起。邓华跟我谈过话，他觉得井冈山没有山头，很没味道，以后就找彭去了。死了的那个陈光，也感到没有山头，不满意。

一九六二年，又闹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各部门可不稳呢！邓子恢要搞“包产到户”。王稼祥过去从来是有病，那半年没有病了，就是要“三和一少”。可积极哩！我们现在就是要“三斗一多”。统战部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并且定了五年计划，软绵绵地，软下来了，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那时他们在国际上是要搞“三和一少”，在国内是要搞“三自一包”。彭德怀的反攻书，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习仲勋他们的《刘志丹》一书，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当谈到读书时）

愚公移山，是有道理的，在一百万年或者几百万年以内，山是可以平的。愚公说得对，他死后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再生儿子，孙子也再生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发展下去，而山不增高，总有被铲平的一天。

哲学讲半个钟头就行了，讲久了反而讲不清楚。书也不要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够了，越读多越不清楚。

（当谈到农村粮食收购、换购时）
有些地区不搞基本口粮，我不赞成。要搞基本口粮。

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摘录）

毛泽东

1964.03.28

一、我四、五十年前看过一本《香山记》，开头两句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单唱一本《香山记》”唱这个就不能唱别的。

二、我们有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五二年搞了一次，五七年搞一次，那只是在机关、学校，这一次要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至少用三、四年时间。我说至少三、四年，不然五、六年。有些地方，打算今年完成百分之六十，不要急，欲速则不达。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慢吞吞的，问题是运动已经起来了。河南太急，说这里是第二次土改，有道理。

三、（有人汇报工作组以包青天自居）包公还不是帮助土豪劣绅？（有人汇报有的工作组打人）包公就是打人。

四、试点失败了，不奇怪，失败了还要干。要特别注意总结失败的教训。

五、（有人说，有人主张用学大庆、学解放军代替四清。）那是代表不搞阶级斗争的那一派。大庆难道就不搞反贪污、反浪费？就不反盗窃？

六、中央五反指示没有谈阶级斗争。

七、牛鬼蛇神要让它出来，出来一半还不行，出来一半还会缩回去。

八、关于四权下放，证明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意见是对的。周兴不同意他的意见，说不能下放到队，实际上是少数人的意见代表多数人的意见。

九（有人说大学教授下乡四清，说自己什么也不懂。）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

十、人家把机关枪都交出来了，就不要再逮捕他了。逮捕是把矛盾上交，上面又不了解情况，还是放在群众中监督的好。

十一、除了年老有病的，文化很低读不懂文件的，以及政治威信很低像彭德怀那样的，都要宣读文件。

十二、一九四七年，《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口讲，有人记下，又经过我修改的。那时我得了一种不能写东西的病。现在写东西都是由秘书写，自己不动手。当然有些东西是可以由别人代笔的。例如总理出国的讲话，就是黄镇、乔冠华他们搞的。有了病，自己口讲，叫人家写，也是可以的。自己总是不动手，靠秘书，不如叫秘书去担任领导工作好了。

十三、一九三三年我在古田的调查，是反映农民的意见，是农民的意见，从我的嘴说出来的。

北京是不出意见的。工厂没有原料，出不来成品，我们就是靠你们的原料来加工。

在四个副总理汇报时的插话

毛泽东

1964.05.00

一、一定要很好地注意阶级斗争。农村四清是阶级斗争，城市五反也是阶级斗争。城市不要吹牛，五反工作不能在今冬明春结束，要准备×、×年才能结束。城市也要划成分。至于如何划法，将来做时要订出标准。不能唯成分论，马、恩、列、斯出身都不是工人阶级。

二、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一定要把干劲鼓足，一定要把后备留到。不能凭我们的年龄来订计划，计划一定要有客观根据。我七十多岁了，比你们大些，但是不能凭着我们在临死以前看到共产主义来订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我看还是注意数量多了，而质量没有更多地注意。

计划绝不能凭主观愿望，一定要有客观根据，要切实可靠。

三、自力更生问题。自力更生十分重要。不仅一个国家要自力更生，就是一个工厂、一个人民公社、生产队也都要自力更生。在人民公社管理工作中，真正有成绩的是靠自力更生的那些公社，凡是有贷款的公社和生产队办的就要差些。现在我们全国真正自力更生的公社有三个：一个是江苏的陈永康公社，一个是山西的陈永贵公社，另一个是山东曲阜的陈玉梅公社。他们从来没有向国家要一个钱，完全靠自己力量搞起来的。

四、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干部一定要参加劳动。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领导干部要蹲点，不能只靠听汇报。部长都要蹲点，不然就不开会。

五、今年的小麦估计可以比去年增加××亿斤。看来今年多雨，是利多害少的。

六、第三个五年计划要从农村搞那么多人进城当工人，不是个办法。

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64.05.15

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要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老的。老的还有些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以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的不会一下子实现的，没那回事。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

对林彪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的批语

毛泽东

1964. 06. 04

江青阅。并于六月五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4. 06. 06

制定计划的方法，过去基本上是学苏联的，比较容易做。先定下来多少钢，然后根据这来计算要多少煤，多少电，多少运输力量等等。根据这些再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是摇计算机的办法。钢的产量一变少，别的一律跟着削减。这种方法是一种不合实际的方法，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就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都落空。打仗，也计划不进去。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打。还有各国的革命，也难计划进去。有的国家的人民革命成功了，就需要我们国家的经济援助，这如何预计到？

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

这几年，我们摸索出来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时，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

年成，如何计划？五年中，按“一丰、二平、三歉”来定。这样比较切实可靠。先确定在这样能够生产的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基础上，可能搞多少工业。如果年成好些，那就更好。

还要考虑到打仗，要有战略部署。各地党委不可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

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手，国防是一个拳手。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

基础工业，现在主要解决品种、质量问题。去年钢的数量虽然比过去少了，但品种比过去多了，质量比过去好了，用处比过去还大。关键不在数量上。苏联就是以数量为标准，如果钢的数量标准完不成，好像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行了。他们年年要增加产量指标，年年搞虚夸。其实，数量计划完不成，国家垮不了台。有一定的数量，品种更多了，质量更好了，基础就更巩固了。

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这不是说可以不要工业支援，水利、化肥、农药，都是需要基础工业的。

要按照我们掌握的客观的比例关系安排计划。

计划不能只靠加、减、乘、除。计算出来了，各部门、各地区，就分数字、争人、争钱、打官司。要政治挂帅，要有全局观点，不是根据哪个地区自己的愿望，而是根据客观存在、事物本身的规律来安排计划。

不要老是争钱，争来了钱，就乱花钱。周信芳一个月一千七百元工资，不演多少戏，还存钱在香港。有的青年演员就作“十年计划”，要赶上周信芳。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

争取几年内做到不再进口粮食，节省下外汇来多买技术设备、技术资料。

不能乱花钱，不要看到情况好转了又随便“大办”。“留有余地”，过去说了多少次，不照办。这两年照办了，不要情况好了又不照办了。

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可以做到半工作、半劳动。这办法值得提倡。懒是出修正主义的根源之一。

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会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北京（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一定要深入生活，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体育，也要对革命斗争和建设有益处的。

一般干部中，“三门”干部很多（出家门进学校门，出学校门进机关门），“三门”不能很好培养干部。国家将来靠这种干部掌握，就危险。靠“小学门、中学门、大学门”干部也不行。不读书不行，读书太多了也不行。本事，光靠读书不行，要靠实践。我们的国家主要靠在实践中读书的干部掌握。

各省都要搞军事工业。要从工业、农业、文教挤出钱来。不要办那么多正规学校。清华学生一万多，教职员、家属四万多。这样，领导精力会大大浪费。

院士、博士，不一定要搞。

在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4. 06. 08

开了二十天的会，我们才见面。你们的简报我都在看。

主要依靠自学，肖楚女就没有上过学校，他在茶馆跑堂。我很喜欢他。在农民讲习所教书，主要教员靠他。他能打破教书的旧框框。后来当黄埔军校的教官。农民讲习所，我们拿小册子给他们看。现在学校不发讲义，叫学生抄，为什么不发？据说怕犯错误。抄就不犯错误？发讲义叫学生看，你可以少讲。材料不仅发一方面，正、反两方面都发，如历史，新学、旧学都要发给学生看。我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写的讲义，就没有讲。《论持久战》也是这样写出来的。《矛盾论》写了几个星期，白天黑夜写，写出来只讲两小时。可以叫人家看嘛。现在的教员就是懒。自然科学不同一些，要看实验，要有工厂。过去搞概念，今天是概念，明天是概念，学生啥也看不到，先生不写讲义。（有人说发了讲义先生没什么讲的）那你可以多看书嘛。

（问刘少奇）你不是同格里巴同志谈了吗？

（刘少奇说：格里巴是好同志，是左派核心，希尔也是好同志。有些国家尚无左派核心，仅是小组活动。）

先出来的可能是积极分子。×××活动在美德轴心，没看到美德矛盾。欧洲有些国家有恐德病，赫鲁晓夫想搞美国控制德国。

法国也怕德国，欧洲一些党也怕德国。

法国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四十万军队，邱吉尔担心法国拿不下来。戴高乐有办法，第一是封官，第二是改为国防军三十万，另外十万军队解散，庞大民兵解散。多列士从苏联回去说服大家交出军队，当了副总理，最后一脚踢开。

欧洲党都如此，××同志讲，他们像我们大革命时一样，工人农民都组织起来，武装也有了，工农向我们要办法。我们就是没有想到夺取政权，也没有准备国民党可能解除我们的武装。当时形势很好，就是没想到资产阶级会叛变。武汉政府两个共产党员当部长。一个是谭平山，后来组织第三党，解放后搞农工民主党。一个是苏兆征。不经过那一次资产阶级叛变是不行的，中国革命不会成功的，这是命中注定的。现在又是一次，我们对赫鲁晓夫开始没有准备他会叛变。现在世界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十月革命，修正主义出在苏联有伟大意义，南斯拉夫出修正主义不行，苏联是搞了四十多年，列宁领导的。南斯拉夫是偶然的，苏联不是偶然的了。

我们已经出了白银厂、小站，过去我们不注意上面的根子。

（郑州会议，主席提出赫鲁晓夫是好人是坏人？希尔讲他早就知道赫鲁晓夫是坏人，我们知道，但不好公开讲。）

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

写党史请董老挂帅，要把蒋介石全集印出，看他怎样骂我们。（周恩来：太多了，可以出选集。）

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修正主义中央。

在十三陵关于地方党委抓军事和培养接班人的讲话

毛泽东

1964.06.16（下午）

讲两个问题：一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二是接班人问题。

一、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

地方党委要安排军事，光看演习不行，要抓军事，要搞武器工厂。各大区、各省都要做出计划，例如，民兵、小型兵工厂、修理厂、制造厂，要有个规划，省委对地方军队、民兵要过问。省委第一书记都兼政委，政委不履行职务，实际上是空头政委。如不抓军事，一旦发生问题，就会手忙脚乱。不管敌人从哪里来，一打进来，我们这个国家是否就会亡国了呢？要做到有准备，我们的国家亡不了。对付敌人，无非是两条办法，一个是打，一个是走，打游击嘛！打得就打，打不得就走。不打就走，这是机会主义；不能打硬要打，这是什么主义？这是冒险主义嘛！顶是要顶一下，但也可能顶不住。所以全放在顶的上面是不行的，顶不住就得打游击，要放在顶不住这点上来考虑。

各级地方党委，都要抓军事工作，抓民兵工作。各省要抓民兵，省、地、县要搞点地方部队，不要靠中央，不要靠几百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几百万人民解放军那个时候也不归你们指挥，归×××××指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长的战线，光靠中央几百万军队不行，要靠地方武装，地方守土有责嘛！也不是死守，要打游击。敌人来了，我们就出城；敌人进了城，就不会对这个城打原子弹，我们可以再进城。总而言之，要跟他斗，像那天看演习，侦察兵爬房子抓俘虏那样跟敌人斗争。

要把民兵很好整顿一下，从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整顿。组织上整顿就是要搞多少基干民兵，多少普通民兵，组织确定下来，要有战士、班、排、连、营、团、师，要有组织，有兵还要有官（就是干部）。而且要真正起作用，要训练。还有政治工作人员也要组织起来，一旦有事，拉起来就走。有人说当几个月民兵，精神面貌就大不相同了。民兵组织要有组织，有兵有官要落实。现在许多地方的民兵组织还不落实。

其次是政治，地方武装也要做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要分清民兵中的好人和坏人，把坏人清理出去。经过四清、五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纯洁组织。武器要掌握在好人手里，不能掌握在坏人手里。政治落实要有政治机构，所以，民兵组织、地方部队里要有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等一套组织。要向大家讲清楚，无论出了什么大事，不要慌慌张张。你慌张还能打胜仗？打枪、打炮、打原子弹都不要慌张。政治上准备好了，就不慌张啦。原子弹从头上打下来怕什么？打到脑袋上又怎么样，不过是见马克思嘛！“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就死嘛！死不了就干嘛！人是死不完的。把中国人都搞完？我看不见得。帝国主义也不干，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剥削中国人，都死光了，那还有什么剥削对象呢？干部也死不光的，没有死的就继续干嘛！二十多年的内战和解放战争，我们不是死了很多人吗？像徐彦刚、黄公略、刘胡兰、黄继光等人，不是死了吗？我

们这些人是剩下来的渣子，有很大的偶然性，偶然剩下来的，一直活到现在。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死。例如，×××，就是这样，阎王爷向他招手，他没去，现在还活着。总之，一旦有事，不要慌张，把准备工作搞好。敌人来了，就有条不紊地领导地方武装好好干。

军事上也要准备，各省要搞一些手榴弹、轻武器，如步枪、子弹、手榴弹的兵工厂，每个省要搞一套，要有准备。和平时期要搞一点枪，打起仗来再搞就晚了。你们这些人只知搞文，不知搞武，只要钱，不要枪（一开会就讲经济建设，大家都在那里要钱了）。打起仗来要靠中国顶住，靠修正主义是不行的。敌人打进来，我们就可以打出去。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几年了，也没有搞起来。打起仗来，不能从××××给你们送枪支弹药。每个省都要搞。现在你们各省不搞一点，将来中央没有办法支援你们。将来中央的工厂可以帮助地方一些技术工人、设备，如军工厂的工人，可抽出一点，先搞修理，后搞制造，一步一步地搞。要搞个计划。如果在你这个地区搞了，敌人没有来，不是没事情做了吗？不要紧，你们可以帮助别的地区嘛！总之，一旦出事，要有准备。准备打烂，准备打出城市。但各省在这种情况下都得有办法。最靠得住的还是靠脚走路，最有用，靠炸药，靠炮解决问题。解放战争打济南是用什么办法打下来的呢？就是靠炸药，一到城墙下面，挖一个洞，放上炸药包，这样打下来的。现在没有事，但是这个问题要讲，不然打起仗来怎么办？将来有事，敌人打进我们国土，我们搞得比南越还差？南越的游击战争搞得很不错，只有一千几百万人，没有我们一个省大，但他们的游击战争搞得那么出色！为什么我们一个省不可以搞呢？各省都可以搞。现在省、地、县委只讲文，不讲武，这不行。

总之，我们要准备打，打起仗来不要慌张，打原子弹也不要怕，不要慌张。一打就天下大乱了？不见得。教育人民不要慌张。无非是死人，人总是要死的，站着死，躺着死，都可以，不死就干。它打来了，怕也不行。打死一半，还有一半。总而言之，对帝国主义要斗争，要有劲，不要怕，怕它是不行的，越怕就越没劲，越糟糕。要斗争，要有准备，不怕就有劲了。

二、准备后事，接班人问题

帝国主义说，在中国，看来第一代没问题了（指搞复辟，搞修正主义），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讲得灵，讲得不灵？谁晓得？希望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苏联不就是出了修正主义吗？它是第三代嘛！如何防止修正主义？我看有几条：

第一条，总是要经常观察我们的干部，教育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干部，总是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最好稍多一些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服务。为中国的大多数人服务，也要为世界的大多数人服务。赫鲁晓夫就是为百分之五的人服务。我们就是为大多数人服务。思想上没有这一条的人，就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过去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过去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方针，革命就不能胜利。但是对搞阴谋诡计的人，还要注意，比如彭德

怀、高岗、饶漱石、黄克城、张闻天、习仲勋、周小舟、谭政这些人。这些人都是不简单，这十多个人都出自中央，都是中央委员，是搞阴谋诡计的人。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我们党内也是这样，有的人就搞阴谋嘛！他们要搞，我们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人在搞嘛！比如吴自立、白银厂、小站。所以要注意。各省都有搞阴谋的人。（刘少奇：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搞阴谋，不然就不成其为社会了。不是我喜欢这种人，而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有两个方面，不然就没有对立面了，那就是形成上学，就没有辩证法了嘛！人有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着一边，大姆指向着另一边。不要以为社会上各种人都搞清楚了。世界上没有真空的。化学上讲“纯”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后面再加上九个九，还有一个在那里，说明还没有纯。这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完全纯是没有的，不纯才成为社会，才成为物质、自然界。百分之百的“纯”就不成其为世界，不合乎客观规律了。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你们看我们哪一年纯过？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哪一年百分之百纯过，但是我们党也没有垮嘛！我们是搞不垮的。我们党有几朝：第一朝的领袖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朝是瞿秋白，搞盲动主义；第三期是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也是冒险主义；第四期是王明、博古，也是搞“左”倾机会主义；第五朝是洛甫（张闻天）。党在历史上有五朝，这五朝都没有把我们搞垮。就是说，非马列主义登台，都没有把我们搞垮嘛！所以把我们搞垮是不容易的。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五朝领袖没有把我们搞垮。这些人在革命里实际上都是自然淘汰的。陈独秀是八十三人开会，发表了声明，自己垮台的；向忠发被捕就叛变了；李立三路线也是自己垮台的，他说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是全国胜利的开始，只几个月就垮了。所以帝国主义也好，党内王朝也好，我们自己的修正主义冒出来也好（彭德怀不就是修正主义嘛！），都没有把我们搞垮。我们说过去有修正主义，现在也有修正主义，以后就不出了吗？胜利以前，在抗战初期出现了第二次王明路线，从“左”倾机会主义搞到右倾机会主义。胜利以后，又出现高、饶、彭德怀这些问题。这些人把我们搞垮了没有呢？彭德怀几次都是拥护错误路线的，拥护立三路线，拥护王明路线，拥护高岗路线。彭德怀和高岗的关系，可能在延安时就勾结起来了。彭德怀、黄克诚这些人历来都是带兵的，一个时期不带兵，他们就不满意了。党的七大以后一个时期，彭德怀没有带兵，以后第一野战军又用了他，抗美援朝用了他，他以为功劳大，回来又要他当国防部长，一当七年，解放军是不是搞垮了呢？也没有垮。他搞了那么大的阴谋，也没搞走几个人，只有黄克诚，谭政、方毅、洪学智这些人跟他走，并没有垮。还要准备出这种人。过去三军团的人，大多数不跟他走。我讲这个经验是为了团结大多数。甚至对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明知道他是反对我的，我还是讲团结嘛，帮助嘛！希望他改好。我找他谈，请他吃饭，一直到后来，他八万字的一封信摊出来，这就团结不了啦！高岗原来也想保留他作中央委员，争取他改正错误。可是有人搞阴谋，把他整死了。那时我还想挽救他，准备派他到西北去。总之，凡能团结的就团结。一要讲团结，二要警惕。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天下大乱不了，同时，还要看到天下是不太平的，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提高嗅觉，分清敌我，明辨是非，绝不能高枕无忧。一方面要团结大多数，另一方面要警惕。《九评》最近发表，是讲这个问题。你说不出修正主义，现在就有修正主义嘛！基层也有，各级都有。当然，主导的占统治的不是修正主义。你说没有修正主义？不见得。现在吴自立这些人不是在活动吗？（主席在另一次会议上讲：我看中国党要搞修正主义，用苏联赫鲁晓夫那一套也比较难。

我们国家七亿人口，工业不发达，比较落后。但是我们有一条，比苏联民主。苏联是沙皇制度传下来的，他们党内是父子关系、猫鼠关系。斯大林一开会就祝酒，每个人都捧，一祝祝到天亮，赫鲁晓夫不就是祝起来的吗？（刘少奇：中国是七亿人口大国，从来没有统一，出了赫鲁晓夫，要各省都赞成，也不容易。）有一个省独立就不得了。我看要把这个意思传下去，传到省委：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都要顶住。（刘少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袁世凯称帝，开始势力很大，后来一登台当皇帝，开始只有云南蔡锷出来顶，以后湖南等地响应，最后只剩下一个袁克定赞成，这样就垮台了。张勋复辟，事前开个会，很多人都在黄绸子上签字，结果还是靠不住，张勋一到北京，大家都变了。）

第四条，民主作风。要有民主作风，有事情和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总要听各种意见，有反对的意见就让讲出来，不要一言堂（就是一个人讲话）。要有民主，听反对的意见不要紧嘛！邓子恢不是变了吗？邓老过去有不同意见，有错误，现在不是又好了吗？改正错误就好嘛！人是可以变的。牛训练一年可以犁田，人为什么不能变呢？只有少数人不能变，花岗岩脑袋，像党外的于学忠、章伯钧、章乃器、刘××这些人不能变。党内也有少数人不能变的，象陈光、戴季英，现在还在河南，吃饱了饭骂娘，这些人变不了。郑位三也是中央委员，说他搞农民运动是最正确的，（插话：郑认为，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他了，他的名字叫位三，第三位。）各省都有一点这样的人，是少数，不变也可以，你骂就骂，但是我们要团结多数人。吴自立这些人也可以不开除党籍，劝他们改好。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要讲民主，不要光是一个人说了算，开会赞成了，以后又翻案，这不好，是形式的民主。开会就讲几个钟头，好像真理都在我们手里，这不好。要听大家各方面意见。我在年青的时候，有一次我的三弟毛泽潭向我汇报工作，听了以后不大满意，发了脾气，拿起棍子一顿，他就走了，临走时说，我们是共产党，是共产党员，不是毛氏宗祠。他讲的还是有道理的。（刘少奇：如果中国发生了赫鲁晓夫政变，阴谋篡党，全党都要反对。我看中国党要养成一种作风，就是要讲道理。有了问题，就摆到桌面上，充分讨论，充分酝酿，不准搞突然袭击，不准搞政变，不准搞阴谋，不准搞宗派。所有的党员都要讲道理，人民解放军要保证讲道理。道理不通，大家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一条，赫鲁晓夫、彭德怀都搞不成。凡是搞阴谋的都是见不得人的，摆不出来，一摆出来就垮了。所以我建议：下次党代会党章上要规定这一条：讲民主，讲道理。要养成这样的作风，有问题摆出来嘛！）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自我批评，不要总是自己对，什么都自己对。要比较少打错主意、讲错话，出坏主意还是少一点好。经常出错主意，只会打败仗。例如，我们要打三个仗，一个仗打败了，两个打胜了，这就比较好，这样还可以搞下去。在延安时反张国焘路线，很多同志在那里检讨，自我批评没个完，还不够，因此，引起许世友这些同志的恐慌，要出去打游击。把他关在班房里，我去看他们，许世友说：我只是想到大别山打游击。我说，斗错了，抓错了，你们要跑，没有罪，就把他们放了。后来延安整风时提出治病救人的方针，那时有左倾宗派主义（王明、博古）的影响，当婆婆的时候打媳妇，媳妇当了婆婆又打媳妇，这不好。要帮助人家改正错误，不要只是批评没个完。但是，有了错误，要有自我批评精神。

接班人的问题，我想的还不完全，你们自己再研究一下，部署一下。中央局、省、地、县一直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也要搞一、二、三线；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你们现在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呢？你们占着地位不让青年人上来怎么能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过去苏联战斗条例上有规定，班长死了，要指定一个代理人。各级都要准备接班人，要准备几套，不能一个人死了就没人管事了。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自己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也没了，不是这么回事。不要以为“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还是有人杀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过去我们常讲死了什么人有很大损失，其实没有什么损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死了吗？还是要继续革命。人总是要死的。死有各种死法，无非是被人打死，坐飞机跌死，游水淹死，还有得病死了。这没有什么，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一、二、三把手。人生自古皆有死，想开了没有什么可怕的，正因为这样，必须准备接班人。但是有一条，不一定每个地区、部门、每个人都选得那么准，不一定，比如高岗当西北局书记，这就选得不准，那时候我就信任他。云南阎××同志曾对刘××同志讲过，说高岗这个人不可信，不是好人，将来会出乱子。他是对的。人经常会看错人，党外像章伯钧、罗隆基当部长，也看错了嘛！不要怕大风大浪，越怕它越不行。牛鬼蛇神不要怕，我是主张放的，把它放出来。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右派猖狂进攻，大鸣大放。那时候我正在拉肚子。我派胡××、伯达他们去看大字报，听一个女学生林希翎的讲话。四川有一个学校要到北京来请愿，沿途阻拦，不让来。很多地方要上街游行，南京、浙江等地方都要上街，一个是让他们上，一个是不让他们上。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情，四川那个学校为什么不让他到北京来呢？可以让他们来嘛！没那么大的危险。从党的历史来看，向忠发叛变后，中央只剩下几个人，但是也没有垮下来。人总是好人多，坏人少。有些事情好人不知道。我提出一、二、三线的时候，高岗和我谈了两个钟头，说周总理的坏话，甚至经常打听我的身体，听说我的身体不好，他还满高兴，他的目标不是总理，而是要当主席。反正我没有死。有许多事情好多人不晓得。我主张放，这里有个信心问题，敢于让大多数人讨论，不要封锁。我们有这个信心，这样一锻炼，接班人就出来了。要让人家讲话，准许人家讲话。比如说，讲形势只讲有利，不能讲不利，讲工作只能讲长处，不能讲弱点，这不是一分为二。不利形势和弱点不让讲不对，这是形而上学，不承认辩证法。有的有长处，有的有弱点，那个地方都有一点长处。甚至于蒋介石，就没有一点长处啦？此人现在还呆在台湾嘛！证明他还有点长处。帝国主义一点长处也没有？自己就一点弱点也没有？甚至在错误路线的时候、白区工作损失了差不多百分之百，但还剩下了一点，××、××、柯庆施、××等同志就是剩下来的。扫地是扫不光的，一天二十四小时还是没扫光。总之，要一分为二。这些，你们讨论一下，不足之处，加以补充。

接见越南外宾时关于保健工作的讲话

毛泽东

1964. 06. 24

中国的保健工作是学习苏联的，我不能完全听保健医生的话。我同我的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发烧时请你，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不找我，我说一年不找他算他功劳大，如果每个月都找他，这就证明他的工作未做好。我对医生的话只听一半，要他一半听我的。完全听医生的话病就多了，活不了。以前没有听说那么多高血压、肝炎。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我们的保健工作学了苏联的，把不专门的医生变成专门的，不多看各种各样的病不行，要改进。

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4.06.27

此件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同志阅。阅后退毛。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关于取消盆花和庭院革命化的指示

毛泽东

1964.07.00

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盆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

我不喜欢房子里摆花，白天好像还有点好处，晚上还要有坏处。我的房子里的花早就让他们搬了，以后叫他们把院子里的花也搬了。你们在院子里种了一些树不是满好吗？还可以再种。你们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留少数人管理庭院。今后庭院还要多种树木、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北京市的中山公园、香山要多改种些果树和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惠，对子孙后代有好处。

与毛远新的谈话（二）

毛泽东

1964.07.00

毛：这半年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

远新：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只是表面的。

毛：我看还是有进步，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你看过“九评”没有？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看了没有？

远新：看过了，（接着把“九评”上所讲的主要内容讲了一下）

毛：讲是讲到了，懂不懂？这五条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在讲到接班人的第一条时毛说：你要学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远新：我当然要学马列主义。

毛：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学什么主义？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

远新：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

毛：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盟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

（毛远新汇报说，在工厂实习听到一些工厂五反运动情况，受到很大教育。）

毛：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长都混进去了，不管他改变成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身边吗？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毛接着问学院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毛远新讲了自己的看法，并说开会多，讲课多，形式上轰轰烈烈的，解决实际问题不多。

毛：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是解放军，为什么不学？学院有政治部吗？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吗？（毛远新说明了政治教育情况）都是上课、讨论，有什么用处！应当到实际当中去学。你们就是思想第一没有落实。你们一点实际知识也没有，讲那些东西怎么能听懂？

毛在讲到接班人第二条时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里很多人都是让国民党、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

远新说：我还有点希望吧？

毛：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讲到接班人的第三条时）

毛：你们开会是怎样开的？你当班长是怎么当的？人家提意见你能接受吗？提错了受得了吗？冤枉你能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结人？你要学会和你意见不同的人一起工作。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颂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讲到接班人第四条时）

毛：你是否与群众合得来？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要让大家说话，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讲到接班人第五条时）

毛：这点你已经有了进步，有点自我批评了，但还刚刚开始，不要认为自己什么都行了。

以后，毛又谈到学院的工作说：你们学校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讲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个学法？只听讲课能学到什么东西？最主要的是要到实践中去学习。

远新：我们是学工科，与文科学院不一样，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

毛：不对！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部都去，一个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对于你不仅要参加五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到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对社会谈不上什么了解。对社会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生呢？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不然军工学院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算大学毕业生呢？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你们学院就是思想工作不落实，这么多反革命，你就没有感觉？陈东平在你身边你就不知道！

远新：陈东平是在家休学收听敌人广播变坏的。

毛：听敌人广播就那么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都没有的吃，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作小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不相信，难道能够相信他（指陈东平）？

什么是四个第一？（毛远新讲了一遍）知道了为什么抓不住活思想？听说你们学院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层，当然思想也抓不住。学院当然有成绩，出了毛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军工才办了十年，军队办技术学校，我们也没有经验。好像一九二七年我们打仗一样，开始不会打，老打败仗，后来就学会了。

毛：你们学校教学改革的情况怎么样？

远新：这次考试我们用新的方法（开卷考试），进行试点，大家感到很好，真正考出水平来了。而且对整个学习方法也发生影响，有可能学得活了。

毛：早就该这样办了。

远新：过去就是分数概念，学习搞得不主动。

毛：你能认识就好。这也不能怪你，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的。你姐姐也吃过这个亏。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也是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就有那样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你们的教员就是会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他的讲课底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当让学员自己去研究。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员抄，把学生限制死了。我过去在抗大讲课，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主要靠自己钻研问题，讲得那么多干什么？过去公开号召大家争全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不一定就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当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真才实学。唐朝最伟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没考取。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训练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上，不要跟在教员后面跑，受约束。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了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员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就说不知道，和学员一起商量，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反对注入式教学法，就连资产阶级都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打击对象就好了。教改的关键是教员。

（有一次毛远新动员毛去看科学成就展览）

毛：现在忙，不能去看。看详细了没有时间，走马观花又没有意思。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要不，平时怎么很少听你问起这方面的问题来？

（毛又问毛远新平时看什么报，毛远新说看《人民日报》。）

毛：《人民日报》没有什么可看的。你应该多看《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战士写的文章，实际活泼，又能说明问题。合二而一的讨论你看了吗？

远新：很少看，看不懂。

毛：是吗？你看看这份报纸，（毛递给他一份《中国青年报》），你看工人是怎么分析的，团的干部是怎么分析的，他们分析得很好，比《人民日报》好懂。

毛：你们政治课主要是讲课，光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你为什么对专业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研究历史不结合现实不行，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就等于放屁！研究古代史要结合现实，也离不开挖掘、考古。尧、舜、禹有没有？我就是不信，你没有实际材料证明嘛！商朝有乌龟壳证明，可以相信。钻到古书堆中去学，越学越没有知识了。

（毛提倡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并让毛远新天天坚持去。一次在北戴河游泳，浪来了。）

毛：你敢不敢到浪里去游泳？

远新：敢。（立即就游到大浪中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了）

毛：你还敢去吗？（毛远新又游出去了。过了半天才回来。）

远新：这次差点没回来。

毛：水，你已经认识了它，已经制服它了，这很好。你会骑马吗？

远新：不会。

毛：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要去学骑马。（毛也经常练习骑马，还叫秘书、工作人员也去学）

毛：你打过枪吗？

远新：有四年没摸了。

毛：现在民兵打枪打得很好，你们解放军还没打过枪，哪有当兵不会打枪的！

（有一次游泳天气较冷，水里比较暖和，毛远新上来后，觉得有点冷，就说：“还是水里舒服些。”）

毛瞪了远新一眼，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

关于注意报道提拔新生力量的批语

毛泽东

1964.07.04

吴冷西同志：

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各省可能都有，要广泛采访、转载，在几年之内做到每县，每社，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都有报道，但要是真实的，典型的。固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点。这个问题，报社和通讯社应当讨论一下。并与各省、市、区联系，要他们也一样做。

教育制度要改革

毛泽东

1964.07.05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为登载两篇文艺理论文章写的编者按

毛泽东

1964.07.07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关于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和团结问题

毛泽东

1964.08.00

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允许人家革命。人家犯了错误，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阿Q正传》是一篇好文章，我劝看过这篇文章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的看看。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主要是写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写他最怕人家批评，一批评就和人家打架。他头皮上长了几处癞疤疮，自己不愿意说，也怕人家说，愈是这样，人家说得愈厉害，结果闹得极为被动。但是，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赵太爷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赵太爷还是不准。对于××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看他们改不改，我们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正。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缺乏帮的人思想不正确。人家犯了错误，你却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跌跟头，就是跌在这上面，他无中生有。就算有吧，也应当是一看二帮，但是××不愿意这样做，结果跌倒了爬不起来。对于革命来说总是人多一点好。犯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许多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们尾巴翘得太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是整到自己身上！××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敌视的态度，还是采取帮助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在团结问题上我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是对同志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该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结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我就是犯过错误的人，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打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话，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个宣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修改还没有完结。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采取有分析，采取辩证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都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的多学了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就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像托洛斯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的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沙皇、蒋介石也都不可

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来说，是绝对的互相排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如此，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来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要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跟法国人妥协了吗？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

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建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展谈判。有些人似乎认为，一进入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谈判了。好像一进入共产党，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两个人或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愿望出发，用帮助的精神搞谈判呢？这当然不是跟帝国主义搞谈判（对帝国主义我们同他们也是搞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搞谈判。再举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搞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搞谈判？实际上是搞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上，接受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一些自己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了。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们作斗争，一只手跟他们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是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们讲妥协，这叫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充满着矛盾。有人说，社会主义可以找不到矛盾。我看这个说法不对。不是什么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原子里头，就充满着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的统一，原子核里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里头又有质子和反质子，中子里头又有中子和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而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会议上谈这个问题，需要在党的各级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党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在准备在支部大会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是优点，第二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对公开放映并组织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4.08.18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

1964.08.18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哲学家们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行了。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不行。书本里怎么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基础是社会学，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时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文学大学生今冬明春都下去。理工科不动，动一些也可以。其他统统下去。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都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庄稼，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一个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七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几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其实，《诗经》中《七月流火》是陕西的事。还有《黄鸟》，讲秦穆公杀死了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马迁对《诗经》评价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贤圣。“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Huan，左豺字旁加恒字右部］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

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诗叫《秦妇吟》，韦庄的少年之作，是怀念君王的。

讲下去的事，今冬明春开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

你们知识分子，天天住在机关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从生活条件好，变到生活条件坏些，下去参加阶级斗争，到“四清”、“五反”中去，经过锻炼，你们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变。

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

下去，试试看，病得不行了，就回来。以不死为原则。病得快死了，就回来。一下去精神就出来了。

（康生插话：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所，也统统要下去。现在快要成了古董研究所，快要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世界了。哲学所的人，《光明日报》都不看。）

我专看《光明日报》、《文汇报》，不看《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不登理论文章，建议以后，他们登了。《解放军报》生动，可以看。

（康生：文学研究所不关心周谷城的问题，经济所张闻天搞利别尔曼那一套，搞资本主义。）

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看，农村工作部不是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建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能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能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地。

现在我们的国家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者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有些地区县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

关于哲学的材料收到了（指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提纲看了一遍（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提纲），其他来不及看。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

这样收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怎么讲，马恩列斯怎么讲，修正主义怎么讲，是好的。资产阶级讲，杨献珍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还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讲造神论。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我看过。列宁看过，好像称赞过它讲原始积累那部分。

（康生：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可能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那一套还高明一些。考茨基的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的也比苏联的高明些。德热拉斯还讲了斯大林几句好话，说他在中国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看中央那时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就是说不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没有讲军事。

（康生：《新民主主义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有意义。我问过西班牙的同志，他们说：他们的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搞新民主主义。他们那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搞不成。）

就是陈独秀那一套！

（康生：他们说，共产党组织了军队交给人家。）

没有用。

（康生：也不要政权，农民也不发动。那时苏联同他们讲，如果搞无产阶级领导，英法就会反对，对苏不利。）

古巴呢？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权，又搞军队，又发动农民。所以就成功了。

（康生：他们打仗也是打正规仗，资产阶级那一套。死守马德里。一切服从苏联外交的一套。）

第三国际还没解散，我们没有听第三国际的。遵义会议就没有听，长征把电台丢了，听不到。后来十年整风，到“七大”的时候，才作决议，纠正“左”的，都没有听。教条主义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国的特点。到了农村十几年，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是到了农村就懂得农村。要研究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一九二五年我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长三、板凳），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因为，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老是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后还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候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一块钱。我给了他三元，无偿帮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我父亲就是认为，人不为已，天诛地灭。我母亲反对他。我父亲死时送葬的很少，我母亲死时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

长沙发生过一次抢米风潮，把巡抚都打了。有些小贩，湘乡人，卖开花蚕豆的，纷纷回家，我拦着他们问情况。乡下青红帮，也开会，吃大户，登了上海申报，是长沙开兵来才剿灭的。他们纪律不好，抢了中农，所以自己孤立了。一个农民领袖左躲右躲，躲到山里，还是抓去杀了。后来乡绅开会，又杀了几个贫苦农民示众。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自发的阶级斗争。

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还看过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为文学家，还试验过电。

（陈伯达：富兰克林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个说法。）

他谈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心之官则思”。说人为万物之灵，谁开会推举的？自封的。这些说法，是封建时代就有的。后来马克思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的动物。其实，人至少经过一百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就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中又只有一类猴子能进化，其它就不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要变。马、牛、羊、昆虫都要变。动物就是从植物变来的，从海藻变来的。章太炎都知道。他的与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就写了这个道理。地球本来是个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水，没有空气。不知几千几万年才形成了水，不是随便一下就由氢氧变成了水。水也有自己的历史。以前连氢氧二气也没有。产生了氢和氧，然后才有可能由两种元素化合成为水。

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要读些书。为了现在斗争的需要去读书，与无目的读书，大不相同。傅×讲氢和氧经过千百次化合成水，并不是简单的合二而一。他这话，讲得到是有道理的。（对陆×讲）你们对傅也不要一切都反对。

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有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综合、分析，不讲客观实际的综合、分析。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和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与农民、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

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分析和综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没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廿万，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口，加上机关、部队一共二万人，只有手工业和农业。怎么能同大城市比？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但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当然他们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不是都一打就垮。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关键就是脱离人民。我们联系人民群众，他们脱离人民群众。

他们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一直宣传到小学里。编了个歌：“出了朱德、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你们怎么办？”教小学生唱。小学生一唱就去问他父母兄弟，反倒替我们作了宣传。有个小孩子听了去问爸爸，他爸爸回答说：你不要问，将来你长大了以后，你自己看就知道了。这是个中间派。又去问他叔叔，叔叔骂了他一顿，回答说：“什么杀人放火！你再问，我揍你。”原来他叔叔是个共青团员。所有的报纸、电台都骂我们。报纸很多，一个城市几十种，每一派办一个，无非是反共。老百姓都听他们的？哪有那回事！中国的事我们经验过，中国是个“麻雀”。外国也无非是富人和穷人，反革命和革命，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切不要相信反革命宣传会人人相信，会一起来反共。我们不是都看报纸吗？也没有受它影响。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都不注意看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四大家族都写到了。《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人。

（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清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来二百多年了，研究《红楼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好一点。

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怎么综合的？你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地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他为什么打延安？陕北除了三边三个县以外，他的军队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万；我二万五千，几个旅，两万多人。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你的军队，我一口一口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整整一个军，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统统跑光，因为消灭了他好几万。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来增援，刘戡军长被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一个俘虏了，全军覆没。这就综合了。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了。士兵也都综合了。愿留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消灭了刘戡，宜川一个旅不打就投降了。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怎么综合法？傅作义就综合过来了，四十万军队，没有打仗，全部缴枪。

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吃就是综合。从来书本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搞了二十几年，我们被敌人吃掉的也不少。红军三十万军队，到了陕甘宁，只剩下二万五千，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逃跑了的，打散了的，伤亡了的。

要从生活来讲对立统一。

（康生：只讲概念，不行。）

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

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为什么不吃砂子？米里有砂子就不好吃。为什么不吃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之类？都是加以分析。神农尝百草，医药有方。经过多少万年，分析出来，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蚂蚱、蛇、乌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够吃。有些外国人就不吃。陕北人就不吃下水，不吃鱼。陕北猫也不吃。有一年黄河发大水，冲上来几万斤鱼，都做肥料了。

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

（康生：主席能不能讲讲三个范畴的问题？）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律平行地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量与质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怎么综合法？难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并存是有的，只是小部分。作为总体，要消灭原始社会。社会发展也是有阶段的，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女人殉葬那时还没有，但要服从男人。先是男人服从女人，走到反面，女人服从男人。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楚，有一百多万年。阶级社会不到五千年。什么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影响。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很纯的。到了封建社会里还留有奴隶制，主体是封建制，还有些农奴，也有些工奴，如搞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那么纯粹，再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落后部分。如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林肯消灭奴隶制，现在黑人奴隶还有，斗争很激烈，二千多万人参加，不少。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鼓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我不信！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就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那就不要经济学家了，横竖一本教科书就可以了，辩证法也死了。

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恩格斯讲，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下面的不讲了。单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和对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只理解一下就行？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劈地，破破土，砌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这就要改造，才能自由。将来就能那么自由？列宁讲过，将来空中飞机，像苍蝇一样多，闯来闯去，到处撞，怎么得了？怎么调动？调动起来那么自由？北京现在有一万辆公共汽车，东京有十万辆（还是八十万辆？）所以车祸多。我们车少，再加上教育司机，教育人民，车祸少。一万年以后，北京怎么办？还是一万辆车？会发明新东西，不要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起飞，用简单机器，一飞就飞到一个地方，随便那里都可以落。单有对必然的理解不行，还要改造。

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他说不仅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认为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这些发现，主要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和以后才发展起来。至于电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发现了。电线里就是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地球三百公里的上空，还发现有电离层，那里电子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篇》引公孙龙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事物总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百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

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他引了列宁的话。

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

总要提出新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新东西在实际事物里，要抓实际事物。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明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不管他，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以师其意，不师其词”，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天对》太短了，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天问》（《离骚》）产生以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个人做了《天对》。这么一看，到现在，《天问》、《天对》讲些什么？没有解释清楚，读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了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点的东西，写一篇报导。

接见非洲、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64.08.25

你们认识了这一点，所谓名义上的独立和实际上的独立有区别嘛！要做群众工作，知识分子如果不同工人农民相结合，不对工人农民做工作，团结工人农民，而是脱离工人农民，那就没有用了。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他不属于无产阶级，就属于资产阶级；他不为无产阶级服务，就为资产阶级服务。他可以替这个阶级服务，也可以替那个阶级服务。譬如我们中国的北京有个北京大学，你们去看了没有？无论哪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那里的教授、教员以及行政工作人员，过去都是国民党的，很少有我们的教员。那些人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有些亲日本帝国主义，有些亲美帝国主义，有些亲法国帝国主义，有些亲德国的，有些亲英国的。解放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人跑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教员都留下来了，替我们服务。现在有些人已经进步了，赞成马克思主义了。有些人还处于中间状态，是中间派。另外有少数人思想很右，他们的脑子还是旧的，大约占百分之几的人数，他们赞成修正主义，不那么公开讲就是了。有少数的人希望蒋介石再回来。社会就是这样复杂的，但是不妨碍大局，因为左派和中间派联合起来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你们会问，为什么中国解放十五年了，有许多人还是中间派，一部分还是右派呢？（全体笑）思想工作就是这样不容易做的，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强迫他们洗脑筋。（全体笑）只能劝说他们，只能说服他们，不能压服他们，要他们逐步了解，逐步觉悟起来。他们这些人是不跟工人农民接近的，他们脱离群众。现在我们想些办法使他们同工人农民接近。

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这是我们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验。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不要脱离你们国家占多数人口的工人和农民。要做群众工作就要交朋友，如果没有工人农民做朋友，你们就不了解工人农民的状况，这就是说要作调查研究工作。知识分子要接近群众，作调查研究是不那么容易的。第一条知识分子过惯了城市生活，他就不想到乡下走一走。有些农村出身的人，也不想到乡下去作调查研究工作，赶也赶不下去（全体笑）。他们成了习惯。第二条到乡下去做调查研究，去了也不等于真正交好了朋友。因为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派头，摆一摆老爷架子去接近工人，工人也看不惯。开始他们弄不清楚，不知道你们是帮助他们的还是伤害他们的。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要经过一个过程。譬如讲组织工会，举行罢工，经过一个过程，工人才相信你是帮助他们的，而不是伤害他们的。同农民谈话决不能摆起一副知识分子的架子，看不起他们。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就某一点说来是比较有知识的人，但是不如工人农民的知识多。因为我们读的书，无论你读的书是马克思主义的书也好，资本主义的书也好，或封建孔夫子的书也好，都是书本上的东西。这些书本都不教我们怎么革命，只有马克思的书教育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

我借这个机会讲了我的一点意见，也许你们不赞成，将来可能会有一天你们会想起我今天讲的这些话。

解放以前中国只有几百万工人，大约四百万工人。有几万万农民，剥削者和压迫者全中国只有几千万，占百分之五左右，大约只有三千多万。那么我们站在哪一方面呢？这个问题在开头是没有弄清楚的，因为我读的书是孔夫子的书，资本主义的书。后来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又组织了共产党，这就下决心赞成马列主义了，由唯心主义者变成唯物主义者了，逐步变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什么叫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讲多了，到时间了。

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

毛泽东

1964.08.29

我们的教育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教条主义。以教育制度来说，我们现在正在改革。现行的学制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学生读了课本还是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许多学生不知道什么是牛、马、羊、鸡、犬、豕，也分不出什么是稻、粱、粟、糜、麦、黍、稷。学生要读到二十几岁才能读完大学，学习年限太长，课程太多，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考试的方法是把学生当敌人看待，举行突然袭击。（笑声）所以我劝你们千万不要迷信中国的教育制度，不要认为它是好的。现在还要改革，还有好多困难，有很多人就不赞成。目前赞成新方法的少，不赞成的多。这就可能泼了你们的冷水，你们希望看好的，我就专讲坏的。（笑声）

但是也不是一点好的也没有，比如拿工业方面的地质来说，旧社会给我们留下来的地质学家和技术工人只有二百人，现在就有二十多万人。

大体上可以说，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些，因为他们接触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纯科学的差一些，但是比文科还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哲学的也好，学经济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我已经说过，我们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来一点东西而已。当然我们也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但是光学马列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出发来研究中国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比如像我这样的人，开始是对中国的情况并不太了解，知道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就不知道如何反法。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中国的情况，同你们研究你们的国家情况一样。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全中国的解放，整整花了二十八年，才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的政策。

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是先当教师的。而且当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习情况。所以在教育学中有心理学、教育学两门科学。不懂实际学不会，学了也不会用。

清华大学有工厂，那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什么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做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所以，比较起来我国文科最落后，就是因为接触实际太少，无论学生也好，教师也好，都是一样。就是在课堂里讲课，讲哲学就是书本上的哲学。如果不到社会上、人民中间去学哲学，不到自然界去学哲学，那种哲学学出来没有用处，仅仅懂得概念而已。逻辑学也是如此，可以读一遍课文，但不会懂得很多，只有在运用中才能逐步理解。我读逻辑

学的时候就不太懂，在用的时候才逐渐懂得，这里我讲的是逻辑。还有，比如文学要学语法，读的时候也不太懂，要在写作中才能理解语法的用处。人们是按照习惯写文章，按照习惯讲话，不学语法也可以的。我国几千年来就是没有语法这门科学。但古人的文章有时写得相当好。当然我并不反对学语法。关于修辞学，学也可以，不学也可以。伟大的文学家并不是什么修辞专家。我也学过修辞学，但不理解它。你也是先学了修辞学才写文章的吗？

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团长及主要团员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64.09.04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改造不行。过去是我们没有抓紧。

谁战胜谁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人不懂，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你们看苏联搞了四十年，现在资本主义复辟了。列宁建立的党，列宁创立的苏联，四十多年，资本主义复辟，搞修正主义。我们还只搞了十五年，将来马列主义会胜利。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麻痹睡大觉，自以为是，资产阶级就会起来争取政权，资本主义复辟。马克思主义不克服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克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就进行复辟。

在刘少奇作反修报告时的插话

毛泽东

1964. 09. 04

毛：蛇是引出来好打，还是钻黑洞里好打？

刘：对苏斯洛夫报告我们赞成发表，它不发。出了八评后引出来了。

毛：一九五六年以来，苏联骂斯大林，我们一论、二论发表后，他就失去了主动权。点名不光我们两家，东欧也点名了。

刘：苏联批评罗自力更生，罗回击，用我们评苏联的话。

毛：不是内部的事，正在电台上干，公开干了。

控制、反控制的冲突，第一位的不是中国，而是东欧国家。

刘：罗已做了苏断绝经济关系的准备，自己不能制造武器，要求我国去人到罗访问，不讲话都可以使人震惊，去了不讲话，握握手都很重要。

毛：中苏关系准备两手，准备破裂，争取拖。哪天出事，不要出于意料之外，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刘：巴西老党四万人，成立新党六千人。

毛：是四万人可靠，还是六千人可靠？

南昌暴动轰轰烈烈，剩下不多人，以后发展了三十万人，长征剩下几万人，以后发展起来，山不在高。

有了修正主义，列宁主义才能万岁！

不注意一定出修正主义，注意可能出可能不出；准备出，可能不出。

对刘少奇给江渭清复信的批语和修改

毛泽东

1964.09.25， 10.18

少奇同志：

你的信及附件都看过了。你的信写得很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第二个十条的修改，就是这样地请教群众得来的，就是我们不自以为是，有错必改这样一种态度得来的。如果在你的信上加上一小段理论性的话，可能更使人们信服些。如何，请酌。

九月廿五日

少奇同志：

我再看了你给江渭清信的全文，觉得实在好。只有第8页上，有两句话，觉得重复，其实是一个意思，“认识了客观真理”，即是变成了主观真理，不是两件事。不能用“并把它变为……”这一句，这一句是重复的。上次我已感觉到，但未改。现在改了，是否妥当，请你酌定。

十月十八日

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时的谈话（摘录）

毛泽东

1964.10.16

我这个人老早就讲了，要为劳动人民，要为工农兵，讲了二十几年。可是以后没有去抓。只要你不去抓，他就照例不动。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资本主义、为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哪！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这种情况再过几年可能会在你们国家出现。

在听取汇报时的指示

毛泽东

1964.11.00

一、过去不是讲过，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还有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大权独揽到哪里？过去农村搞“四权分裂”，所有权和使用权分裂，生产权和分配权分裂，全国实行，不知何人决定的，中央没有讨论过，就传开了。后来一查是河北省一个大队发明，登在《农村工作通讯》上。农村工作部非取消不行，一取消，舒服得很。××取消不取消？如果像现在这样就应取消。说到督促检查，中央有责。延安文艺座谈会，讲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为问题解决了，但二十三年了，一直没抓。你不去抓，他照样不动，管你马克思、列宁都不灵。我跟毛远新说，到农村搞一年，到工厂搞一年，然后再上哈尔滨军工学院，这个学院办得并不好，从学生中搞出十几本反革命日记，还有其它。不经过劳动锻炼，不经过阶级斗争，就不要上大学。

二、要注意总结经验，过一个时期，就总结一次。文艺界就从来都未总结过。整个文化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三十，或者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部都垮了，在部长、副部长中有没有一个人能站得住？现在看，都垮了。

三、社会主义教育也要几个月总结一次经验。

四、《宣传动态》两个老贫农的谈话要看，是跟赵××二十天的谈话，这是我们全党的老师。全是他们出的主意。他们说要搞好生产，四清开始也不要过猛，要逐步搞，不然他们顶，生产就搞不好了。搞不好生产，仍然是贫下中农吃亏。可以讲四清，但不要点名，慢慢来，不要一下子谈那么多。也不要今天找贫下中农，明天又找，只谈四清。要谈家常。注意冬种、卫生。

五、过一个时期总结经验，非常重要。现在××的职责如何？同各方关系如何？××工作怎样做法？还没有个章程。十五年了，还没有个章程，也怪得很！

六、七个简报都看了，这个方法好，通点消息嘛！

七、（××工作的计划和组织分两下管）为什么分两下管？你们总是希望搞三个主义——分散、官僚、教条。历史上多头领导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回了广西，杨秀清就造了个谣，说他回了天国了。当洪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杨的。其实那时杨更青年有为些，洪应该服从杨的领导。但洪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八、（××、××情况严重）那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烂掉了也没有什么要紧，不要大惊小怪。

九、我研究土地革命十年，一九二七年前后那个不像样的纲领，现在还保存着。取得打仗的经验，也花了十年功夫。现在取得经验，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了。

内战时期，我们犯了错误，丢了南方，都跑到北方。看来犯错误是有好处的。陈独秀那个错误是不能不犯的。不犯错误，蒋介石不杀人，谁上山？一犯错误，蒋一抓人，大家就上山了。内战时的错误和那个时候（陈独秀）的错误不同，那个时候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是“左”倾，还是要革命。

要总结经验。有六十条，又有十条。你们办事，也没有个章程。开始粗点也不要紧，有错误的地方经过实践再改。各委分工，主管什么？关系如何？应当有个章程。

现在经验也好总结了。例如，首先要搞矿山，铁矿、煤矿。不要搞多头领导，大权要独揽到中央，要有协作嘛，还要搞新技术，如氧气顶吹炼钢。这不是有了四条嘛。

对湖南省委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大队、生产队由贫协行使权力的电报的批语

毛泽东

1964.11.07

送少奇同志阅。

此件请你考虑，似应批准。还可考虑发给各地，将他们一军。大多省、区是还没有搞起各级贫协来的。

对谢富治在沈阳冶炼厂蹲点的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4.12.05

送朱、贺、罗、陈毅、定一、康生、冷西阅后，退一波。

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谢富治同志这个报告很可一看。

与参加亚非文学交流会的亚非作家的谈话（摘录）

毛泽东

1964.12.05

我们这个国家有些好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譬如文化、艺术、教育方面，现在刚刚触动它们之中的一些坏东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不接受，不然我们就没有知识分子，没有教授，没有教师，没有新闻记者，没有艺术家。那些人就信他们的，不信我们的。我说那些人叫做坏人。他们有他们的爱好，崇拜死人和外国人，外国人也是死外国人。他们崇拜西方国家的古典作品，看不起自己，总觉得自己不行。这就是一个教训。

历史遗产要接受，但要批判地接受。你们看，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创造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好东西，批判了坏的东西，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接受古典遗产的时候，就要接受好的，批判坏的。

人一脱离群众，就没有好结果了。人民群众总是占大多数，剥削者、压迫者总是极少数。还有一条：人是会改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马克思这个人，从前是唯心主义者，后来起了变化。起初是形而上学的，后来学了辩证法，也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也是变过来的嘛。恩格斯和列宁，也都是有过这个变化。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原来是当小学教员的，不知什么原因，把我抛到革命中了。

对陶铸的信和蹲点报告的批注

毛泽东

1964.12.10

此两句有语病。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各级干部除少数人以外，在这次下去蹲点以前，根本没有下去认真蹲过点，没有作出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他们有些人不出办公室，谈不到视听见闻。有些人下去了，甚至蹲点了，却是蹲在基层干部、富裕中农、富农地主那里。这些人是有视听见闻的，可是只视听见闻了剥削阶级一方面；而对被剥（削）阶级一方面，即广大的贫下中农，则根本没有什么视听见闻。

对国家计委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4.12.12－13

富春同志：

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在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稿中加写的两段文字

毛泽东

1964.12.13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产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小型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4.12.20

毛：总理报告，你们连“赶上”都不敢提，我给你们加了个“赶上而且超过”。加了一段“孙中山一九〇五年就说可以超过”。这样讲了可以不登报。近代史也得看看。《孙中山全集》没有包括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的文章。你得看《新民丛报》，你得看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特别要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他是个讲演家、煽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给他鼓掌。我听过他的讲演，也跟他谈过话。他是不准人驳的，提不得意见的。实际上他的话水很多，油很少，很不民主。我说，他可以做六十年前的好皇帝，没有民主。他一进场，全场都要站起来的。叫孙先生。没有民主，亦无知识，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种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画了一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一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大圈，写上民主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们的三民主义里头。总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周恩来：苏加诺讲“五基”，也是把社会主义包括在他的“五基”里头。）湖南有个石蕴山，你认得吗？他开始说，孙文没有学问，叫孙大炮，不如黄克强有学问。黄先生好，因为黄是秀才，能写一手苏东坡的字。后来他一到广东，见了孙中山，回来后一下大变了，说：“可了不起，孙先生！”

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吗？他只是一个猛将、闯将吗？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是要他带个新作风去。（周恩来：去冲破一潭死水）你（指贺）赞成吗？我们现在有些人从来不做总结，只管小事，不管大事。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四封来信（按：指第二版“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这一栏里的四封信）是谷牧组织的吧？（吴冷西：不是，是胡绩伟他们）我全部读过了。按语谁写的？（吴冷西：按语是胡绩伟写的）不是谷牧写的？过去《人民日报》我从来不看的，学蒋介石办法，不看《中央日报》。现在好了，《人民日报》上白菜是怎样长的之类的东西少了，有些议论了。让胡绩伟参考《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

刘少奇来了，毛说：你开讲，你挂帅，你不讲，我们散会。

刘少奇：开了几天会，几个同志发了言，讲了不少问题，提出了问题，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大家蹲点了，是件大好事，讨论一下嘛！

毛：讨论一下有什么矛盾。

刘：大家下去蹲点，认识一致了。

毛：时间短了。

刘：还是初期，还是第一次，还没有看到发动群众的成熟的经验。还看不到群众发动之后是什么样子，要看到群众发动之后才行。

毛：要省、县、社、大队、小队发动了群众，都成立了贫协，才知道。

刘：我农村知道些，我对城市了解很少。农村材料我看得多一些，这几天我对城市工厂的材料努力看，也还是初期的经验。

毛：白银厂的经验，是比较成熟的。

刘：有的单位要搞两年，具体做法不一样，等到将来再搞，你们就懂了。一个县可以搞两年，城市大厂恐怕也得两年。

刘：白银厂搞了两年，高扬文这次的报告，我也看了，看来还要深入。可以再写个总结的东西。总之，大家蹲点还是第一次的初期经验，所以很多问题还讲不出来，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经验，就有头绪了，要有比较。你们懂得点农村以后，再做个比较，就会懂得的。现在看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了。有的单位要搞两年，具体做法不一样，等到将来再搞，你们就懂了。一个县可以搞两年，城市大厂恐怕也得两年。

毛：要两年呀！打长一点，搞三年也好，横直是要把问题彻底解决，也可能缩短。

刘：湘潭、山东就是。陈正人提出洛阳拖拉机厂也要搞两年，不要赶时间。

毛：把问题解决。

刘：熟练了，不用这么长的时间。

有个问题，农村方面主要矛盾是什么？陶铸讲，农村已经形成富裕阶层、特殊阶层。他讲主要矛盾是广大贫下中农与富裕阶层、特殊阶层的矛盾。李井泉说，还是地富反坏、坏干部结合起来与群众的矛盾。

毛：地富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边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这是头一回。当权派后头有地富反坏，或者是混进来的四类分子。有些坏干部与地富关系不很密切。地富反坏混进组织包括漏划的地富变成贫农、共产党员。那也是当权派，不属于过去的地富，地富臭了。有一部分就不同了。

毛：如刘澜涛讲的渥中兴，是马步芳的参谋长。

刘：这在西北也是少数。

毛：在西北是少数，在全国也是少数。

刘：怎么划要讨论一下，统一语言。怎么讲主要矛盾？

毛：还是讲当权派。他们要多记工分嘛！“五大领袖”嘛！你“五大领袖”不是当权派？

刘：陶铸提出这个问题，各方面有反映。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就有人不赞成，我就听到过。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多数情况是劳动人民出身。在立场、经济、思想、组织上四不清，他们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被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富当了权的。还有已经戴了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当了权的。

毛：后两种哪种多？

刘：还是漏划的多。

毛：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

刘：有些小队干部也坏了。

毛：小队干部多数不是党员，这岂有此理。一个大队只有几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党员，党员太少了，他死也不发展。他搞久了，搞出味道来了。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没有希望。

周恩来：机关也是如此，你建工部刘秀峰，你统战部李维汉，你政协张执一，还不都是党员？非搬开不可。我们在民主人士中宣布了，他们很震动。

毛：共产党是有威信的。也不要提阶层，那人就太多了，吓倒了人，得罪的人多。就提党委！地委也是个党委，县委也是个党委，公社也是个党委，大队党委会、支部委员会，无非左、中、右，我相信右派是少数，特别右的只占一部分，左的也是少数，中间派油水多，要争取，你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王××说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拉有打，拉中有打，打中有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我们多年没有讲过这一套了。

刘：这是统一战线策略。

毛：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

刘：实际如此，不要出去讲。

毛：还有少数烂掉了的，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有人说：还有云南。）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很嘛！

刘：不提富裕阶层，叫新的剥削、压迫分子，或者只提什么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如果他们结成一体也可以叫集团。

毛：不提阶层，叫分子和集团就全了。你们研究一下，分子嘛！分子也有团，有分子团哩！

刘：他们跟广大群众的矛盾，这些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被压迫的总是多数，总要革命。全世界压迫者少数，压迫厉害，孤立了，信心就在这里。

毛：被剥削、被压迫，不满的人多，因此就要革命。

刘：有几种情况要区别清楚：一种是地富站在前边的，应打倒。一种是漏划的地富分子，是阶级敌人。这种人不会干好事，把材料弄清后，处理也容易。凡是过去的地富反坏分子，混进党内来的，照四类分子处理。还有一种贫下中农，过去土改，革过命，后来被地富拉过去了，站在群众头上压制群众，对这些人要严肃斗争，彻底退赔。

毛：第三部分是主要的是多数。

刘：漏划的不少，和平土改区多。彭真：地主劳动五年改变成分，富农劳动三年改变成分，有些摘了帽子的又坏了，这个规定不行了，要改。毛：那好办，再戴上。刘澜涛：搞土改时我们提过中立富农的政策。

毛：我们犯了错误了，认识不足，当时为了稳定中农，对富农只摘掉他们的封建剥削部分，这次没有反映过去侵犯中农的材料，贫下中农发动起来，就要侵犯中农。有没有把中农划成富农的？你晋西北就搞中农嘛！

李井泉：晋西北有一个查三代的错误，没收粮食是为了度灾荒。

刘：一部分戴帽子的，一部分漏划的，还有一部分原贫下中农，现在当了权变坏的。原贫下中农（毛：以至中农）多数可以争取，提高阶级觉悟，但你要不把他们的财产、手表、自行车、新房子搞掉，群众不满意。退赔要搞。

毛：你讲第三部分。

邓小平：不退赔，也不利于教育干部。

刘：搞掉，教育了新干部。多数要争取，少数要戴帽子，恐怕这个策略要定下来。

邓：少数恶劣的，要戴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

毛：我看，这些人总而言之不是共产党。但主要是整共产党。管你劳动人民出身的、漏划的地富，总而言之，搞的结果，戴帽子的户数不能超过百分之七至八，人数不能超过百分之十（李雪峰：是包括现在的在内？）你们看呢？否则，得罪的人太多了。要知道，他们也不是一块铁板，是有变化的，有富有贫，有升有降，有好有坏，有当权有不当权的。我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右。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划百分之二十多少人？恐怕要发生“左”的潮流。（李雪峰：能争取的干部还是要耐心地争取，不然贫下中农的比例就要减少很多。）群众起来划，影响你们走群众路线，群众要求多划，干部也要多划，结果不利于人民，不利于贫下中农。四不清干部，贪污四、五十元的、一百元的是多数，先解放这一批，我们就是多数嘛！犯了错误的，对他们讲清楚道理，还是要革命的。那个报告中讲的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都是老工人，犯了错误讲清楚，让他们做工作嘛！

刘：有个富裕阶层“三大件”之类。

毛：他们先富裕，用扣工资等办法，自行车、毛衣，还有后富裕的贫下中农。

刘：现在还是王任重讲的“四清”好，可适用于机关。

毛：原“四清”叫作“一清”，就是经济。挂谁的账，是河北的发明权？（大家议论：“四清“这个含义，在第一个十条中已经从正面提出，是主席加的，以后又由王光美的报告，河北省委从反面也提出。）

刘：华北把社教统统叫“四清”。李雪峰：我们先讲经济上四不清，政治上四不清，后来加组织上，王光美同志报告，连思想四个四不清。

毛：我没有这个印象。你们把王任重压低我不赞成。我最早看到的是王任重的。

康生：任重对四不清的提法很好。他的那个报告我很欣赏。

刘：你账挂到河北站下，王任重也是河北人嘛。地富反坏当了权都坏，不会有什么好的。问题是贫下中农当权。

毛：只要把一百至一百五十元的解放出来。

刘：那不一定，几百元的不少，一千元、一千斤粮食的也相当多。恐怕要把一千元的解放出来，退赔还要退赔。

毛：挤牙膏，挤不净，那有什么办法？留一点也可以。挤得那么干净？宽大处理嘛！

刘：能挤多少就一定挤多少。一个剥削群众，一个剥削国家，还是退赔，退赔从严，要彻底，特别恶劣的，一直抵抗到底的，没收。

毛：国家也是人民的，我们自己没有东西，退赔从严，对！要合情合理好。不必讲“彻底”。

刘：打击面究竟多大好！百分之几恐怕有利。地富分子有些老实的也可以摘帽子，那是极少数。地富子女情况不同，有分家的，有没有分家的，有表现好的，有表现一般的，有表现很坏的。邓小平：打击面控制到百分之几有利，一开始，分化四不清干部就需要。地富有一部分表现好的，也不能戴了。贫下中农和中农中极少数的戴帽子，也有好处。比

如有的给戴上新恶霸分子的帽子。但多数应分化、争取，不能当干部、党员。不是打击对象，还是争取对象。

毛：多吃多占，复杂得很哪！主要是我们这些人。汽车、房子有暖气，司机，我只四百三十元，雇不起，又要雇请秘书。

刘：要退赔多少？（陶铸：退赔搞得差不多了，就行了。）

毛：群众知道的，搞到一定程度行了。牙膏不可挤得太净。有的地方只有十八户，没有虱子，一定要捉虱子？

刘：一个大队定一两个这样的分子，可以不可以？有些要戴帽子，戴了什么分子的帽子，就好办了，戴帽子，以后可以摘。

毛：叫分子，留点出路，好嘛！不涉及家庭，还可以摘嘛！其它劳动好的，不戴贪污分子帽子。

刘：改得好的，主动的，不戴什么分子的帽子。

毛：陈平宰肉甚均。他做宰相时贪污，周勃等人就告他贪污，说给钱多的做大官，给钱少的做小官。刘邦就找他谈，说人家告你贪污。他说，我养的人多，我是没有钱呀！刘邦说，给你四万两黄金，搞统一战线。有了四万两黄金，就不贪污了。《鸿门宴》这出戏现在不唱了。马连良演得激昂慷慨。贪污历来举他（陈平），特别是曹操。目前正在火头上，我又怕泼冷水呀！

刘：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群众是懂理的。

毛：有时也不然，群众起来了，有盲目性，我们也有盲目性。过去武汉时代群众发动起来了，工厂关门，减工资，失业了，盲目性。

刘：我当时就怀疑。

毛：现在怕泼冷水，你们掌握气候。现在还是反右。十二月不算。明年一月、二月、三月，至少再搞五个月。一不可太宽，不可打击面太宽，二不可泼冷水。不要下边宣布！讲了牙膏不可挤得太净，贪污分子也可以做宰相了。

李井泉、李雪峰：对敌应包括严重四不清干部，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上的老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叫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刘：可以。对四不清干部就是要退赔，没有搞清楚……。

毛：没有搞四清的地方，可以先借一些出来，借给国家，救济贫穷的。然后再搞，搞出贪污来，就不要还了。

刘：大体上能退赔到多少？能不能退赔到百分之七、八十？只退赔到百分之三十，大概过不了关。

毛：问题是现在还有实物存在没有，如果没有那个东西，就挤不出来。有就挤，无非“四大件”，金银、房子、地下藏的什么的。

李雪峰：严重四不清，投机倒把跟……。薄一波：城市更不同，“三原政策”合营，统战部历来不搞资产阶级，每次运动都要下一个保护资方人员的通知。新老在一起，严重的在上边、工厂、公司。因此第一步目标要鲜明，要集中力量整部、整厂、整党。例如一个部先整党组成员，一个厂先整党委书记、厂长等。要明确规定这一条，否则当权的干部会滑掉。

毛：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找到了问题。不从当权权派着手不行。李先念：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的头上了。毛：根本问题就在这里。薄一波：先搞豺狼，后抓狐狸，不讲阶层。不然你强整资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或强调下面的小偷小摸，或强调不当权的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学生，那干部们精神就很大，斗呀！后果干部很容易滑掉。就搞不成干部了。例如：白银厂的根子在省委、冶金部，不把根子搞清，白银厂好不了的。

刘：冶金部根子是谁？

毛：我没听说过冶金部根子是谁。薄一波：王鹤寿嘛！

彭真：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目前主要是四不清……以四不清干部，当权派为主。

刘：一次搞不清，以后还会发生。

毛：只要隔两三年不搞，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一个新生，一个烂掉，那是当权派。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先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搞了，其它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下马来，然后改造。

刘：重点是党。

毛：重点在党。冶金部是党委，白银厂是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委。抓住这些就有办法。你高扬文开始到白银厂也是庇护的，一蹲点变了。你王鹤寿庇护，变了吗？

陆定一：北大整陆平，资产阶级教授出来保护陆平。蒋南翔同志在延安不是说右吗？清华搞得好，发动了群众。

毛：你姓陆的，陆定一整陆平，我是站在你这方面的。陆平还可不可以当校长？不能，就擒下马来嘛！看来清华比较好。（有人问：四清与四不清是农村主要矛盾，这样提行不行？）行！（又有人问：这些富裕阶层是什么性质？）

毛：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因为我们搞了民主革命，给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给社会主义也开辟了道路，你们蹲点就是开辟。横直我们搞不完，留给下一代，不要拿我们这些人的年纪做标准。

刘：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毛：人家贪污盗窃，还社会主义？

刘：有的没有虱子，有的虱子很小。

刘：有个策略问题，坏干部布置了。

毛：你整他，他不布置？

刘：四不清干部造了很多谣，说什么“先整群众，后整干部。”应明白地讲是干部。

毛：这有什么，先整干部嘛！

刘：干部多吃多占的要退，所有社员的不退。不只是贫下中农不要搞。这样群众的顾虑就解除了，其次再解放些多占的干部。干部同社员一起分了的，只退干部多占了的部分。

毛：一分为二嘛！一个群众，一个干部。

刘：然后再集中搞少数严重的。

毛：有那么多步骤，我就不赞成。

刘：你安源开始联系小职员么！你那安源，肖志远、朱锦堂、朱少兼两个老婆我们联系他，一直联系他。粤汉铁路要成立工会，一个人不认识，找到一个工头，也是两个老婆，后来也枪毙了。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不要上当。

扎根串联，雪峰同志讲的，扎在真正老贫农身上，这是对的。但开始扎的不一定是好的，勇敢分子也可以利用一下。

毛：勇敢分子也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刘：老实根子，不一定工作队开始就能找出来，找出来的不一定是好的，要到一定时候才出来。根子不要告诉他是根子。

毛：什么根子不根子，横直搞社会主义。

刘：积极分子一批一批出来，经过斗争，到那时他是老资格了，你说他不是老资格？

毛：李立三同志老资格，到紧急关头不干了，才请我们国家主席去。

刘：不只李立三，蒋先云也跑了，李立三认识他的人多，因为宣布胜利是他宣布的，同时我们活动不准杀人，你如果杀人我们就停工。

毛：那个矿一停，三天水就满了。

刘：凡搞剥削历史，有人不赞成的。找可靠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一开始是不会扎准的，刘澜涛那里就换了百分之卅多嘛！恐怕还是在斗争中逐步发现。

毛：你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

刘：干部与贫下中农还是同时搞。背靠背，他不知道什么，干部揭发干部，群众另外揭发，消息也会走露。

毛：有消息灵通人士嘛！为什么赵紫阳住的那个老贫农家喂条狗？怕人听。

刘：先背靠背，后做主席团台上，让贫农先参加干部“洗澡”会，不能一下子就当主席。

毛：他又没读过孙中山的《民权初步》。搞点勇敢分子，当主席行不行？总而言之，把那个流氓无产阶级说得那样坏，不行。军队中有个时期要洗刷他，我就不赞成。

刘：五反的经验还是少。工厂核心烂掉的恐怕不是少数。基础、中层都有问题。要整顿领导核心，中层干部也要整，基础干部也要整。

毛：王鹤寿有没有转变？

薄一波：有进步。

毛：已变好，我很高兴。此人跟我有些关系，学解放军学大庆，没有他，我不知道。

刘：总之一脱离体力劳动，方向就错了，要参加劳动。

薄一波：能不能实现“三同”是能否蹲下点，能否联系群众的主要关键。特别要参加劳动，一参加劳动，问题就解决了。重庆钢铁厂，任白戈在那里蹲点，他们“三定一顶”实行得好，有些干部只学到了炼钢的本事。

刘：那批人有技术，不应该脱离生产，做工作，给点时间就行了。

毛：每天要几小时？

刘：小组长有半小时、一小时就够了，车间主任有一小时、两小时也够了。

毛：科室人员统统下去，大庆几万人，各种舆论，一个死命令都去劳动了。这次少奇骂呀！要大家蹲点。我骂娘不灵，少奇一骂，还不是下去了。

刘：干部中大部分是老工人，应该批评、争取。

毛：所以要下死命令。要有秦始皇。中国的秦始皇是谁？就是刘少奇，我当他的助手。

谢富治：有个人多如何处理的问题，还有个奖金，本是工人工资的组成部分，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刘：工厂里好人多，干部不比我们下去的弱。抽出训练，他们的任务吃不饱嘛！你抽出百分之二十，你们搞出经验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工厂搞五反的干部，就从工厂中抽。工厂人多，拿出来训练骨干分子。谢富治就是这样搞的，陈正人，也训练了四百人。

毛：全国都要搞，你（指谢）那个厂抽出一半人来，另搞一个厂子。一个厂办两个工厂。

刘：工厂技术员，工程师也要参加阶级斗争，注意参加运动，才能又红又专。

毛：也不那么专，他不联系群众，不参加劳动，听意见听不到，或者望一望，不下苦功夫。下一个死命令，余秋里办法，六万人里有七千人，各种各样议论。

薄一波：有各种各样议论，“参加劳动耽误了研究工作”，“我刚升起来，又让我去劳动”。

毛：还是下个死命令，统统下去。

（有人提：要组织革命委员会，现在工会贪污的很多，不行了。）

薄一波：洛阳拖拉机厂搞五反代表会。

刘：工会系统恐怕不行了，重新组织，从扎根串联，发现好的，重新组织，用什么名义都可以，就是要革命。开始组织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积极分子。

毛：有百分之三十就了不起了。

刘：此外，工厂、机关多出来的人，如何处理，都交上来，怎么办？

薄一波：不能上交，还是雪峰讲的，三勤夹一懒，自己处理。

毛：还是在工厂中三勤夹一懒好，李雪峰同志讲的嘛！不是我讲的嘛！以邻为壑，不是办法，就在这个工厂，一分为二，三勤夹一懒嘛！怕什么！适当分散。

刘：把那些坏人戴上帽子，放在乡下，好劳动了。

陈丕显：有家可归的，是否可以回家些去？

毛：有家可归的，你们去江西多少万人，不是又跑回去了？工厂搬就好了。集中几千，只几十个干部管，你说那百分之四十就没有办法？都要交，我看交到哪里去，交到他（指周恩来）那里去了。

刘：我还讲这么一种意思：前途无限光明，昨天李雪峰同志讲的认识论，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城乡如果领导得好，真正搞好，马列主义、提高文化，认识论，毛泽东思想，可以出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一个大工厂，一个县，一个大城市，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搞不好了，不得了，就会变颜色。江西兴国、上杭出那么多干部。

毛：还有永新。

刘：苏联的基洛夫厂，以前叫镰刀与锤头工厂，十月革命后，全国都有他的干部。搞好了，一个大工厂、一个大县、一个大市，就可以出办法，出干部，可以改造全国、全世界。大的精神面貌变了，一个大工厂影响全市、全国、全世界。现在工作队慢慢搞下去，一直搞下去。

毛：列宁是很重视农民，提工农联盟。《共产党宣言》就怕小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的缺点、消极面提得过多了。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看你强调哪一面。中国有多少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更多。对流氓无产者更不客气。就强调消极面？他有积极的一面嘛！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改造的。

刘：机关也一样，无限光明。基本问题要有强的领导核心，有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搞好了坚持下去，人的、自然的面貌大大改变。再多少年，一直这么搞下去，世界要改变。就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大贡献。十月革命生动活泼，斯大林建设了社会主义，后来死气沉沉，赫鲁晓夫又这么一搞……世界上还没有在社会主义下放手发动群众搞革命斗争的经验。冰岛共产党记者问我，如何资本主义才能不复辟？

毛：两种可能。一种复辟，一种不复辟。

刘：我答复他们的办法：发动群众搞四清、五反、工资不要太高，半工半读，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三种事。开始这样做。毛主席讲三项伟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避免修正主义，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去参加，形成那么一种作风。现在开始，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搞好了，那三分之二就会过来。

毛：我们希望搞好，搞成一个像样子的国家。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搞不好，那怎么办？也没有什么。不要性急，不要希望我们在时都能搞好。大概一个省的三分之一搞好，那三分之二不搞也可以。那三分之一动起来，那三分之二也动了。你湖北七十一个县，三分之一就是二十四个县，也就好了。

刘：但要搞好一个县、一个工厂，不付出劳动不行。没有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认识论不行。

毛：历来讲认识论不联系具体工作，离开具体工作讲认识论，那讲哲学干什么，有什么用处！

刘：有了可以造成……

毛：不是一切人心情舒畅，地富反坏不舒畅，四不清干部一定时期也不舒畅，不然他们为什么封锁？

刘：是否杀人？我看还是个别杀。点上一般杀人不利。一杀，面上非要恐慌不可。但是不是一个人不杀，什么时候杀也考虑。

毛：就是要震动。杀多了哩！多了，有什么害处？一、以后找他使用，活材料没有了；二、得罪了他家人，杀父之仇。要杀的可以先关起来。不可不杀，不可多杀，杀一点，震动，怕震动干什么，就是要震动。还有一条，杀错了，死者不可复生。

罗瑞卿：像天津厉慧良要杀，也没有材料可用。不杀，得罪了广大群众。

毛：京剧界就发生问题。

魏文伯：地富儿子劳动，算什么成分？

毛：是社员，当然是农民嘛！你社会主义不让人家参加，一家独占。
李雪峰：贫农、中农也叫社员，这个称呼不能解决成分问题。
周恩来：一般农民嘛，就叫农民。
毛：你们再争论争论嘛。

在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

毛泽东

1964.12.27

陈：主要矛盾是什么？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封建社会就是清官与贪官的问题。《四进士》就是反贪官的嘛！

毛：巡抚出朝，地动山摇，可了不起哩！

陈：封建时代的清官实质上是假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阶级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谓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财阀。

毛：清朝刘锷的《老残游记》中说，清官害人，比贪官害人还厉害。后来一查，南北朝史中的《魏史》就有此说。

陈：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此问题。

毛：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

陈：主席强调，要听各方面的话。好话，坏话，特别是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这是工作做得好坏的准则。

毛：讲话长了怎么办？李雪峰同志说的话，讲长了打零分。讲长了，让他讲长嘛！横直没人听嘛！

陈：许多人忘记自己是从那里来的。不能忘本嘛！我这个人不参加革命，顶多是个小学教员、中学教员而已。

毛：大官是从小官来的，小官是从老百姓来的。我们都是从老百姓中来的，还是老百姓嘛！“蒋委员长”不姓蒋，姓郑，叫郑三发子，河南人氏，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还不是老百姓变的？

陈：主席常说，不要自以为是。乡干部当权，就以为自己的意见对。

毛：不要当了权，就是自己的意见对。自以为是，没有自以为不是的。为什么要开会？就是意见不一致。一致了开会干什么？

陈：不怕官，只怕管嘛！

毛：小官怕大官，大官怕洋人。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二十八日讲话的摘录

毛泽东

1964.12.28

没有多的讲。这个文件（指二十三条）行不行？

第一条，性质问题，这样规定可不可以？

有三种提法，前两种较好？还是第三种较好？

常委谈过，又跟几位地方同志谈过，认为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

因为，运动的名称即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四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矛盾交错的教育运动。

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搞了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

六二年上半年，刮了“单干风”，还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刮得可凶啦！“单干风”，邓子恢是一位，另外还有几位。有些同志听进去了。还有的听了，不答腔，不回答问题。

搞社会主义，搞了许多年，而有些同志听了不答腔，不能回答问题。

四、五月间，没有一个地方同志讲形势好，只有些军队同志说形势好。我直接听到的是许世友、×××，间接听到的是杨得志、韩先楚。当时是五月，就是说形势不好，有那么一股空气。

到六月，我到济南，有几位同志说形势很好。时间隔了一个月，为什么变了？五月未割麦，六月割了。

为什么在北戴河我要讲形势？因为那时有人说，“不包产到户，要十年八年方能恢复”。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所以，提出“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

因此，政治局常委觉得，大家讨论了也觉得，第三种提法较妥，较为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

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毅同志说，他也是当权派，只要你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还当你的外交部长。

第十六条，工作态度，就是要讲点民主。

天天说要民主，就是不民主，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民主。

军队本来早就有三大民主。堡垒打不开，找士兵、战士、班长开会，大家议，怎么打？办法就出来了，这就是军事民主。

政治民主——三大纪律。

经济民主——伙食，要由战士管伙食，现在还管不管？不能单叫司务长管。连里有两个人，一个文书上士，一个司务长。文书上士叫师爷，搞抄写的，就是搞表报的，可了不起了！因为他认识几个字。

好话坏话都要听。好话，爱听，不成问题。问题是坏话。七千人大会上我讲过“老虎屁股摸不得，老子偏要摸”。后来认为那句话不那么文明，改成另一种形式了。老子者，

就是劳动人民，下级干部。我们这些人就是不大好摸的，你想揭他的疮疤，疮疤可不容易揭！

正确的话、错话都要听。正确的要听，错了也得听下去。人家批评你批评得错了，有什么问题呢？！你本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责任在批评者，你听着，有什么问题呢？！你不听，那不好。正确的，批评得对的，要听。人家批评错了，那更容易听了。还有一个，特别是那些反对你的话，要耐心听。做到这个，比较困难。

要让人家把话说完，这也是有点困难。他讲那么长，水分很多，米很少，是稀饭。我就受过很多次这样的灾难。有人讲了两个钟头，还没出题目，我问他要我帮他什么忙，他才出题目。×××，在延安，有一次找我谈话，讲了两点钟不着边际。我问他，你来找我谈，要我帮你什么忙？他才出题目。另外，有别的同志，他就是训话，我出题他不答题，我只好听训。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世界上有这种人，专门训人的，对我这种人，他就要训，长篇大论地训。

宣传和鼓动的区别。宣传者，许多概念联系起来。鼓动者，一个概念一个口号。比如罢工，提出一个口号，简单得很，就叫鼓动。写文章，做报告，长篇大论，叫宣传。贴标语，叫鼓动（专为一件事动员）。

×××发明这个道理，他说讲了两次，一次是五十分，一次是零分，人家不愿意听了嘛！我历来提倡，听讲话，不要鼓掌。不爱听的，可以打瞌睡。你讲的没有味道，他还不如打瞌睡，保养身体，还是保养身体免受这场灾难为好。还有一个办法，看小说。我从前在学校听课时就是这样，这就把教员整倒了。（讲了念书时的故事）这也许是我的毛病，也许是因为先生讲的不引人注意，我就看小说，后来发明了打瞌睡。不要说我这个人没有发明，我也有发明。（大家笑）用这种办法，我整了那些不是交谈式，而是训话式的人。整了那些老师，他只爱讲，不能让学生提问题，不是提问题启发学生。上课有了讲义，就不必讲了，让学生去看，再出点题目，让学生讨论。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我就主张不再念的。后来说有些人不识字，还是念好。我让了步，还是念了，也鼓掌了。这种会，鼓掌，我也赞成。

在同志中，不要使人怕。对敌人，要使他怕。在同志中，使人怕，那可不行！使人家怕，总是你有鬼，不然为什么使人怕你呢？凡使人怕的，大概是道理少一点。

过去军队里，班长带兵有三个办法：打人、骂人、关禁闭，别无它法。他不搞民主。后来我们说不许打人、骂人，禁闭现在也取消了。逃兵，逃了算了，何必捉！捉回枪毙，岂有此理！人家为什么逃？无非是在你这里过不下去了。跑了算了。如果你要把他捉回来，那就向他承认错误，请他吃顿饭，有猪肉吃，并且对他说，你还想逃，就逃之，不想逃，就留下来。不能用打人、骂人、禁闭、捉逃兵的办法。逃兵让他逃，他的积极性已经不高，留他有何用？！逃到外国，有什么了不起？！中国那么多人。无非是出去骂我们一顿。骂我们的人多得很。赫鲁晓夫、肯尼迪并不是中国人，他也骂。音乐家傅聪，逃到英国去了，我说是好事。这种人留在国内又有何用？

我只讲这两点：一是性质问题，二是工作态度。

对陈伯达同余秋里谈话记录稿的批语

毛泽东

1964.12.31

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副总理各同志看看。形而上学在我们党内盛行，辩证法抛到九霄云外，连一些大老爷也在所不免。现在应该是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1965 年

汪东兴传达的关于礼宾工作的指示

毛泽东

1965.00.00

关于宴会

我们招待外国人的宴会规格太高，而且不看对象，千篇一律地都要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就不吃这些东西，这是西太后和《红楼梦》里贾宝玉、林黛玉那些人吃的。我们请外国人，热菜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宴会的时间不要太长。我们又要同外国人谈话，又要同他们吃饭，时间长了我们陪不起。听说外国人的宴会就比较简单。

关于礼品

我们送外国人的礼物花钱多、规格高，吃穿用的东西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少。其实送礼不在多少，而要送有民族特点、又能长期保存的东西。送礼自然要大方，但不能没有个边，大手大脚，大少爷作风。不能靠用多送礼的办法搞友谊，友谊要靠政治。外国人送给我们的礼品就比较简单。艾地同志来送了一根“金鸡毛”，约多同志送我一个小孩玩的弹弓。这种礼品就很好，礼品就是表示意思，也不能靠礼品过日子。

我们给外国人送礼，花的是国家的钱，外国人送给我们的礼品，也要归国家，不应当归个人所有。送给我们的礼品，要好好处理。有展览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找个地方陈列起来；没有价值的一些日用品，可以内部作价处理（收回来的钱交公），或者交给国家使用；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可以分给工作人员尝尝。

关于接见

外交礼节，不能学洋人那一套。什么黑服装、薄底皮鞋等等，这都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是中国人，有我们自己的习惯，外国人到中国来是看你的政治，看你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看群众的情绪，人家不是来看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穿什么样的皮鞋。

在听取汇报工作时的讲话

毛泽东

1965.00.00

工业七十条没有改，一直没有改过。农业的改过多少次了，开始是十二条，以后是六十条，修正了的六十条。工业一直没有改，没有人抓总结。外交也不断总结经验，军事也不断总结经验，公安也不断总结经验，统战部出了毛病，也注意了总结经验。各行各业都要进行总结经验，工业没有人抓这件事。工业只搞了个七十条，而七十条又是几个年头了。破除苏联迷信不是讲了几年了吗？为什么搞不出个东西来？！分行业搞，各行各业都要搞。上半年搞出个初稿，下半年再定稿。

（当汇报到有些人搞工厂搞上十年、十五年，把工厂看成是自己的，别人不能动的问题时。）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这是《尚书》上的几句话。其实，《尚书》是汉朝人写的，汉朝实行这个制度。三年一考，三考就是九年，太长了。一个部、一个地方搞久了，容易看成自己的，也听不到反对意见了。

在这方面（指搞楼、堂、馆、厅、修游泳池，搞剧团，搞享受）用心多了，在那一方面（指革命）就用心少了。

关于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毛泽东

1965.01.00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未定稿中加写的三段话

毛泽东

1965.01.00

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关于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话

毛泽东

1965.01.03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就开会。有的同志说，打歼灭战怎么打法？一个二十八万人的县集中一万八千人，搞了两个月没有打开，学文件就学了四十天，学习那么多天干什么？我看是烦琐哲学。我不主张那种学习。光看是没有用。（刘××：河南有几万人集中在几个地方，搞了四十多天，是反右倾，搞清楚一些问题。刘子厚：我们集中也是反右倾放包袱。）有成绩没有？文件一天就读完了，第二天就议，议一个星期就下去。主要是在农村学，向贫下中农学习。我的一个警卫员，二十一岁，他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这次下来才知道了些东西。"就是学一个礼拜文件，下去就进村，向贫下中农学习么，他说还有几怕，怕死人，怕扎错根子，怕这个怕那个，那么多怕就不行。二十八万人的县有一万八千干部，还说少了，要那么多人？我看是人多了。工作队那么多人，你又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八万人？依靠那里的好人。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个坏的，还有二十七个是好的。有二个坏的，还有二十六个是好的。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呢？一万人两万人搞一两个月还搞不起来。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就是没依靠好，如果依靠好了，一个县十几个人就够了。总而言之，我们从前革命不是那么革的。一两万人搞一两个小县，倾盆大雨，几个月还搞不起来。以前安源煤矿办工会，安源工人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一去就公开讲：有哪些人愿意进夜校？开始找到了工头，他有两个老婆，是否搞了俱乐部？（刘少奇：没有搞。）搞了三个月，罢工就罢起来了么。

我看一进村和群众见面后，开门见山宣布几条就行了：

一、向社员宣布我们来不是整你们的。还有一部分老实的地富是否也可以宣布，不是整你们的。除了一部分漏划地富、一部分有严重问题的反革命和投机倒把分子以外，小偷小摸统统免了。开门见山讲是整我们党的内部，不是整社员。宣布我们来意不是整你们的。你们有什么不对的事你们自己去谈，我们不听你谈。社员中有严重的、极个别的也可以谈谈，这是极少数。

二、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的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有多吃多占多的，有多吃多占很少的，也有什么都没有的。几十元的，一百元二百元以内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经过群众批准就拉倒，也只有这一点么！你讲出来没有事了，不讲出来就有些事了。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退赔得好，可以不戴帽子，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继续当干部。

我看进村以后个把月要开个大会，以县为单位开个大会。一个小队来一个小队长，两个贫下中农。一个大队来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公社来书记社长。分几次开，一次开一天就行。先讲来意，话不要讲长，讲半个钟头就顶多了，讲一个钟头大家就不愿听了，让他们下去传达。二十八万人的县，三千多个小队。一个生产队三个人，一万人上下，一次开不起来分两次三次开，一次开一天。开过万人大会，就安民了。这样冷冷清清，搞那么多工作队，几个月搞不开，又没有经验，不会工作的人占大多数。通县去了两万多人搞一年多

还没有搞开，有不会工作的，有做官的，我看这样革法，革命要革一百年。工作队里去了一些教授，不如助教，助教就不如学生。书读得愈多愈蠢，啥也不懂，就是这个事，此外没有了。

这样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要依靠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不浓厚了。这个搞法和我们过去搞法不一样。要几个月歼灭敌人。我看方法要改，不依靠群众，几个月搞不起来，想个办法吧！

你们（指刘子厚）张承先、地委书记李悦农带队，几个月搞不起来，想个办法吧！为什么搞不起来！（刘：是强调扎根串连搞慢了，我在任县是大会小会结合搞的）干部会、贫下中农会可以在大队开，也可以去县里开。去年湖南省开了一个全省的贫下中农代表会，结果不错，今年增产粮食二十亿斤，我看起作用了。那么怕，怕扎错了根子，你钻到里头去了。进村要开大会，贫下中农包括漏划的地主和富农统统都来，宣布几条，双十条不要一条一条的那么念。

真正的领导人、好人要在斗争中才能够看出来，光靠访贫问苦看不出来。访贫问苦，我就不信。一不是亲戚，二不是朋友。粤汉路组织罢工，我在长沙。我们不认识一个人，还不是找了两个工头，一个叫朱绍廉的有两个老婆，他也要革命。因为工头受压迫，工资少，不够用。这个人后来还不是英勇牺牲了。哪里是这样的扎根串连的方法？你去发展，去搞群众运动，去领导群众斗争，在斗争中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么，然后在斗争中造出自己的领袖来。（刘子厚讲了他自己去任县蹲点开斗争会的办法）这些斗争大会也应该讲去年分配，讲工分，注意生产。南方有，北方没有？有灾救灾，无灾清工分，搞当年分配，冬季生产。四清放在后头。四清是清干部，清少数人。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也有清的吧！身上没有虱子，一定要找出虱子来！（刘××：一个高潮一个高潮地来，不能拖延，拖延反而搞不彻底。）一个时期，文件学四十天，搞烦琐哲学。我跟前那个警卫员来信说。学了四十天文件仍然不懂，下去蹲了点才懂了。我历来反对这样读文件，学文件四十天是迷信。要开大会，搞斗争，搞地县的三级斗争会。

谢富治那个办法值得采取。抽出20％的人来训练。六千人的工厂总有五千人可依靠，为什么不依靠五千人，只依靠你们工作队的五百人呢？我看有你一个人就行了。一个部长依靠五千人还搞不开？不要纠缠在文件上，训练那么久？搞斗争么。过去我们打仗，一拉起来就打。有打胜的，有打败的。什么书也没有。有人说我带《三国演义》打仗的，谁照着书来打仗？林总过去打仗是内行，贺龙过去也是内行。罗瑞卿也是内行。内行也好，外行也好，要打才能学会。你不打仗光在那里学，怎么能行？（问谢富治）你们搞了一千多人的训练班是不是也是学双十条？怎么学？学多久？（答：也学了点，很快就搞斗争了。）为什么不可以以大队为中心或公社为中心开训练班？所谓训练班就是斗争会，就是要在会上了解情况，了解各种人物，进行调查研究。要把斗争的人斗得差不多了，然后指定个把人作总结。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依靠工农群众。河北省新城县张承先、李悦农当了多少年干部不懂群众运动。那么多人冷冷清清没有搞开。李××是保定地委书记，他首先提出四清，他下去要搞别的，群众要搞四清。他听群众的，就是一九六二年提出搞四清的保定地委书记李××，原因是那时有个压迫在前面，打仗也好，搞农民运动也好，搞工人运动也好，工厂有资本家，农村有地主豪绅。国民党政治军事都在压迫着我们，我们无法可想，只好依靠群众。那时党员干部又少。几千人万把人的工厂，一个党员也没有。有

一个就可以搞大革命，搞罢工。粤汉铁路一个党员也没有，可以搞大罢工。你后来建党么。现在进了城，当了官，就不会搞群众运动了。

为什么过去上军校的人打起仗来不翻书，黄埔军校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是正式军官学生训练，操一操，练一练，就毕业了。林彪同志说：出来当连长根本不会打仗。班长有经验，听班长的话。他说怎样就怎样，打上几次就会打了。我不相信学了就会打仗，一个知识分子读了几年书就会打仗？不会打仗是合乎情理的。打几年就会了。我们工作队是否出了些主意？（刘××：贫下中农的主意多，我们也出了一点，主要是群众的。）要听他们的。要听群众的，要听贫下中农的。就是发动群众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命。要搞大的，小的刀下留人。（刘：一个是把群众发动起来，一个是群众发动起来到一定时候，工作队要掌握住火候，要善于观察形势。何时进攻，何时后退等等）等于罢工一样，什么时候罢工，什么时候复工。打仗也是一样，还是进攻，还是退却，实在不行你不退啊？有时候双方都退。比如打高兴圩，蒋、蔡向赣州退，我们向山沟里退，各退各的。

（问陈伯达）天津开了多大的会？（陈答）不得了，糟糕！多浪费时间，就不要开么！（陈插话）一千多户去那么多工作队，人多展不开。搞人海战术不行。一千多户你依靠七八百户就搞起来了。有一个陈伯达就够了。嫌人少再带一个去，无非是宣布：我叫陈伯达，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开个会。无罪的是多数人，有罪的是少数人，依靠多数人么！

（总理插话：刚才陈毅讲张茜学了两个月才进村）越学越蠢。反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张茜在哪个县？（×××：句容县。）我历来反对学文件，一个文件几个钟头就看完了，你带下去学么。下去一不要学文件，二不要人多，三不要孤立地扎根串连。开会不要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我身边的娃娃学四十天文件还不知道讲些什么，下去才知道。另一个在通县说教授不懂，助教好一点，学生更好一点。我对孩子讲，你读十几年书越读越蠢，什么也不懂。你向大家说，我二十几年是靠吃蜜糖长大的，什么都不懂。请叔叔伯伯大娘指导。还是学生比助教好，助教比教授好。教授书读得太多了，不然怎么是教授。这些人下去是阻碍搞四清的。他们的目的是不要搞四清的。

一个是谢富治的经验，办训练班搞斗争。一个是河南经验，“三结合”开斗争会。他们搞斗争也搞了一个月四十天。他们不是读文件，而是搞斗争，发动群众，了解情况。总而言之，搞斗争。（×××：我所在的那个大队，搞了两个月，搞出两万多元，十几万斤粮食）还是有油水搞，向他们借点钱用，他们钱多得很，群众还是有希望的，照顾五保户也好，搞生产也好。会不能开得太小了，有的生产队十几户，十几二十几个人，讲话打不开情面。一个大队十几个生产队开大会顶多也是几百人么！

现在搞不起来，其原因就是不开大会、不宣布来意。

从来没有看到要这么多人，那么多人我就不相信能搞好。

总之，要依靠群众，不能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不了解情况，或者没有知识，有的做了官，阻碍运动。工作队本身有些人就不能依靠。现在已摆成这么个阵线，一个通县，一个新城县。谁叫人少，我就砍一半，再叫人少，再砍一半。通县二万人砍一半分到别处去。一个县有五千人还不行吗？（康生插话：扎根串连是邓老发明的。）啊，是邓老发明的！神秘化么！不宣布来意。要宣布我们做的事：生产、、分配、工分，搞这几件事。四清讲

一点：清不清，群众讨论。有就清，没有就算了。群众的不清。开个会要有几百人，小队十几户人少，以大队为单位开。说县里开了会了，讲出去可灵哩。县委书记问题严重的，当工作队到别的县去。照现在搞法，我看太烦琐了。你陈伯达那个是一千多户，开始几个人也搞开了。以后加下了五百人，要那么多人干什么？（邓××插话）讲长一点，反对急躁情绪。讲五、六年，三、四年，两三年完成岂不更好。方法很重要，一个县集中一万多人是多了。一九二七年搞农民协会，一个县一个人，是农民自己搞起来的。没有好几个干部。农业部、财务部、武装部，七、八个哩，开始都是些勇敢分子，包围县城的也是那些勇敢分子。要求过分彻底，实际上不能那么彻底。当权派少数人是混进来的，是严重的，大多数是能够争取改造过来的，还有用处。过分了，群众不一定赞成。我们想开一点，可能快，不能那么太彻底。（刘插话）工厂中要可靠工人占优势。

工作队不一定太干净，一定要把有问题的开除出去吗？不一定。工作队中可以有贪污投机倒把的人，只要他交待就行。我们这些人对贪污投机倒把没有知识，没有经验，他们有经验，没有他们还不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方向问题没有解决，如何打法？这样多人反而搞不开。不如陈伯达的办法。靠人海战术不行，要出问题。

王××提出干部交换问题，从这个县到那个县，这个社到那个社。来了新人不摸底，群众敢讲话。新社长，新书记来了，就敢讲以前的。很快就可以搞开的，为什么要很久。

现在是工作队不要那么纯洁。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没有群众运动。一万多两万多人在一个县还嫌少？

贫下中农协会就是要把问题搞清楚，跟陶×他们说。

对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的批语

毛泽东

1965.01.12

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在听取中南局汇报工作时的插话

毛泽东

1965.01.12

要抓好分配。我们都讲政治经济学，其实，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是三个方面：一是所有制（谁占有生产资料）。二是谁占统治地位。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讲相互关系。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在社会主义农村中，是贫下中农占统治地位，还是富裕中农、贪污分子占统治地位？三是分配。这都是讲生产关系。

（当谈到李达编的《哲学大纲》时）

李也送了我一本，我没有详细看，翻了一下。还是言必称希腊、罗马，而且大纲内容基本还是照斯大林那几条讲的。不把矛盾的对立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离开矛盾的对立统一来说什么运动的发展和联系，就不是真正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当谈到××准备一九××年争取实现四、五、八时）

四、五、八原定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实现的，你们可以努力去做，也可能达到，也可能接近，也可能根本达不到。看来需要再长一些时间，再多十年实现也可以，不能勉强，勉强是不行的。

（当谈到每个地区都有先进和落后的问题时）

你们湖南就没有先进的地区？可能你们不了解，要宣传本省、本地区的先进。河北省就搞了十个试点县，说搞得很不错，没有比这十个县再好了？我就不信。不一定是试点县搞得好，不是试点的县就一个好的也没有？果然，后来发现井陉县，它不是试点县，却搞得好。

（当谈到怎样对待自己地区工作落后时）

要承认落后，要使这些地区的同志大吃一惊。刚才张××同志讲，有些地、县工作差一些，盖子一揭开，有些人几晚睡不着觉。需要刺一下，证明这些同志还有希望。但也不要沉不住气，还是扎扎实实做好工作。

（当谈到王××同志写一封信给毛泽东、请示总路线有无补充修正时）

照你的提法，太长了。总路线还是不改。每个时期有所发现，有所强调，不必改。

（当谈到突出政治的问题时）

要突出政治。有的同志重业务、轻政治，是方向问题。但不是说，不要业务。孙中山讲过：“政治是众人的事。”他比古人讲得好一点，但他不讲阶级。什么“众人的事”？各个阶级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释。资产阶级说是资产阶级的事，无产阶级说是无产阶级的事。国民党说是国民党的事，共产党说是共产党的事。还是《共产党宣言》上说得对，在阶级社会里，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在阶级内部，也有矛盾，有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矛盾，有斗争。党内也会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但都脱离不开阶级斗争。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映。袁世凯作皇帝，连他最亲信的两员大将段琪瑞和冯国璋都反对，只有他最亲信的陈宦

极力劝进，说袁如不答应做皇帝，他就跪在地下不起来。袁很高兴，让他当四川督军。可是，蔡锷一起义，他首先响应。可见，搞个人野心总是搞不久的。我们党五朝书记都不好，但也没有人能把党搞垮。最危急的是内战后期，王明路线的几年。遵义会议后十年，虽然还是洛甫当总书记，王明路线基本被克服。但抗战初期，也有过王明路线。解放后，还有高、饶、彭、黄、张、周、习等，但都搞不成。因为搞个人野心，总要有几个人合谋，可是联络人多了，就容易暴露了。

（当谈到切实搞好城乡四清时）

一定要认真搞好。可以再以×年时间，到一九××年全部结束。但也不要再拖长时间。

（当谈到会议文件时）

看了四个，短，还有些味道，准备看下去。（农村四清文件中关于“我们不少同志，长期重业务轻政治，谈起生产来津津有味，而对阶级斗争懵懵懂懂，兴趣不大，）提得好。（“各地都要深入向群众宣传，藏粮于民、藏富于民的指示”）这样一宣传，公粮还能拿得出来？这件事，只能在干部中讲，不要在群众中宣传。

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几条批注

毛泽东

1965.01.15

一、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二、为什么不可以劳动四个到五个下午呢？剩下还有两个整天和四个到五个上午做别的事。

三、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四、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接见以苏班德里约为首的印尼代表团时的讲话

毛泽东

1965.01.27

好的拿来，坏的丢掉。无论是本国的或外国的都一样，只能批判地接受，不能教条主义，照搬。

军事学校办得一塌糊涂，正在整理。过去没有军事学校可好了。打了几十年仗，就是没有军事学校。我们的军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识字和小学程度的。国民党尽办军事学校，什么陆军大学毕业，就是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兵打倒了它。

进军事学校的时间太长了。蒋介石办的黄埔军校，两个月入伍训练，四个月学校毕业。蒋介石的军队主要就是这些人还比较能打，陆军大学毕业的实在不能打。

书可以读一些，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革命斗争培养干部。

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的指示

毛泽东

1965.02.22

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接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65.03.00

日本投降了，我们又被迫打仗。打的办法就有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军事道理，简单地就这么两句话，什么叫你打你的？他找我打，但他又找不到，扑了空。什么叫我打我的？我们集中几个师、几个旅，把他吃掉。

事物都是可以分割的。帝国主义也是事物，也可以分割，一块一块地消灭。蒋介石八百万军队也是事物，也可以一块一块地消灭，这就叫作各个击破，这就是欧洲和中国古书里说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不要看书喽，谁打仗还拿本书去看。我打仗从来不看书。少看一点，看多了不好。

战场就是学校，军事学校我不反对，可以办，但不要学得太长了，一读二三年，太长了，几个月就行了，什么陆、海、空学校，不怎么高明。

有些现代科学需要长一些时间学，例如导弹、原子弹，这是讲研究和制造。单单武器的使用训练，士兵不需要很长的时间。训练炮兵一个月就行。训练驾驶员、飞行员，几个月就够了，最多一年。主要是在战场上训练。和平时期要在黑夜里训练，战争时期，战争就是学习。你不是说念了我写的文章吗？这些东西用处不大。主要是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我的又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帝国主义最怕这种办法。打得赢我就把你吃掉，打不赢我就走掉，你找也找不着。我们开头时用游击战的办法，攻的时候用，防御的时候也用。根本的办法是打运动战。打蒋介石时，从小仗打到大仗。后来我们用三十万军队消灭他五十万军队，我们用三个指头吃他五个指头。我们是少数，怎么能吃得掉？怎么吃法呢？还是一个个地吃，结果把它吃掉了。

有些外国人在中国上学，学军事。我劝他们回去，不要学太长。几个月就行了。尽课堂上讲，没有什么用处。回去参加打仗，最有用。有些道理只要讲点就行了，不讲也可以。大多数时间可在本国，或者根本不出国。

对民兵工作的指示

毛泽东

1965. 04. 21

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首先要落实组织，有没有队长、班长，组织起来没有？首先是有没有，然后讲政治，不要地、富、反、坏之类，要贫下中农，中农子弟进步的也可以要。地富子女中进步的也可以。真打起来他们会分化的，一部分组织维持会，插白旗，杀共产党，一部分跟我们走。地主富农、资本家也会分化，不会全部跟敌人的。是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不然就要失败。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

民兵，第一是组织，第二是政治，第三是军事。

关于卫生工作的三次谈话

毛泽东

1965.06.26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有结束呀！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关于学校要减轻学生负担的批语

毛泽东

1965.07.03

陆定一同志：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对军队文工团到农村、工厂去锻炼的指示

毛泽东

1965.07.15

军队文工团只知道军队的事不够，还应知道工人、农民的事，因此，也应同地方文工团一样，要到工厂、农村去，特别要到农村去锻炼，去参加四清。

关于绘画使用模特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

1965.07.18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科学，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齐白石、陈半丁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

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如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

与医务人员的谈话

毛泽东

1965.07.19

（××说毛对卫生部的批评是一针见血，要切实改正。）

城市医生下乡还不一定高兴，在城市住惯了。可不要相信有些人嘴上说的那一套，要看；嘴上说的好，不一定。

北京医院改得怎么样了？

（谈到北京医院目前的情况）

北京医院并没有彻底开放。×××、××就不能去看病，××、××可以去看，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些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

（谈到北京医院改了，中央改了，可以影响地方）

不一定。他可有他的办法呢。反正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

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动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告诉我，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赔钱。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好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椎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你。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最近政治局要讨论一次卫生部的工作，××同志已经告诉我了。他找他们谈过。

（谈到卫生部现在正讨论具体办法，很想在政治局讨论之前，主席先接见一次，再给以指示。

毛表示同意。

在听取钱信忠、张凯汇报卫生工作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65.08.02

毛：我要讲的都讲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答：（略。汇报到打算为农村生产队培训不脱产卫生员）

毛：训练多长时间？

答：半个月左右。

毛：半个月太短了吧！

答：他们主要学会些针灸，常见病的治疗和一些预防工作，训练后还要带他们做。

毛：带很重要，带多长时间？

答：城市医疗队下去可一直带，共带三、四个月。

毛：这还可以，带三、四个月，学会治十几种病。

（当汇报到搞了一些半农半读训练班时。）

毛：半农半读怎么搞法？

答：采取农忙不学，农闲多学的方式。

毛：多长时间？

答：两年，三年。

毛：两年就是读一年书，三年就是读一年半书，这个办法好。

（当汇报到根据毛的指示卫生部作了检查时。）

毛：现在有多少卫生技术人员？

答：（略）

毛：这个队伍不小！

汇报：主席批评我们只为城市人口服务，很对。现在高级医务人员百分之八十在城市，其中百分之七十在大城市，百分之二十在县城，只有百分之十在农村。经费，包括县在内，农村占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七十五用在城市。

毛：你们用了这么多人力、这么多钱，为那么少的人服务。

答：主席指示后，才清醒了。

毛：你们研究过神医没有？

答：我们没有研究过。

毛：神医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答：许多病不治也可以好。

毛：比骗人的医生要好。

汇报：通过四清和医疗队下乡，了解到农村卫生队伍很复杂。

毛：怎么复杂？

答：有许多人过去不是医生，看些医书就加入到医务人员队伍里来了。

毛：看些什么书？

答：看些中医书，看些药方。农村医务队伍中，政治情况复杂，技术水平低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毛：坏人不多吧？

答：真正坏人占百分之五左右，但政治技术水平低的较多，占百分之四十左右，这个队伍如果没有新生力量，取消他们还不容易。

汇报：现在正在召开医学教育会议，讨论主席、总理指示，要办三年制卫生学校，为农村培养医生。

毛：高等教育要五年，读那么长时间书，值得研究。

汇报：现在想两条腿走路，办三年制，多在农村办，在农村招生。

毛：招什么生？

答：大部分招高中生。

毛：初中生还不行吗？

答：目前农村高中生还不少。

毛：招中学生还不行吗？你们不在城市招了吗？

答：城市也招一些，主要在农村招。

（当谈到医生政治思想最重要，只有技术没有政治不行时）

毛：这一点很重要。医生一定要政治好，招些政治好的中学生就可以了。

汇报到城市问题时。

毛：你们对城市是不是服务得好？

答：也没有服务好，要求愈来愈高。

毛：怎么愈来愈高？

答：以北京来讲，××多万干部公费医疗，××多万工人劳保，还有家属。

毛：工人不是“老爷”，工人还是要为他们服务的。

汇报：工厂医务工作没有搞好，工人也都到医院去看病。

毛：你们为什么不在工厂设不脱产卫生员呢？小厂可以设卫生员，大厂设医务所。

答：非正式医生开不了假条，要请假还要到医院去，经医生开证明才行。

毛：这涉及到劳保问题，要好好考虑。

答：城市医院压力很大，公费医疗包下来，一个钱不出，到处看病。

毛：看了病，拿了药还不吃。

汇报：总理指示城市要组织医务人员下农村，每年去三分之一。

毛：怎么下去，多久？

答：轮流下去。下去后城市医疗卫生工作仍比较重。我们打算高等医学院校学生三年就一边工作一边上课。护士也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毛：光念念书是不行的。你们对打仗考虑了没有？

答：中央指示后考虑的。

毛：怎么考虑的。

答：组织了××个医疗队，随时准备赴前线服务。现在的医院对战争没有训练。组织医疗队训练，有的地方已开始了。

毛：打仗了还能都到北京医院看病？要考虑到打仗。你们分科那么细，打起仗来怎么办？打起仗来还不是什么都要看，只会内科不会外科怎么行？

答：过去部队年轻人多，疑难病可能不多，有的也许不认识。但是医学科学是发展的，要有一小部分力量搞尖端。

毛：搞科研的人看不看病？

答：一部分人看病，一部分人不看病。

毛：什么人不看病。

答：搞基础科学的，如搞生理、药理、生化的，研究理论不看病。

毛：理论还是要结合实际啊！

答：×××同志说百分之五搞尖端就可以了，现在共有科研队伍××人，其中技术队伍××人。

毛：科学尖端还是要搞的。

请示：第一，卫生员的工分问题。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补贴工分不超过百分之二，卫生员的补贴工分社员同意给，但六十条没有规定。

毛：给群众办好事没问题，农民会同意的。现在干部参加了劳动，百分之二也用不了，有的地方只用百分之一。工分不成问题，农民会同意的。

请示：第二个问题，希望党委多领导、批评我们，多抓卫生工作。我们认识到党委多抓、多领导、批评，工作才有劲。

毛：这话很对。党委是集体领导，什么都要管。卫生部门是为人民服务的，当然要抓，党委也要研究卫生工作。

最近政治局不是要讨论卫生工作吗？你们的报告写得怎么样了？写好，送政治局。

请示：农村卫生工作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建议中央今年召开一个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中央召开可以找省市领导同志参加。

毛：可以。

请示：还有有关药的问题。

毛：药的问题怎么样？

答：药不归卫生部门管，问题不少，现在正在研究解决。

毛：药品应当降价。

汇报：药品降价对农民有一定的好处。但药主要用在城市，药降价，农民还是看不起病。

毛：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答：我们医疗队下去也搞计划生育。

毛：农民接受得如何？

答：宣传后可以接受。

最后，请示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没有什么了，就按你们讲的办吧！

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65.08.03

毛：马尔罗先生来了多久了？

马：十五、六天了。见了陈毅副总理，到延安等地去了一次，回来后见了周恩来总理。

毛：喔，你到了延安。

马：这次去延安，使我学到很多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况，比过去知道得多，我今天能坐在除了列宁之外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家的旁边，感到很激动。

毛：你说得太好了。

马：我在延安看到了过去的艰苦环境，人们都住在窑洞里，我也看到了蒋介石住宅的相片，对比一下就知道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

毛：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弱者总是能战胜强者的。

马：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曾领导过游击队，不过当时的情况不能同你们的比。

毛：我听说了，你打过游击。

马：我在法国中部打过游击，领导农民军队反对德国军队。

毛：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当时推翻封建统治的那些力量最初也不是强的，而是弱的。

马：这很有意思，农民都没有打过仗，不知如何打，但他们能当很好的战士。拿破仑手下就有很多这样的战士。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到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毛：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打不赢仗，谁听你的话？打败仗总是有的，但少要一点败仗，多打一点胜仗。

马：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农民习惯于打败仗，打胜仗的不多。

毛：我们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甚至整个南方根据地都失掉了，跑到北方来。

马：尽管如此，但人民对红军的怀念仍然存在。

毛：以后在北方建立了很多根据地，发展了军队，发展了党，发展了群众组织，北方人民得到了土地。我们解放了北京、天津、济南等大城市。队伍逐渐扩大到几百万，由北方向南方打。要讲经验还有一条，就是在中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凡是不跟敌人跑的人。我们在一个时期甚至跟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建立了统一战线。如果蒋介石不进攻我们，我们也不会进攻他。

马：为什么蒋介石要进攻你们呢？

毛：他想把我们吞掉，他以为他可以。

马：他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很弱？

毛：我们有很多根据地，人口占全国五分之一，军队有一百万左右。蒋介石却不同，他有四百多万军队，有美国的援助。我们的根据地很大，但根据地是分散的，也没有外部的援助。

马：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即蒋介石只相信城市的力量？

毛：他有城市，有外国的援助，同时他在农村的人口比我们多。

马：我曾去过俄国，曾同高尔基谈过这个问题，同他谈到了毛泽东，那时您还不是主席。高尔基说：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大城市。当时我问他：没有大城市，是会失败还是会成功？

毛：高尔基当时回答了你没有？（马尔罗摇头）他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所以不能答复你。

马：高尔基常说各地的农民都一样。但我认为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

现在我提一个问题：中国再一次要把中国变成为伟大的中国。几世纪前，中国从技术上来说是强国，如丝绸。后来欧洲变成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有武器、军火。现在的中国也有了武器、军火，又要成为强国了。当然中国不需要成为欧洲式的强国。中国要成为中国式的强国，不知需要什么东西？

毛：需要时间。

马：我们希望你们有你们需要的充实的时间。

毛：至少需要几十年。我们还需要朋友。例如同你们往来，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是朋友的关系。我们有各种朋友，你们就是朋友的一种。同时在北京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还没有见到他。我们同艾地有共同点，同你们也有共同点。

马：这些共同点是不一样的。

毛：有一些是一样的。例如如何对待美帝国主义，对付英国的两面派。你们比英国明朗。

马：实际上反对美国在越南“逐步升级”的只有法国。

陈毅：英国人支持美国侵略越南，而你们反对。

马：英国有马来西亚问题。

毛：英美俩要交换。

马：从戴高乐总统恢复政权后，法国已结束了它的殖民主义立场。每年援助阿尔及利亚几亿法朗，是我亲自去非洲四国宣布他们独立的。在戴高乐总统看来，中、法有一个绝对的共同点：如果有苏、美双重世界霸权，那么，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和法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国，是办不到的。

毛：当然罗，一个是你们的盟国，一个是我们的盟国。你们的盟国美国，对你们是不怀好意的。我们的盟国苏联，对我们也不怀好意。

马：列宁死后，人们谈到苏联时就会想起斯大林。斯大林死后，斯大林的制度被推翻了，至少部分被推翻了。但苏联领导人却假说苏联的制度没有改变。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亲自告诉我的。我认为现在的制度不同了，尽管用的词一样，但是内容很不同了。

毛：他还进一步说要建设共产主义，这是斯大林都没有说过的。

马：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毛：他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马：他们甚至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的方法。

毛：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很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马：难道主席真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毛：是的。

马：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那里走，去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他们也有自己的经验。法国社会党难道真搞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人真信马克思主义？

马：法国社会党员中只剩下百分之七是工人，其余主要是职员。在这方面他们是强大的，因为有工会，是由职员们组成的。另外，还有一些党员是南方葡萄种植园主，是地主。至于说法国共产党，法国共产主义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法国农民的作用同中国的不一样，不只是绝对少数，占人口比例也不及中国。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要起作用，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知识分子中寻找力量，一是在真正无产者中间寻找力量。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可能在感情上偏向中国，但因具体情况不同于中国，因而实际上又偏向于苏联。

毛：他们是反对我们的。

马：作为一个党是反对中国的，但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并不反对中国，目前党内冲突很严重。法共就像最懒的人一样，两面都想应付，你们可能已看到很多这种情况了。

陈毅：他们并没有应付我们。

毛：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本身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走什么道路。

马：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毛：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这些是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

马：为什么有作家？

毛：有一部分作家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把旧的摊子都接受下来了。我们原来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

佩耶：我有一个感觉，中国青年正朝着主席所主张的方向在培养中。

主席：你来了多久了？

佩耶：十四个月了，从广州到北京一路上学了许多东西。以后参加使节旅行，去过华中、华南、荣幸地访问了主席的故乡韶山，还到过长沙、四川。最近又到东北去了一次，很有意思。我在工厂、公社、街上、戏院都尽量同人民接触，感到青年人没有那些要你们操劳的矛盾。

毛：你看了一个方面的现象，另一方面的现象没有注意到。一个社会不是一个单体，是个复杂的社会，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佩耶：我感到有一种力量引导青年，使他们走向你们所指出的方向。矛盾当然还会有，但是方向肯定了。

毛：一定有矛盾。

马：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在国内方面。

毛：那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

马：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例如举行党代表大会就要确定一个目标。是否是农业问题，因为我感到工业问题已解决了，或起码是走上健全道路了。

毛：工业和农业问题都没有解决。

马：我在西安参观了纺织厂，在法国纺织厂同革命有很大关系。一七八九、一八三〇、一八四〇、一八五一年都是这样，特别在里昂。因为纺织工人是最穷困的。我在西安看到该地的纺织业已达到解放前上海的水平，大部分机器是中国造的，机器多，工人少。显然中国党能在纺织工业中执行它要执行的政策。但相反在农业方面，可耕地很少，使中国政府处境困难。现在农业方面是否考虑发动一次超过人民公社范围的大规模的运动？

毛：人民公社在组织机构和生产关系方面不会有什么改变，在技术方面开始有了改变。

马：你考虑可增加些耕地面积？

毛：可增加一些，主要的还是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作。今天就不多谈了。请回去问候你们的总统。

马：关于外交政策的问题，我已同周总理、陈副总理谈过了，不再向主席重复了。今天谈的是戴高乐总统阁下最关心的基本问题。感谢今天的接见，并转达戴高乐总统对阁下的问候。

（出门时）

毛：我接见过法国议员。

马：我最不相信议员的话。

毛：他们对美国的态度没有你这样明朗。

马：可能是我更负有责任的缘故吧。

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总检察长及夫人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65.08.08

毛：你们是从几内亚来的？

贡代·塞杜：是的。我们之中有些人来了十天。我们是几内亚政府和党派出的两个代表团，来中国和中国朋友们接触。我们来了以后，学习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想尽一切办法企图孤立中国，中国是一个大国，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孤立不了的。我们把中国的胜利看成是我们自己的胜利，我们要加强同中国友好的甚至兄弟般的关系。

毛：我们都是友好国家，有你们帮助我们，我们就不怕了。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 我们两国是走在一个方向的。

你们都是头一次来中国吗？

法迪亚拉：我已经来过一次，享受过中国好客的接待。

毛：你来过一次了！

法迪亚拉：我是一九六〇年来的，当时我参加了亚非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很高兴也很荣幸地访问过中国，当时受到了主席的接见。我还保存着接见时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很好的纪念。

毛：你是跟总统一起来的么？

法迪亚拉：我是在总统进行国事访问离开中国几天后，参加亚非拉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的。随后我又和韩幽桐同志和她的爱人一起参加了索非亚国际法律工作者会议。一九六〇年访问中国，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五年又获得了大跃进。

毛：没有大跃进，小小的进步。

法迪亚拉：还是大跃进。

毛：（分别向贡代·塞杜和法迪亚拉）你先到，还是你先到的呢？

法迪亚拉：贡代·塞杜部长先到。上一次，我访问中国才一个月。这一次，我计划在中国呆一个月，准备十三号去外地参观，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毛：到处走走好。

法迪亚拉：谢谢，我已经跟我的朋友说过，非常感谢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主席的邀请。

毛：只要你们愿意来看，我们都邀请。不过你们要注意，中国的经验不都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

法迪亚拉：主席很谦虚。

毛：不是谦虚，这是实际问题。世界上没有哪一块地方、哪一个国家只有优点没有缺点，没有哪一个人不犯一点错误，也许只有上帝不犯错误，因为我们都没有看见过他。我们的工作，无论哪一项工作，都正在改造过程中，教育工作也是如此。我们过去自己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我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人统统收下来，逐步加以改造。有一部分人改好了。另一部分人还是照他们的老样子。你们改造，他们不听你的。法院、

检察工作也是一样，到现在还没有颁布民法、刑法、诉讼法。（毛问韩幽桐：现在搞了没有？韩回答：正在搞。）大概还要十五年。

法迪亚拉：在我看来，规定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有了精神，办法就有了。规定不过是把已经作过的工作明确下来，规定是需要的。

主席：你这个讲得对。现在正在作些工作，譬如改造反革命分子，改造刑事犯，我们有几十年的经验，不只十五年，过去根据地也有些经验。

法迪亚拉：在这一方面，一九六〇年我和中国检察长、政法学会会长谈过这个问题，中国重视战犯的改造问题。我们几内亚也有同样的情况。把战犯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需要动员人民，把司法机关和人民结合起来。我们两国的问题是相同的，当然其结果是你们取得了很大成功，而我们现在还在试验阶段。你们无论在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你们把最后一个皇帝改造成为公民，使他为人民的事业而工作。主席先生，你信任人民，认为改造人是可能的，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两国的社会条件有所不同，但是目的是一致的。

毛：（面向贡代·塞杜）你是搞教育的。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问题，还有方法问题。采取教育的政策，还是采取丢了不要的政策；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还是采取镇压他们的方法。采取镇压、压迫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进步的。

贡代·塞杜：非常正确。

毛：要相信这一点，如果有些人不相信，可以试点。（毛对韩幽桐说：“将来把这些写进法典里去，民法、刑法都要这样写。”）要把犯罪的人当作人，使他有点希望，对他有所帮助，当然也要有所批评。譬如劳改工厂、劳改农场就不能以生产为第一，就要以政治改造为第一。要作人的工作，要在政治上启发人的觉悟，发挥他的积极性，劳改工厂、劳改农场就会办得更好。不仅犯人自己能够自给，而且还能给家里寄点钱。现在我们的劳改工作还有缺点，主要是我们的管理干部不太强，有些地方的方针不对。

法迪亚拉：我看他们还是很强的。这个工作不是立竿见影的，已经取得的成就使人充满着希望。因为改变一个机构比较容易，要改造人们的思想比较困难。

毛：这个问题不决定于罪犯，而决定于我们。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不要把劳动和生产放在第一位。不要赚犯人的钱。

法迪亚拉：这点同意。在我们那里有同样的问题，作一件事首先要教育干部才能收到效果。

毛：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怎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确定。

贡代·塞杜：这很正确。

毛：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我们的法院工作、检察工作是为犯人服务的，不是要犯人为我们老爷服务的。

贡代·塞杜：这是正确的，我们很同意。

毛：整个来说，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给我们饭吃，吃了饭不为人民服务，干什么？大使是哪一年来的？

卡马拉·马马迪：一九六三年来的，来了两年半了。我刚来中国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陪一个代表团去上海，在上海受到了主席的接见。

毛：你这次穿的是白衣服，我不认得你了！

卡马拉·马马迪：是的。上次在上海我穿了一身全黑的衣服。

毛：是不是谈到这里。我也没有什么道理跟你们讲。你们回去后，请向你们的领导人杜尔总统问候。

（注：贡代·塞杜 几内亚教育部部长。法迪亚拉 几内亚总检察长。卡马拉·马马迪 几内亚驻华大使。）

关于民族工作的指示

毛泽东

1965.09.00

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同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代表团的谈话（摘要）

毛泽东

1965.09.14

事情总是有麻烦，不能怕麻烦。革命也可以叫麻烦。革命就是麻烦。搞经济建设也是麻烦。怕麻烦什么事情也搞不成，不怕麻烦什么事情也可以搞成。知识分子就是要能够跟人民的大多数结合起来。跟他们结合的时候就有麻烦。你要跟他结合，他不跟你结合，这个麻烦得很！这些人听话，那些人又不听话，就有这些麻烦。不能怕这些麻烦，无非是在长期的斗争中跟群众站在一道，群众最后会了解你们的，会信任你们的，会在那些真正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劳动人民很需要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但是，不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不高兴，不喜欢。

你或者是比他们高一等，站在他们头上，那他们不喜欢。他们喜欢那种平等的人，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跟他们一道参加劳动，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了解他们的要求，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又有知识，他们喜欢这样的人。

在一次视察各地工作时的讲话

毛泽东

1965.11.00

（综合整理）

（一）

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自力更生，中央既没有粮，又没有布疋，现在还有点枪炮，打起仗来，枪炮也没有了。我们历史上，就是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冲突这两次，靠后方供应了点枪炮。真正打起来，中央什么也没有，只有发号施令。

你们有没有钢？（答：准备××吨，将来再发展到××吨。）哦！搞××吨，那好！

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年内要把这件事情搞好。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浪费不浪费？没有什么浪费。粮食储存一些，有好处，反正要吃。棉布有一点，也反正要穿。枪炮子弹如果用不着，只好当废铁用。打洞，不过用点劳动力。

打起仗来，没有粮食是不行的，打仗要有饭吃。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占领延安，我们退出延安，在山里转，还有饭吃，有粮食，有酸菜。后来，我们一个旅一个旅地消灭他，他就不要延安了，我们也解放全国了。

我们军事上是诱敌深入。敌人来，一是想占地方，一是想抢劫。诱敌深入，才好消灭它。

越南打得这样好，我们能不能打好？你们看，美国人怎么样？只要我们在××年内把后方建设起来，就不怕了。

你们向全民做了动员了（指备战）？群众听了以后有没有抢购东西的现象？有没有惊慌的现象？（彭：没有这些现象。职工的情绪很高，推动了生产。现在倒是有些人还不相信打得起来。）不说群众了，连我们党内还有些人认为打不起来，或者只是小打，大打不相信。他们是有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两手准备的。（刘中：向一般居民宣传备战后，大家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说不像抗战时期唐生智守南京，事先不告诉怎么办，敌人一来自己先跑掉，群众损失很大。）哦！这样回忆对比一下好。国民党弄得国破民穷，敌人来了又惊慌失措，他集中了七十个师，在上海打了三个月，守南京还无准备。敌人从乍浦登陆，直插到芜湖，当中空隙很大，无兵镇守，唐生智他们就那么慌慌张张地逃跑。

军队过去是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现在军队就是搞些生产，不大做群众工作了。我们还是要恢复过去的三大传统，要打仗，要生产，还要做群众工作。

你们这些省、市委书记，过去都是在军队里的，现在搞地方工作，就不大问军事了。军队的同志，搞了军事，也不问地方工作了。这都不对。搞地方工作的要管军事，搞军队工作的也要管地方工作。江×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工作的，做了省委书记以后，就不大管军事了，军队就对他有意见。现在听说已经改了，这就好嘛！

（二）

安徽下去了多少人？有多少人马？（答：农村×万多人，城市×万多人）河北是××万人，山东××万人，你们×万人，越往南越少。

机关可以留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下去，机关人越多，事情越难办。中南海×局，解放后编制为××人，我找汪东兴同志谈，能不能减？他说可以。我说减一半是不是可以？他说可以，减到××人。我说再减一半是不是可以？他说可以，现在是××人，一半人下去搞社教了，只留下一半人。

分化（指经过社教后地富子弟有些分化）是会有的，真正打起仗来，内部也会分化。隐藏在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要分化出去，还有地富反坏，但地富反坏也不是全部的。历史上就是有分化的。大革命时有五万人，失败后，逃跑的逃跑，叛变的叛变，只剩下几千人，包括总书记陈独秀在内，还不是叛变了！还有向忠发。以后还有王明，直到现在还写文章骂我们，不用真名，化名。就是在井岗山，不是也有一些叛变投敌了！以后又有张国焘，此人现在香港。不但困难时有分化，在胜利时也有分化，如高、饶、彭，还有当了十年总书记的张闻天。不要怕分化，革命是越来越强的。

检讨也要一分为二嘛！不要说的一无是处。去年开会，有几个地委对你们攻得很凶，你们苏州有一个地委副书记，攻你们攻得特别凶。我知道这个人，这个人能力不强，思想水平低，他不了解江苏的历史情况。

河北汇报有三条：一是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只有一般号召没有具体指导。二是领导核心与群众相结合，只有领导核心，没有与群众相结合。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到群众中去，没有从群众中来。只有一般号召，没有具体领导，只有领导核心，不与群众结合，只到群众中去，不从群众中来，是不行的。只剩光杆，怎么领导呢？

与××的纠纷解决了没有？（李××：现在问题基本解决了，关系还好。下边可能还有些问题。）你们向××让步，向××让步，你们一让步，就主动了。你们让步，人家也会让步。

（三）

安徽各种资源和经济作物都有，今年庄稼不错，麦子比去年种得好，从车上看，麦子很整齐，前年一、二月还看不到东西，稀稀拉拉的，现在十一月就长得很整齐了。沿路看山东造林不错，你们怎么样？

你们不要调××××万斤嘛，给中央少调一点嘛！要粮，不要冒失，要藏粮于民，不要学曾希圣。

猪多了，让群众多吃一点肉，就可以少吃粮食。

二十元（指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太少了。除粮食外，每人有五十元、六十元就好了，将来要搞到一百元。

一个月五十元（指工人平均工资），一年六百元，还有七千六百元（按劳动生产率为八千元计算）上交国家。因此，农民说工人落后是不对的，工人为国家创造了很大的财富。

南京解放时才六千工人，蒋介石是该失败，他不发展生产，怎么解决群众生活！现在××万产业工人，一人养活四口，那就是××万人。你们江苏人口这么多，土地这么少，怎么办？（答：要大抓节育）是的。但是节制生育，有些人不容易做到。

避孕药、避孕手术最好采取少要钱、不要钱的办法，这还是划得来的。天津放环等都免费了。环也可以不收费，少收点费用，把这件事搞好，意义大嘛。

（四）

精神变物质，有些人不服。有一个人驳我的意见，和我辩论，此人是一个中学毕业生（一译电员）。他看《矛盾论》看了七遍，工作了十几年，他说精神变物质，同意能变粮食、变钢铁，就是不同意能变石头。还是可以变石头的，如人造大理石、氢氧化钙等。氢氧化钙就是石灰，老百姓在几百年前就懂得搞了，作肥料用。革命战争，最后全国解放，是精神变物质。人大会堂，也精神变物质，精神就是设计图纸，按照图纸盖起来就是物质，就是力量。经过四清，人的觉悟提高，产量增加，也是精神变物质。

这本书（指《毛主席语录》）共有三十三章，够了，比孔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五千字，还没有这本书这么多。马、恩、列、斯文章太长，我主张写短文章。这个本子不错。（李××：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我们已向中央办公厅提出这个要求，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提了。）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提。

现在的教育制度要改革。一个小孩子要学习十七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五年，这不行。大学文科只要二年半到三年，要办抗大式的学校。（李××：安徽最近两年毕业的大学生都先到下面搞社教去了。）社教就是大学，就是抗大。

你们谁在抗大念过书？我们解放军很多干部，没有念过书啊！小学毕业就不错了。刘亚楼同志是小学毕业的，不是很好嘛！你（××）妹妹在那里？（答：民间文学研究所。）在民间文学研究所干什么？要下去才能研究出东西来。现在学生连马牛羊、鸡犬豕都不识，怎么不出修正主义！学校搞五分考试制，我的女儿就是因为考试把脑子考坏了，现在已经把她搞到农村去了。考五分不一定是好的，考三分也不一定是坏的。

课程负担太重，为什么要上那么多东西？我看要减轻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负担。（有人插话：初中学生现在一学期只下乡劳动一星期。）太少了！小学也可以搞点轻微劳动。看起来，还是要搞半耕半读学校。

南京人喜欢看什么戏？旧戏都搞掉了吗？旧戏已没有观众了。现在的青年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感兴趣，跟他们距离远了。只有我们这些懂点历史知识的人看得懂。但是，群众不要看旧戏，我们也只好和群众一齐不看了，来个“一刀两断”。

你们这里有个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吓昏了，现在到那里去了？（答：下放几年后，现在图书馆工作。）这些人，要看他的变化怎样。当时党内就是不布置，只对党委书记打招呼。但像清华有个党委书记就不能打招呼，他和右派的人搞到一起去了。总支书记、党员、团员都不讲，让右派进攻，让它混战一场。一个学校左派可能是百分之二十左右，中间派占大多数，右派极少数，但让他们闹起来，也会猖狂一时。

以后遇到备战、形势变化、运动等紧要关头，都要注意让敌人暴露一下。这叫“诱敌深入”嘛！

现在的形势很好，无论全国、江苏、南京的形势都很好。

反对折衷主义

毛泽东

1965.12.02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省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这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关系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辩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现在我来讲一讲折衷主义的特点。

折衷主义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两点论即一分为二）。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都看到它的两个方面。例如在总结的时候，既肯定成绩，又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他们看作都一样，各占一半，半斤八两，而是严格地把他们分为主要的和次要的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例如：林彪同志对政治思想工作领域中四对矛盾的分析，人和物的关系，两个都重要，但是思想更重要，活的思想第一。这就是重点论。有第一和第二、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又如解决实际问题和解决思想问题，两个都重要，但主要的是解决思想问题。

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重点论，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规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判断是非，就不能进行工作。折衷主义用二元论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就是它把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了。他们把事物的两方面、矛盾的两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结果就掩盖了事物的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使人在工作中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们引到错误的路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政治与业务这一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统帅业务，不能平起平坐。如果把他们并列起来，就是折衷主义。

把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或者主张轮流坐庄的思想和看法的人认为既要突出政治，又要突出业务，“今天突出政治，明天突出业务”，“闲时突出政治，忙时突出业务”等等，这是一种折衷主义的倾向，是错误的。

第二个特点是用混合论、调和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论。折衷主义惯用的手法，就是把各种对立的观点、对立的名词、对立的事物，无原则地结合起来。这种无原则的结合，就是混合，就是调和，就是折衷主义。

折衷主义的混合论、调和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论是根本不相同的。折衷主义的混合论和调和论是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例如现代修正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根本对立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主张取消军队，主张不要斗争，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不叫工人罢工，不叫农民斗地主，而搞什么和平过渡等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不要斗争，不要革命的。

折衷主义是不分敌我，不分是非，不要斗争的调和论和混合论。例如有的人就不搞阶级斗争，他们对不法资本家不批评，不斗争，敌我不分。你们浙江不是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地主分子表现很不老实，一个党员职工批评了这个地主分子。这件事给经理知道了，经理就找这个党员谈话，批评这个党员说：“地主分子本来就想国民党，你这样一斗他，他就更想国民党，以后不要斗了。”这位经理好人主义，讲人情，看到别人有缺点，见到有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的事，明知不对，也不批评，不斗争，听之任之。这种不讲是非，不讲思想斗争，只求一团和气，只求得无原则的暂时团结的态度，是混合主义、调和论，就是修正主义、折衷主义。臭气相投，很容易混到那个臭水坑里去。好人主义也不少，大家要小心一点，提高警惕。

第三个特点是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来冒充和代替辩证法。折衷主义在判断事物的时候，总是这样也对，那样也对。他们惯用这种手法来冒充辩证法，这样就容易打“马虎眼”，容易偷梁换柱，混水摸鱼，容易欺骗群众。例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篇文章里批评折衷主义的时候说：“把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

如有人说：“我既不是单纯业务观点，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观点，在我那个单位，既突出政治，也突出业务，只有政治和业务都突出，这才是全面观点，光强调突出政治或者突出业务都是片面的”。他这种讲法，初听起来好像满有道理，考虑得很全面，既照顾了政治，又照顾了业务。但仔细地想一想，这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它不过是以全面的面目出现，它卖的完完全全是折衷主义的货色，所以很容易模糊群众，很容易蒙蔽群众。

第四个特点，有折衷主义倾向的人，总以为自己很有政治，其实他的脑子里政治缺得很，少得可怜。这些同志所谓很有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口号在嘴上，保证在纸上，决心在会上”而已。他们在小声地喊了一句突出政治的话以后，唯恐人家把突出政治的话听去了，于是紧跟着高喊“要突出业务”，好像不这样做，就很不舒服似的。这些人唯恐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刁难政治干部，实在感到奇怪。

第五个特点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为它把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搞错了，把灵魂抽去了，其结果就一定是：小则只是单纯业务观点，大则陷入修正主义泥坑。

以上讲的是折衷主义的五个特点。

凡是有折衷主义观点与倾向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从他们的思想深处来说，是反对突出政治的，他们不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

关于罗瑞卿问题的谈话

毛泽东

1965.12.02

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看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报告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65.12.02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关于机要保密、警卫工作的指示

毛泽东

1965.12.14

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在杭州的谈话

毛泽东

1965.12.21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爱国主义？无非以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历史工作者必须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作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姊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嘴，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概念。

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的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成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出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

分析也不有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是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让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的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

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以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些了。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给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触，还要跟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陈伯达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做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1966 年

必须组织和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

毛泽东

1966.00.00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

关于重新印发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2.06

彭真同志：

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毛泽东

1966.02.08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真说要对左派“整风”）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与毛远新的谈话（三）

毛泽东

1966.02.18

（当谈到军事工程学院先搞两、三年，然后搞两年半工半读，并结合预分配时。）

理、工科还要有自己的语言，六年中先搞三年试试看，不一定急于搞两年。尖端科学搞三年也许行，要有针对性。三年不够将来再补一点。有针对性才能少而精，有针对性才能一般和特殊相结合。六年改三年，这样作以后，步骤稳妥，方向对头。

新事物干它几年，不断总结经验才行。

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语言，要读一点书。但是也有共性，光读书不行。黄埔军校就读半年，毕业后当一年兵，出了不少人材。改成陆军大学以后，结果出来尽打败仗，作我们的俘虏。

理工科我是不懂的，医科我多少懂一点。你要听眼科大夫说话，神乎其神，但人总有一个整体。

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按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三千年历史，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尖端理论，包括通过实践证明了的、有用的基础理论中，要去掉通过实践证明没有用的和不合理的部分。

讲原子物理，只讲坂田模型就可以了，不要从丹麦学派玻尔理论开始。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坂田都用辩证法，你们为什么不用？

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医学先讲心理学，讲神经系统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应该先讲解剖学。数学本来是从物理模型中抽出来的，现在就不会把数学联系到物理模型来讲，反而把它进一步抽象化了。

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2.19

任重同志：

此件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二十五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二十五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得不大好。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

毛泽东

1966.03.12

少奇同志：

三月十一日信收到。小计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的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五、七、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林乎加二同志去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似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也只有大约七十人左右去到那里开一个七天至十天的现场会。是否可行，亦请斟酌。

医务人员应加强马列主义学习

毛泽东

1966.03.12

（在看了一名医学科学工作者谈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文章后，说：）

应该加强医务人员的马列主义的学习，并用以指导业务工作。既然军事上证明了所谓弱者可以打败强者，没有念过书或念过很少书的可以打败黄埔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生，医务界为什么例外？医学校也要加强马列主义课程，好多毕业生就是不懂马列主义。血吸虫病的检查与治疗应该免费。过去医务人员就是不接近群众、不相信群众。消灭钉螺的办法，还不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写的那首诗内说：“华佗无奈小虫何”。今后要在医务界大力地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

××没有吃苦，应该锻炼。有的人是不赶不下去的，有的人是赶还不下去。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3.17

江青：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6.03.20

关于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

苏联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了。苏联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打，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

（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还发不发贺电？）

发还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改变了过去苏区的政策。这个政策是灵的，正确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

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自然科学史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范老是帝王派，对帝王派将相很感兴趣，反对青年研究历史，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林彪：这是阶级斗争。）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现在全国二十八个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林彪：报纸是一件大事情，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区注意一下，报纸、文艺各方面都要管。

尹×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各报都应当转载。尹×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翦伯赞等人。

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

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写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写等于学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听、写为主。至于写史，到工作时再说。不要只读死东西，不搞应用。我们解放军的军长、师长，对宋朝、明朝、尧舜不知道，同样打胜仗。读《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他那样打仗的。（林彪：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是简单一些，按实际情况办事。）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戚本禹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全集呢！（林彪：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改了就好，不改也不要紧。还是尹×讲得对。尹×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朱德：打倒那些权威。陈伯达：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谁融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陈伯达：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你死，他就夭折了。）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工业体制问题

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在南京，我和江渭清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斗争武器。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归市，扯不清。

（刘少奇：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员太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

现在要做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

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周：要搞机械化。）先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鸣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周：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彭真：上海用机器支援农村，由非法变合

法。）是非法要承认合法，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变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派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皇、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彭真：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上就是工业党。）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什么××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三个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只生产精神。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央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个人、一粒粮、一颗子弹，只有来源于你们的实践经验，根据你们打胜仗打败仗的经验，出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周：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要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老产品带新产品。）（林彪：老带新，这是中国的道路。）这好象抗战时期带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彭真：小钢厂有四千个，给中央统光了。）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彭真：明年搞个办法。）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周：现在搞农业机械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那就叫八机部的×××去当厂长嘛！

有的对农民实在挖得苦，江西一担粮收税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

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统死。（刘少奇：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你用战争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么？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面无权管。（陶铸：中央也无权呀！）现在我们允许闹独立性。你对官僚主义就闹嘛！要象戚本禹等人那样闹独立性，对错误的东西闹独立性，你宣传部长不要压嘛！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众运动，让学生鸣放。我赞成挖他们的墙角，包括挖部长的墙角。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角。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没有读过呢！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林彪：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林彪：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

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林彪：这些人只想专政。）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判得好，把大是大非讲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谴责

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

把农业机械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与康生等谈话纪要

毛泽东

1966.03.28－30

毛两次找康生谈话，又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批判五人小组（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的《关于学术讨论汇报提纲》，即所谓“二月提纲”。并说：“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又批评彭真：“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并要彭真对叫许立群打电话给杨永直的事，向上海市委道歉，毛最后说：“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对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的指示

毛泽东

1966.04.00

这方面的革命（指文化大革命）要靠青年，党中央号召你们青年要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你们青年批判到那里，党中央就支持到那里。

关于中国是否会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

1966.04.00

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当权派的问题，一是出，一是不出；一是早出，一是晚出。还是早出好；搞好了可能不出，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

书记处也是分化的，彭、陆、杨、谭、罗等都当过书记处书记，是不断分化，合乎辩证法。有人怕得要死。不分化是主观愿望。中央有，各省也会有。

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4.14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学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

毛泽东

1966. 04. 22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的很广泛，涉及面很宽。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

在党中央各部门，包括大区、各省市，朝里是否那么干净？我不相信。

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4.23

此件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关于彭真的谈话

毛泽东

1966. 04. 29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大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地。“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赞成鲁迅的意见，经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侮你。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同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在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时的谈话（摘要）

毛泽东

1966.05.05

（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毛在会见时说）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毛又说：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5.07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

毛泽东

1966.06.00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在同学中取消保皇派这个名词。

七律：有所思

毛泽东
1966. 06. 00

正是神都有事时，
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
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
故国人民有所思。

关于播发《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6.01

康生、伯达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谈话（节录）

（未经审阅）

毛泽东

毛：自古以来，总是没有经验的人民打胜有经验的军队；没有枪的打胜有枪的；很少的人打胜很多的人。你们不也是这样？八月革命时你们有多少人？

胡：党员共有五千多人，没有多少军队。

毛：你们的军队开始恐怕只有几百人，以后有千把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你不是在帮我们的忙吗。那时，我们工人、农民有几千万人，组织在工会、农民协会里。农民有农民自卫队，工人有纠察队。可是没有准备敌人杀人。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四个月工夫，一扫而光。跟印尼现在的情况差不多。五万党员剩下一万不到，十个人中只剩下两个。另外的四万那里去了？一批被杀了；一批投降了；一大批不干了，吓破了胆，不敢活动，离开了党。只有八、九千人继续干。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七搞八搞，搞了十年，打了一部分败仗，多数是打胜仗。军队发展到三十万，包括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但是，在十年中遇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是瞿秋白；第二次是李立三、向忠发；第三次是王明。结果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当时，我们这些人被赶出军队。我是一次被“开除”党；三次被赶出军队。其实是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有谣言说被开除出党，成为民主人士。我是井冈山的书记、地区的特委书记，支部也不能参加了。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整我，后来又说师长可以当。就是这样，当了半年多的民主人士。后来搞清了，没有开除出党，又当起党代表，当起政治委员了。那是一九二八年。他们说，我犯的错误，第一是烧房子烧得少了；第二是杀人杀得少了；第三是话讲错了，我为什么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们到处发通知，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什么枪杆子里还能出政权。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

胡：天下无奇不有。

毛：你有这套经验吗？你是一帆风顺，开始就当党的领导者。

胡：你说得对，我是一帆风顺，没有遭受过反对。

毛：你有马克思保佑。你的马克思主义比我多。

胡：我不承认。

毛：为什么人家不反对你？

胡：我们是党小、国家小、军队小。党和军队的其他领导人年纪都比我小，这也是个原因。

毛：你是老资格了，也有一个坏处，你没有受过挫折，没有经验。

胡：对。

毛：所有的人都叫你“万岁”。我这点跟你不同。

胡：正因为这样，你的经验多。

毛：许多次是把我打倒。有一次是在江西，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打胜了，却说我犯了错误，一贯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丝毫的马列主义。有丝毫也好，丝毫都没有。他们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路线。说我打仗也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应该打大城市，我不打。如象说你们现在不打大城市也是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你打，人家一攻，又得退出。现在你们这八十万敌人，能机动的不过二十万人而已；其他六十万，要守公路、机场、海港和大小城市。就在这一点上，你们会胜利的。

胡。向你报告，现在我们在西贡周围有几个营。

毛：但不要去打西贡、岘港。其他省城也暂时不占。占了人家来恢复，又得跑出来。

胡：现在我们有一种特工部队，到市内去打美国大使馆、打飞机场的就是这种部队。我们不准备现在就去打大城市。

毛：这个好。偶然进去一下又出来好，如象打岘港那样。因为有你们的人作内应，铁丝网、壕坑等都有人破坏。搞几百人进去，突然袭击；外面打炮。几个钟头后，几百人又出来。这样好。以前我们也打过很多次。一些小城打进去了，可以收集很多资料，有敌人的报纸、图书馆；也可以扩大兵源，几天内扩大几千人。如象我们打过江西的吉安。我们有三万人，敌人只有一个旅，几千人。我们住了十天，就扩大了一、两万军队。以后，我们还打过福建的漳州。是我同林彪去的。歼灭敌人一个师，得了许多武器、弹药；还得了陈嘉庚的许多胶鞋，他是新加坡华侨大资本家，做橡胶生意的；也得了一批马列主义的书。国民党为什么会有马列主义的书呢？他们的图书馆里也有，是为了研究我们用的。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还有世界经济地理、社会发展史、德波林的历史哲学等。

毛：德波林这个人我很熟悉。斯大林批评他是孟塞维克。他不同意斯大林，也不同意列宁开创了哲学的新阶段。当他八十岁以后，赫鲁晓夫发给他勋章。这一两年才死去的。以前批评德波林的人，现在又成了修正主义者，如米定、尤金、罗森塔尔等人。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比你们的河内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The division of one into two）。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什么是我的发明呢？明明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的。列宁不讲辩证法的三个原则。“对立统一”、“ 质量互变” 、“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抄黑格尔的，主要是恩格斯抄的，列宁就不抄。他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但要解释和发挥。他没有来得及解释和发挥。我们是遵守列宁的原则，不搞三个原则。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原则，搞了个四个原则，叫做“联系”、“质量互

变”，“发展”、“对立统一”。我们也不听斯大林说的；我们相信列宁。我不过是遵守他的指示加以解释和发挥。按照这条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列宁虽料到会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反对派，但他的办法是不杀人。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四年，掌握政权不到八年的时间，列宁死了。在这段时间中，他主要搞理论去了。工会工作做了一点，不多。农民工作根本没有做，农民运动的纲领都没有搞。十月革命时，临时用民粹派的纲领作为布尔塞维克的纲领。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开会时，列宁说，对这个纲领不要讨论太多。民粹派对自己的纲领是不能执行的，提出“到民间去”，也走不通。以后民粹派成了富农的代言人。

你们以前说犯了错误，土改不应该搞左了，人杀多了。我看是杀少了。你们出了《人文》、《佳品》。你们怕群众搞示威，向我们要催泪瓦斯。《人文》、《佳品》不过就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胡：现在中国的四个省正在帮助越南的七个省，如广东帮助我们的广宁省等。

毛：帮助些什么？

胡：帮助搞农业生产、水利、改良稻种、牛种，还帮助办小型发电厂、小工厂，搞改良农具等等。

毛：你们的炼钢厂搞起来了吗？

胡：已开始投入生产。敌机也已开始在附近轰炸。

毛：年产钢多少？

胡：很少，还没有轧钢设备。

毛：你们那里有煤矿、铁矿吗？铁砂从那里去的？从中国去吗？

胡：越南有煤、有铁。中国也去一点。

毛：没有钢，没有机械工业，国家就没有整套的工业。

胡：可能你还记得，是我在见你后，在你的鼓舞下，才建钢厂的。

毛：我最关心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

胡：我们太原钢厂的设备和专家都是中国的。

毛：可以从小型开始，逐步发展。有个什么十几年，就可以搞成。小型轧钢机可以从中国弄去，炼钢可以采用新的技术。我们已经开始搞用氧气炼钢。有些新技术也可以从中国弄去。初步，不要搞急了，搞多了，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一年搞了一千七百个基本建设项目。搞了几年不行，然后缩小下来，变成七百多个。你看，减了一千个，有的已经搞成了，没有搞成的基建单位，就象癞痢头一样。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可惜你没有到锦州去看看。那里搞了许多小工业。没有资金，干部、工人每人凑一点，没有钱盖房子，就搭个草棚。现在出了许多新产品。有些大工厂，很落后，比如鞍钢，有十六万工人，年产五、六百万吨钢，但它有落后的一面。上海也……［此后原稿有缺页］

毛：……陈独秀，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共七年的时间；后来他跑了，跑到托派那里去了。第二朝瞿秋白，他是“左”的，只搞了三，四个月。我刚才说的把我赶出政治局，有人造谣说我被开除出党，当了民主人士，也是这个时候。第三朝，李立三、向忠发，搞了几个月，“左”得很，要打大城市。第四朝是王明，他的时间最长，统治了四年之久。他没有到根据地去过，但他的人马去了。五个根据地都有他派去的人；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他的人；彭真就是执行王明路线的。第五朝是张闻天。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是国民党的人。

胡：过去他们参加过国民党？

毛：在第一次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那个不算。我也参加过，是党要我们参加的。对他们，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只是一种怀疑。他们都有一个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胡：他们被国民党收买了吗？

毛：彭真被国民党抓过，怎么出来的，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他们混进党内这么久没有看出来呢？他们的错误我们发觉过，如彭真在延安办党校就犯过错误。在晋察冀时也犯过错误，现在才揭发出来，过去不知道。聂荣臻知道，他是晋察冀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也是晋察冀的。彭真到晋察冀不到两年时间，执行王明路线。这个时候的王明路线同十年内战时不同，十年内战时王明路线是“左”的，主张打大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王明路线是右的，是投降主义。后来，王明也跑了，去莫斯科，是我们送去的。他现在还用假名字写文章骂我们。此外，跑了的还有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现在香港当美国特务。在井冈山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接替我的政委，后勤部长，也都叛了党，跑到国民党方面去了。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自首书。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路线）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王明被捕后也成了叛徒。他被捕了几次，怎样放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在东北，他被日本人抓过；在上海，被蒋介石抓过，然后放出来。饶漱石在新四军时被抓过，怎么放出来的不清楚。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

胡：留下来不是危险得很么？

毛：就是危险得很。但不到一定的机会，他们不自己暴露，我们不整他们。如彭德怀，历次犯错误，我们只是批评批评，但他记仇。抗美援朝时，他当了司令员，回国后又当了七年国防部长。他拉走了几个将军呀？将军、文官被他拉走的不到十个人。我们党这五朝，领袖都不好，革命失败了嘛。两次大失败：一九二七年陈独秀领导时革命大失败；一九三四年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五千人，还不是失败吗？但党并没有消灭，军队还有两万五千人，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又变成了一百万人。这时，我们有了经验了。经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我们有了经验，使我们能够作出总结了。所以，要感谢这些人教育了我们。首先要感谢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第二要感谢右倾机会主义者、“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否则。单单靠马克思主义是教育不了我们的。

毛：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 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

康生：无官不贪，官与贪是分不开的。

毛：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分好多界，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美术界、雕刻界；戏剧界又分京戏和几百种地方戏。

毛：今天，我只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心里有事，要见你这胡伯伯。我打听你几点钟睡，知道你五点钟起床，好，我七点见你。前天我睡了八个小时，昨天睡了八个小时，今天睡两个小时够了。夏天，有时我几天不睡觉。庐山会议时，我没有睡觉，讲了话之后，去游水，回来又讲，是整彭德怀。现在，主要是看大字报；报纸上也很热闹。大字报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你可以到浙江大学去看一看嘛，晚上，化装去，戴上口罩去看一看嘛；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胡：一九五七年时我也在中国看过大字报。

毛：没有这一次深入、广泛。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胡：中国有的，越南也有。中国搞的，越南也要搞，虽然越南的规模要小一些。越南的情况同中国 是一样的。

毛：可能都是一样。你们也有小学、中学、大学教师，这些人还不都是旧知识分子。党内的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种人都有。我们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入党的。他们没有经过什么风浪，没有经过斗争，其中好的也有，坏的也有。

胡：所以有矛盾。

毛：就是有矛盾，我同很多人有矛盾。

胡：从你谈的历史情况来看，问题真是复杂 。

毛：斗争很复杂，但党并没有灭亡。

胡：听了毛主席、刘主席等同志的谈话，我吸取了一些经验，也比过去更加担忧了。

毛：一方面要担忧，一方面要乐观。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出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

我就不信。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还有斯大林一代。斯大林没有料到，他死了之后，赫鲁晓夫反对他，而且反得那样不近…… ［未完，原稿缺页］

关于暂不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6.30

少奇、小平同志：

来电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王任重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扩成为廿条左右。因为十二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廿一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值得参考。

对中央负责人的讲话

毛泽东

1966.07.00

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的。

（有人讲，几个少先队员给他爸爸贴大字报，说爸爸忘了过去，没有给他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他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赏。毛叫陈伯达转告这些小朋友：）

大字报写得好。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给江青的信

毛泽东

1966.07.08

江青：

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以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yao， 左“山”右“尧”］［yao， 左“山”右“尧”］者易折，［jiao， 左“白”右“敫”］［jiao， 左“白”右“敫”］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

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畅游长江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66.07.16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

关于撤工作组的讲话

毛泽东

1966.07.21

开两天会，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主要讲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前几天讲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也烂了，《人民日报》也不好。“六·一”公布大字报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得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也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师生。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只有依靠他们搞。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昨天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我也不行。现在无非是搞革命，一是斗坏人，二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权威，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然后集中起来。

工作组改成联络员或是叫顾问，你们讲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牵引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们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是怕字当头，怕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有乱的地方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南京大学三次大辩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叫讲话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你叫革命的师生一点毛病没有？搞一、二个月一点感性知识都没有？你去就是叫围吗？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受锻炼。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书年年编不出来，我看可以去繁就简，错误的去掉，加来不及了，加要加中央社论和通知，那个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条。如：处理广播学院打人，哪本书上有？哪个将军打仗还翻书？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方向转过来。

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赞可以被右派用，也可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但不能集中，象中华书局那样。可搞个训练班，活字典，只要不是民愤极大的。代表会，革命委员会都要有个对立面，常委就不能要了。

除你（李雪峰），那个市委，人员不要多，多了他们就要“革命”。打电话，出表报。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部长很多人都有秘书，统统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没

有。市委机关可搞个收发。你夫人（不知指谁）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国务院的部有的可改为科，庞大机关，历来没有用。

有些人不想想，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出来后，有些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么可靠？有些部、报馆是谁掌握呀！我回北京四天后还倾向保现成的，许多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文件要马上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骂人、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斗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讲话

毛泽东

1966.07.22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事。学校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斗和改，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我们能斗能改吗？象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依靠本校、本单位，不能依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改成为联络员？改成顾问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员。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的。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派人。那样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们不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的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又是无名小将，说不清，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比较好，没有阻挡学生到中央来。（康生插话：南京搞了三次大辩论：第一次辩论新华日报是不是革命的；第二次辩论江苏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辩论的结果江苏省委还是革命的；第三次辩论匡亚明是否戴高帽子游街。）在学校，革命的是多数，不革命的是少数。匡亚明是不是要戴高帽子游街，辩论的结果自然就清楚了。

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到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今天要搞文件，就不去了。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倾话的。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话，就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左派挨右派打，锻炼左派。派去工作组六个月不行，一年也不行，还是那里人行。一是斗，二是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材半年改过来不行，要首先删繁就简，错误的、重复的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王××插话：砍掉三分之二，学毛主席语录。）政治教材，中央指示、报纸社论是群众的指南，不能当做教条。打人的问题，通知上没写也不行，这是方向、是指南，赶快把方针定下来，改过来。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和左派，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有右派参加也不要紧，有用的，可以当反面教员。右派也不要集中起来。北京市委不要那么多人，人多了就要打电话，发号施令。秘书统统砍掉。我在前委的时候有个秘书叫项北，以后撤退的时候，就没有秘书了。有个收发文件的就够了。（康生插话：主席谈了四件事：一是改组北京市委，照办了。二是改组中宣部，也照办了。三是取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照办了。四是有一些部改成科，没有办。）是啊！部长管事的可以不改，称部长、司长、处

长。不管事的就改，改成冶金科、煤炭科（有人插话：北大进行四次大辩论。“六·一八”事件是否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说是，因为里边有流氓；有的说不是，工作组有错误。附中有四十多人要提出撤销工作组长张承先的职务。）有许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包括张承先在内。不要随便捕人。什么叫现行反革命？无非是杀人、放火、放毒，这些人可以捕，写反动标语的暂时不捕，树立个对立面，斗了再说。

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词语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7.25

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化同志：

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批评团中央“三胡”

毛泽东

1966.08.00

有人讲团中央“三胡”糊里糊涂。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什么糊里糊涂？团中央不但不支持学生群众运动，反而镇压学生群众运动，应严格处理。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毛泽东

1966.08.00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毛泽东

1966.08.01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6.08.04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许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
1966.08.05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加写的批注

毛泽东

1966.08.05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在中央接待站接见群众时的讲话

毛泽东

1966.08.10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6.08.12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对陈伯达、康生关于李雪峰不再兼任北京市委书记请示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8.15

林、周、陶、刘、邓、雪峰同志阅，请林主持开会谈一下。雪峰市委暂时似可名义上不动，实际工作交与吴德主持，需要华北局支持时去支持一下，似较好，请酌。

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上同林彪的谈话

毛泽东

1966.08.18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

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上同彭小蒙的谈话

毛泽东

1966.08.18

毛：陆平现在干什么？

彭：陆平在北大扫地。

毛：陆平只能扫地，就象我一样，我到了你们学校也只能扫扫地，别的干不来。我是你们的勤务员。张承先也是个坏人，把你们“红旗”拆散了。你们要把“红旗”拉起来。你们发展了多少人呢？

彭：有发展了。

毛：这就对头了。

彭：主席身体好不好？

毛：我身体很好。我在长江里游泳，有个青年同志肝痛了，我就上来了，要不然可以游三、四个小时。

彭：下一步怎么办？

毛：你们一斗二批三改，按十六条办事。会不会游泳？

彭：才学会，游得不好，很乱。只会游十几米。

毛：那不叫游泳，那叫闲庭信步。（这时毛作了闲庭信步的样子）你要能这样，就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了。你们老怕别人批评。马克思主义就是压出来的。经风雨，发展兴旺起来。

江青：不能让她老出风头，要让她谦虚。

毛：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要让人家干革命嘛！

对薄一波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8.21

印发常委、文革小组及薄一波同志。

请一波同志将一个请求和一个设想，先用书面告我，然后谈话，可以缩短谈的时间。你是一个爱讲长话的人，我有点害怕听三四小时那样的长话。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6.08.23

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做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对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像就照像，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在章士钊反映被抄家情况来信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8.30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对傅连暲来信的批语毛泽东

1966.09.03

送陶铸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9.07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对四位美国专家的一张大字报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9.08

林彪、总理、陈毅、陶铸、伯达五同志：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对署名“奥地利《红旗》的同志”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9.09

退陈毅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好，值得一切住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附件：

送主席审查：

陈毅

署名“奥地利《红旗》的同志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读到关于红卫兵支持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报导，我们非常赞赏。以你们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智慧为基础的这一历史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致力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但是我们认为因此更有必要提醒你们注意，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在维也纳的商代表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是极不相称的。从他们衣着看来，很难（即使说不可能的话）把他们同蒋介石走狗区别开来。精制的西绸衬衫和高价的西服同先进工人代表的身份很不相称的。这些代表们不仅占有一辆而且是两辆列尔来得——奔驰牌汽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标志），难道真有必要吗？由于这一鲜明对比而引起维也纳人的窃窃私语和嘲讽，使我们听了很痛苦，这样的资产阶级，不仅损害了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且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我们尊敬地并且迫切地要求，你们把这种事情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致以同志的致意。

奥地利《红旗》的同志

对中央关于国庆节挂象、抬像办法和口号的通知稿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9.10

陶铸同志：

标语、口号太多，是烦琐哲学，要大精简，各有十几条就够了，至多总共不要超过三十条。多了，谁也不记得，不看作一回事了。请再议削，印出交来。

对刘少奇《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的批语

毛泽东

1966.09.14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关于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的指示

毛泽东

1966.10.00

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组成排、连、营、团、师。编好的，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同志和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伐。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的革命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与各大区领导的一段谈话

毛泽东

1966.10.00

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接见在京部队时的指示

毛泽东

1966.10.13

下次接见，采取阅兵式的办法。不管多少人，解放军要统统地包下来。经过训练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到全国各地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人人要会唱，我也要会唱。

对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批语

毛泽东

1966. 10. 24

即送陈伯达同志。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

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6.10.24

毛说：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

毛问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刘答：回去看看再说。）毛说：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的。

（毛问周恩来会议情况，周说：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毛问李井泉：廖志高怎么样？（李答：开始不大通，会后一段较好。）毛说：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毛问李先念：你们今天会开得怎样？（李答：财经学院说，他们明天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毛说：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李说：明天我要出国。）毛说：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

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说：大权旁落。）毛说：这是我敌意大权旁落。现在到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一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遵义会议以后，中

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没改。（周恩来插话：李立三思想上没有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康生说：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毛说：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志们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闹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十七天会，有好处，象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思想工作。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讲阶级斗争熄灭论了，一九三九年又搞肃反，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的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锋，还有一个李范五。

真正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周恩来说：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聂元梓现在怎么样？（康生说：还是要保。李先念说：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对！

（谈到大串联问题时，周恩来说：需要有准备地进行。）要什么准备，走到那里没饭吃？

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以后，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也认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6.10.25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理解了。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级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

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在讨论工矿十条和农村十条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66.11.00

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第七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时对一些负责人的谈话

毛泽东

1966.11.10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学校师生的谈话

毛泽东

1966.12.00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

关于不要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等的批语

毛泽东

1966. 12. 25

关锋同志：

都不要引用。

对李雪峰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的批语

毛泽东

1966.12.26

伯达同志：

此件不知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都有没有？请你们议一议，此件是否是正确的，是否有发给各地作参考之用的价值？因为各地很多同志至今还没有如实地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的决心，极有帮助他们的必要，你看如何？

1967 年

按照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毛泽东

1967.00.00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必须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毛泽东

1967.00.00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

1967.00.00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毛泽东

1967.00.00

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

毛泽东

1967.00.00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要节约闹革命

毛泽东

1967.00.00

要节约闹革命。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人民解放军和干部的大多数

毛泽东

1967.00.00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毛泽东

1967.01.00

一、 我认为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前有后。

二、 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叉开。

三、 现在国际上帝、修、反正在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继续大搞反华活动。如苏联在镇压学生，新疆边境飞机活动多了，地面部队也在调动。凡是前线的大军区部队要有警惕，要有所准备。如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军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要稍推一下。将来一定要搞的，顾大局。

对张春桥上海来电请示夺权问题的答复

毛泽东

1967.01.00

如果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

关于夺权问题

毛泽东

1967.01.00

毛问周恩来：夺权怎么样？公安局是夺权机关。

周：才夺一天多。

毛：要抓典型。

周：市局开了会，夺权有几种形式：干部是当权派。（一）是黑帮，影响很深程度的黑帮。（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承认错误，但还有严重错误。（五）有个别一般错误（这种人数较多）。

毛：前两种面要划小，孤立打击极少数，接管本身就是革命。建立新的，根据不同情况也有五种形式：（一）全部改组（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二）接管后对当权派不同形式处理，边检讨边工作，监督留用（根据指示工作）。（三）停职留用。（四）撤职留用。（五）撤职查办。

周：那种办法好。一边斗争，一边留用，有了对立面可以壮大队伍。把许多面压在身上也很被动（指造反派）。留用，一边斗争一边工作。科学院左派队伍壮大了，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很好。让那些当权派扫街，扫完睡大觉，太便宜他们了，便宜事都叫他们办了，不要把自己队伍流于事务之中（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要拿大权，监督他们，一个单位几个战斗队，观点不同不奇怪，有事商量比不商量好。

毛：接管是个大事情，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动，是个革命。要解决接管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接管办公，遇到问题怎么处理要有具体政策（局、科、部、科员怎么办）。现在夺了权，也许还会夺走，有的单位夺过来夺过去，是个锻炼。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左派力量小时，夺权少，夺过去很快又被夺走。左派要壮大。我支持夺权。夺权后要抓革命促生产。

关于外国友人参加文革的指示

毛泽东

1967.01.00

外国朋友中真正革命的可以参加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

毛泽东

1967.01.00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周恩来传达）

毛泽东

1967.01.00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是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可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地在这次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持左派，然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之下搞好工作。

三、夺权后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在中央常委会上的四点指示

毛泽东

1967.01.00

（1） 大家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要进行自我批评，引火烧身。

（2） 大家要挺身而出，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被戴高帽子，抹了黑脸的，洗洗脸继续上班工作。

（3） 从长远利益出发，团结多数。牛鬼蛇神就是地、富、反、坏、右，是少数。有些人就是犯了严重错误，也得挽救他，使他改过自新，不然怎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呢？

（4） 说服干部，使干部懂得不要人人过关，都搞得灰溜溜的。两个挺身而出，不能躲躲闪闪，怕字当头。敢字当头，再大的问题也能解决。怕字当头，价钱越来越高。

对刘少奇关于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要他去公开检查的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1.06

总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

毛泽东

1967.01.08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有什么人出。文汇、解放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

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的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市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得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〇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

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工作岗位上，让群众监督）。

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青时《共产党宣言》都未看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关于陶铸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

1967.01.08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

毛泽东

1967.01.09

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仅仅有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没有机关干部起来积极投入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去，是不成功的。有好多重要问题，就是依靠机关来揭露的。

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1.10

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

（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四点指示（张春桥传达）

毛泽东

1967.01.17 传达

（1）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2）要抓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责任是在造反派身上，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3）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4）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一定要朴素。

张春桥还说：毛主席在元旦祝酒时说：“祝你们明年过社会主义关。”

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1.21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到北京研究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1.21

总理：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

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

在延边自治州党委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去电制止冲突报告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1.21

总理：

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毛远新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

关于广播系统夺权的谈话

毛泽东

1967.01.23

听说中央电台的革命派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争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团结。和反对自己的人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内部有分裂，应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不同意见可以商量解决。

对军委八条命令稿和中央通知稿的几段批语

毛泽东

1967.01.26，02.03

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

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关于接管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

1967.01.26

接管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这个政府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来的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保留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1.27

总理：

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1.30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在《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写的一段话

毛泽东

1967.01.30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关于斗争方式方法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

1967.02.00

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高风格。北京街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哪有那么多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搞喷气式飞机，照象片、登报，贴在大街上让外国记者搞走了。现在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水平太低。八月初也没有这么凶嘛！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将来他们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题摆出来，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主要是政治上的斗臭。

关于实行大联合的谈话

毛泽东

1967.02.00

目前斗争形势很好，成绩很大，经验很多，全国都在前进中。革命派在优势情况下，可以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实行大联合。要注意保守势力把革命派吃掉。不要用解散组织的办法实行大联合。

文化大革命是发动广大群众揭发黑暗面的一种方式

毛泽东

1967.02.00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对《郑州日报》问题的批示

1967.02.00

准备查封军管，时机宜迟几天，让骂解放军的多骂几天，然后左、右两派各派数人来谈。

关于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一封信

毛泽东

1967.02.01

恩来同志：

最近以来，许多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起不了教育人的目的。这里我顺便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坚持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才能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应当分析武斗的大多数是党内一小撮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起的，他们有意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党的政策，降低党的威信。凡动手打人应依法处之。请你转告给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关于应说服红卫兵让王任重就医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2.02

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

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
（速记草稿，未经本人审阅）
毛泽东
1967.02.03

毛：我这个人是不大行的，你们同志们也知道。你们看看，中国搞得这么乱，没有搞好嘛。现在天下大乱。什么时候谢胡同志到中国来的呀？

周恩来：去年五月。

毛：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两条道路，两个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胜利，还是无产阶级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我也说，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一九六二年，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比如十七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他们一个集团，我们把他整下去了。这是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然后是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这个集团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 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卡：受毛泽东同志指示写的。

毛：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

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

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比如象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把罗瑞卿的问题处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是去年五月。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八月。你们有人不是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吗？谁人去见的呀？

卡：什图拉同志。

毛：她在去年五月二十五号写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到六月一号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这一下大字报就满天飞了！

巴：大字报就发出信号。

毛：也不是我写的，是聂元梓她们七个人写的。红卫兵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两处搞起来的，他们有一篇材料给我看到了。到了八月一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就大搞起来了。八月十八号我接见了红卫兵几十万人。接着八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就开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自己才写了一张二百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某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搞白色恐怖。这才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一个《人民日报》（中央机关报），就不听我的。《人民日报》是夺了两次权的，第一次是去年六月一号；第二次是最近一月份。过去我公开声明，我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也说，我不看你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人，大概可以分这么几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赞成；实际上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入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党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干部，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甚至更高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中央委员，这么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其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了，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

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以后他们进了学校，甚至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等，顶多有百分之五。那么，七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三千五百万人。他们也分散，分到各个乡村、各个城市、各个街道。如果三千五百万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

巴：尽管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军队。

毛：他是灭亡的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方人里顶多有几十万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农村、各学校、各机关。所以，大字报一出来，群众运动一出来，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吓得要死。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也搞得很乱，又是什么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毛泽东主义，我就不喜欢这个“主义”，就不喜欢这个“ism”。

周恩来：我们说就是将来也用毛泽东思想，这也是一个体系嘛。

毛：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保留一个Teacher，我是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

进过大学，你们都进过大学吧？

卡：一个都没有。

毛：马克思是大学生，列宁是大学生，斯大林读了中学，我也是只读了中学。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险，这些人将来就是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希望，斗得厉害。

毛：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

毛：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的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去过。

毛：“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

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 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

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打倒肖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但是，有一条真理永远是真理，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

巴：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虽然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一点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

巴：工作上可以犯错误，可以改呀。

毛：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我们都是斯巴达克，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压迫，组织共产党。

（注：这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中央办公厅印发的记录稿。）

在西藏军区党委一份电报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2.07

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

有些问题处理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

另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

对《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2.09

有一些修改。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张春桥二月二十四日传达毛泽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时的谈话

1967.02.12—18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向是好的。

你上次去的时候（安亭事件时），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百万工人了，工人组织将近一百万了，这就说明上海工人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

你们那个时候，学生不是都到码头吗？那现在这些学生是不是还在码头啊？（张、姚：当我们陪卡博同志到码头去的时候，我们还是碰到很多学生在那里。）很好！

这一场革命，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发动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

（张、姚谈到：我们一个大学生刚刚毕业，有的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我看当一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学校很复杂，你是在一个学校里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全校的情况也不大了解。

有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当然罗，周谷城再教书恐怕不行了吧！看哪些人还行呀？

我们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走的。只要我们善于引导，他们（指小资产阶级）也会跟着我们走的。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单位，连副科长都不要。这种副科长都不要的人，这种人搞不了几天的。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即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名称，是一个词，好象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

名称不宜改得太多。还有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如现在有人不喜欢那个“长”啊，都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有点象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子，王莽皇帝下诏书都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那么下诏书他就要写上，譬如咸阳是陕西一个县，改成祁酉，诏书里就写上“祁酉即咸阳”，把老名称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主要经验是巴黎公社、苏维埃。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咱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改名字了。

（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国号问题。是否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来这个问题，紧跟着改。不但出来这个问题，如大小都要改，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问题？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入在那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那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党呢？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里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这是十六条所规定的。

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啊！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啊？你们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想几个办法，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仍用“人民公社”）这个办法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不是很孤立吗？现在又不可以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一登，全国都要叫。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上面的问题，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承认不承认的问题。第三个办法，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了。可以早一些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些时候吧！你们怎么样？能不能说得通啊？

张春桥二月十九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传达的毛泽东指示

1967.02.12—16

一、 三结合问题

夺权一定要三结合。福建问题不大，贵州问题也不大。内蒙问题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群众，百分之二十七是部队，百分之二十是机关干部。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上海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要把所有的部长都取消，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这是谁搞的？现在都不愿叫×××长，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是还有长的，要看内容。

湖南有一个口号："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要改变"，这是反动口号。

二、 关于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你吗？苏联就可能不承认，英法倒可能承认。改了以后，驻各国大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它地方都不准搞人民公社。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是改成市委和市人委。

（上海）人民公社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手软了一些，有人向我告状，公安局前门进后门出。

学校的权力机构可为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三、关于中央文革紧急指示（指一月三十日就炮轰张春桥问题给上海红革会的电报）我看了，写得很好，有造反的气派。最后一点说"将采取必要措施。"这一次炮轰张春桥大会开的话，一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抓人。

四、 有几笔帐以后还要算：

1. 市人委机关向总理的勒令；
2. 红革会问题；
3. 广革会反对电台军管；
4. 龙华机场反对军管。

五、 其它：

1. 现在用得很多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这是一九二〇年讲的，自己也记不住了，以后不要用了。

2. 以后不要提"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马列主义的。现在我们的斗争方式要高明一些，不要、不能老是"砸狗头"、"打倒×××"。我看大学生应该研究一下，选几段写些文章批判。

4. 文艺界也要回原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

5. 文汇报搞得很好，很同意他们对斗争里弄干部的观点。我支持他们。

二、三、四月份是夺权的决战时刻。当前有四大任务：1. 夺权；2 . 抓革命，促生产；3. 镇反；4. 内部整风（整思想、整作风、整组织）。

要搞三结合，对于革命的领导干部不结合要犯很大错误，要走到反面去。

《论共产党员修养》是欺人之谈，对资产阶级有利，要好好批判。

对王明昆关于成立“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情况汇报的批语

毛泽东

1967. 02. 14

林彪、恩来同志：

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

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两所中学军训经验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2.14

林彪同志：

请派人去调查一下，这两校军训的经验是否属实？核实后，可以写一1000字左右的总结，发到全国参考。又大专学校也要作一个总结，发往全国。请酌。

对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大、中学开展军训的两个总结报告的两条批语

毛泽东

1967.02.19－03.23

林彪同志：

（一）此两件应即转发全国。

（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时间四小时。

（三）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二十天。以上请酌办。都不要发表。各地经验已超过北京。我的批语也有些不适应新情况。因此都不宜发表。

关于了解广东省委领导干部情况等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2.24

总理：

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区梦觉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黄永胜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

关于要注意反革命复辟现象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2.28

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对报纸的指示

毛泽东

1967.03.00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报纸上有三个不够：调查得不够，揭露得不够，批判得不够。

关于“三相信、三依靠”的谈话

毛泽东

1967.03.00

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指林彪三月二十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 依靠群众。这一条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机关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作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哪一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 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从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与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一条，组织性纪律性强，动作快。如沈阳军区的支左、支工、支农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动作很慢。

三、 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

毛泽东

1967.03.00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3.03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可印发军级会议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的批语和修改

毛泽东

1967.03.07

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或民兵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3.07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关于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程序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3.10

各省、市亦宜照此办理。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熟，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关于《毛泽东选集》注释问题的批示

毛泽东

1967.03.16

一、 注释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

注释修改，要费很多时间，现在没有时间。

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不好，可以不收。

三、《整顿党的作风》中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没有必要，可以删去。

四、新印《毛选》仍用原来日期。

五、《毛选》五六两卷一年以后再说，现在你们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

六、《语录》第二百0八页引用刘少奇的一段也删去；另二百0四页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

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3.19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此事请研究酌处为盼！

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

1967.04.00

一、 我们这些干部是经过长期锻炼的，还是要有些人站出来。现在的情况是：站出来就打。我们的事情总是要有人挂帅的。红卫兵能挂帅吗？今天上台，明天就会被打倒，原因是政治上不成熟。现在我们要做很多工作，使那些主要干部站出来，那怕是黎元洪式的人物也是好的，出来两年也好。红卫兵不行，没有经过锻炼，这样大的事情，信不过他们。

二、 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是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让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委书记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三、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谢富治四月二十九日传达的毛泽东关于干部联系群众的谈话

1967.04.00

（三结合）要有群众参加。十八年了，我们脱离了群众。四九、五〇、五一、五二年群众欢迎我们。那个时候干部吃住很简单，吃小米子，住帐蓬。进城后搞薪金制，群众就不欢迎我们了。不要看不起年青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做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三结合，老中小要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五二年以后群众对我们冷淡了，过去党团员受到《修养》的影响脱离了群众，没有独立的意见，成了驯服工具。各地群众不赞成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过半年或一年以后再恢复。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对干部，而且也是对党团员的大审查。通过审查，大多数一定是好的。有的干部，群众意见较大，可过二、三年以后再说工作，有些干部可以立即恢复工作。五二年以后我们党脱离了群众，群众不欢迎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改变我们脱离群众的问题。对于犯错误的人，要给改正的机会。“联动”要放出来，没有右派就没有左派。搞薪金制，搞军衔我从来就反对。

在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决定稿中加写的一段话

毛泽东

1967.04.01

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接见谢富治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67.04.19

我祝贺你，祝贺这次大会成功，（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请代向北京市的革命造反派祝贺。

致敬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宣言，说不要写宣言了。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产，不然会造成脱离群众的。要半官半民。北京的形势还有反复，无政府主义就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不怕犯错误。各种反动观点的群众组织，他们是极少数的。就是反动的组织，也要做工作，但是还得斗争。

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

毛泽东

1967.04.20

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

（现在号召斗、批、改，有人屁股坐不住）毛说：要学生坐得住，要到夏天。

对《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材料的几段批语

毛泽东

1967.04.23

林彪、恩来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

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

关于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等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4.23

林彪、恩来同志：

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4.23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在“五一”和“五一”的前两天召开的中央常委、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毛泽东

1967.04.29 - 05.01

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脱离马列主义。

我们党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蓬。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听我的话。刘少奇、高岗、彭德怀学习了苏联那一套。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变过来。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作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

对江西军区文件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5.00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同志：

江西军区与群众对立情绪为什么越来越激烈？江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三个省军区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对，也值得研究。

对上海市革委会的指示

毛泽东

1967.05.00

一、这次双方都有经验，这股风不会刮得很大，我们要遵守“八条”，解放军得遵守“十条”。

二、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办法是否好，同志们可以提出来。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67.05.01

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曾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利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提醒人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衷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也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拿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林彪同志插话：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群众在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我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是一个不考试的考试，谁能紧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我总说对毛泽东思想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讯号。这个信号一出来后，遭到了彭真等坚决反对。因为敌人是特别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所以我在中央常委会主持制定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已明显的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有很多人仍然是不通的。李井泉就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自己。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一九六六年十、十一、十二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挑开了党内的矛盾。由对这一路线的批判，启发了许多革命派的革命激情。这里边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这是符合革命发展规律的。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骨干，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全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工农兵是具体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

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是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好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一月风暴就是上海工人搞起来的，随着全国工农兵起来了。广大工农一起来，才较彻底地冲垮了资产阶级那一套，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不得不退居到从属的地位，不是吗？工人一起来就冲垮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这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大联合三结合，这可算做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这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是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说明的，××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彼此打得好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七年来，文化教育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出现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增强随时防修、反修

的能力。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既然叫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大家不是主张灭资兴无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很多有利条件，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是能够被消灭的，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能够被打倒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能够被改造的，打倒有利于改造。今后老干部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做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的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以自己的话说出来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一个培养问题，不应在他们犯有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做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只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做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以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的反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

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应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在“五一”节中南海晚会上的谈话

毛泽东

1967.05.01

毛听到江青介绍京剧一团有人被打的事后，问：“现在还打不打了。”答：“现在我们都团结一致了。”

毛说：“不打了，好！”

毛还问了谭富英一些老演员的情况。

在演唱中，毛问：“现在还有没有反二簧，反西皮？”演员们说：“在革命现代戏中，反二簧，反西皮可不可以用？”毛说“我看可以用。”

在庆祝“五一”活动中的谈话

毛泽东

1967.05.01

毛对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说：“我们还是有困难的。中国是有希望的，世界是有希望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大批判，大斗争，尽快实现三结合。（有人谈到象“九评”那样批判《修养》。）毛说：“不要写长文章，两千字就够了，不要超过三千。”

我们今天是老、中、小相结合的大会。（这时向朱德）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中年的四、五十岁了，广场上是小将。今天的大会是个大联合。

我们看干部要从历史上全面地看干部。今天除刘、邓、陶之外，其他的都来了。各省第一书记都要回去，还是要作工作，江华、江渭清、谭启龙不是三反分子。陈丕显思想上，作风上蜕化，应很好改造。廖承志过关了没有？应让他过关。王震不是三反分子，是个粗人，建议谭震林同志去拜访他。余秋里讲假话，谷牧三六年被捕过，比较困难一些。

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对老帅的一些历史一点也不懂。有人找我摸底，我说：“所有老帅统统打倒怎么办？你们来做行吗？”打倒谭震林，今天还不是在这里开会吗？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徐说：“我身体不好，请肖华代替我工作。”）还是你搞吧！

邓和刘有区别，邓历史上闹独立王国，不理我，在中央书记处还临阵脱逃，以后反王明路线是我一派的。

刘少奇二五年被捕过，后来被人保出来了，住在北京。刘少奇一条路线，一个理论，一个班子。六人小组，谣言很多，完全是造谣。

“联动”大部分是好的，少数不好，有什么要紧啦！全都让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他们不是承认了错误吗？不是改得很快吗？

毛在天安门上与王震握手，说：“王胡子，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有人要打倒你，能打倒吗？是打不倒的吧！你对打倒你的人要宽大嘛，宽大嘛！”

关于大批判的谈话

毛泽东

1967.05.02

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调查清楚，批判才有力量，否则就会一风吹。引他（指刘少奇）的话不能只顾头不顾尾。批判要站得住。

“托拉斯”这个名词，不能一概驳，主要驳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些旧名词要赋予新的意义。

“驯服工具论”要批判，但也要有无产阶级纪律。服从、团结，那是有条件的。

今年形势好，布、粮还是要抓。社论要搞快一些。

批判文章文字要短。一、二千字，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明了就行，不能超过三千字。长了没有人看，看了也记不清。

彭、罗、陆、杨可以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他人称“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文章中提，在标题上不要提。

对《（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加写的两段话

毛泽东

1967.05.07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5.07

林彪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供各地参考。

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天至十四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州的较好。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以上，请酌定。

在山东省军区关于山东地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的报告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5.07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请阅。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

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54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八·一五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诸同志共同商处。

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5.10

此件送总理阅后，交文革小组一阅，退林彪同志存。

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这是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未到济南时学生、工人们表现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

关于甘肃实行军管和成立省革委会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5.14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冼、詹大南诸同志商处。胡继宗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

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5.14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区分，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的一段修改

毛泽东

1967.05.18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对黄永胜与“广州工联”造反派座谈时讲话摘要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5.23

林彪、恩来同志，并告文革小组：

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作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如同意，请酌处。

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5.27

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对一些高干子弟参与抄家一事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5.28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5.29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对八三四一部队支工工作的指示

毛泽东

1967.06.00

1．下去后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

2．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

3．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的生活，组织个医疗组，给他们看病。

关于对外宣传的指示

毛泽东

1967.06.00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不要失去原理。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把“光焰无际”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所以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

关于意识形态方面容易出修正主义的谈话

毛泽东

1967.06.00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钻进了无产阶级内部。

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关于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的文化革命运动搞好的一段话

毛泽东

1967.06.08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搞地下斗争，而是武装斗争。

就是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是光明的，那世界就有希望，没什么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傅崇碧传达毛泽东关于逐步实现大联合，恢复党组织的谈话

1967.07.00 初

开快车要翻车，要听打招呼。当前主要搞好大联合、三结合。坏人挖出来，牛鬼蛇神挖出来。党组织恢复，各级党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我看要到明年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有疲劳的感觉，不要想脱身。

关于“八一”建军节的指示

毛泽东

1967.07.00

“八一”不能改，这是很重要的一天。我们打响了第一枪，为井冈山的斗争揭开了序幕。

这个问题是历史问题，历史问题是不容颠倒的。

教育要彻底改革

毛泽东

1967.07.00 初

（大学斗批改）一种可能是彻底翻身，一种可能是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就看能否在下阶段打硬仗了。

斗批就是破，改就是立。这次教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否则是改良，和过去一样，到后来是改不下去的。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67.07—09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在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时，毛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在谈到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时，毛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

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了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派。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上月左右。

毛还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在视察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关于制止建造毛泽东塑像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7.05

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关于派部队制止赣州武斗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7.06

林彪、恩来同志：

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

接见某会议全体人员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67.07.07

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两年另八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要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

1967.07.07

我个人觉得目前存在这样一个苗头，就是放弃对敌人斗争，对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在这儿座谈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应该上纲，这个纲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这个矛盾不集中，很分散，这样就难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67.07.13

不要怕闹，闹得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闹清楚。不管怎么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也是不好的。

全国大闹不可能。那里有脓包，有细菌，总要爆发的。

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第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

（张春桥：有人讲第三派是走第三条道路的。）

哪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呀！人家要大联合，大批判，你要诱导嘛！

关于军队支左的谈话
1967.07.15（康生传达）

支左有很大好处，就是使军队本身受到教育，他们会从实际斗争中体会到这个问题。支左不仅支革命群众，支左派组织，不但看到社会各方面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也能看到军队里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要看到阶级斗争也反映到军队里边，军队通过支左，把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从而更加提高我们军队的思想水平，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

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中所加的一段话

毛泽东

1967.07.25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中央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毛泽东

1967.07.25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康生传达关于山西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传达时关锋在场）
1967.07.28

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六十九军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谢富治传达毛泽东关于更进一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谈话

1967.08.00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必快结束，而是更深入、更大规模开展起来。更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宣传十一中全会，要好好讲成绩，讲方向，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不仅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打倒。这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打倒修正主义，他们就要搞复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向前看，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不能把我们军队搞乱了，解放军内部有问题，可以一个省一个省地来谈判。

要把斗争矛头指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毛泽东

1967.08.00

在这一场伟大的斗争中，一定要把矛头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些钻进党内居领导地位，他们是一些牛鬼蛇神和支持者和包庇者。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常常以马列主义的词句做幌子，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更加阴险得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注意奖励坚持生产、作出成绩的职工

毛泽东

1967.08.00

凡是坚持下井，坚持生产，作出成绩的职工，不论属于那个群众组织或者未参加组织，都应当给予表扬和适当奖励。

对张际春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问题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8.04

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素描的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的道路。

对《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的几段批语

毛泽东

1967.08.20，28

文元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题目似可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小题目不要。此外，有些地方似太简略，宜于加以发挥。但文章已不短，再加或显得太长。究应如何，可与你的写作班子同志们一商，他们可能提出些好的意见。

看过，极好。我只改了几个字，加了一段话，是否妥当，请酌定。建议在北京发表，前一天广播，以便同北京在同一天在全国各报发表。还要先送北京，在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以三四天时间加以讨论。如有好的意见，加以吸收。

还宜在二三个月写几篇批刘文章，你是否有时间担负起来。明后日拟和你一谈。

关于“五·一六”集团的谈话

毛泽东

1967.09.00

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革命学生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视察湖南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些讲话

（根据黎源、华国锋、章伯森传达记录整理）

毛泽东

1967.09.00

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多做自我批评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群众两派对立时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

（在谈到湘潭情况时说）这样多的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

（在谈到要正确对待干部时说）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过错误向群众做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对干部除投敌、叛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做过一些好事嘛！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侮辱。

（在谈到造反派要加强学习时说）对造反派也要进行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青年人不要性急，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不平等待人，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的情况搞乱了，把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乱了。

对林彪在国庆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9.29

退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气势磅礴，又扎实、不浮夸。是一篇一年斗争的总结文章。

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7.10.09

林彪、恩来同志阅后，退陈伯达同志办理。《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以什么机关为出版单位的问题，请在一次会议上商定。

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

毛泽东

1967.11.05

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

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可否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

各地对整党问题，有些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

不少地方的意见还没有反映上来，因为那里还乱着。

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

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

过去，一是听话（做驯服工具），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一个支部书记说了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同大家研究，不商量，不向大家征求意见。支部作决议是要征求党员意见的，一次不够，再征求，要让党员讲意见，征求一次不够再征求。但是过去有很多地方不是这样，是个死党，一塘死水。

过去青年人入团可困难啦，比入党更困难。党团组织被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支部书记就象个皇帝。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是这样，他把持全大队的党、政、财大权，搞贪污，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只有沙石峪是这样，我就不信。

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有些人二三十岁，年岁不大，暮气却很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一冲，病没有了，坐喷气式飞机，反而治好了他的病。现在到医院去的很少了，起了很大的变化。才不要都听医生的话，我多少年没量血压了，前几天发烧三十八度五，医生要听心脏，我不让听，吃两片药就好了。当然，有的人是真有病，如心脏病，要治。

我把李大夫放下去支工，可有点意思。他们到北京针织厂。去的时候我就交代了几条，一是先做调查研究，当群众的小学生；二是不轻易表态；三是推动工人群众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实行大联合。跑到一个地方就哇刺、哇刺干什么？那个厂有两派，斗得很厉害，开始两派都说他们搞阴谋，但他们顶住了，一直做调查研究。后来我说了几句话，就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救了他们，否则，人家要赶他们走。现在两派联合起来了。那个厂一个派一千二百多人，一派八百多人。八百人的一派说一千二百人的那派保得厉害。两派争位置，结果人多的一派采取高姿态，问题反而解决了，一派六个，一派七个，无派的出二人，共十五个人组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还有一些人去化工厂，这个厂比较复杂、知识分子多，去的人被围攻。人家出了一条标语，我们去的人乱加评论，讲错了话，结果被人家抓住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张本这个人，谁知道她历史有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搞出了很多问题，当然一次搞不干净，但搞出了不少。

我赞成康生同志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观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

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

怎样整党，你们拟出几条办法，也是征询意见性质，十一月能够发下去，十二月再发一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说要恢复组织生活，他们又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
这样的人都不要，就太多了，但要做检讨。有的人，不想当党员，就算了嘛。

接受新党员，要经过群众议一下。

党纲要修改。我在看联共党史，他们建党，建了几次。也不要象联共的党纲，写得太长。从政治经济学、商品二重性一直到剩余价值，写得很长，烦琐得很。我们党纲不要写得太长，长了看的人就很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农民怎么看？横直是废话，会一散，就完了。我们的党纲，就是党章上开头的那个总纲。

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做陈独秀、瞿秋白的驯服工具就是不行。八七会议我们反陈独秀时，就没有做陈独秀的驯服工具。

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就讲了三个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线正确，人家自然就会服从。打了胜仗以后，战士都高兴，对领导上不讲闲话，打了败仗，闲话就多。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最好，打开锦州的时候，那么多苹果一个没动，这纪律就是建立在为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解放军战士也有个别犯纪律的，不是绝对的。

现在报上都讲好的，内部情况报导困难多，才不要相信。我就不相信天下都黑了。

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经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两件事：

关于九大，第一批反映材料综合一下，通报下去。

关于整党，整个什么样的党，老党员怎样一分为二，新党员入党，恢复组织生活又不要恢复老样子，这些问题怎么办，搞几条办法出来。

废除级别问题，也要谈一谈。

（注： 这是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戚本禹记录稿。）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的谈话

毛泽东

1967.11.05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关于对浙大“红暴”应以联合为原则的批语

毛泽东

1967.11.22

林彪、恩来同志阅。

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

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等的批语

毛泽东

1967.12.17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 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 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 我们不要题字。

（六） 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1968 年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

毛泽东

1968.00.00 （初）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毛泽东

1968.00.00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确立无产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统治。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关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段话

毛泽东

1968.00.00（夏）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关于徐州两派群众组织要大联合的几条意见

毛泽东

1968—1969

徐州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大联合。

徐州已经翻了几个个了，再也不能翻个了。

一派不灵，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

讲明政策，多数人是能接受的。

论述文化大革命“必要性”的一段话

毛泽东

1968.00.00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毛泽东

1968.00.00（上半年）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对北京大学一学生反映“伍豪启事”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68.01.16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江西省军区教育部队经验批示稿中加写的一段话

毛泽东

1968.02.10

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地方部队（独立师、团、营、连），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有责任帮助他们，犯过错误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有成绩的要宣扬他们的成绩，把他们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阶级兄弟。当然，首先要使自己弄正确。如果自己有错误还没有改正，那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在一年左右完成这个任务。

关于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

1968.03.00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8.03.30

总理、伯达同志：

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的一段话

毛泽东

1968.04.00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在中央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委会的批示稿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68.04.06

退周再阅。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请酌定。

机关工作人员要学点生产知识

毛泽东

1968.05.00

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太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

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

毛泽东

1968.05.08

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同林彪等人的一段谈话

毛泽东

1968.05.11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一段谈话

毛泽东

1968.05.20

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像个样子了。……还是你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一段谈话

毛泽东

1968.07.12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对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关于举办释放学生犯学习班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8.07.24

这样做很对。对犯罪者应当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

毛泽东

1968.07.28

毛：（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走进接见会场，毛站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都是年轻人！

（毛同黄作珍握手）你叫黄作珍？我还不认识，没有打死？

江青：好久不见了。

毛：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有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对聂）工人、学生这么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搞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

聂元梓：我们在门口摆开水供给……

温玉成、黄作珍：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是与农科院。他们骂我们是老保。

毛：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互相打了。

毛：北大抓黑手，这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不到三万人。

毛：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井冈山）、（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那几个反对谢富治的跑了。

谢：他的二把手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那是他们挑拨关系。他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

林彪：来嘛！

谢：去！去！（王大宾坐到毛身旁）

毛：坐下，坐下。

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时三百人，有时候一百五十人，哪像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是三万多。

林：天下大事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佛爷老窠」。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梳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在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大家都同意你下放，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代替你呢？

谭厚兰：都安排好了。

毛：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四·一四（师大）兵团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说没有自由了嘛。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按着辩证法，不要住在一个城里，就一分为二，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一个南，一个北，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窠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人家说了，不是有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说了。不过你以后要注意一点，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

江青：她有人保镖。

聂：没有。

毛：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那个娘家就是不好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姐姐不好是姐姐嘛，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有人报告找不到蒯大富）

蒯大富是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广播了，点名中说中央文革要找，请蒯大富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是他不肯来，还是出不来？

谢：我估计有人控制他。

姚文元：有可能。

毛：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人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没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保守派干了一架，是伯达同志派人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取得了胜利。

毛：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不要打架。韩爱晶，很会出主意啊，是个谋士啊，是不是韩信的后代？

康生：听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边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数极少了，武斗这批人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康：不是你说得那样吧！

毛：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团是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还要搞反夺权。别的学校也参与了，你（指韩），蒯大富都有份。

韩：我也参加了。

江：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

毛：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青人就是要作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两方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啥。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败家子。

毛：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那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林彪同志兵多，给你几千几万，可把“井冈山”通通消灭嘛。这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两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可容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聂元梓来，或者候汉卿来（北大井冈山头头之一）。

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炖羊肉」嘛？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卿，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只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年青人嘛！还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还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二年、

三年。我说，如果不行，要多长时候给多长时候，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还不是……

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我不是哲学家。

江：她是老佛爷。

毛：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周恩来：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你不要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林：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没有中学文凭，就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第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起加长了。

毛：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一些军事教练。

林：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几天就一目了然，百闻不如一见。

毛：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的。

林：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遵义会议的时候，跟××辩论，他问我「孙子兵法」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他也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是什么题目，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

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望一遍。

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米尔」就是兵法。这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亏了。学外文要赶年青的时候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分别问了每人，王大宾学俄文）学地质没有外文不行，还是学英文好！学外文要从小学学起。

韩：主席，文化革命完了，就叫我当兵去吧。

毛：当兵半年就够了。当那么长干什么？当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校就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还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算什么知识分子啊？算土包子。黄永胜同志，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一年半。

毛：你家是什么成份？

黄：算下中农。

毛：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

温：三年。

毛：你家是什么成份？

温：算贫农。

毛：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那么点学问，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

林：黄埔军校有个×××，蒋介石奖他一只表，后来在南京，打仗就是不行。

叶：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在世界上不被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

林：×××在南京军事学院，很多学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

毛：斗批走也是办法，是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现在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不要办，但要改变方法。学文学的要写点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的革命斗争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听说天派是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才弄出几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公安部只留下几十人，其余办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一定要打倒，匆匆忙忙的抓。人大三红总部不讲话，用个小战斗队的名义出大字报打倒谢富治，一去追究责任呢，就说「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他提出打倒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你们那点材料我看了，赵桂林怎么反革命呢？聂元梓，侯汉卿你们还没有提反革命吧？

聂：他们在社会上搞了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

毛：我们这些人诬蔑些也不要紧。牛辉林的纲也上得不好（北大井冈山的头头之一），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

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吧？

鞍钢有个审讯侦缉的案子，由群众办，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打人。由侦缉得来的材料不确切。

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这个人不认识几个人，就根据侦缉，能行吗？我们说学习群众，说一不要杀，二不要判刑太长，判他两年、三年算了。军队过去也关禁闭，现在有没有了？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禁闭取消了，逃兵不抓了。

毛：人家想逃，你抓回来干啥？斗批走，要走就算了。为什么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抓，不关禁闭，反而比过去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里抓了人就当俘虏，逼供信，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我看知识分子是不文明，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他们就不抓逃兵，不关禁闭。现在发明了一种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就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街」，但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

今天怎么样，以为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林：值得，损失最小。

周：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应采取欢迎的态度，你们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方法。

周：六六年下半年，去工厂串连，人家欢迎你们，就没有打你们。

毛：让他们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去的嘛。不是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工人阶级专政，专你们学校里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知名人士，你们要专学校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包括蒯司令在内。

现在还在搞串连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林：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还说什么中央开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北航开什么国防系统会议，开了没有？

韩：一吓没敢开。

周：不要开了。你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我为啥子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今天找你们来谈这事，使你们有准备啊！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搞多人都被动。

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天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找蒯大富也不算数，一定要让中央直接表态。除了开始管一下，后来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啊？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毛：群众就不要打内战。

林：你们脱离了工农兵。

毛：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广西烧了一千间屋子，还不让救火。

毛：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林：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韩：蒯大富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

康：不是你说得那种情况！

毛：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

周：广西佬躲在你北航。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毛：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韩：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打来电话，接待两个省革委会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说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开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之分，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质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批评已经下来了。

毛：你们对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二十三岁嘛！

江：在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上访，你们接待他们，作了很多工作。你们把他们藏起来，我们也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九·七」是谁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是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谢：是江青同志。

江：对师大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们做得出来！我听了就要流泪。他几百个、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韩：我错了。

毛：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世界上无政府主义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能消灭，这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是对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我对你们那个对立面并没有好感。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不是替他们说话，你们把他们放了吧！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是几十个反革命，也是年青人。绞死我，我不怕别人油炸，北大井冈山说要油炸江青。

姚：油炸也只是说一说。

毛：还有什么绞死蒯大富。

谢：牛辉林不好。

江：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点发言权没有？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了起来。我说过四·一四必胜吗？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是它是群众组织啊！我住的

地方你们都知道，要绞死就绞死，要油炸就油炸好了，我们都是一同患难过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治国平天下？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的。

毛：可以不提了。「杀牛、宰猴、火炖羊肉」。牛宰了干什么，可以耕田嘛！你们例举的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可以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讲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

江：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

周、叶群：是伊林、涤西吧。

毛：此外，北外六·一六领袖刘公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

谢：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你不要给我开脱错误，给我掩盖。抓也是我叫抓的，但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两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是弄几个钱，玩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

周、姚：不好，她的父母很坏，与伍修权搞在一块。

江：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中央文革的，但他们是群众组织。

毛：他们几千人是搞不掉的。北大井冈山几千人也搞不掉。有坏人自己揪，「杀牛、宰猴、炖羊肉」不要再提了。牛可耕田，猴宰它干什么？

江：我们对你们是有政治责任的。在政治上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你那下山的人都靠不住。你那井冈山大多数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上山，有自由。我们不勉强，不要污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犯过很多错误。你们初犯，也怪不得你们。

江：樊立勤怎么样？

聂：没搞他，他和彭言反革命集团搞在一起。

毛：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候汉卿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是研究生，他父亲在六三年投机倒把。

江：最坏的不是他们，他们是几个组织联合起来的。里边有坏人，外围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毛：这作风不好。

你们今天来了两个地派两个天派。地派支持清华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天派的保护蒯司令、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大将我们是清楚的，就是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它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五个。你们作了很多工作。不管你们工作有多少缺点错误，都要护着你们，你们工作也确实有很多困难。文化革命我没有经历过，你们也没有经历过。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打，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逍遥派，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谢：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主要责任在于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首都大专院校的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们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连，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连不对，不过你们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对我帮助很大。

毛：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一场大雨，就把打倒的大标语吹了。

毛：小孩子搞大字报纸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哩。中国人有个好处，有意见他要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连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连。砸三旧派在串连，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连。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连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连。你不让好人串连，坏人在串连。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的。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进来就大哭。毛站起来上前握手，江青笑了。蒯一边哭一边告状，说清华告急，黑手操纵工人进清华镇压学生，是大阴谋。

毛：你叫黄作珍，那里人？

黄：江西×都人。

毛：老表嘛，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同志讲话也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姚：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

毛：四个办法，是哪四种？

姚：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

周：去年开始。

毛：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大打，像四川一样。

江：败家子。

毛：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江：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你们也不想一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做做工作。

毛：他们忙啊！

周：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不要分派了。

江：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不要搞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教改搞不上去。

毛：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们也搞不上去，何况你们。这是旧制度害了你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的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吗。我看无非是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马克思搞哲学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你说创造党就这么容易？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普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一个拉萨尔，布朗基的所谓报告，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

现在我们来管这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点内战无关紧要嘛，所以四条中有一条要打就大打。

姚：我倾向有些学校斗批散，斗批走。

毛：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历史，写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教授，北大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

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但要删繁就简。

姚：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在北大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算我一个。

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

大学办得那么死，这个大学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现在是搞武斗。

毛：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不要大学生啦，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的有时还听我们一些，有的听，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毛：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去干涉，无产阶级去干涉。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

毛：你要合你胃口的，一定要六十三军，别的你又不要。三十八军可以不可以？如果井冈山三十八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六十三军。你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

江：聂元梓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你们欢迎三十八军行不行？

毛：去一半三十八军，一半六十三军。三十八军不像你们讲得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会就比较好，郑维山作了检讨。

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是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么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是坏，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指谭）的麻烦没有？

谭：没有，同学对他有意见。

毛：过去是有历史原因，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紧跟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主席今天语重心长。

陈：六六年上半年比较好，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搞革命风暴是对的。现在脑子膨胀了，自以为了不得，想要统一天下。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毛：二十几岁嘛，不能轻视年青人。周瑜出身骑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江：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全闹浮肿病。

陈：你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对中央意见没有好好考虑、思索，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第一条是我官僚主义，一次未见你们。人家不要抓黑手，我还不会找你们哩。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不要说承认错误。

陈：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主席早就讲，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蒯大富，我们对你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的，你说你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要赶上去，你们没有看到运动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

毛：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二百多人，一年还不能压服。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了，怎么能征服呢？曹操用武力征服孙权，打了败仗。刘备要用武力征服孙权，失了街亭，打了败仗。司马懿要征服诸葛亮也不成，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郃剩了个马。

叶群：那是失街亭。

林：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多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你们脱离群众。

毛：工农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清华二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他们也是上了老虎的背，想下也没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当官作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没那回事，根本没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里去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支不少。

谢：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是否把他的枪给收回来？

韩：主席，我有一个要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很爱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很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了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都清楚了。

陈：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不要老是批评。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多中心。都是中心就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

江：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几次，你就一直没给很好表个态。

毛：不要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毛：年青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像我年青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江：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

（蒯报告，井冈山总部陈育延是女同学，被工人抓了。）

陈育延出来没有？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

蒯：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你毫无办法。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家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

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像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四·一四思想不对嘛，井冈山、红旗飘中坏人多一些，聂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

聂：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搞串连，我也禁止不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

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我就上过井冈山，我不是说你的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谢：革命的井冈山！

江：不要把我搞得爱莫能助。

毛：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有。

毛：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周：韩爱晶，你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革委会开会不算数，只好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武斗这么多天，工人敲锣打鼓来，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大多数学生，脱离你们自己人。说你坏话的不少，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吴德：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毛：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

江：四·一四是骂我的。

毛：他们抬尸游行，他们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四·一四的头头）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还是要联合，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

江：现在你们五个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

毛：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斗批走，这就是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当然打内战是几个月。第四把工人撤出来，把枪都还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但大学没有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跳的。

江：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学问不是学校里学来的，林彪同志刚才不是讲了嘛！他的学问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军校学来的？黄永胜同志学了一年半，温玉成学了三年还是幸运的。温玉成，你是长岗人，也就认得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槽里怎么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

江：读那些厚本本，几十种。而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都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反而在外面，这样不好，井冈山统统到人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区别，分别对待。

韩：主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几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中国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剧混战的局面，怎么办？

毛：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什么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有毛泽东思想。

毛：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当然也不能保证，聂元梓，以她的哥哥、妹妹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聂元素我不清楚，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妹妹联系起来呢？

周：我的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送到卫戍区去了。

毛：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嘛。

毛：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韩爱晶过去就是提过这个问题，有林彪同志这个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我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姚：这个问题，主席已经讲过了。

周：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学得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著作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江：韩爱晶给我写几次信，讲这个问题，韩爱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一是脱离工农，二是脱离实际。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我们有几种死法，一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被细菌钻死，三是被火车、飞机砸死，四是我又爱游泳，被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是寿终正寝，还是细菌么！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姚：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我批评韩爱晶是悲观主义。

韩：一次总不能胜利，肯定有曲折，按辩证法。

毛：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前进总是曲折的。

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加写的一段话

毛泽东

1968.08.00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关于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驻军队院校的批语

毛泽东

1968.08.00

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对解放军报社两个座谈会情况简报的一条批语

毛泽东

1968.08.13

这两个座谈会所提出的意见，有很多都值得注意，应当采纳。他们的意见，无非是说，不应当关门办报，应当面向群众，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

为准备发表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

毛泽东

1968.08.31

此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送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调查报告，现在本刊发表。我们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

为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加写的一段话

毛泽东

1968.09.00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

毛泽东

1968.09.03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对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8.09.20

请林彪同志先看，我再看，然后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委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100多人就够了。

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

毛泽东

1968.09.30

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讲的两段话

毛泽东

1968.10.13

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

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8.10.13

会议大概开七天到十天，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形势问题：一个国内，一个国际。国内要总结上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两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十一中全会时我就说过，我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也打过招呼：不要认为会议通过了都能执行，在会上举手是一回事，真正闹意见是另外一回事。后来证明还是不理解，有的人出了问题。

有一位同志叫张鼎丞也没有发现有叛徒、特务、反革命问题，为什么没有来开会？是什么原因？邓老你是很熟悉的。（周恩来：大连会议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徐海东他们四个人，徐海东同高岗抱头痛哭，说中央亏待了他，没有他在陕北打胜仗，中央就站不住脚，这正是公布高岗当付主席的时候，他同高岗联盟有勾搭，值得审查。）

山东谭启龙，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错误。山东不谅解他，现在还不能解决问题。山东要揪他回去斗，我们不让。（周恩来：揪回去了，现在在济南。）山东的同志要作说服工作。

湖北张体学，是好同志犯了错误。回湖北检讨得好，群众就谅解了。群众都欢迎他。他还要检讨，群众说不要再检讨了。

王任重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湖南王延春，这个人不行了。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张云逸：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藉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来他历史上投敌叛变自首这一类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可以给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是找点工作。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工作也很难作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江华这个人，我是保过他的，许世友同志，你也是保过他的。霍世廉揭出他的问题，看样子不能保了，你还保吗？（许世友：主席说不能保，就不保了。）

有些事我看我们工作没做好。比如徐海问题，那里一个南京，一个济南，不怪两个军区，就是我们没作工作。现在办学习班，就好转了嘛。军队内部分成两派，野战军也分成两派。有几千人跑到南京，几千人跑到济南。要把人叫回来。（许世友：我有错误，没听主席的话。）

军队是可以讲清楚的。军队两派也好，三派也好，抓紧了就好解决。比如广西吧，也是两派。野战军地方军有两派。工作做好了，军队也就合作了。军队统一了，什么“4.22”也好，“联指”也好，军队问题解决了，群众问题很好解决。当时不是说要××吗？我说不要这个办法，我们出布告“7.3”、“7.24”布告。这是一个发明。过去也搞过十条、八条，也不在群众中宣传，群众也不知道。你不宣传，群众也不懂得。你怪谁呀？

也不办训练班，办训练班是从内蒙古开始的。内蒙两派那么对立，来北京办训练班，一个月就解决了问题。

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比如浙江问题，“红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也是一个工作问题。

徐海的“支派”，北跑济南，南跑南京上海，踢派搞一党政权。徐州一个“支派”一个“踢派”，还是军队不一致，两边都是共产党，共产党与共产党打架。可以作工作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福建问题很大。韩先楚你那里不是天下大乱吗？（韩先楚：现在形势很好。）看到了。你们的报告很好。工作一做，还不是解决了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怎么不能解决呢？

中央各部门，地方有二十九个单位，地方是徐州、保定、重庆，还有些问题，还得解决一下。

四川可打得厉害，双方都是几万人，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谁叫你搞“二月逆流”，一抓就是十万人？中国人多得很，四川也不少。你抓错放了就是了。你说问题不得解决吗？不是都放了吗？（张国华：还剩五百人，都是坏人。）你放了九万九千五百嘛，还不是自己搞错了，放了就是了。

要总结经验。过去南征北战，解放战争好打。秋风扫落叶，一扫三年半扫完了。那时候敌人是比较清楚的。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困难多，仗不好打。文化革命总比过去快一点。过去打了22年，从1927年到1949年，文化革命只打了两年半。

问题就是有思想错误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比如辽宁省三大派，打了八个月，天下大乱。不是解决了吗？还是能够清楚的。

自己要多负担些责任，使下面轻一点。主要是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内部也夹一些敌人，是少数，是做好工作的问题。

比如，浙江省的“红暴”派，说来北京观礼的人数少，自己跑来21人。“省联总”要把他们抓起来，用绳子捆回去。清华工宣队做了工作，这次工作做好了，双方做了自我批评，不争了。（周恩来：看了放焰火，都高兴地回去了。）浙江两派也是工作问题，不是别的。

你们把九大的问题先谈谈，在尾巴上另外再谈谈这方面问题。还有一个多中心论的问题。这是从总参谋部杨成武那里开始的，搞了一个“大树特树”，其实就是树他。

后来，北京学校都分成两派，都有武装，谁的话也不听。一个学校只能有一派，有两派的就多了一个。还不是多中心？工厂也分成两派，北京有例子，很多。

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一百二十万工人，掌握了局势。北京八十万工人，现在才掌握了形势，办法就是工人开进学校去。那里知识分子成堆。要掺砂子。他们是粘土板结了，不透气，不长庄稼。

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9．16”炮轰聂荣臻。这个机关里谁办的？七

机部也难办，听说有十万人，就有七万人是大学生。国防科委“9．16”他们炮轰

你，还是很客气的。还得开工人宣传队进去。有些地方，就用这个办法，开宣传队进去。

就讲这么一点。国际问题，以后有时间再讲。（向林彪）你讲一讲。

（林彪：主席讲得很多，总理讲得很多，我没有什么讲的。）

肖×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

×××呢？（周恩来：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

哪个是李德生？你们安徽的事件办得不错，你们整芜湖整的不错嘛！

（李德生：是主席批的“七·三”布告起了作用，是舆论造得好。）

就是要造舆论。好像一个发明，搞了几十年，不懂得造舆论。搞了几十年，就是造舆论嘛。不然那里能搞起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群众，哪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群众，没有军队，谁收你这个党？

现在到处分派，有“8．15”、“反到底”、“支派”、“踢派”。清华有“井冈山”、“4．14”；七机部有“9．15”、“9．16”。到处都有这些事情，我们开始也没有想到。南京三派，后来又冒出一个“红总”，势力那么大。

十一中全会讲，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他们就要武斗，不要文斗。一个学校两派斗，各有武器，一个工厂两派斗，两个中心，一个部也是两派斗。

基本群众还是工农兵，兵也是工农。然后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缺点是容易动摇，主要是没有和工农兵结合。

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可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军事院校，谁知道办了一百一十个，“1．1．1”。其中确实有“妖”。只怪我们

自己，办那么多干什么呀？又没人管，叶剑英你不是管吗？搞四清不行，还是统统开进工人，开进解放军去。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厂不整你们看，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得了？比如北京一个木材厂，有那么千把人，是两个资本家合起来的。有的厂三朝元老，有的四朝元老。还有新华印刷厂，北洋军阀时期它给印票子，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国民党接管的，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它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的是隐藏的反革命。我们的人也不得力，思想状态、精神状况也不好。隐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厂究竟是谁的呀？

按说农村要好一些，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的公社、大队，要好好抓一下。靠人民解放军、省地县革命委员会。有一个省组织了一百万人的宣传队，解放军只有几万，百分之九十是贫下中农。就是广东。江西也不错。江西是个中等省，两千二百万人，有的地方人太

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意见

毛泽东

1968.10.31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传抄稿）

毛泽东

1968.10.31

大家有什么意见？有意见就发表。我没有什么话说了，林总都讲了，同志们讲了很多。这次会议我看开得可以，开得很好嘛。是否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不了解，经过十八天比以前了解了。过去高级干部也不清楚，我们没有透风。过去各省来解决问题，也没有工夫来讲这些事情。在这次会上有犯错误的同志说明问题，同志们质问他答复。质问再答复，比较清楚了。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付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的，是公开讲的。两个大闹就是公开讲的嘛。有些细节，过去我也不太清楚。细节如来往多少次，有过什么交往，不要过分注意这些，不要把党内生活引到细微末节。不注意大问题就不好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说天就塌下来？！地球就不转了？！照样转，还能不转吗？！我倒是佩服邓老，一直顶住。要是我，就不理，结果你还是搞出一篇自我批评。他早就有自我批评了，比如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有自我批评了，有些老同志将来是否可以要工作，打倒的谭启龙、江渭清，过几年以后，大家气消了，也可以做点工作嘛。不作主要工作，×××、×××，身强力壮，将来总得给点事做吧！邓华来了吧？（邓站起来）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人说他不好，不晓得红卫兵又把他关起来了，你这个人跟彭德怀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在北京的有黄克诚、谭政。犯错误的人，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给他时间，直至多少年。因为群众还要看他的表现嘛。

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稳、准、狠嘛？稳，有右的，稳就不稳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过了火。重点就是“准”字。否则，不准，稳也稳不了，狠也狠不起来。要调查研究，要注重证据，不要搞挂黑牌子、喷气式，不要打人。我在1927年写了湖南一篇文章，对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其实几十年都不搞了。红卫兵就按那个办法逐步升级，挂黑牌子，搞喷气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对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调查研究，注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那一套。这样结果并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嘛。过去对敌人俘虏也不搞这一套。有些死不悔改的人，你整他，他也不悔改。冯友兰你不叫他搞唯心主义一套，我看也难。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24元，最多的给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在坐的范老，也是搞帝王将相，郭老也算一个吧。那时没有别的书看嘛，都是二十四史之类的。要反帝王将相，还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不然人家问你答不出来。我可不是劝你们在坐的人去搞帝王将相。你们还

是按总理讲的，按那几个文件去搞。我也不赞成青年学生去搞。少数人去搞。比如范老，你不搞，帝王将相不就绝种了？不是要再出帝王将相，而是历史要人去研究。

清理阶级队伍，对这些人你们要注意，有好的，中间的，极右的三种。我说的对右的，应当如何对待他们。世界上总有左中右。没有右，你左从哪里来呀？没有那么绝。统统是左派，我不赞成。哪有的事？那样纯也不见得。我们的党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看比较纯了。从来没有这样搞过。但太纯了也不太好。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各地把他们选作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派嘛。你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符合，可以协商嘛。有少数人参加有好处。

现在情况同两年前十一中全会时不同了，很大的不同了。运动还没有完，就是九大开过了，运动也不见得马上就完。因为这涉及到每个工厂、每个学校、机关。我今天就讲这么一点。

（毛在别的人讲了几句之后又讲：）

注意政策，注意稳准狠中的准字。总还有一些不那么准的，狠过了头的，也有太稳了狠不起来的。

比如上海同志讲，还存在有“老大难”的问题。几百万人的城市，不平衡状态哪里都存在，不平衡是自然现象，北京也是。

对学术权威不要搞得过分。

对老同志犯错误的，条件不那么符合，用协商的方法，选他们当“九大”的代表。一个代表大会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基本部分能反映工农兵意见就好了。你们谁有话，谁就讲。（当时李、朱、陈表态，略）滕代远搞湖南农民运动，你当什么县的委员长，叶得会就是在你手里杀掉的嘛。这个人是前清的翰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我看杀掉不那么妥当。你们各省都有，我总想找个机会给同志们讲讲，就这一次讲吧。

对大知识分子，要给他们出路。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受工农兵再教育。

还有×××，也是权威。这些人我们是保的。对这些人不要过分，会议上讲一讲。个别讲不行，报纸写社论也不行。一写他们就过关的。不批不行，批还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校长不一定当了，官不能作了，教授的头衔还得有，好领薪水。广东有个杨国荣、赵吉安这两位是尊孔夫子的。拥护孔子的，在坐的还有郭老。我看范老你基本上也是尊孔的。你那个书上还有孔子的像。冯友兰也是拥护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向孔夫子。不赞成说孔夫子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代表奴隶主的。我同郭老在这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我不赞成。范老把孔子也作为新兴阶级的代表。这是古董，我劝同志们不要研究这一套。

人家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不赞成。天津有个杨××说老子是唯心［物？］论者，我就注意了这个人，调查一下什么人。原来是个大右派。上海周谷城、刘大杰，刘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周写了中国通史。谈家祯是搞遗传学的，你们斗得很厉害吧？这个人是搞摩尔根学派，改了可以用，不改也可以。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家，全国也没有几个。苏步青，复旦大学教授，数学家，对这些资产阶级学者也不要太过分了，我讲的就是这一点。

清理阶级队伍，注意调查研究，注意准字。对老同志，一批二保三看。保就是帮助，看就是观察他的表现。我看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不能强迫人家改。地球照样转，胡弦不能拉得太紧了。对学术权威要注意，交给学生七斗八斗他就没命了。薪水扣了之后，有的只给20元，多的40元，他一家老小要吃饭嘛。我们无产阶级对旧社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还得养一批。

至于民主党派，有人提议不要，为甚不要？不如要一些好。因为问题决定不在民主党派，而在共产党里边。民主党派就是有问题也是第二位的。共产党不出刘邓陶之类，民主党派要造反也造不起来。与其要他秘密地搞，不如让他公开地搞。对政协、民主党派现在还没有取消。至于是否要，这次还来不及讨论。这次有人提不要，考虑一下，下次会议再议。要不要，你们考虑考虑。我们派出作工作的人，也不太好。比如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少数人研究帝王将相，为了反帝王将相，要搞一点。比如科学院、大学里等。关于大学开社会科学学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政治经济学、哲学、文学之类，这些东西十八、九年还没有解决，没有什么好结果。读四、五年大学，搞社会科学的不懂得马列主义，不懂阶级斗争，还不如劳动锻炼几年。先搞阶级斗争，再回去搞两年。大学还有两、三年，不是五年吗？已经两年了，再搞两三年就走光了。我相当赞成斗、批、走。总要走吧。这批大学生都到工农兵中去，这是帮助他们的方法。他们没做工，也没有种地，大学两年不招生让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

上海的同志有什么意见？还有北京的？

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看。上海工总司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会。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这次会，有年青的同志参加很好。但太少了，还有尉风英（尉站起来后问了年龄。）哪一位是刘殿英呀？（刘站起来）你多大年纪，（刘答：32岁）你好象是个军人，他还是青年嘛，年轻的是你们三位代表了，还有年轻的没有？（周恩来：还有青海的达洛38岁，藏族）你会讲汉语吗？（达洛站起来答：“会”），你是真藏族还是假藏族？（达洛答：真藏族）

新疆，我讲过你们那里团结起来，你们那里还有些问题。哪个是龙书金？（龙站起来）你还是我的老乡咧。还有王恩茂。你有些作法很笨，到飞机场搞欢迎那一套干嘛呀？结果搞的一派赞成，一派反对。总有人给你出主意，摇鹅毛扇子的。

还有陈永贵（陈立即站起来），你那个打扮还是农民的本色，大寨也有灾难，每天一万人参观，不影响粮食生产吗？（陈答：很好，对我们是个促进）

冼恒汉，广西佬吧？你认识韦国清吗？（冼答：不认识）你们都是红七军的吧，怎么不认识？（冼答：都是兵）不要老死不相往来。

青海的张××，久闻大名，未见其人。你在哪里？（张答：四川达县）多大年纪？（张答：52岁）没有那么大吧，虚报年龄。

不要认为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谁说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在坐开会的就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嘛，没有那回事。

不要以为中央出了个陈独秀，就没有好人了，陕西出了个高岗就没有好人了。共产党出了个陈独秀，认识他的人不少，总理认识吧？（周恩来：康老也认识。）将来写党史没有陈独秀的名字不好。开始是他，后来不好，他整个思想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党出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李立三、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

天、贺龙等人，就说我们党不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我看不能这样说。坏人是有的，开始不是以坏人面貌出现的。井冈山两个师长范××、杨××，还有两个团长都叛变了，有这么多叛变的，井冈山矮了一截吗？没有。我前几年去过，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那么高。

这次又清出了刘邓陶、彭罗陆杨这些人。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也有点区别。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我们这些人一举手还不容易！你们要开除，将来开除好了。我是有保留的。至于怕他造反，我看不要怕。他造不起来。邓小平的特点是太脱离群众了。我这个思想可能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给他讲几句好话。不过邓是摇鹅毛扇子的，真正决策的还是刘少奇。八大时搞招降纳叛，七大时审查代表，是刘少奇、彭真他们搞的。他们在延安召开了一个白区工作会议。

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节录）

毛泽东

1968.10.31

我就没有什么话讲了。林彪同志讲了那么多，同志们也都讲了很多。这一次会呀，我看是开得还可以，开得好嘛。特别是有些同志，特别是对于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就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十三号，（周恩来：今天是十八天。）十八天，就比较了解了。象高级干部都不大清楚，我们过去也没有通风。过去嘛，各省也都有人来，每省解决问题，也没有功夫来讲这些事情。在这个全会上，由于他们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又再说明他们的问题，又再质问，好象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就比较清楚了，每天都有简报。

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我们在北京的人看，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嘛，不同嘛，他要说嘛。要说嘛，就是要谈一谈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也是许可的了。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也不是完全不公开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什么？

（周恩来：京西宾馆。）

毛：京西宾馆嘛。他这个大闹嘛，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他没有什么秘密嘛。不过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倒是细节无须乎多过问，还是大纲节目要紧。那些细节呀，比如讲往来多少次呀，谈哪，在桌边上讲过一些什么小道消息呀，我看那些事情哪，倒是不需要那么着重。如果党内生活注意那些事情去了呢，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而把大问题呀反倒不大注意了，就不那么好罗。所以，我说嘛，事情是相当大一件事，不是一件小事。但是说是那样天就会跌下来呀，或者地球就不转了呀，我看也不一定。，地球还是照样转。你那六、七个人反对这个地球让它不转吗？

对于这一批人呀，请你们注意，在清理阶级队伍里头，对于学者，这个学者，无非是比较好的、中间派，比较右的这么三种。我现在着重讲的就是这个比较右的，我们怎么对待他们？这个世界上面，你总是左、中，右嘛，你没有右，你这个左那儿来的呀？为什么人长两只手呀？这个叫右手，这个叫左手。长一只不行吗？他就要长两只呀。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要那么纯，纯得那么很厉害呀。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我看是比较纯一些，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大好。你比如就讲九大嘛，九大代表，这个“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呀，我看就是个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你们在各地方把他们选举为代表。陈毅同志，我看了他讲话，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就是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对于我们那个条件，那个三条，第二条是不那么合。作为协商，有这么少数人参加呀，我看也有好处。

我主要就是这么几点，就是一个讲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注意调查研究，注意一个“准”字。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嘛，要一批二保还有三看嘛，是不是呀？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嘛，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嘛，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改，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这么几位有啥要紧啦，我看。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地球照样转。这个胡琴不要拉得太紧了。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速记稿。）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毛泽东

1968.11.04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对军委办事组转报的一份情况简报的批语

毛泽东

1968.11.14

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毛泽东

1968.12.00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中加写的两段话

毛泽东

1968.12.00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一段批语

毛泽东

1968.12.01

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1969 年

订计划要留有充分的余地

毛泽东

1969.00.00 年初

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

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

毛泽东

1969.00.00 年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

关于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

毛泽东

1969.00.00 年初

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

毛泽东

1969.00.00 年初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要认真总结经验

毛泽东

1969.00.00 年初

要认真总结经验。

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在一封要求选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来信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69.01.00

徒有虚名，都不适当。
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

关于不要批判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家属的批语

毛泽东

1969.01.03

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9.03.15

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是不行的。

（当汇报到珍宝岛地区敌炮击到我纵深七公里时）打进七公里有什么要紧，最好是打进七十公里、七百公里、七千公里。七千公里就打到郑州了。一个县一个团，战时就象割韭菜一样。苏修，要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打进来，进来就好了，我们就有理由了，“充足理由律”。打进来，地球照样转。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它也需要动员，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纪律不好，一个是要东西，一个是要女人，他们同国民党一样，他们的军队很穷，发一套衣服还是家里出钱。我们的衣服是国家发的，也是人民的，但是经过了国家征的，因此就比较公正了。这次会议要动员一下，请总理讲一讲，请总长也讲一讲，动员大家。

日本人打败了，就是国家小，没有根据地。另一方面，政府投降了。我们的领导机关被打掉了，下面要照常打。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苏联知道我们不会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林彪：今天的行动（指三月十五日苏联挑起武装冲突）是莫斯科指挥的，不是前面人指挥的。］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它们是要面子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我们有的人说：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应当改为我必自卫。人家犯我，我为什么不能犯人？无非是东西，坛坛罐罐打烂，把人消灭一半，地球还是照样转。

红卫兵打仗勇敢，红卫兵还是要称赞一下，他们还很活跃。凡是过去武斗比较厉害的学校，现在就转得比较好。对这些武斗的学生，军队不愿意要，地方也不愿意要。红卫兵不听话是个暂时现象，或者是有坏人指挥。红卫兵前期、后期，甚至于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后期之间有一个时间不听话，现在就好了。他们到军队里去，开始有的人不愿意出早操，后来比战士起得还早；开始有的人行军不愿背背包，现在不但愿意背，让他坐车也不坐了。……

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很多人，解放的人很少。无非是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
改？

内查外调，外调的人太多，关的人多了，外调的人就多，统统地把他们放了算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讲师不象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当然不是一个不关。教授、讲师、支部书记 （指行政干部）要分化，坏人总是少数。清华一个系，几十个人解放出来，工作都是听话的。坏人是极少数，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不要在学生中去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连一点也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他们因

为肚子里有气。有的今天讲了，明天就不讲了。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二月逆流不仅北京有，其他地区也有，因为你们还有个八条嘛！

政策不落实，不解放知识分子不行。北大也没有一个典型！叛徒，特务是否都要戴帽子，他们或许有严重历史问题。特务、叛徒无现行活动的，也可以戴，也可以不戴，等他造反的时候再给他戴嘛！坦白了是否要从宽，手里拿着帽子不戴，个别人戴，多数人不戴。一个人戴了右派的帽子，不但他自己难办，一家人也就不好办了。

北京到天津二百公里，风气同这里就不一样，关了不少人。学生都想走，成分好的搞专案，成分不好的没事干，都想走。

一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二是负责人要抓点，心中有数。

美国劳工党说我们没有批评越南、柬埔寨。

翦伯赞本是资产阶级，但与帝国主义不同。

打倒美、修、反，有人怕。

二月逆流不仅冲击了地方机关，也冲击了军队机关。那个时候，一时打倒这个，一时打倒那个，可多了，无非是说错了话嘛！

我们的部队这次很勇敢（指珍宝岛反击战），不怕死。

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都知道了。

报告上（指九大）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他们一肚子气，再加上一个三座门。只讲刘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现在与那个时候不同了，那时他们是公开发表的。

有些犯错误的，过一两年还是要解放他们，就是不让他们掌大权。

二中全会，（七届）就讲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刘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资产阶级。给了宋［Fei，上“非”，下“木”］卿很多钱，结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李德一个人有什么用，还不是有那么一些人捧他的场。这次会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二月逆流这些人选成“九大”代表，地球还不是照样转！ “天地悠长，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

就是这些。主要是落实政策问题 。反帝必反修，不反修反帝是不能胜利的。

（注：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记录稿。）

对新当选中委的基层干部的要求

毛泽东

1969. 04. 00

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

关于抓好典型和面上工作问题

毛泽东

1969. 04. 00

一定要抓好典型。

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9.04.01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恩来同志、伯承同志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呀，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同谢富治等的谈话

毛泽东

1969.04.05

第一、 历史问题：

在一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后，只讲合作，就不讲独立自主。讲国共合作，就不讲和国民党作斗争。有一个倾向问题。有时讲倾向，有时讲潮流。有时讲思潮，有时讲浪潮。在一个倾向下就蒙蔽许多人。只想到合作，没想到分裂。破裂了，一九二七年又来了一个倾向：只要工人农民，不要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其他党派就不行了。

教条主义主张，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小党派比国民党还坏。这就是还有欺骗性，不承认有第三势力。在这种势力下，又产生了“左”，其中也有右。这是十年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又来了一个高潮。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戴国民党的帽子。很多人不理解，想不通。其实我们是独立的。以后王明回来了，带来了国防路线，形“左”实右。（××插话，当时主席提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时彭德怀很坏，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很感兴趣，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在太行实行了土改，三起三落。）后来，马歇尔来了。搞三人小组，说什么和平。实际上他们是帮国民党、蒋介石的。我们就准备打。我们准备一段时间，其中的就是准备打。皖南事件，有人认为是主流，实际不是主流，主流是抗日。八年抗战我们没上当，有困难，也有斗争。全国胜利以后，请程潜到北京谈判，他怕把他整垮。我去接他，出他意料之外。我到北京只接过这样一个人。

一个时期总要有一个倾向，要掩盖另一个倾向，分裂中掩盖着联合，联合中掩盖着分裂。

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是赎买政策。没收资产阶级不会敲锣打鼓。赎买政策列宁早就提出来了，列宁逝世得早，在苏联没有实行。

第二、 落实政策。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事情都上纲很高。北京有个工厂，有八个人的专案组，说他们的厂长是狗特务。经过群众审查，这个厂长是好人。有些专案组我就不太相信。北大一万多人，抓了几百人。宣传队进驻以前，不交待任务，进驻以后，没总结经验，不找他汇报。北大三进三出，这样，对军队也不好嘛！63军就不要走了。这主要是领导不下去，层层听汇报，刘兴是63军政治部付主任，七个月来还没听他们汇报过一次。我原以为远的不好抓，没近的地方工作好做。但也不一定了，蒯大富下放以后，表现不错嘛！

现在不是讲对准刘邓一小撮吗？北大是否抓一小撮？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的都放走。教授、讲师、付教授手无寸铁，造不起反来，造反再抓嘛。

十六条第七个问题，我就只加了一句：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予依法处理外，其他一个不抓，一个不杀，一个

不关。有些专案组不分青红皂白，关人容易，放人难，就是怕人家说右倾。四二年延安整风时，不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么！周兴抓了很多人，不是都放了吗？但是很被动。重大特务案件，也是大部不抓，抓一两个就行了。右派分子不要随便戴帽子，帽子在我们手里，他要造反再戴嘛！戴帽子不是右派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家人的问题。为什么把他们推到敌人那里去呢？外调的太多了，收获不大。你关的人太多了，统统放出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过一两年也会好的嘛！聂元梓改了，就不错了嘛！

二月逆流几个干将，我就恨不起来。不是这几个嘛！其他地方也有的。有个别跳，他们是公开搞的，不是阴谋。他们反对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我和林彪同志。九大不要写上了，不象杨成武搞两面派。他们还是一肚子气呢。

每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资产阶级是否要搞反复呢？要一个工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一个公社、一个公社，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搞。搞的时候目标要小，要集中，要具体，抓典型。当然有个过程，关人才不是好办法呢。我们历来不赞成。军队有禁闭，现在还有没有？（答：没有了。）不见得。北京部队还有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讲讲自己，如实行对犯错误的人分配适当的工作。对延安整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少数人翻案，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是否有人翻案呢？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总是反对我们的。资产阶级人数虽少，但他们的能量很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分子。

第三、 准备打仗。

要准备打仗，东北、西北、华北都要准备。准备好了，不打也没有坏处嘛！要准备敌人飞机轰炸我们的原子反应堆。日本投降时，是他们没有根据地，国小。二是政府投降了。我们的领导都被他们打完了，但是我们下面的人还要打。

苏修兵很穷，纪律不好。苏军进东北时，纪律坏透了。苏修兵一年只发一套衣服，还要人家拿钱。他们一是要东西，二是要女人，三要面子。珍宝岛，他们炮打进我们后方七公里，我们不反击，给他面子。打进七十、七百、七千公里，到郑州才好呢。我们就有办法了。割韭菜，但不是拨韭菜。打起来，我们发动，他们也发动，但他们不会发动。红卫兵很勇敢，很听话，凡是过去学校打得厉害的，这些学校红卫兵就听话。这次分配工作，军队不要，工厂不要，地方也不要。到军队开始不会出早操，睡不起嘛！后来比谁都起得早。开始他们不肯背背包，训练一个时期体力也有了。

加强地方武装，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平时搞生产、搞训练，打起来编到野战军。义务兵打起仗来就来不及了。

在中共九大期间的讲话（二）

毛主席

1969.04.11

我们这个会，是这样小会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全体会议？

开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先通过不发表，好不好？

……

北京小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个问题在好多会议上讲了几次。

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有些地方搞得好一些，有些地方就差一些。不太准，扩大化。抓了一些人，不应抓的也抓起来了。群众起来了，多抓了一些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搞的，规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扩大化了，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为了开七大把两条路线搞清楚，我在大会上批评了犯错误的人。所以七大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过会后，确实团结了，胜利了，比中央苏区内战时期更加团结了。

中央苏区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头头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在当时情况下，犯错误也是难免的。因为那时候，要与国民党斗争。国民党政府杀人，我们拿起枪对付国民党，所以出现了“左”。七届四中全会后更左了。王明的《为中央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说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搞得更“左”，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那时候，他在莫斯科。红军有五十万，后来只剩三万，他就舒服了。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更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厉害。抗日时期，王明回过来搞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有一个情绪，国共合作，就不要独立自主了。王明从苏联回来了，就领导了这种投降主义情绪，犯了错误。国共合作的民主潮流掩盖了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根据地。

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现在有人说“整风是错误的”。将来还可能要出，不奇怪。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还在。那时也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也行。有的喊，有的不喊。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就不喊。（林彪：李维汉就不喊打倒土豪劣绅。）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有广大群众运动，土改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广东都有。过了一个时期，掩盖的矛盾突出了，蒋介石杀人，我们拿起枪干，当时没想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有的人跟着刘少奇在武汉缴枪投降，有的地方打败仗。南昌起义不知道到农村去。我们到乡下去，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因为城里呆不住，蒋介石要杀人。打起来了，一切都打了，资产阶级……工商业、小资本家都打倒，城市作坊也打倒……民主革命一句话，资产阶级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民族资本家。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路线。为什么不犯右倾路线而犯“左”倾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打仗。第二次国共合作出现了右倾。现在合作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

战线。不要独立自由，不要发动群众，不要军队，不要党的领导。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谈判。我在重庆时，刘少奇在延安党校作了一个报告说“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结果还向各地发了电报（董必武：我在重庆就没听说。×××：晋察冀在张家口传达了。黄永胜：听说给东北发了电报。林彪：东北也收到了电报。我们没有传达，发了一个电报说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是“内战的开始”。）谈判没有结束我就回来了，准备打仗。后来总理康老去了，写了个协议，签了字。这个协议算不算数呢？按道理说应该算数的，实际上没有算数。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也是胜利的大会。三年多蒋介石打败了。进城后又胜利地把许多人团结起来了，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后来查明是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薄一波、安子文与国民党有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天起就标志着社会主义开始，当时我们没有宣布，一直到土改后才宣布。有的地方土改不彻底，和平土改，当时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的。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公开和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但有些人在那里讲利用，不讲限制、改造。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不叫文化大革命，由历史做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管叫什么名字，总能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到机关、学校、工厂、农村……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要搞典型、搞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林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在北京抓了几个典型。）我管不了那么多，要你们抓。过去北京市委管不了，现在可以了。我只抓了典型，统统去管搞不过来。工厂、学校、机关都要搞典型。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单位去抓。（毛问黄永胜的清队工作）我们军队要谨慎。

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的专案组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交群众一查，不是特务是好人。搞专案的人搞材料不那末可靠。他们的观点搞得越多越好，象我们过去行军抓虱子，抓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翻案是不容易，要翻案是有领导错误，我不搞专案。

北京有个大学，九千多人，抓了九百多人，十分之一。把人家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就得讲个理由，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放我？有的推一推可以下去，拉一拉可以上来。有的关在牛棚里面扫厕所（问张春桥）×××干什么？（张答……）知识分子扫扫厕所是可以的。

王明写文章说我们不要知识分子。秦始皇焚书坑儒，杀了四百多人。我们没有杀，搞喷气式、戴帽子、游街、扫厕所，是一时现象。（康生：苏联报上登了彭真戴高帽子的照片。）戴高帽子是打土豪劣绅的，我在一篇文章里写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翻出来，又给戴上高帽子，土豪劣绅能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能戴高帽子？我们反对戴高帽子，反对戴黑牌，反对搞喷气式，反对乱抓人。抓了就要放，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各个时期，主要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使同志们彻底了解我党的历史经验，避免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屎急了，才挖坑。事先挖好坑的也是有的。

我们过去行军，到宿营地就挖茅厕。现在住了营房，茅房不搞一点是不行的。在老百姓那里住久了，群众会讨厌我们。我们这次“三支两军”，又使军队与群众的关系融洽了。你们说“三支两军”，外国人不懂。

搞形“左”实右，“左”是形式，掩盖了右的本质。

我提议几个老同志都选进去，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函、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王明大家不会选他了。王稼祥犯了错误，还是做了工作的。

在中共九大期间的讲话（三）

毛泽东

1969.04.13

康老建议学习《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

还有一个文件，在延安党代表大会上的一个报告，讲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讲民族民主统一战线。那时候刘少奇、彭真不赞成。过去几十年翻来复去犯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河南李维汉只讲一切联合，否认斗争。那时候一种倾向，既然同国民党联合，就不同他们进行斗争。同国民党斗争是不行的。如武汉那时候，我离开武汉去长沙，当时刘少奇、项英，只要联合，否认斗争。所以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代表就是蒋介石。汪精卫倒向反动阶级，也是倒下来的。党内也有被群众运动吓坏了，就是不敢提民主的口号。南昌暴动后城市呆不住，往乡下跑。这就是过去掩盖的一个矛盾。国共合作时掩盖的矛盾就突出来了。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这股风是正确的如国共合作。但这股风也有另外一风，就是不要独立自主，发动群众掩盖阶级斗争。现在反苏修不要掩盖苏联的广大工人、农民，引起反苏。中国过去对外国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好坏都反了，经过几十年直到共产党成立，才懂得了两种：一种是帝国主义统治阶级，是坏人，一种是劳动人民，是好人。南昌暴动，召开“八·七会议”清算陈独秀右倾错误，以后主要是“左”的错误。有些中间流派，可以联合也不联合。城市的小作坊不该没收的也没收了。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瞿秋白、李立三没搞几天，主要是王明。瞿秋白、李立三这两个人都是不成事的。最大三次，一次是陈独秀，一次是王明，一次是刘少奇，其他是局部的。

彭德怀、高、饶也都是局部的，他不以党中央的正确不正确，而看势力大小。他看四方面军力量大，一方面军力量小，所以另立中央。罗章龙就是湖南人。我对此人相当熟悉。也搞中央，不晓得为什么另立中央。不管当时中央有什么不好，有话可讲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吗？一个是张国焘，一个是罗章龙。罗章龙没有军队，没搞几天。张国焘也没有搞几天。张国焘我认识他比较早，是北大学生，五四运动前在长辛店搞过工人运动。搞职工夜校，他当校长。1918年我就与他发生关系。这个人历来有大少爷味道。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搞国共合作，他坚决反对，他不到会。

土地革命时，犯右的错误是有原因的。主观打倒资本家，平分土地，可以过得去。六次代表大会解决这个问题，搞人口平分地。

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他们是犯错误的，经过中央苏区斗争的，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时帮过忙的。有个时候红卫兵贴他们的大字报，现在选他们进中央委员困难，其实和朱德、陈毅差不多。有人说朱德、陈毅反了……几十年其实也有时不反的。红四军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八次代表大会，是想夺军权，心里又不踏实，到上海中央请示。中央批评是极端民主化。后来请我回军队了，我又不是复辟了吗？项英夺了军权，又不会指挥，要请外国人来指挥。至于王明，没有搞过一个根据地、打过仗，农民运动也没有搞过。那时二十八个半吃得开，我们这些人是右派。

一个时期项英没有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吸取了教训。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情，不能不利用他，不能不限制他，不能不改造他。他们要反限制。有的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有的就反对，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场文化大革命，一方面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一方面有人乘机放毒，大闹一切。我看这样都无关大局。是指武斗。有的武斗几万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好象军队稳不住了，其实不然。军队有两派，野战军、地方军各支一派。如保定、浙江、四川、贵州、云南都是如此。这都是我们自己经过的。这些矛盾过去没有暴露过，这次暴露了是好事。这些同志我看是可以讲清楚的。过去搞武斗，现在应该联合，是人民内部矛盾，何必那末记仇。

看有些干部，叫他犯错误检查了没有事。有的人犯了错误，群众抓住不放，譬如杨勇。当然他有错误。是哪个下的命令把他关起来（有人说：是个老帅下的命令，他们大闹一场，还强加于中央文革。）肖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是有问题的。杨、余、付主要是杨、余的错误大些，不过傅崇碧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都不讲真话。

现在的问题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要把政策落实，一年左右，自己要亲自抓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所有工宣队、军队宣传队都不能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工人阶级压倒一切。你反军代表，就说人家反解放军。其实是几个学生说几句话。反工宣队就说人家反工人阶级。这些话不要这样提，反一下不要紧，要作工作。大多数是不同意他们这样做的。街上贴几条标语就倒了，风一吹就倒了。去年有人要打倒张春桥，有人要打倒张国华。打了半天，今年还在这里来开会。现在打的那一派比拥护的那一派还好一些。

所有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形式上解决了，是形“左”实右。如北京木材厂、车辆厂、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也有共产党，有的是走资派。他们搞物质刺激，搞奖金挂帅、利润挂帅，关、卡、扣、压。我看所有制还没有解决。不是全部没有解决，是相当一部分没有解决。学校也是如此，领导权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

今天要通过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风英、孙玉国、纪登奎九个同志报名要发言。还有谁要发言？谁发言就报名（等了一会，没人报名）先周恩来同志发言。（周恩来：先通过，后发言）不发言谁晓得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啊？

［总理发了言。孙玉国是来自珍宝岛的一个边防站的付站长，65年入伍。三月十五日他在付营长负伤后，代理付营长指挥，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他一上台，朝毛敬礼。毛站了起来，招手致意，在几个人发言时，毛都点名，在康生发言后还说“怎么办？你们都是分秒必争啊！”意思是说发言都很快。孙玉国发言中间，毛数次鼓掌。当孙玉国讲到“中国革命是打出来的，世界革命也一定是打出来的”时，毛、林彪、中央文革成员都鼓掌，微笑，毛问旁边的人：他今年多大了？然后又问孙玉国：］

你今年多大了？三十？（答：29岁）哪里人啊？（答：辽宁的）噢东北人。老家在哪里？（答：河北）打过仗没有？（答：没有）（毛开始向大家）

他叫孙玉国。孙是赵钱孙李的孙。玉是王字加一点的玉，国是国家的国。这次珍宝岛打仗就是他指挥的，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敌人打仗用了飞机、坦克、指挥车，我们什么也没有。不用飞机、不用坦克、不用指挥车。我们的战士除了一个付营长，都是没有打过仗

的。这次破除了一个迷信。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胜仗。苏修他们开的乌龟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乌龟壳把人的勇敢降低了。我们打仗靠人的勇敢，靠不怕死，靠林付主席的二百米硬功夫。苏联有飞机、乌龟壳，我们是步枪、手榴弹，靠步兵。三月十五日来了许多辆乌龟壳，五百米我们不打，三百米不打，一百米还不打。五十米来了，我们一开火，他们的乌龟壳就翻了，不管用了。我们过去打仗没有乌龟壳，打胜了，还得靠人，靠步兵。乌龟壳我们有一点，但主要不靠他们。装甲兵司令来了没有？（回头看，没有。林彪说：“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来了。在下面。”黄站起来）我不是说不要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了，也不是说不要吴法宪的空军了。说还要靠步兵。靠二百米。要准备打仗，要做准备，各省都要能生产武器。主要是精神准备，新疆那里也可能要出点事。我们不打出去，边境上小打。可以放进来，给他些甜头，放进来后再打。下面请尉风英同志发言，还是辽宁的。（尉发言。在纪登奎发言前，毛说：）还有一个纪登奎同志发言。我们是老朋友了，他是山西的，在河南受了点灾难。（发言完后）还有谁发言？大家都赞成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的了。这还是少数。下面先通过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赞成的举手。（毛也举手，看一看。）有希望噢，大概是多数，通过。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毛举手，看看）也有希望噢，多数，通过。（然后毛宣布散会）

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及各大组召集人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9.4.23

这个名单很难排。比如北京军区六个军，只有×同志（一个军长）排上了。候选名单排上的，大多数是好同志，但并不一定个个都那么好。排上名单的好的是大多数，能保证党的领导。但也有的不那么理想。还有很多好的没排上。这么大数目，怎么能都了解清楚呢？不见得选上的、排上的都合乎理想。有的同志在中央工作犯了错误，不排又不好。也不是没列入的比列入的强。历史上常常证明后来者居上。头一次要进中央委员会的占名单的大多数，“七大”没有这么多人，“八大”也没有这么多人。八届中央委员只到了50多人。

工农代表要做工作。但要帮助他们，不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劳动。这些同志在地方上很活跃。参加中央工作后，来访的人也多了，就要妨碍他们联系群众和参加劳动。（有的同志从中央到社队都有工作，五种职务。大队和中央的职务留下，其他去掉。）不要脱产，这就是又要工作，又要参加会议。我们安排的县地委一些同志，只是了解本单位的情况。我们要帮助他们了解全国的情况。长期脱产，一到我们中央，这几个坐机关来，什么记者采访、照相，不用一年就要垮台。选工农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过去有，这次是主要的。工农占中央委员会70％以上，解放军是大多数，也是出身于工农的。

选进中央委员会的会不会变化？犯过错误的可能变好，不变就不行了。新选上的不要脱离群众，我就担心他们脱离群众。我们需要工农积极分子。有的省就提不出来，这就说明他们脱离群众。我们这些同志要了解积极分子，要和他们交朋友，开个会，了解不清楚的要和他们谈话。谈话就清楚了。黄永胜同志，打张辉瓒时你干什么？（黄……）到北京才认识。领导同志不要忙于事务。事务工作要做，但有些不管也可以。

这个名单大体上是公道的，但也有些不公道。譬如说正式委员，候补委员为什么这么分？我就说不清楚。比较困难的是几位老同志。

一些老同志排上了还得选他们（许世友：他们反毛主席几十年还选他们呐？）反几十年难说，要你许世友选是困难，这些人资格老，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讨甚多。检讨也检讨不清楚，就不要写了。写了大家也不满意，还不如不写。让他们到群众中去。世界上有这些老同志有什么办法？也有功劳，也有错误。我看这样就差不多了。看他们今后的表现。我们看他们的行为，他们也看我们的行为。“七大”选了王明、李立三，王、李代表两条路线，不选他们还行吗？“八·七”会议没有叫陈独秀参加，“六大”叫他参加，他就不来了。李维汉在湖南就很右，他同情把农民运动骂成痞子运动。后来到了中央苏区，很“左”，形左实右。形“左”实右是掩盖右倾的实质。“左”是形式，右是本质。这些人后来都坏了。现在选进坏的也不怕，没有他们，地球还不一样转？

（许世友：毛主席下命令，我们就选。）那不行。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么！

我看共产党就比国民党和其他党好。我们选举，起码不用花钱买选票，不要活动费，没有到会的也可以选。“六大”我就没有到莫斯科，也选上了。王明统治四年，太“左”，不适合当时情况。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了，由于政策适合当时的情况。

资产阶级搞什么议会选举。我认识一个人，为了当税务局长，只当三个月，花了很多钱买选票。当了以后就拼命地刮皮，要不他就蚀本了。我们共产党是灭不了的。我们有政治纲领，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所以我们共产党不能埋头搞选举，更重要的是要准备牺牲的。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要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我们有许多根据地，活着的不多了，抗战以来，人多了。

在会议过程中，有些代表团提了意见，我是赞成的。黑龙江的工作做得不错。我们这个名单没有刘少奇一伙，王明说他是精华而我们是糟粕。刘、邓要有区别。邓小平在红七军时临阵逃跑，在北京又干了许多坏事。他打过仗。有人说他打仗也不那么行。在中央苏区他是受打击的。

还要选政治局委员。挺麻烦？你们想一想，一步一步做。我想由下而上的方法比较好，只提数目，不提名单。大家想想比较好。搞个政治局常委，想一想群众路线方法比较好。（周恩来：主要在于协商，由下而上。过半数当选。用票数多少比较，不是无产阶级政治的表现。）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9.04.28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

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跟王效禹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

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谢富治。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罗。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会！

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

毛泽东

1969.05、1970. 02

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其他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对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9.06.06

看了之后，很感兴趣。对每一具体技术改革说来，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不必再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历史上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电力，现在又发明原子能之类。

对江青关于京剧《智取威虎山》改名等问题请示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69.08.31

牵动太大，至少暂时不要改动戏名和主要人物名字，地名暂时也不宜改动。对小说作者的批评也宜从缓。

1970 年

在康生转送陈垣来信的报告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70.01.00

同意。要争取这样的知识分子。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送审稿的批语

毛泽东

1970.04.03

此文写得较好，已看过，另一篇待看。用这一篇似乎就够了，可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有用的话，不至于引起反感的话，保留了几段，并未全删。以上请酌。

关于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批语

毛泽东

1970.04.12

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同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马哈古卜谈话纪要（节录）

毛泽东

1970.06.24

马哈古卜说，在英国还没有完全从苏丹撤走前，美国又进来了。但是由于人民的团结和斗争，英国的星辰已经落下去了，美国的星辰也要落下去。

毛说，这个世界上怕英国人、怕美国人的很多，这几年慢慢地都不大怕了，并敢于说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话。你们苏丹人民了不起啊！

毛又说，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统治者是要分开来看待的。我对美国人民是寄予希望的，就是美国的工人以及其他穷苦的人。他们总有一天要站在你们和我们这个战线的。

美国独立时，只有三百多万人口。那时英国有近两千万人口，是全盛时代，可是打了败仗。打了八年啊。还不就是一些比你们现在还要差的武器。你们苏丹有一千四百多万人口。

马哈古卜说，人民已经起来，毛主席的教导在全世界已经传播开了。人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理解了毛主席的话，懂得真理应当属于自己，所以人民一定会起来。

毛说，中国的经验可以作参考，要结合各国自己的经验。我们也是找外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经验，譬如巴黎公社的经验，十月革命的经验，等等。

毛说，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可以进口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但是要自己搞。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

马哈古卜感谢中国向苏丹提供友好援助，特别是在谈判中贯穿的友好精神。

毛说，物质援助，要到了手，见了效，那才算数。不到手，工厂没有建立起来，那不能算数。你们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没有培养出来，中国人不撤走，也还不能算数。那末，什么叫帝国主义呢？它就是不帮助人家建设的，它赖着不肯走，那没有办法，只好革命了。

毛说，非洲可沸腾起来了，闹起来了，大闹起来了！半个多世纪了，五十多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又培养了反对它的人，另外培养一批走狗拥护它自己。

毛说，美帝国主义、世界人民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这个美帝国主义专门团结那些各国人民认为是不好的人。它喜欢那类人作朋友，我们就喜欢我们这类人。

在讲到帝国主义对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施展阴谋活动时，毛说，帝国主义是要对非洲各国人民的领袖和著名政治家进行暗害阴谋活动的，要提高警惕。

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关于王光美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70.07.00

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都宜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请中央一议。

（注： 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

我的一点意见

毛泽东

1970.08.31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70.09.06

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的几本书时，毛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毛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在讲到党内外团结时，毛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对吴宪法检讨信的几条批注

毛泽东

1970.10.14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对叶群检讨信的几条批注

毛泽东

1970.10.15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一段谈话

毛泽东

1970.11.13

我们这几年一直总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钢之间往来徘徊，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觉悟了，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

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70.11.24

林彪同志：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关于同意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语

毛泽东

1970.12.00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70.12.16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

1970.12.18

斯：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 ，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

，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

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斯：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

毛：可讨嫌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

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

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

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

斯：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luo， 左"口"右"罗"］，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

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路线被批判了。

斯：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

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一九七二年。

毛：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二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

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末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嗵！嗵！嗵！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的嘛，只有三万人不到，一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

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两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二百户人家。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

斯：你想到了。

毛：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

毛：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蒋介石，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勃兰特也不算怎么好。

斯：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

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毛：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一个，毛泽东一个。

斯：我认为，你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重要的。

毛：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个讲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

毛：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

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洲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Belden（贝尔登）。

斯：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

毛：那个拉提摩尔怎么样了？

斯：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斯：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

》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斯：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那就早［luo， 左“口”右“罗”］，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是新版吗？

毛：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

斯：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

斯：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吗？

毛：就是那张。

斯：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 and order （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 （法律），是喜欢那个order（秩序）

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新宪法要写上。

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毛：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个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去调查一个工厂，我是说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够了吧？

斯：够了。

毛：如果调查两个工厂也只有两个星期。调查一个农场，一个星期也够了吧？

斯：够了。

毛：调查两个农场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个月嘛。再调查两个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时间。

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他们怕你调查他们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不容易。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

毛：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中国之间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欧洲，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斯：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荡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们的一上辈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距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对他们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

毛：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斯：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那是。

毛：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毛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毛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毛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毛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末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

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斯：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

毛：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

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

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好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

斯：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毛：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

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斯：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的变化。

毛：就是这个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斯：有时候还要走0型，然后再设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

毛：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批语

毛泽东

1970.12.19

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

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

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70.12.29

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1971 年

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军队要谨慎”指示情况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71.01.08

林、周、康三同志：

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在军委办事组关于学习讨论毛主席“重点在批陈”指示情况报告上的两段批语

毛泽东

1971.02.00

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关于批陈整风运动重点在批陈的批语

毛泽东

1971.02.19

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送审稿的批语

毛泽东

1971.03.15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

只在18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17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对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71.03.24

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很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关于黄、吴、叶、李、邱的自我批评的批语

毛泽东

1971.04.11

恩来同志：

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在李德生报告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71.04.24

这样就好。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工作不顺利，有中央帮助，总会解决。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

毛泽东

1971.08—09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斗争。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

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毛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毛说，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毛说，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说，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武昌与刘丰、刘建勋、王新、汪东兴的谈话

毛泽东

1971.08.17

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81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

毛又说：六届五中全会，是在江西瑞金开的，他们都到了中央苏区了。我是政治局委员，不让我参加会，让我当苏维埃主席，不让我在军队工作，让我去做群众工作。

毛说：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是周总理指挥的。

毛接着说：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王明错误的路线。王明夺权四年之久。上海的中央移到中央苏区去了，陆续跑过去了。先是周恩来，然后是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去的。到中央苏区，李维汉去得早，他那时是组织局长。然后是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懋功会合以后，张国焘搞政变，成立伪中央。

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

毛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

（在座的人纷纷检讨自己犯了错误。）

毛接着说：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毛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毛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

毛接着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

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毛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

毛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毛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毛接着说：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人、三十岁以上的人。

在武昌与华国锋、汪东兴的谈话

毛泽东

1971.08.25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简述了党史，说：中国也怪，中国党没有分裂。陈独秀81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是犯路线错误。王明搞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即第四次、第五次全会。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义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毛又说：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毛接着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六号简报时）毛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

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在谈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时）毛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毛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最后，毛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在长沙与华国锋、卜占亚、汪东兴的谈话（摘要）

毛泽东

1971.08.27

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

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

毛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毛讲完这段话，带着几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的谈话

毛泽东

1971．08．28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

毛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毛把话题转到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毛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1935年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又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坑。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转向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问韦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算第四。

（刘兴元做工作汇报）毛听完后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讲到延安整风时）毛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讲到打锦州，毛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又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毛沉思一会，把谈话转向“天才论”，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毛接着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

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进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和汪东兴的谈话

毛泽东

1971．08．30

（当谈到林彪一伙人的问题时）毛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在谈到党的状况时）毛说：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81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样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又说：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

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1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

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毛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毛看了看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说：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接着谈起中苏关系）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又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毛最后说：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在南昌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的谈话

毛泽东

1971.08.31

（毛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陈独秀搞分裂，有81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

毛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 到江西、湖南一带。

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在杭州与南萍、熊应堂、陈励耘、汪东兴的谈话

毛泽东

1971.09.03

毛说：那份简报（指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毛又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在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时）毛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再次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又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毛再次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态度），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毛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又谈到军队问题）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毛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三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同时，又批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毛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在丰台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汪东兴的谈话

毛泽东

1971.09.12

（毛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谈了阿党对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

毛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

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他们（指美国）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要撤军。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

（接着，毛又谈起党的历次路线斗争），毛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渔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81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三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五十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毛谈了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成功，然后说：）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

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毛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

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对着汪东兴说）他沾了一点边，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作了几次检讨。

（汪说：正式地做检讨是三次。）

（毛在谈到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做检讨时说）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问）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

（纪登奎回答说：算！）

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节录）

毛泽东

1971.11.14

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周恩来：武汉检讨还没有写出来。］

（此时叶剑英进来了）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周恩来：后来杨成武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是树他自己的。（周恩来：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更厉害了，简直说得不象话了。）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把污水尽往自己身上刷，我说，你不要讲了。

（周恩来：万人大会斗陈毅，外事口的一些外国专家也参加了，当时搞不清楚。斗完后要把陈毅抓走，大会堂的服务员不让抓走。问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抓？服务员说主席叫保我们就保。）斗他的时候，向前向后三鞠躬，上汽车后又推翻了，又不承认了，说是你们逼我讲的。

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叶剑英答：当时我也不清楚。）廖汉生为什么要抓？（周恩来：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

你们如果有时间，鲁迅的有一本书是值得看看的。《准风月谈》的后记里，有曹聚仁写的一篇《文艺座谈遥领记》。曾今可要开文艺座谈会，请了曹聚仁没去，报上登出来，他成了发起人。曹就问龙榆生，那天的会是怎么开的，龙说：就是吃点点心、喝喝茶。曹聚仁说：“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啦！”这件事，可见那时斗争的复杂。现在，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我看不一定。今天你们吃了我的茶，就是我的人吗？不一定。总理、康老都喝过他们的茶嘛！吃了他的茶，就是他的人，不要党，不要中央了吗？

《我的一点意见》写好后，第二天早晨总理、康老去找林彪，看了以后，他说同意了。《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当主席，老百姓通不过。我说：我不当主席有十几年了嘛。我这个人，同你们吹一吹是可以的，要我当国家主席，天天去迎接外宾，迎来送往，什么国书啊，那一套，无非是催我见上帝。（叶剑英：主席很忙，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写出来。）和大家吹一吹就是了。

那些人整叶剑英的黑材料，我都看过，他们是步步升级，先是炮轰，后是打倒。后来他们看形势打不倒了，也就不打了。“红造”并不都是“五·一六”。整理的黑材料，有

一条国民党报上的消息，说红军长征了，叶在江西投降敌人。他是跟着长征了嘛，你们这些老同志都是长征的，那有那个事呢？

红军的传统历来不能自己打自己。（指张国华）你就是王佐部队的一个兵。（周恩来：后来是司号长。）王佐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有功劳的，而且还加入了党。就是舍不得那个山头，吃不了苦。王佐这个人被彭德怀杀了，这就不好了嘛！那有共产党的部队打共产党的部队？五军团的冀登同也不该杀。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你把解方这样的人杀了干什么。（周恩来：那个王实味也可以不杀。）不杀，现在多好。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活证据嘛。

（注：此件为中发［1971］148号文件）

1972 年

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

毛泽东

1972.00.00（下半年）

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

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毛泽东

1972.00.00 （年底）

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对苏振华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72.03.05

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

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72.03.25

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对反映白坚情况摘报的批语

毛泽东

1972.05.31

送总理阅处。

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

对贺诚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72. 06. 28

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的谈话（节录）
（未经本人审阅）
毛泽东
1972.06.28

毛：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

周恩来：头子在班房里。

毛：那些年轻人是受骗的。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你还不知道呢。

班：我听说了一点。

毛：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就是ALl-ROUND CIVIL WAR。 现在好多了。

班：就是自己人之间打内战吗？

毛：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

周：名义上是抢枪，实际上是送枪。

毛：他们外交部，她们（指王海容、唐闻生）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班：为什么？

毛：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班夫人点头）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班：见上帝？

毛：是啊，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班：噢，我明白了。（众笑）后来飞机怎么样了？我不大清楚。飞机掉下来了，还是过到苏联去了？

毛：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要摔。

（外交部绝密文件，文特69）

对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72.07.07

送总理阅处。

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在林枫家属来信摘要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72.08.11

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72.08.14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心脏病情况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72.11.12

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对刘建章家属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72.12.00

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1973 年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学习班

毛泽东

1973.00.00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每期三个月，一年办四期，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

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节录）
（未经本人审阅）

毛泽东
1973.02.17

毛：以前的仇人，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FRIENDSHIP（友谊）。

基：我们方面的感情是这样。我告诉过总理，我们同别的国家从未象同你们这样开诚布公和诚实地谈话。

毛：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到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我跟你们的一个记者EDGAR SNOW（埃德迦·斯诺）谈过，我说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大事也不行，不管用。

毛：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毛：对。

基：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

毛：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基：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毛：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实际上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基：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忠于各自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双方讲同样一个调子，只会使局势混乱。我对总理说过，在欧洲，你们出于自己的原则，可以讲得比我们更坚定。

毛：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

基：主席先生，从我们这方面说，你们和我们之间虽然有时要进行批评，但我们仍要同你们协调行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参与企图孤立你们的行动。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一切实质问题上要同他们合作，但目前欧洲的领导很弱。

毛：他们不团结。

基：不团结，而且不象你们那样有远见。当他们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们总想不费力气就使危险消失。

周恩来（对毛）：帮助蓬皮杜，他（指基）同意。

基：我们正在尽量这样做，回去后我们要争取做得更多。

毛：现在蓬皮杜受到威胁，就是那个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顶他。

基：两家联合。

毛：两家联合，苏联想要共产党登台。那个共产党我不喜欢，就象你们的共产党我也不喜欢一样。我喜欢你们，不喜欢你们的共产党。（基笑）

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

基：但是，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毛：我正是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毛：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基：我曾告诉过总理，你们的行动方式要比我们直截了当和英勇一些。我们有时要采用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 。

毛：英文什么叫做行动方式啊？

译员： MODE OF ACTION（行动方式）。

基：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末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毛：你说的这个是老实话。

基：这是我们的立场。

毛：中国人排外得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你们不同的民族有多少，你们美国有六十万中国人，而我们恐怕连六十个美国人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从来就不喜欢外国人。包括日本人也很少。印度人一个都没有。

基：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幸运。

毛：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一百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日本人占领中国十三年，占领大部分领土。他们过去占领中国领土不算，占领了北京还要赔偿。

基：还有治外法权。

毛：治外法权，多哩！现在我们对日本，不要它赔偿。没法算，谁也算不清。赔不起。

周恩来：一赔就要增加人民负担。

（注：此件节自外交部绝密文件（［73］办文特1号。）

给李庆霖的信

毛泽东

1973.04.25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的谈话（节录）

（未经本人审阅）

毛泽东

1973.06.22

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中的国家。你不要看中国有什么展览会啊，其实啊，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说，I SAY（英文：我说），越穷越好！就会革命啊。西方国家呢，不大行了。

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包括语言——的好的部分。

（外交部绝密文件，文特43）

对叶飞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73.06.25

纪、汪酌处，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

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

1973.07.04

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驻法、驻瑞士、乃至驻叙利亚，其他还有许多，都比外交部的意见高明。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浓缩铀吧。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写得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的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样浓下去，浓到明年，欺骗性变为更大，要升级了。这个欺骗性的问题闹了一年多了。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是讲我，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一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贵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 。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亚洲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插话：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改变。）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现在又说孔子是奴隶主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

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指李白）尽想做官，《梁父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

又说是美国不行了，腰杆子硬不起来了。她们两个从联合国回来都说美国的肉、蔬菜都不好吃呢。尼克松本人也承认中间有夹肉面包，有三块肉咬不动，中国、欧洲、日本。这还不讲其他，第三世界。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历来我们党，一股风一来，就是……。比如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自称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中央苏区的领导，就是指鄙人，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一股风一来，随风转。多啊，不是个别人。硬着头皮顶的是少数。幸得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个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尽转呢？日本人最好挡住在石家庄、太原以北。可是日本人不听话。你怎么办？一直打到广西、贵州。我的意思是最好打到重庆、西安去，他也不听我的呢。我这个思想，跟列宁接近，叫作半败北论。公开拥护蒋介石抗日，反对顽固派，实际希望最好把蒋委员长也打死。现在此人还没有落气，但是不能见人了。

我见了一个驻西德记者，叫王殊。被新华社整得要死啊！见了我就哭。这个外交是委托他去办才办成功的。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

关于革命不能有妥协这个学说，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嘛就被杀死，要嘛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

你们搞的托洛斯基文件，我还没有看完，看了一部分。他就是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列宁就是主张割地赔款，签和约。这个和约是闭着眼睛签字的。第一写上割地、第二是赔款。德国帝国主义跑了，对付西方，他也不能两面作战。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地也没有割，款也没有赔，条约一张废纸，就象尼克松讲的。

我是半败北论。列宁是主张完全败北，主张政府军完全被打败。那时俄国和日本的军队在旅顺、大连、辽阳一带打仗。越彻底越好，革命就会起来了，俄皇的威信就会完蛋了。我们打日本，不能学他的全部，实际上要用他的。蒋介石王八蛋，你干什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几百万军队都是反革命的军队，跟我们打了十年，又有三次反共高潮。我是希望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地方越占得多越好。

第二次王明路线的潮流就不同了，结果还是照我同一些要革命、有马克思主义的同志的意见。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论持久战》，批那个速胜论。名为批党外的，实际上批党内的。又批亡国论。

这类例子多得很，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威廉几世，（插话：二世）姑且说是威廉X吧，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东西进攻，结果皇帝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杀掉了，死掉了，跑掉了，我没有查清楚。军队全部覆没。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杀出一个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杀出一个中国革命。其办法很简单。你杀

得人，我就不能杀人？鲁迅在《阿Q正传》上写的，“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插话：有些人盼十大，开过十大，开人大，人大一开就要解决工资问题。）各有各的心事。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一个共性，至于个人想的，伤心之处不同，那是个性。我劝人们去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回。

（外交部［73］办文特17号）

（注：文中省略号是原有的。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上写有：“记录：王海容、唐闻生”）

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时的谈话（节录）
（未经本人审阅）
毛泽东
1973.07.29

毛：中国跟你们非洲国家差不多，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压迫我们。现在苏联，我们也说它是帝国主义，因为他也压迫我们。

周恩来：我们叫它社会帝国主义，因为列宁说过，披着社会主义外衣，实际上是帝国主义。

毛：我们希望你们非洲国家和地区一个个统统独立。第二，团结起来，逐步，急了也不行，逐步统一起来。还有拉丁美洲、亚洲——日本除外的一切国家——我们也是这么希望。日本为什么除外呢？它不属于所谓的第三世界。

毛：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大使馆在非洲各国犯过错误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新殖民主义。如果中国人在你们国家，一切非洲独立国家，在那里称王称霸，自以为了不起，那么这种态度就是不对的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叫新殖民主义，我不大清楚。

周：就是象美帝国主义那样，没有殖民地，但有特权，实际上苏联也是，即不是象老殖民主义那样直接统治。

毛：我对扎伊尔的总统说，那个时候，我们恨不得把你们统统推翻。我们是支持革命的，是支持革命人民的，可是这些人不争气，推不倒你啊，那也没有办法啊，只有跟你打交道。他说我这个话是实话。

因为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我说，你（指恩古瓦比）也要采取这种态度，就是要站在各国人民方面。

恩：是这样。

毛：总而言之，应该偏向代表多数人的政府。如果偏向代表少数的入，那就不大妥了。

有时候在外交政策上也不得不搞。譬如美帝国主义，他们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所以叫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跟它往来，因为现在那个左派好是好，但是没有权力，中间派也没有权力，就是这个右派，反共最厉害的，尼克松，他有权力。

毛：现在这个世界，不要相信是平安无事。

周：天下大乱，毛主席常说是大乱。

毛：现在的局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这个山雨要来，还没有来呢。可是风来了，而且风很急啊！不晓得你们非洲人感觉怎么样？

恩：我们要保持警惕，因为现在有表面和平，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大家都谈“安全”，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所以我们对世界和平持怀疑态度。

毛：我们根本不相信，什么“和平”啊，“安全”啊。

（外交部绝密文件，文特57）

对郭化若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73.08.04

总理、剑英同志：

请考虑可否给郭化若分配工作。并希将孙子序言改版，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此信并请告郭。

七 律

读《封建论》呈郭老

毛泽东

1973.08.05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对罗瑞卿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73.11.20

似可释放。请中央酌定。

对批评江青的一封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73.11.25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对江青诬陷周恩来的批评

毛泽东

1973.12.09

唐闻生、王海容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给华国锋写的材料中说：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在政治局批评周总理同基辛格会谈中所犯错误的会议上，江青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江青还指责周总理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主席。十二月九日，毛主席在会见尼泊尔国王后，曾分三批先后同周总理、王洪文和我们两人谈了话。

主席对我们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周总理后来告诉我们，主席也跟他讲了这两条。王洪文也曾承认主席那次也对他讲了，不同意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

［注：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

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问题的谈话要点

毛泽东

1973.12.12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提出了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和二十一日，毛又对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等问题，作了一系列指示。

十二月十二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我主张找各大军区的人，司令员来。议什么事，要议军。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毛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呢。

毛提议，陈锡联同志当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同志到沈阳军区去；杨得志同志跟曾思玉同志对调；许世友同志跟丁盛同志对调；韩先楚同志跟皮定均同志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他们都刚去，不要动。

毛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

你们还要工作呢，还要保持晚节 。 ［注］

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

牛长角干什么呢，无非是斗嘛 。 ［注：这两段是校对记录稿后加上去的。］

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你（指叶剑英）把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吧，参加议军。

十二月十三日，毛在同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时，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

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十二月十四日，毛在同政治局有关同志谈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问题时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一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就会批你（指陈锡联），那也不要紧。辽宁“八三一”、“辽联”是两个小团体，彼此要照顾一下，不要偏了。“辽联”、“八三一”，不要批呢。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

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包括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不然，“ 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不大好呢。要开

一个军长、政委，师长、政委见面的会吧。不认识一下呢，也不大好吧。比如东北吧，要他（指陈锡联）在场介绍他（指李德生）。比如华北，要他（指李德生）在场介绍他（指陈锝联）。还有政治委员。

毛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毛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

毛再一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毛说，他们（指各大军区司令员）到了，开门见山，讲互相对调，不要吞吞吐吐。对共产党员不要吞吞吐吐。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吞吞吐吐呢？就是直说。

十二月十五日，毛在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大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

毛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起梗子，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比如那个“八三一”、“辽联”，他不要贴你的大字报？你那个出气的人、你不喜欢的那个人都走了，你还贴大字报吗？

我们还有一位李司令，到了没有呢？司令常来常往嘛！如果到那边不顺手，我们也可以商量一下。（李德生说：一定顺手！）靠不住。你不从坏处着想，单从好处着想。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

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象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中国人有那么多，有那么几万，几十万坏人，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

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包括反革命。保存活证据，不要杀。

犯点错误呢，改掉就好。

毛说，准备打仗！ 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

人家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不过他有个大使馆在这里，也要消灭呢。我估计，他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选了两个小城市打，一个广岛，一个长崎，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他不打。

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这时，毛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毛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选妃子遍及全国，某一个省就选了三百人，这也是共产党干的事呵？！

毛说，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杨得志同志带一个旅到延安，我才认识他。他是要抓逃兵的。我说逃兵不要抓，他不喜欢在你那里，让他走了算了，如果要抓，请他吃一顿猪肉，因为他不满意嘛。捆绑不能成夫妻嘛，捆绑能够革命嘛？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指邓小平）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那就要当老百姓。那个乡村里头，工厂里头批起来也厉害。

动不动就说人家“三反分子”、“五一六”。甚至福建李庆霖的那一封信，我看了相当好呵，有人说那里头有刺，就是要有刺呢！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辽宁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也有人发议论，说是不对的。后头不是在人民日报登了吗？也说是不对的。

我看，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他们考。他们总是看不起学生。

现在好多人又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最后，毛说，要准备打仗！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们时，又作了许多指示。

毛说，不要相信那些屁话！我们在旧社会，国民党的报纸那么多，广播电台天天吹，又没有把我们就变成国民党了嘛。我们还是共产党。现在贴两张大字报，不要紧呢。

总是两面的。你们说了什么四川不行，有些不听话，不听调。这也是常事，养着嘛！有一个能办事的就好了嘛。 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这个会差不多了吧。明天一天就“聋子放炮竹”［注：这是《红楼梦》第五十四回中王熙凤讲的一句歇后语，意思是“散了”。］了。

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第四回里边有一张“护官符”，那上面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你（指许世友）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按：《晋书·刘元海传》中刘元海说：“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主席说，“鄙”字改为“恨”字。随、陆、绛、灌分别为汉朝的随何、陆贾、周勃、灌婴。）你能够看懂《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少文。

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慢慢来，就会顺手。

还有什么话讲啊？明天开一个大会就散了罗。（周恩来说：还要起草一个命令，鼓励大家一下。）噢，这个好。你们带个头。底下的政委、参谋长、总部、省军区、军、军分区，还有什么人武部，人也很多。这个问题不要紧。

世界上总是这样的（把两只手合起来），总有两面。有廉洁必有贪污，有贪污必有廉洁。只有廉洁，没有贪污，也不行啊，那就只有一只手。这个手（举左手）是廉洁，这个手（举右手）是贪污。是对立统一。

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苏联现在跟我们又在拉关系。最近有个什么文化部的招待会上，他们跟我们驻苏联武官处的人谈话。我们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时候那样。二要承认错误，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

你陈司令（指陈锡联），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位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

这时，周恩来提议唱个歌，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第一段。毛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

毛又亲自指挥，大家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后鼓掌。毛宣布散会。

（注：这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文中注是原有的。）

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节录）

（未经本人审阅）

毛泽东

1973.12.21

（同朱德握手时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对朱德）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

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 。

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自我批评。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记录稿。）

1974 年

对江青的几次批评

毛泽东

1974.00.00（下半年）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两次讲：“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间，毛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又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

毛泽东

1974.00.00

毛在几次会见外宾时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比较过去很不安宁，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包括中国在内。前不久出了林彪的事。林彪是我们党内的一霸。

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头几年，不讲和平，不要说要缓和紧张，而现在大讲特讲！没有病，就不要看医生。有病，他就要看医生。现在地球害病，所以要讲缓和紧张，缓和国际紧张，要讲和平。现在给地球治病。我是持怀疑态度。国际会议这么多，美国这个国务卿到处跑，相当怪！黄昏的时候，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

我是不赞成所谓永久和平的。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美国人就跟我讲，争取时间。我也觉得这是个严肃问题，现在全世界人民考虑的问题。

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是世界性大灾难时，毛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是不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

毛说，未来总是光明的。要经过斗争。不斗啊，人家不听你的话！

毛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

给叶剑英的信

毛泽东

1974.02.15

剑英同志：

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内容的通报

毛泽东

1974.02.22—25

一、毛对卡翁达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又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对布迈丁也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二、当布迈丁问到美苏是否达成某种协议和进一步问到战争问题时，毛说，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我看会打仗。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暂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

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争，也不是这些富国的人民想要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想到希特勒几乎统一了欧洲，又失败了。谁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又产生了十月革命。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尾把日本、后来又把蒋介石赶走了。

至于打不打原子武器，可能打，也可能不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对日本打过，但是后头在朝鲜战争，就没有打。在越南战争，也没有打。在中东、以色列也好，埃及也好，美国人跟俄国人也没有援助他们原子武器。

布迈丁说，我们国家太小了，没有办法对付大国。毛说，你们不小，你们把法国人赶走了，越南人也把美国问题解决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把美国军队赶到南边去了。现在美国到处霸了地方，它要保护这些地方，力量就分散。苏联要对付的地方也多，欧洲、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中东、南亚、中国、日本、美国，太平洋的美国。它的事情也不好办呢。

布迈丁问，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态度如何？毛说：准备打仗！准备它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三、毛对卡翁达说，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你呢，我们希望也是要帮助人民。我劝你对人民要好啊！没有人民就会垮台。当卡翁达谈到赞支持世界的反帝反殖斗争和在国内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时，毛说，你现在不能当共产党，你当共产党，人家就都反对你，但是你可以看一点马克思的书。

四、当谈到中国的成就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时，毛对布迈丁说，中国成就有一点，但是不大。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有时候工作方法比较好，有时候不大好。如果片面地介绍中国，说怎么好，那是不妥的。当然，说中国是一片黑暗，也是不对的。

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有黑暗这一面。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就爱吹他的成绩，而不爱把自己的错误讲出来，所以你们要注意。别国大体也是如此，总是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缺点。

当卡翁达赞扬我援赞工程人员时，毛说，我们是共产党啊，应该好一点！我们的人也犯了一些错误呢。要教育。共产党内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有一些人看不起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人民，所以应该教育。我委托你教育中国的工程人员，还有尼雷尔总统，也应该这样做。在你们那里工作的，世界上的人作了坏事，不管哪个国家的都应该教育、处分或者把他们赶回来。不然那些人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帮助你们修了铁路，了不起呀。

五、在同布迈丁谈话时，毛指出，地中海是密切关系欧洲的。欧洲安全，阿拉伯世界不安全，地中海问题不解决，那怎么行呢？几十个国家怎么能取得一致？单是欧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如果是听两个大国——美国跟苏联，这也不行吧。

六、毛还对卡翁达说，非洲最好统一起来。南部非洲难啊！中间和北方的慢慢地统一起来。并且说，你们应该发展人口。中国人口太多。非洲人还不够。

给江青的几封信和批语

毛泽东

1974.03—11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3．20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3．27

江青：

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4．17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

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11．20

同尼雷尔谈话主要内容的通报

毛泽东

1974.03.25

一、当尼雷尔提到美苏不是为和平而努力时，毛说：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并说：总而言之，所谓裁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说要裁军，结果谈出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后又说要裁军，又是几年了，没有一个裁的。但是他们双方都说他们要搞和平，而且是长久的和平，或者是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嘛，大概是半个世纪，五十年吧。何不讲两代人呢？因为这一讲，他的武器就没有销路了。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总而言之，我们对“持久和平”这样的口号要看一看呢。大概一段时间可以，太长了不行，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总而言之，这个全世界是不安定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讲和平，就是因为这样讲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的口号。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

二、毛说，他们（两个超级大国）现在有点怕第三世界。尼说，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他们就不会怕。毛说，也怕呢。尼又说，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毛说，那不能这么讲！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

三、毛问到：整个非洲的事情怎么样了？尼雷尔回答的过程中，毛插话说：比过去都要好些。就是讲北部和中部非洲。当尼雷尔谈及他们在南部非洲正在努力赢得独立时，毛说，我跟你们意见一致，就是不喜欢南非白人政权控制非洲人民。并说，（南部非洲）将来总是要起变化的。非洲的变化已经够快的了。

四、尼雷尔说，中国现在对非洲的帮助是很多的。毛说，帮助很小。当尼称赞中国医疗队时，毛说，应该主要是帮忙教会你们的医生。搞铁路的也应该主要是教会你们勘察、各种建设、修路、桥梁。各种技术人员都这样，我们将来一走，你们就完全可以自己管理了。如果不教，那就不好哩。

毛说，听说我们的人在你们那里做了一些坏事。并问：给了赔偿没有啊？有些犯错误的也撤回了吧。人多了，我们教育又不严，势必将来也还要出一些问题。你们发现有什么错误，就告诉我们的大使。尼称赞中国人员在坦桑人对他们不好时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从不发牢骚。毛说，不能怪你们。这个不能发牢骚，发牢骚是错误的。尼谈及他的母亲向我人员送活羊和鸡蛋时，毛说，收人家礼物不大好吧。以后成为风气不大好。

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

毛泽东

1974.05.25

一、毛问希思，尼克松水门事件能过关吗？希思认为尼可以幸存下来。毛说，那个水门事件我们不懂，为什么闹得这么大。何必呢？没意思。借题发挥。希思问水门事件是否使中国建立同美的关系及执行对美、对尼克松的政策更困难？毛说，倒不。希思问中美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似乎停滞了。毛说，那不要紧，还是比较好的。你可不可以劝一下尼克松，帮他一个忙，叫他渡过水门难关？

在谈到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时，毛又说，美国人呢，就是手伸得太长了。你看，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东南亚、南亚、伊朗、土耳其、中东、地中海、欧洲。美国人骂了我们多少年，二十多年。希思开玩笑地说，中国对美国帝国主义要当心！毛说，但是我们比较对美国人放心。

二、毛问希思，你们欧洲那个安全会议哪一年搞成功啊？当希说如果问这个会议什么时候完蛋倒更容易回答些时，毛说，对，我们的意见一致，这个欧安会完蛋了，他们（美苏）两家真正的和解也就搞不成了。

当希思谈到苏联下了很大决心并有强大的组织来增强其实力时，毛反问，难道苏联就没有困难吗？并说，我看他们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当希思再次强调苏军实力并问及中国是否认为苏联对中国不构成威胁时，毛说，我们准备它来。但是它来了，它就垮台了呢！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俄国这一股祸水流向中国。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包括达拉第，就是推德国向东。

希思问中、苏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毛说，由意识形态引起的边界问题。中苏争吵要从五四年开始算起，因为五五年赫鲁晓夫就找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希说，阿登纳总认为苏联会企图接管欧洲。毛说，欧洲、亚洲、非洲，但是它力不从心。丢了埃及。在我们这里影响更小呢。也有些影响，林彪就是他们的人呢。

希思说，虽然苏联同甘地夫人订了一个条约，但他们在印度也没有多大影响。毛说，我也这么看。你们的外交部长霍姆先生劝我们要跟印度搞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印度从苏联那边挖过来。

当希思说一个强大的欧洲很重要，可以使俄国发愁时，毛说，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并且说，我们看欧洲、亚洲，包括日本，都不要吵架。要吵呢，可以，不要大吵。希问中国对日本比较放心吗？毛点头并说对。

希又问中国是否相信日本人的和平意图。毛说，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将来很难说。但是我们不怕你们欧洲。

三、毛说，英国能够跟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还是希思办的呢，所以我称你为首相先生。当谈到因为希思不是现任首相所以未安排他在机场检阅仪仗队时，毛说，我看要。不怕得罪威尔逊。（对希）我是投你的票的！

当希思谈到可能英国在技术方面能向中国提供所需的帮助时，毛说，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希表示始终乐于帮助，毛说，好，很好。

毛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指在座的年青人）的事情了。

以安定团结为好

毛泽东

1974.08.00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对陈丕显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74.09.17

洪文同志：

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

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

1974.11.00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对电影《园丁之歌》的评价

毛泽东

1974.11.00

我看是出好戏。

同邓小平在长沙的一次谈话（节录）

（未经邓小平核对）

毛泽东

1974.11.12

（毛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邓：主席也知道了。）好！（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赞成你！（邓：她［指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用手指王、唐）都不高兴。（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这个好。

（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唐闻生、王海容的记录稿。）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

毛泽东

1974.12.00

毛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说，这次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中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关于民兵不要参与两派对立的意见

毛泽东

1974.12.00

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

对反映刘景范情况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74.12.21

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

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节录）

（未经毛、周审阅）

毛泽东

1974.12.23

（毛摇着手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涨红着脸，点头说，以后不搞了。）

明年一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就是讲话、肺、腿。

（谈到邓小平时说）他（邓）政治思想强，Political（政治）比他（用手指王洪文）强，他［指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

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人材难。［注：毛当时在纸上写了“人材难”三个字，写到此处，周恩来马上说出来：人材难得，毛就把笔放下了。

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沉默片刻）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搞乱了，三件事，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又不告诉我。

（注：这是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此件根据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唐闻生、王海容的记录稿。）

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节录）

1974.12.23-1975

（一九七四年末至一九七五年初）

传达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日四次谈话要点：

一、留三天谈谈。二十四日又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二十五日说，你们还可再留两天。二十七日见面时说，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二、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在二十四日谈话中，主席又说在批刘批林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 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洪文同志有回答，我与洪文同志谈了话）

［原稿不含三、四两点］

五、在二十三日谈到小平同志时，主席写了“人材难”三字和“强”一字，并指指脑袋，说小平是难得人材，政治思想强。在报告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讲到副总理名单时，主席在听到我念邓、张、李对，又加了一个陈（锡联）字，念为邓、张、李、陈，并说张有才干，李较软弱。

六、主席说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江青同志说，没有工作做，主席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主席自己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对江青同志，主席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这一条，我们报告主席，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一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七、主席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我们说，在一、二月份，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我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七月十七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曾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怂”起来的。

主席说，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八，谈到国际形势，主席认为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主席认为要弄清苏修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主席问，如果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该怎样？我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主席点头。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周恩来手稿。）

1975 年

给江青的信

毛泽东

1975.01.04

江青：

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暇时可以一阅。

关于释放战犯问题的意见

毛泽东

1975.02.27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包括］？

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75.04.23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为盼。

关于知识分子的两句话

毛泽东

1975.05.03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

老九不能走。

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毛泽东

1975.05.03

毛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到会者一一同毛握手。

（在与周恩来握手时，周说：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毛问：怎么样？还好吗？（周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问候了。）

（在与叶剑英握手时）说：老帅呀。

（在与邓小平握手时）说：小平呀。

（在与陈锡联握手时）说：你要挂帅呀。

（在与纪登奎同志握手）纪说：最近刚见过主席一次了。

（在与吴德握手时）说：吴德有德呀。

（在与陈永贵握手时）说：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

（在与吴桂贤握手时），吴说：主席好，我是吴桂贤。

毛说：我不认识你啊。

吴说：我六四年见过毛主席，国庆节参加观礼的时候。

毛说：不知道。

吴说：延安儿女问候你。

毛问：你是延安人哪？（周恩来：她是河南人，陕西西安的纺织女工。到延安去看了。）

（在与苏振华握手时）说：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比小指）。

苏说：现在大了一点了，现在这么大（用无名指作比）。

（在与谢静宜握手时）说，你当了大官了，要谨慎呀。（谢答：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毛说：试试看吧，不行就（作手势）搞不好就卷铺盖卷。

毛说：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办了一个大学，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唐），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邓是你（指小平），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除邓以外）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指邓），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一九五八年就写了文章？那时代还不认识他，好象不认识（张春桥说：见过一面），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候是邓拓管的吧？（张春桥说：是吴冷西。）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来学说。巴克来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

（江青说：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毛说：嗯。

毛说：那是谁？

（张玉凤：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象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罢工的时候，还没有修这条铁路，二〇年、二一年、二二年，这三年我是在湖南搞工人运动，粤汉、安源煤矿，湖南一些工厂，株洲、萍乡、粤汉路、株萍路、安源煤矿、水口山锡矿，名日锡矿，其实没有锡。

无锡锡山山无锡
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
长沙沙水水无沙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孙权要搬家，老百姓说，宁饮扬州水，不食武昌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指叶剑英）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

（毛要叶剑英念了一首辛弃疾的诗）

南 乡 子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说：此人（指叶）有些文化。“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看不起吴法宪。黄吴李邱不是曹刘，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吴法宪不行。

（周恩来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到会者与毛一一握手告别）

（在与周握手时）毛说：还是三句话。

（在与王洪文握手时，王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说：你不要（作手势翻过来翻过去）。

江青说：听主席的。

张春桥说：按主席的指示办。

姚文元说：照主席的指示办。

（在与陈锡联握手时）毛说：司令官呢。

（吴桂贤说：主席保重。）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

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上的两条批语

毛泽东

1975.05.17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印发中央同志。

傅连［zhang， 左“日”右“章”］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

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同邓小平关于批评“四人帮”的一次谈话（节录）

（未经本人审阅，未与邓小平核对）

毛泽东

1975.06.00

（邓：会议的情况［注：指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以后，政治局根据主席指示开会批评“四人帮”的会议。］毛主席都知道了。）

（毛点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你（指邓）跟庄则栋讲一下，告诉他，不找陈锡联不好。跑江青、王洪文，司令不好办。

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

（邓：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指邓），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他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

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那好。

（邓：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邓：开始工作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邓：总参谋长。）

就是这样。

（注：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唐闻生、王海容的记录稿。文中的注是原有的。）

关于原林办工作人员处理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

1975.06.30

中央：

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予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

请讨论决定。

对“四人帮”文艺政策的批评

毛泽东

1975.07.00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对嫌疑人员处理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

1975. 07. 01

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予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

对林默涵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75.07.02

中央：

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

附林默涵来信。

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

毛泽东

1975. 07. 14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

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本家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十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长春沈阳解放。

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对电影《创业》导演张天民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

1975. 07. 25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关于《水浒》的评论

毛泽东

1975. 08. 14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对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请示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75.09.00

已办，退小平。

另，江青不要参加对越活动。

对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请示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75.09.09

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就业的，转别地就业。如何，请酌定。

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的指示

毛泽东

1975.10.00——1976.01.00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 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

、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苏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 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

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6］4号）

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的批语

毛泽东

1975.10.16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关于江青不要下去“蹲点”等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

1975. 10. 27

改一改，
不要蹲点。
军队、地方都不要蹲点，
特别在北京，
我在北京没有去个（过）任何一个地方，
说话不要冲口而出。
不要管，
要顾大局，
不要打电话，
不要来看我，
有事写信。

在苏振华关于拟到东南沿海视察的报告上的批语

毛泽东

1975.11.00

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退苏振华。

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

1975.11.13

过去只有河南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关于暂时仍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批语

毛泽东

1975.11.15

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

关于打招呼会议的两个批语

毛泽东

1975.11.22、23

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小平同志：

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1976 年

对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76.01.31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关于知识青年问题宜专题研究的批语

毛泽东

1976.02.12

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

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批语

毛泽东

1976.03.10

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对选印的天安门事件中诗文原件的批语

毛泽东

1976.04.13

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

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几句话

1976.04.30、06.25

慢慢来，不要招（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国内问题要注意。